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2004)

The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主　编/景体华

副主编/陈孟平　陈　维　刘品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预　测　态　势　·　指　点　迷　津

“皮书系列”图书（经济蓝皮书、社会蓝皮书、世界经济黄皮书、电子政务蓝皮书、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等）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几年推出的大型系列图书，它们由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权威研究报告组成，对每一年度中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预测。该系列图书的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为主，兼有国家各部委、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均为国内一流研究机构的一流专家，他们的看法和观点体现和反映了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最高水平的理解和认识，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大部分新版“皮书”开发了数据库光盘（SSDB），该光盘是电子书，具有电子浏览、快速检索、相关资讯链接、新旧资讯智能累加等功能，阅读与搜索更为方便快捷。一册图书配一张数据库光盘，随书赠送。

封面设计：孙元明



ISBN 7-80190-190-8
9 787801 901903 >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90-190-8/F·079
定价：40.00元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03～2004)

The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主　编　景体华
副主编　陈孟平　陈　维　刘品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2004）

主　　编／景体华
副 主 编／陈孟平　陈　维　刘品安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　　址／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皮书事业部
（010）85117872
项目经理／范广伟
责任编辑／程　秦
责任印制／盖永东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20.75
字　　数／311 千字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90－190－8/F·079
定　　价／40.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2004）/景体华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ISBN 7－80190－190－8

Ⅰ.中… Ⅱ.景… Ⅲ.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2003～2004 Ⅳ.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6699号

《皮书系列》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　版　人　谢寿光

项目负责人　范广伟

发　行　人　王　菲

编辑主任　张大伟

编　　辑　（按姓名笔画为序）

邓泳红　张大伟　宋　娜

陈斗仁　范广伟　徐逢贤

封面设计　孙元明

内文设计　熠　菲

责任印制　盖永东

编　　务　曹继红

皮书事业部　电话：85117872、85111313－222、220

网址：cjh 7885@ssdph.com.cn

编 委 会

前　言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已使区域经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突起。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的“五个统筹”，其中第二个就是统筹区域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给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全球经济、政治各领域的复杂变化。催化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加入 WTO 的各国都必须按照 WTO 的章程、制度，即按照全球经济“游戏规则”行事。在各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制定或修正本国的规章制度时，实际上各国政府已经削弱了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力。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控制力的弱化，把企业推上了经济竞争的前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直接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

企业为了应对这种全球化的竞争，通过产业集群，继而形成产业带，是形成可以立足世界的核心竞争力的主要途径。目前，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不仅要打破原来意义上的行业分割，区域分割，甚至正在打破国界。产业带的形成，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同时也构造成了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区域经济大发展中，形成了区域经济竞争的新格局。

从世界近年来发展的趋势看，由于区域内的产业集聚，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大城市群。大城市群可以定义为：由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带把多个大城市圈聚合成的一个高密度的关联紧密的城市空间。大城市群是区域经济的龙头。世界目前已经形成了五大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欧洲西北部

超级城市带。五大城市群已经成为最具世界竞争力的五大增长极。可以预言：有能力进入21世纪国际竞争舞台的真正参与者，是由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支撑的区域经济和其中的大城市群。

鉴于这一认知，我国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都十分关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本区域经济发展比较研究报告，就在这种新形势下诞生了。本报告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为主办单位，聚集了全国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翻开本书可以看出，当今我国正在突起的三大经济带和三大城市群属地的上海、广州、天津、河北等地的专家学者已经突破了地区界限，和北京市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携起手来，以积极的探索精神、深邃的思想在本研究领域不负重望地挑起了大梁。其研究视野超越了一个区域范围，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之上来思索我国各区域之间、国家之间乃至全球经济竞争的格局。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特约了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中心杨开忠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久文教授的文章，他们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并且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有着长期的研究积累，他们的支持将使本研究报告更上一层楼。

在本报告出版之时，我们的区域经济网站也将开通。该网站开设的专门论坛，将成为区域经济研究者探索和交流的园地。为了研究者工作的便利，2004年6月，与该网站配套的区域经济数据库将建成开通，并开始提供服务。其网址是：www.qyjjnet.com。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朱明德

2003年12月

目　录

全国区域经济比较

首都圈与京津冀

上海与长三角

广东与珠三角

区域核心城市比较分析

CONTENTS

Comparison of Regional Economy across the Country

Economic Area of the Capital and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Shanghai and Changjiang Delta

Guangdong Province and Zhujiang Delta

Analyses and Comparison of the kernel Cities in the Economic Regions

全国区域经济比较

我国三大经济带的现状与走势预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魏书华　邓丽姝

加入 WTO 扫除了我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制度障碍，加速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自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或即将受到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强势冲击。经济发展空间的区域组合既是我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主旋律的趋势日益强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渐趋明朗。本文就三大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概况进行简要分析比较，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支持。

一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基本状况比较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地域范围的概念，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共识，而以京津为中心的城市群其地域范围如何界定则

认识各异，既有环渤海、京津冀、京津唐城市群等多种概念，也有首都经济圈和大北京经济圈之说，在此我们采用京津唐城市群之概念。

1．长三角城市群基本状况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省一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5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757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9%。其中科技人员占区域总人口的3.8%（见图1和表1）。



图1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示意图

表1　长江三角洲基本情况

城市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比重	人口文化水平				公路里程（公里）
				科技活动人员（万人）		专业技术人员（万人）		
				合计	科学家、工程师	合计	中级技术职称以上	
上海	6340.5	1334.23	0.76	15.18	11.61	—		6286
南京	6588	563.28	0.60	—		28.15	12.32	7329
镇江	3847	267.13	0.39	—		11.59	4.29	1810
无锡	4788	438.58	0.44	—		26.24	8.54	3682
常州	4375	343.24	0.46	—		22.34	6.79	2709
苏州	8488	583.86	0.47	—		32.92	9.29	5520
南通	8001	780.26	0.34	—		20.80	5.77	6845
扬州	6634	452.22	0.29	—		15.24	5.06	3239
泰州	5791	504.00	0.26	—		14.48	3.86	2528
杭州	16596	636.81	0.40	—		31.28	13.19	6560

续表 1

城　市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比重	人口文化水平				公路里程（公里）
				科技活动人员（万人）		专业技术人员（万人）		
				合　计	科学家、工程师	合　计	中级技术职称以上	
宁　波	9365	546.19	0.30	—		36.79	12.46	5506
嘉　兴	3915	332.38	0.26	—		8.06	2.64	1966
湖　州	5817	257.05	0.28	—		6.76	2.47	2801
绍　兴	8256	433.59	0.21	—		14.94	5.30	4087
舟　山	1440	97.76	0.33	—		2.68	1.06	949
区域合计	100241.5	7570.58	0.44	—		—	—	61817

资料来源：《2003 上海统计年鉴》、《2003 江苏统计年鉴》、《2003 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表 1 为 2002 年数据，全文同；根据统计资料，除上海以“科技活动人员”反映人口文化水平之外，其余城市均以“专业技术人员”来反映。

2. 珠三角城市群基本状况

珠三角城市群覆盖的空间地域范围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以及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肇庆、惠州，共 9 个城市。其土地面积为 2.2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0.23%；人口 2625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2.04%。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本区域总人口的 3.9%（见图 2 和表 2）。



图 2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示意图

表 2　珠江三角洲基本情况

城　市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比重	专业技术人员(万人)		公路里程（公里）
				合　计	中级技术职称以上	
肇　庆	664	390.76	0.25	1.55	0.64	7662
佛　山	3813	338.98	0.51	6.79	4.86	3890
广　州	7434.4	720.62	0.70	38.93	15.21	5138
东　莞	2465	156.19	0.36	3.42	1.09	2533
惠　州	419	283.02	0.39	1.93	0.67	7084
江　门	1818	381.26	0.38	3.82	0.96	4058
中　山	1800	136.03	0.32	19.02	2.95	1027
珠　海	1688	78.61	0.71	7.41	2.42	1017
深　圳	1949	139.45	0.80	18.64	8.40	1314
区域合计	22050.4	2624.92	0.50	101.51	37.20	33723

资料来源：《2003 广东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因资料限制，表 2 中专业技术人员数及肇庆、惠州、江门的土地面积数为市区的数据，其他均为全市的数据。

3. 京津唐城市群基本状况

京津唐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市一省，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等市。土地面积 3.2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0.34%；人口 2762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2.15%。其中科技人员占本区域人口总数的 3.65%（见图 3 和表 3）。



图 3　京津唐城市群示意图

表 3　京津唐地区基本情况

城　市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人口文化水平				公路里程（公里）
			科技活动人员（万人）		专业技术人员（万人）		
			合　计	科学家、工程师	合　计	中级技术职称以上	
北　京	16807.8	1136.3	25	19.7	—		14359
天　津	11919.7	919.05	—		48.28	19.89	9696
廊　坊	292	72.67	—		1.45	0.54	—
保　定	312	92.02	—		1.93	0.61	—
唐　山	1182	292.75	—		16.4	4.88	7451
秦皇岛	363	72.01	—		1.76	0.88	—
张家口	819	85.26	—		2.56	1.00	—
承　德	708	44.76	—		1.8	0.75	—
沧　州	183	47.52	—		1.8	0.66	—
区域合计	32586.5	2762.34	—		—	—	—

资料来源：《2003 北京统计年鉴》、《2003 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根据统计资料，除北京以“科技活动人员”反映人口文化水平之外，其余城市均以“专业技术人员”来反映；因资料限制，部分城市公路里程数缺失。

4. 三大城市群面积与人口的比较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覆盖的空间面积为 15.5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1.61%；人口近 1.3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0.08%。其中长三角的空间面积和承载人口数远大于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土地面积分别是这两个区域的 4.5 倍和 3.1 倍，人口分别为其 2.9 倍和 2.7 倍。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则大体相当。在各区域内部，除上海、广州外，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规模差距不大，而京津唐地区，除北京、天津外，其余城市规模较小（见表 4）。

表 4　三大区域基本情况比较

区　域	土地面积		人　口	
	绝对值(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	绝对值(万人)	占全国(%)
长三角	10.024	1.04	7570.58	5.89
珠三角	2.205	0.23	2624.92	2.04
京津唐	3.259	0.34	2762.34	2.15
合　计	15.488	1.61	12957.84	10.08
全　国	960	100	128453	100

二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经济概况比较

1. 综合经济实力比较

从国内生产总值角度看，长三角最高，占全国的19%，为19124.98亿元，远远超过珠三角的9565.29亿元和京津唐的6552.63亿元。除了区域内城市数量多之外，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均衡，也是长三角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主要原因。其中上海达到5408.76亿元，其余城市大部分在400亿元以上。珠三角的GDP位居其次，其主要优势是各城市的GDP都较高，均在400亿元以上。京津唐的GDP在三大区域中最低，其中北京和天津合计为5263.86亿元，不及上海一个城市。并且占到整个区域的80%。其余城市只有唐山在400亿元以上，有3个城市在100亿元以下。反映出京津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衡，京、津两大直辖市与其他城市的经济实力对比悬殊。

从人均GDP角度来看，珠三角实力最强，为36440元，长三角与京津唐相差不大，分别为25262元和23721元。在珠三角，9个城市中有6个人均GDP在30000元以上，深圳在全国最高，为46388元。长三角中人均GDP在30000元以上的城市有3个，京津唐各城市最高人均GDP不足30000元，仅有3个城市介于20000元和30000元之间（见表5～8）。

2. 三大需求比较

从消费和投资来看，长三角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6246.93亿元和6419.96亿元，均占全国的15%，远超过珠三角和京津唐的同类指标。珠三角和京津唐则相差不大。在各区域内，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北京与天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和占到京津唐的86%。从增长速度看，京津唐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略高，比上年增长12%，珠三角和长三角分别为11.4%、11.5%；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以长三角最高，比上年增长18%，远高于

其他两个地区。

从出口贸易额看，珠三角为1126.08亿美元，占全国的35%，略高于长三角的923.97亿美元，远高于京津唐的288亿美元。出口贸易比上年增长，长三角超过珠三角为25%，珠三角为24%，均远高于京津唐地区（见表5～9）。

但是，从三大需求的人均值来看，珠三角的整体优势和核心城市的优势尤其突出，特别是深圳，各项指标远远高于其他核心城市；长三角由于人口数是其他两大经济带的近三倍，除人均出口额略高于京津唐之外，其他人均值均低于其他两个区域。所以从人均值角度看，长三角的优势不复存在；京津唐以人均值表示的经济实力居中，其中北京的人均消费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上海相近，天津与其他核心城市则有一定差距（见表10）。

表5　长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

城市	GDP（亿元）	人均GDP（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对外贸易情况（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速度（%）		
					进出口总额	出口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出口
上海	5408.76	40646	2035.21	2187.06	726.64	320.55	50.30	9.3	9.6	16.0
南京	1297.57	22858	525.17	496.84	100.94	60.11	15.02	12.7	6.9	4.5
镇江	560.90	21018	150.92	110.75	20.98	10.11	5.01	12.1	-26.6	35.5
无锡	1580.66	36151	444.29	276.81	97.41	51.45	17.40	13.7	-31.7	42.9
常州	760.60	22215	248.80	147.36	39.18	26.56	5.61	11.8	-22.7	22.6
苏州	2080.37	35733	451.62	438.46	363.90	185.21	48.14	15.3	-22.4	50.5
南通	887.33	11356	297.14	150.85	38.96	25.31	2.38	9.7	-41.6	21.4
扬州	558.93	12368	182.76	136.04	15.14	8.01	2.56	10.3	-5.6	20.6
泰州	504.60	10021	161.19	93.20	5.73	4.20	1.81	10.3	-40.2	9.1
杭州	1781.83	28150	523.53	769.76	131.07	84.81	5.22	14.1	66.7	16.4
宁波	1500.34	27541	462.87	601.27	122.73	81.63	12.47	11.8	87.6	30.7
嘉兴	706.43	21268	249.21	379.25	36.96	25.48	4.81	11.4	97.4	14.9
湖州	422.50	16454	170.88	200.29	8.87	7.09	3.85	7.4	112.4	23.1
绍兴	928.15	21414	269.27	367.48	38.70	29.01	3.82	12.7	153.1	54.7
舟山	146.01	14910	74.07	64.54	4.96	4.44	0.11	13.3	70.1	8.6
区域	19124.98	25262	6246.93	6419.96	1752.17	923.97	178.51	11.4	18.0	25.0

资料来源：《2003上海统计年鉴》、《2003江苏统计年鉴》、《2003浙江统计年鉴》、《2002上海统计年鉴》、《2002江苏统计年鉴》、《2002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6　珠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

城市	GDP（亿元）	人均GDP（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对外贸易情况（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速度（%）		
					进出口总额	出口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出口
肇庆	450.22	11549	154.62	94.16	13.39	9.01	5.46	10.6	12.2	18.2
佛山	1175.92	34850	419.80	290.43	129.69	78.87	10.03	12.0	21.9	24.1
广州	3001.48	41884	1370.68	999.33	279.23	137.76	26.53	10.2	2.8	18.5
东莞	672.89	43401	224.95	191.57	442.41	237.33	21.48	14.7	52.7	25.0
惠州	525.2	18641	161.00	104.73	112.26	58.90	13.26	10.8	24.0	20.0
江门	660.82	17344	248.39	126.15	47.76	29.52	7.41	11.5	15.9	14.8
中山	415.67	30693	134.33	219.00	93.41	57.24	7.65	12.4	23.0	31.4
珠海	406.27	32682	143.47	120.53	128.34	52.03	9.37	11.7	14.9	37.4
深圳	2256.82	46388	689.59	799.84	872.16	465.42	49.02	13.2	11.6	24.2
区域	9565.29	36440	3546.83	2945.74	2118.65	1126.08	150.21	11.5	12.7	24.0

资料来源：《2003 广东统计年鉴》、《2002 广东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7　京津唐地区主要经济指标

城市	GDP（亿元）	人均GDP（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对外贸易情况（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速度（%）		
					进出口总额	出口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出口
北京	3212.7	28449	1744.8	1814.3	525.1	126.14	51.0	9.5	18.5	7.2
天津	2051.16	22380	941.36	811.26	228.27	115.92	38.69	13.1	15.1	22.0
廊坊	92.87	12850	18.1	173.86	—	—	0.35	12.7	8.1	41.5
保定	164.39	18156	89.74	268.46	—	3.64	0.28	11.0	9.9	20.5
唐山	544.86	18663	142.25	220.64	7.34	3.85	0.85	10.3	1.4	17.9
秦皇岛	211.98	29861	67.17	91.63	7.85	3.52	0.92	11.6	4.4	38.4
张家口	139.24	16416	63.57	81.38	1.25	0.89	0.062	7.0	1.3	17.6
承德	67.65	15303	26.12	77.17	1.2	0.51	0.14	6.4	6.0	11.4
沧州	67.78	14298	29.15	137.97	3.29	2.21	0.03	10.6	0.9	20.5
区域	6552.63	23721	3122.26	3676.67	820.03	288.00	92.32	12.0	13.6	19.1

资料来源：《2003 北京统计年鉴》、《2003 天津统计年鉴》、《2003 河北经济年鉴》、《2002 北京统计年鉴》、《2002 天津统计年鉴》、《2002 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因资料限制，京津唐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出口额以京津与河北省之和代替（下同）；表格空白处表示相关数据缺失。

表 8　三大区域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区域	GDP（亿元）	人均GDP（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对外贸易情况（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速度（%）		
					进出口总额	出口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出口
长三角	19124.98	25262	6246.93	6419.96	1752.17	923.97	178.51	11.4	18.0	25.0
珠三角	9565.29	36440	3546.83	2758.62	2118.65	1126.08	150.21	11.5	12.7	24.0
京津唐	6552.63	23721	3122.26	3011.21	820.03	288.00	92.32	12.0	13.6	19.1
全　国	104790.6	8184	40910.5	43499.9	6207.7	3256.0	527.43	8.8	16.7	22.4

表 9　三大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指标比重

单位：%

区　域	GDP	人均 GDP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对外贸易情况		实际利用外资
					进出口总额	出　口	
长三角	18	309	15	15	28	28	34
珠三角	9	445	9	6	34	35	28
京津唐	6	290	8	7	13	9	18
合　计	33	332	32	28	75	72	80

表 10　三大区域三大需求人均值比较

区　　域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元）	人均出口贸易额（美元）
长三角地区	8251.59	8480.14	1220.47
核心城市：上海	15253.82	16391.93	2402.51
珠三角地区	13512.15	10509.35	4289.96
核心城市：广州	19020.84	13867.64	1911.69
深圳	49450.70	57356.76	33375.40
京津唐地区	11302.95	10900.94	1042.59
核心城市：北京	15355.10	15966.73	1110.09
天津	10242.75	8827.16	1261.30

3. 经济外向度比较

从进出口总额来看。珠三角最高，为 2118.65 亿美元，占全国的 34%。其次是长三角，为 1752.17 亿美元。最后是京津唐，为 820.03 亿美元。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外向型程度依次升高。同时各区域内部差距悬殊。如在长三角，进出口总额最高的上海是 726.64 亿美元，最低的舟山仅为 4.96 亿美元；而在京津唐，北京和天津的进出口总额之和为 753.37 亿美元，占整个区域的 92%。

从利用外资角度来看。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最多，为 178.51 亿美元，占全国的 34%。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三角对外资的吸引力较强。珠三角和京津唐依次是 150.21 亿美元和 92.32 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 28% 和 18%。这三大区域实际利用外资占到全国的 80%。在各区域内部存在较明显的不均衡。如在京津唐，北京实际利用外资最高，为 51 亿美元，而最低的张家口仅为 0.062 亿美元（见表 5～9）。

4. 产业结构情况比较

三大经济区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比分别为：长三角 5.8∶51.9∶42.3；珠三角 5.6∶49.3∶45.1；京津唐 4.0∶42.3∶53.7。三次产业的排序分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呈现为二、三、一结构，京津唐为三、二、一结构。上述现象说明，京津唐地区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升级换代快，且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在京津唐地区内部，北京三次产业构成依次为 3.1%、34.7% 和 62.2%，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最高。此外，河北省廊坊、保定、秦皇岛三市的产业构成也呈现为三、二、一结构。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只有上海、南京、广州的三次产业构成为三、二、一结构（见表 11～14）。

表 11　长江三角洲三次产业发展概况

城　市	GDP（亿元）	GDP 中三次产业绝对数值（亿元）			GDP 中三次产业相对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上　海	5408.76	88.24	2564.69	2755.83	1.6	47.4	51.0
南　京	1297.57	62.40	613.90	621.27	4.8	47.3	47.9

续表 11

城市	GDP(亿元)	GDP中三次产业绝对数值(亿元)			GDP中三次产业相对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镇江	560.90	34.66	313.13	213.11	6.2	55.8	38.0
无锡	1580.66	56.93	868.04	655.70	3.6	54.9	41.5
常州	760.60	48.84	431.50	280.26	6.4	56.7	36.9
苏州	2080.37	91.72	1211.52	777.13	4.4	58.2	37.4
南通	887.33	140.92	438.58	307.83	15.9	49.4	34.7
扬州	558.93	70.83	272.60	215.50	12.7	48.8	38.6
泰州	504.60	71.75	249.72	183.13	14.2	49.5	36.3
杭州	1781.83	114.64	901.82	765.37	6.4	50.6	43.0
宁波	1500.34	105.71	828.88	565.75	7.0	55.3	37.7
嘉兴	706.43	61.66	403.83	240.94	8.7	57.2	34.1
湖州	422.50	51.45	228.54	142.51	12.2	54.1	33.7
绍兴	928.15	80.06	539.39	308.69	8.6	58.1	33.3
舟山	146.01	32.91	53.33	59.78	22.5	36.5	41.0
区域	19124.98	1112.72	9919.47	8092.80	5.8	51.9	42.3

资料来源:《2003上海统计年鉴》、《2003江苏统计年鉴》、《2003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12 珠江三角洲三次产业发展概况

城市	GDP(亿元)	GDP中三次产业绝对数值(亿元)			GDP中三次产业相对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肇庆	450.22	125.04	166.77	158.41	27.8	37.0	35.2
佛山	1175.92	72.14	625.75	478.03	6.1	53.2	40.7
广州	3001.48	103.07	1227.14	1671.27	3.4	40.9	55.7
东莞	672.89	30.34	369.71	272.84	4.5	54.9	40.6
惠州	525.20	73.78	302.43	148.99	14.0	57.6	28.4
江门	660.82	70.21	319.68	270.94	10.6	48.4	41.0
中山	415.67	26.19	246.29	143.18	6.3	59.3	34.4
珠海	406.27	16.18	224.11	165.98	4.0	55.1	40.9
深圳	2256.82	19.06	1234.69	1003.08	0.8	54.7	44.5
区域	9565.29	536.01	4716.57	4312.72	5.6	49.3	45.1

资料来源:《2003广东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13 京津唐地区三次产业发展概况

城市	GDP(亿元)	GDP中三次产业绝对数值(亿元)			GDP中三次产业相对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北京	3212.7	98.05	1116.53	1998.13	3.1	34.7	62.2
天津	2051.16	84.00	1001.90	965.26	4.1	48.8	47.1
廊坊	92.87	9.56	40.62	42.69	10.3	43.7	46.0
保定	164.39	4.66	79.18	80.54	2.8	48.2	49.0
唐山	544.86	56.83	312.20	175.83	10.4	57.3	32.3
秦皇岛	211.98	4.32	76.17	131.50	2.0	36.0	62.0
张家口	139.24	1.96	70.11	67.17	1.4	50.4	48.2
承德	67.65	1.41	41.21	25.04	2.1	60.9	37.0
沧州	67.78	1.04	35.56	31.18	1.5	52.5	46.0
区域	6552.63	261.83	2773.48	3517.34	4.0	42.3	53.7

资料来源：《2003 北京统计年鉴》、《2003 天津统计年鉴》、《2003 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14 三大区域产业发展概况比较

区域	GDP中三次产业绝对数值(亿元)			GDP中三次产业相对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长三角	1112.72	9919.47	8092.8	5.8	51.9	42.3
珠三角	536.01	4716.57	4312.72	5.6	49.3	45.1
京津唐	261.83	2773.48	3517.34	4.0	42.3	53.7
全国	16117.3	53540.7	35132.6	15.4	51.1	33.5

5. 主导产业比较

从主导产业看，三大经济区域具有同构现象。如都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作为自己的主导产业。在区域内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趋同问题。如同处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两省主导产业雷同（见表15）。

表 15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主导产业比较

区域		主导产业
长江三角洲	上海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
	江苏	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浙江	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珠江三角洲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京津唐地区	北京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天津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
	河北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纺织业、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

资料来源：《2003 上海统计年鉴》、《2003 江苏统计年鉴》、《2003 浙江统计年鉴》、《2003 广东统计年鉴》、《2003 北京统计年鉴》、《2003 天津统计年鉴》、《2003 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因资料限制，以江苏、浙江、河北全省角度的主导产业代替处于研究区域中城市的主导产业。

6．经济所有制结构比较

由于统计资料限制，我们主要通过区域核心城市工业总产值所有制结构来分析各区域的经济所有制结构。

外商投资企业对上海经济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 44.2%，超过全部内资企业所占比重。对广州和深圳来说，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其次是外商投资企业。如深圳的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 78.2%，内资企业仅占 21.8%。与其他核心城市不同，北京和天津的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了 50%，外商

投资企业也有一定规模，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规模较小（见表16）。

表16　工业总产值所有制结构比较

单位：%

城　市	内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合　计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其他类型企业		
上　海	40.9	8.9	4.1	27.9	14.9	44.2
广　州	40.9	7.2	5.5	28.2	33.4	25.7
深　圳	21.8	2.0	0.3	19.5	41.3	36.9
北　京	60.4	18.9	4.2	37.3	11.4	28.2
天　津	51.8	15.6	16.2	20.0	7.1	41.1

资料来源：《2003上海统计年鉴》、《2003广东统计年鉴》、《2003北京统计年鉴》、《2003天津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因资料限制，部分城市以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结构代替工业总产值结构。

总体来看，从北往南，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依次减少，市场开放程度、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逐步升高。珠三角因为最早开放，优先享受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以及与港澳台自然的经济联系，市场经济发展较为充分，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较发达；长三角因为越来越优越的产业发展环境，经济活力也逐步增强；京津唐则明显受到国有经济改革滞后的影响。

三　几点结论

1.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区域的土地面积仅占我国的1.61%，但聚集了我国10.08%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我国平均水平，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2002年GDP占我国GDP的33%，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45%，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2倍。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同类指标的比率均超过了7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占到全国的1/3左右。

2．三大经济带的经济实力从北向南依次递升，与改革开放所释放的能量成正比

珠三角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很好地利用了国家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在 20 世纪后 20 年的大改革、大发展中，由深圳、广州带动起的珠三角，已经把制度改革所释放的能量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了。进一步的发展将不是特区和特殊的优惠政策所能支撑的。珠三角正在进行动力的凝聚和结构的重组。区域合作或包括港澳的泛珠三角大区域的合作，将为这一地区进入新一轮发展注入活力。

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在改革开放方面都还有较大的空间。在新的形势下，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将更上一层楼。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从理念逐步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进而得到企业界的广泛共识。在这一基础上，长三角正在成为我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带。

3．京津唐地区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相互依存度不高

京津唐地区内部没有形成有序的梯度。北京、天津的综合实力最强，成为区域发展的"飞地"，其余城市的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与两大直辖市形成巨大的反差和落差。这一方面反映出北京、天津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不够；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周边城市对北京、天津的经济支撑力相对不足。

总体来说，京津唐地区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发展的局面尚未形成，仍未摆脱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封闭发展的旧有模式，国有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格局中，京津唐区域合作与发展既要寄期望于国有企业的大踏步改革，也将催化这场改革攻坚战的进行。没有大力度的改革，京津唐地区参与国内乃至国际经济竞争，都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四　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预期

1．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正日益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产业集群

机制的培育、技术链接与制度的配套将把长三角地区的制度改革继续引向深入。长三角将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成为一支活跃的领先团队。

在区域内部，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重要的金融、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中心，具有较强的辐射力。汽车业等现代制造业也较发达。因富有人才和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较强的市场需求等因素，上海正逐步成为区域研发、营销、资本运作等职能的中心，成为区域的总部基地。江浙等地则逐步强化与上海的经济合作和分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在研发、生产加工等方面与上海形成有效互动，向我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发展。

随着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动，长三角内部的经济分工协作将更加紧密，产业结构将更趋合理，从而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长三角的经济必将持续快速增长。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①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明显，原有工业技术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资源加工能力强。改革开放以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最发达的地区。加之以市场为纽带的经济联系密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较为均衡，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经济的分工、合作奠定了基础。

②每年召开一次由常务副市长、副省长参加的区域协调发展联席会，形成政府协调机制，逐渐消减区域内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以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优良的投资环境，确立了“龙头”地位，周边城市主动接轨上海，区域良性互动局面已经形成，为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保证。

③为加强区域合作，各城市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区域一体化进入实质性阶段。如：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方面推行一体化管理制度；实施各地人员资格证书的互认和衔接，实现各地教育、培训、考试资源共享；杭州湾大桥、沪杭磁悬浮列车等3小时都市圈大型交通设施的建设，等等。都将使城市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极大地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带来生产力格局的重大变化。

④长三角地区的科技竞争能力处于全国前列，依据暨南大学韩建安、李相银的分析，上海的科技竞争能力排在全国的第三位，江

苏居第六位，浙江居第八位。较强的整体科技竞争能力，为产业梯度转移和合理布局、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⑤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投资软硬件环境的改善，以及经济开放度的增强，将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长三角地区。近几年，珠三角地区的外资开始向长三角地区转移。2002年，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出口额的增长速度均已超过珠三角地区。外资的大量进入将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长三角在发展过程中也必将面临一些问题，这主要包括：与经济协作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将是长三角需要认真探讨与率先实践的难点；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的经济实力还不很强，影响到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在区域内行政壁垒作用下，各地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资金、重复建设，无序竞争问题将难以避免，影响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 珠三角城市群

对珠三角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市场经济启动较早，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区域一体化的先发地区。但近几年，随着改革能量的充分发挥，政策优势的逐渐消失以及来自长三角强有力的竞争，珠三角出现外资转移、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的不利局面，正面临着新一轮发展的动力重组期。

同时，CEPA的签署和实施以及包括粤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经济区的建设，将为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再一次崛起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珠三角与香港、澳门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加上经济联系的历史渊源，使粤港澳的合作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制度框架下，如果能够抓住这一得天独厚的先机，珠三角必将实现经济的再一次起飞。

总体来说，珠三角地区仍将是我国经济、文化、科技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并且，珠三角作为我国重要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将被加强。在与港澳共同打造“大珠三角”经济区的过程中，以香港国际现代服务业中心为平台，利用其国际商贸、金融、管理和人才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现有以单纯加工为主的制造业向加工制造与

研发设计相结合转变；在与京津唐等区域的产业互动中，因共同发展的需要，通过技术交流、合作创新、人员培训等途径，珠三角的技术水平会不断得到提高。这都将有力提升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同时，通过着力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会展、中介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不仅能优化产业结构，而且将进一步拉动珠三角经济增长。

3．京津唐城市群

在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唐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对弱一些，经济联系与协作程度最低。区域行政壁垒、分工协作的体制障碍较严重，区域经济一体化尚未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仍是内闭式自我循环，发展极不均衡。以京津为双核心，带动两翼的局面远未形成。区域经济整体呈现为北京一枝独秀向京津双头并进转变的格局。

我们认为，京津唐地区经济一体化必须与改革相配套，没有改革护航，区域经济协作将举步维艰。同时，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将在全球竞争的挑战中加速进行。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京津唐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从经济实力和产业发展上来说，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条件。作为区域核心城市，北京的经济实力雄厚，排在全国前列。经过多年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电子、电气、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在产业内的位置得到提升，并逐渐形成主导产业群。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独特的政治资源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证。天津作为另一核心，本来就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人才、科技竞争力也较强。近年的后发优势更加明显，从2001年开始经济增长加速，远快于北京。河北省的几个市也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如果各城市能增强分工协作意识，从区域整体的角度，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并从制度安排上为区域协作铺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局面是能够实现的。

具体来说，京津唐地区的发展趋势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京津唐地区将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北京是我国科技实力最雄厚，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天津的科技实力也较强。只要具备有效的科技创新机制，这一地区特别是北京将会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推动区域

乃至全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源泉。相应的，在北京这一强大的研发中心的推动下，京津唐地区产业的技术水平会有较大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会得到长足发展。随着区域合作意识的日益增强，天津、唐山等城市的企业会更加充分地利用北京的研发资源，或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或联合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使北京的研发优势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同时，有天津等工业基础相对完备的城市做依托，会方便北京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强整个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

其次，京津唐地区将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在世界各国取得重大进展，技术进步的主导作用明显提高，并以强劲的态势推动着经济的增长。随着技术、资本与劳动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角色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将向更高层次演进。同样，这种趋势也引导着现代制造业的演进。

科学技术向人类生产活动渗透的过程中，除了生产工艺的提升，很多链接活动，比如设计、品牌策划；质量控制；设备租赁；后勤供应；保存和维修服务；会计、人事管理、电信、法律、保险、金融、安全服务；广告；运输、销售、售后服务，等等，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服务部门逐步从生产各阶段自然分离出来，形成新的服务行业。新兴服务业的崛起是科技革命促进社会分工逐步细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制造业成熟的重要标志。

京津唐地区形成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正可以背靠以上两大优势：强大的科技创新平台和配套的现代知识型服务业。这对于21世纪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从长远眼光看，一旦这两大支柱成为京津唐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该区域的现代制造业必将呈现出与长三角、珠三角截然不同的竞争优势。

在京津唐地区，北京将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引领现代制造业。成为研发、营销、总部管理职能的中心和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中心。天津作为我国传统的工业城市，现代制造业已粗具规模。北京和天津制造业的链接，将形成我国现代制造业中的一个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团队。河北的唐山等城市，不但具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更拥有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其有潜力承载北京、天津等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产业转移，成为生产加工和产业配套基地。从更长远来看，京津唐地区将与环渤海的东北、山东等地形成有效联动，共同打造在我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及功能定位分析*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陈　维

一　从战略视角深刻审视我国区域经济协作趋势

由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所引发的我国区域经济协作正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并且呈不断深化之势。我国目前对区域经济协作的理论研究方面，比较侧重于不同区域经济之间的比较。当然，这一方法比单个城市之间的比较显得有深度和厚度，但是这种比较仅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是有缺陷的。

缺陷在于缺乏战略的高度，更没有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和谋划。我国的区域经济协作如果脱离了经济全球化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背景，其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并且对区域经济协作的推进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区域经济协作过程中，如果缺乏清晰目标的引领，我国刚刚起步的区域经济协作将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不但区域之间、而且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也进行相互抑制性的竞争，并且乐此不疲。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区域经济协作是服务于经济全球化中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区域经济，更不是服务于区域中的某一城市。

---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靳嘉春、姜婷、孟啸华为本文的写作进行了资料收集和整理。

那么，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我国区域经济协作如何推进？以什么目标来引领？一个愈来愈清晰的迹象为，在经济全球化势头日益增强的环境下，在不断加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我国将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分散化发展倾向，在有效的市场基础上对地区经济资源进行重新整合，走集聚化、规模化、综合性的发展道路，并加快营造若干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区域性经济高地，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区域经济协作的发展具有若干层次性要求。

第一层次为区域内的合作。以目前发展比较成熟和先进的城市和地区为核心，在我国搭建若干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区域性高地，使其不但具有拉动国内经济发展的综合能力，而且应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断对外拓展，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层次为区域间的协作。以若干区域性都市圈为节点，建设和形成功能互补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其意义在于都市圈和区域经济协作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国民经济组织水平和竞争能力，是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资源要素组合提供一个高效率的平台。区域经济协作不仅仅是区域性的，在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中各自封闭地进行，而是首先进行这些区域的经济社会整合，然后把这些区域作为一个整体，以功能建设为导向，再进行更具开放性的经济协作整合。

区域经济协作应是开放性的，而不能封闭性运作。所谓的开放性，其含义在于产业结构的动态性调整和组合，区域经济协作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产业组合重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供平台。区域经济协作的实质性意义是通过集聚和辐射进行要素资源的优化重组：集聚是内敛性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而辐射是开放性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区域经济协作或者都市圈建设的意义不可能仅仅局限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区域经济协作中，资源要素优化重组的集聚和辐射范围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第三层次，通过若干优势明显的区域性经济社会文化高地的组合，功能互补，从而构筑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系。建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向全球市场拓展的产业体系。

对前面的分析做一个简要总结：区域经济协作联动的意义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服务于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协

作联动、都市圈建设是为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供更大的操作平台、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强大的竞争能力。这一视角将对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协作产生更深刻的思考及更合理的举措。

二　对我国三大都市圈功能定位分析

1. 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基本情况及比较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目前被列入“长三角”都市圈的共有16座城市，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的这16座城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人口占全国的5.8%，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8.7%，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22%和全国出口总额的28.4%。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区域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是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区域，也是中国区域经济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地区。珠三角毗邻港澳，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五个地级市及若干县级市，共计14个市、县（区），土地面积4.15万平方公里，人口2365万人。目前，珠三角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国总量的9.2%、9.1%、34.6%和27.1%。

京津唐都市圈：京津唐大都市圈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等2个直辖市、8个地县级市，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0多万人。

虽然我国的都市圈主要是经济圈的概念，但在目前行政性区划体制下，就功能定位来说，还要就目前各行政区划整体的经济社会状况及发展趋势来决定，并且都市圈经济基本上占当地行政区划经济的极大比重。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些都市圈的行政区划范围来讨论其功能定位。

表1　2002年三大区域基本情况比较

项　　目	全　国	上海、浙江、江苏	北京、天津、河北	广　东
GDP(亿元)	104790.6	23835(22.7%)	11385(10.86%)	11769(11.23%)
总人口(万人)	128453	13653(10.62%)	9165(7.13%)	7859(6.11%)
人均GDP(元)	8184	17457	12422	14975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6207	1848(29.78%)	819(13.2%)	2210(35.61%)
外商直接投资(亿美元)	527	175(33.25%)	40(7.75%)	113(21.48%)
三种专利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件)	205544	50310(24.47%)	24592(11.96%)	34352(16.7%)

注：括号内数据为该区域占全国的比重。

下面以2002年的数据，对三大都市圈所属的行政区的经济基本状况进行比较。

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人均GDP水平看，长三角区域的江浙沪为最高，广东次之，京津冀最低。江浙沪人均GDP为全国水平的2.13倍，广东为1.83倍，京津冀为1.52倍。

②开放度。在进出口总额方面，广东最高，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5.61%，江浙沪为1848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29.78%，而京津冀仅为819亿美元，占13.2%。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江浙沪为17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33.25%，广东113亿美元，占21.48%，而京津冀仅为40亿美元，占7.75%。

③创新能力。在各区域的专利申请方面，江浙沪为50310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24.47%，广东占全国总量的16.7%，京津冀则占全国总量的11.96%。

根据以上对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主要的判断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江浙沪无疑为全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不但人均GDP全国第一，而且开放度、创新能力也是名列前茅，表明这一区域经济实力强劲，基础扎实，发展潜力雄厚。

第二，广东的突出优势是其开放度相当高，特别是其外向型特征明显。广东的进出口总额一省压倒江浙沪二省一市，能力超强。同时，广东的创新能力也不弱，就人口总量分析，专利申请是2287人/件，而江浙沪是2713人/件，京津冀是3726人/件。表明广东地区创新活跃，其市场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是有助于创新活动的。

第三，京津冀的各项指标在三大都市圈中是最弱的，特别是这一区域的外向型和开放度方面的指标，与其他两个都市圈之间的差距十分大。2002 年京津冀仅吸引外资 40 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 7.75%，而江浙沪为其 4.37 倍，广东为其 2.82 倍。这些指标可以表明京津冀区域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大，地区间协作联系也是比较松懈的，京津冀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区域整体性运作、协作联系的特征，北京和天津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三大都市圈中，长三角所属的江浙沪发展潜力最大，该区域不仅有上海这一龙头城市，而且周边地区的发展成熟度高，协作配套能力强。由于外资逐步向长三角区域集聚，与江浙沪的完备产业体系相结合，长三角、江浙沪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和动力。

广东的发展主要是外资拉动的。而大量外资进入广东，特别是进入珠三角地区的根本原因在于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这是一种政策导引的产物，同时还在于广东濒临港澳，地缘和人缘相近。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外资进入更看重区域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加上广东总的来说其产业基础不够深厚，因此，广东吸引外资有相对趋缓的势头，外资大量向长三角集聚。但由于 CEPA 政策的推出和实施，使得广东与香港将进一步紧密结合，从而可能迎来第二轮发展浪潮。特别是香港的服务业与珠三角加工制造业的结合、与创新冲动的结合，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倍增动力。

京津冀区域的总体发展水平在我国处于中上游水平，其目前的发展势头远远不如江浙沪和广东。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京津冀地区的协作联系深化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在正确的目标导引下，加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协作，其发展潜力同样是巨大的。

2. 三大都市圈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趋势

①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以上海为核心的该区域发展目标指向是成为世界性的市场和服务中心之一，并成为全球制造业高地。其发展的主要抓手是以金融市场和航运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为手段，加快资金、资本和货物流转，在这基础上提升上海服务业的层次，特别是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大规模吸

引外资，在这一区域奠定世界性重化工业，特别是装备产业的发展基础，成为推进和提升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产业布点区域。

因此，在目前阶段，长三角应成为吸引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领头羊，成为中国的产业高地和经济中心。长三角区域要下一个决心，明白一个宗旨，长三角要做的产业必须是在全国一流的，是领先的。特别是上海，目前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如经过进一步的整合，长三角都市圈的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装备产业、信息产业、造船产业、能源设备产业等，将在全国做成一流水平。

长三角今后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打造世界级制造业中心，并逐渐把产业的控制部门和高端部门留在中心城市，而把协作配套业务向周边地区及全国扩散，并借此延伸长三角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服务业辐射半径和影响区域，把产业做大增强作为服务业扩张的基础和依托。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龙头城市，经济扩散中心和产业布局重心，已经确立了自己未来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目标。在这过程中，上海必须实行“双辐射”战略。这是上海成为市场中心和服务中心的重要条件。

所谓的“双辐射”战略是：我国主要以大市场的优势和充分供给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接受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和充裕资本的辐射。这种互补快速有效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各方面水准，其具价格竞争力的产品主要瞄准发达国家市场。而我国不断增长的制造能力，则主要是瞄准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以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和资本辐射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广阔市场和低成本劳动力实行互补；如我国正在逐步推进的对外投资及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等，这是我国在特殊国情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样，一方面是我国接受发达国家的辐射及与其互补；另一方面是我国相对优势的技术和资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辐射和互补。但在同时，国内也在进行着这种“双辐射”的互补动作，即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及互补。我国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在沿海地区的集聚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沿海发达地区也将产生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互补。总的态势将是：就国家间的经济协作来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辐射和互补；另一方面是中国制造业对周边及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辐射和互补。就国内来说，一方面

是我国沿海地区接受跨国公司的辐射和互补；另一方面是沿海地区在接受的技术和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后，将大规模地展开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互补。在这进程中，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圈无疑是处于“双辐射”的枢纽转换地位。

只有在产业和能力集聚到一定程度，其辐射能力才能体现和实施。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圈应该有意识的加快“双辐射”模式的运作：如以上海深水港为核心对周边地区港口资源的整合；以上海资本市场为核心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拓展和整合；以上海汽车产业为核心对周边地区汽车产业的整合及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以上海宝钢为核心对周边地区及全国钢铁产业的整合；以上海石化产业为核心对国内石化产业的整合等。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以上海及长三角的制造业能力、金融实力、相对技术优势的组合，形成综合性的开发能力，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进行辐射和互补，并积极开拓对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市场的辐射和互补。

以此为目标，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是以上海为龙头、以苏浙两翼的产业现代化和配套能力为支撑，而江苏和浙江的发展应该以做大、做强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为其长远发展的依托和动力。长三角都市圈内的各城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我国经济格局的演变为视野，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考虑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协作联动，加快长三角都市圈内部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融合，培育和突出区域经济特色和优势。

长三角都市圈确定以上的功能定位及发展目标是有基础的。长三角都市圈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该区的加工工业具有较强的开发设计能力、综合配套能力、适应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对国外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及相当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同时，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较快调整，以上海金融、航运中心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金融保险、通讯、信息和房地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正趋向高度化，向生产者服务业方向提升。这样的产业发展态势为长三角区域和全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产业的系统支撑。

长三角区域同时也是中国城市最密集的地区，在占全国土地面积1%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7.25%的城市（地级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及所管辖的70个县（市）与上海经济存在密切的联系。随着各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内的产业分工趋势将进一步得到加

强，这种趋势有助于上海增长极的经济扩散。

同时，长三角区域历史上的经济联系纽带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联系和经济纽带。这不同于珠三角。珠三角是在一个行政区划内的经济布局和产业联系，而长三角则分属两省一市，虽然相互间存在着各种竞争关系，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其所达到的经济联系与协作程度在国内各区域间是水平最高的。

从全国层面来看，加快长三角都市圈建设的目标是要在全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中起到整合性、龙头性的作用。目前三个都市圈，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同时，需要有一种功能上的组合，从而形成更为合理有效、更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民经济整体框架。由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圈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大，如果长三角都市圈的功能定位能够进一步明确和突出，区域协作联系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将对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起到整合和带动作用。21 世纪中国经济将可能形成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中心、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冀北圈为南北两翼的发展态势。

②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成为我国的技术创新中心、创业孵化中心及全球生产基地。

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必须结合未来港澳与这一区域的一体化趋势，特别是在 CEPA 推出之后，加快一体化整合及明确发展潜力所在是粤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国际商贸、金融、管理、人才是香港的强项，市场环境的自由度高是深圳的突出优势，而以广州为中心展开的珠江两岸已成为世界生产基地之一。因此，珠三角的功能定位来源于这样的设想：以香港的强大服务能力与珠三角的创新、创业环境相结合，成为亚太地区甚至是全球性的创新、创业中心之一，并力争成为有影响的技术专利交易中心。同时珠三角应以新的优势吸引外资大规模进入，吸引全球高素质人才，进一步打造世界加工生产基地的影响和效果。

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制造业方面的分工将是：珠三角是以产品为核心的集聚和辐射基地，而长三角是以产业为核心的集聚和辐射基地。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已成为全球性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和光电一体化产品的生产基地，国内外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大型企业相继在这里设立组装点，目前在珠三角集约了 5 万家零部件生产厂家。根据珠三角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珠三角的发展内容将主要是多出企业，通过技术引领、人才和资本吸引，形成相

当规模的集聚效应，加快发展步伐。

但在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一缺陷也是我国加工制造业的普遍性缺陷，那就是缺乏更多的具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产品。因此，珠三角要加强内部的互动：以港深联手发展成为技术创新基地，以技术创新推动珠三角加工生产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以这一效应吸引全球更多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在珠三角集聚，并逐步增强珠三角产品的加工生产能力对周边地区及全球的辐射。

我们认为，将香港和珠三角地区视为大都市圈进行功能定位的分析是合理的。将大珠三角都市圈发展成为一个具加工生产、现代物流、金融和专业服务、旅游娱乐以及信息资讯中心等综合性优势和功能的经济区域。

③京津唐都市圈：成为中国、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文化和科学中心。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都市圈应该借助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城市之一，为中国参加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基础、做出贡献。

在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功能定位上，京津唐都市圈应该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营造。其内涵为：首先，在全国来说，京津唐都市圈位于首都所在区域，当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次，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京津唐都市圈力争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专家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科研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唐比肩。但在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我国北方未来的工业化重镇将是东北地区，随着振兴东北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进及改革开放的深化，东北地区将重新崛起，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因此，京津唐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减轻发展成为工业基地的压力，着重营造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

第二，京津唐区域的加工制造业相对地向天津和唐山集聚，并借产业疏散之机来适当分流人口压力。特别是利用天津在环渤海经济带中的中心地位，更多地承担制造业发展的任务，并加强环渤海经济带各城市间的协作联系，作为烘托首都北京的强大经济基础。

第三，调整北京目前所承担的过多的功能，明确以营造环境为目标——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旅游景观、城市形态、会展设施及能力、文化氛围和市场、大商贸、科研体系及立体式交通枢纽等。使北京成为既具中国传统文化深蕴、又富现代气息的大国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

第四，在北京至天津之间全力打造一条密集型城市带和产业走廊，并提高北京与天津之间各方面联系的强度和深度，大幅度增强京津唐都市圈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

应该承认，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已落后于长三角都市圈和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京津唐都市圈内的各方联系松懈，优势不互补，各自为战，导致整体实力不强。非常可喜的是，京津唐都市圈各方对区域协作的认识都有明显的提高，协作步伐在加快。特别是利用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的机遇，对该区域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进行全面的规划、调整和建设，京津唐都市圈将以全新的面貌成为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高地。

对我国三大都市圈功能定位的基本分析总结。

第一，长三角都市圈：以市场服务业中心及制造业高地为其发展目标，主要功能定位于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尤其是提升工业化基础——装备业水平。其产业发展将经历由“重（重化工业）、套（成套设备）、全（产业链）”转向“轻（高端部门及产业服务）”的较长过程。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瞄准产业发展的系列技术创新。在市场服务业方面，主要建设和发展以金融和航运（资金流和物流）为主体的市场服务体系。

第二，珠三角都市圈：结合区域内各方的优势，以创新、创业中心及高科技加工生产基地为其发展目标，尤其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产业发展向“轻（轻型产品）、新（新型产品）、外（外向型出口产品）”发展。在市场服务业方面，借助香港的优势。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瞄准新技术向实用产品的转化。

第三，京津唐都市圈：以政治、文化、科学中心为其发展目标，以环境营造为抓手，建设和发展与大国地位相适宜的首都景观和氛围。制造业功能适当减轻，并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天津转移和集聚。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是以形成全国性的科研体系，组织科研项目，瞄准重大基础性技术突破为目标。

三　国家战略规范下的都市圈发展导向

从我国目前及未来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的趋势看，将产生以下经济社会文化高地：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东北都市圈、长江中部（以武汉为核心）都市圈，及长江上游（以重庆为核心）都市圈。

我国区域经济协作的导向是为国民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加快发展服务的。区域经济协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应形成更为有效的区域性产业结构。即在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整合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较以前更合理的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和体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外辐射拓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其次，在此前提下，进一步突出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及产业的组合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区域经济的产业优势、功能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寻找自己区域的正确定位，为国民经济结构优化贡献区域的力量，为区域对特定的资源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和辐射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再次，区域经济通过协作联动及整体优势的进一步营造和发挥，并通过对全球资源要素及产业的集聚和辐射，从而使得这一优势体现在全球性的市场竞争中。

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及都市圈的建设来看，与以上分析是十分吻合的。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东北都市圈、长江中游（武汉）都市圈和长江上游（重庆）都市圈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南部、北部、中部和西部，它们首先承担起本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同时，这些区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营造在国内的突出产业优势和经济功能，为我国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同构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些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必须基本配备的，是为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发展基础和基本手段，如商贸、轻加工业甚至是一些在目前条件下合理的重加工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业的发展，而是产业的发展服务于建立和发挥本区域的什么经济功能。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对国民经济整体优化发展有害的是经济功能的同构，如各区域都要成为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制造业高地、研发中心等。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离

不开金融、研发的支持。但这仅是一种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是对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支持。而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建设是有条件的，在一国内不可能是多中心的，这方面的同构是一种功能的严重冲突和社会经济整体效益的巨大损失。

比如我们说北京是我国的一个政治文化中心，那么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并不是说只能是发展政治文化，这很明显是不合理的。京津唐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产业体系建设和产业竞争力提高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但是，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定位主要是突出政治文化功能（当然，这里的政治文化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制度变革的超前、政策突破的引领、文化产业的突进、科学事业的突破等），这将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贡献出区域所特有的优势。

如果我们以这一战略视角来审视我国目前正在展开的区域经济协作和都市圈建设状况，那么我们的有些做法和认识是有缺陷的，是比较短视的，缺乏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和长远发展思路。特别是对推进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具有重要作用的核心城市来说，提高这方面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区域的中心城市目前似乎都在考虑如何在自身狭窄的范围内建设全面的产业体系。但是，区域经济协作不是一种简单的地方经济的叠加凑合，不是地方经济总量的加总。这种认识和做法有害于区域范围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整合，有害于产业分工协作深化，更无法创造出区域明显的产业优势和突出区域的经济功能。这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对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竞争力提高是不利的。并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对中心城市的加快发展同样是有害的。在一个恶性竞争、各自为战的区域内，所谓的区域中心城市是缺乏基础的，站不住的。区域协作的低水平将无法烘托中心城市的高度。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在进一步增强协作联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如何营造具有全国性、全球性的区域突出优势和功能。特别是这一优势和功能是与上海向世界城市的发展相吻合、与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相吻合、与中国赶超型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相吻合、与中国快速增强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要求相适应。

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经济的区域差异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中心　杨开忠　王彩凤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知识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和经济形态，催生了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的成长。这种新经济因人们的观察视角以及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又被叫做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等。新经济之新，体现在与传统经济相比，其产业、劳动力、政府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征。新经济的本质，在于技术创新跃升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知识技术提高生产力。当今科技进步迅速且具有强大的渗透力，知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通信技术革命以及分子材料工程和生命科技的发展；交通、通信费用的急剧下降促进了国际商贸的发展，加快了经济一体化进程；经济活动的数字化与信息化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生产力。

新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发展，并成为各国各地区关注的焦点，其特点本质和运行机制都将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全面揭晓。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经济发展具有如下趋势：经济自身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调整、重组以适应不确定性带来的变动；具有一定知识含量的经济服务活动不断扩展且意义日趋重大；终生学习成为趋势；企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竞争更激烈，新产品、新工艺、营销方式和组织形式成为竞争的关键；在研发、培训、教育、软件、品牌经营、营销、后勤等服务领域投资的比重巨大；培养敏捷的反应能力十分必要。

对于中国来讲，无论是站在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看，实行新经济战略都具有非同

寻常的意义。目前，国内产业结构亟待升级，由农业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过渡，而经济体制也面临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面对知识革命浪潮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

一 中国新经济指数

新经济的测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本文采用北京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测评结果即“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经济指数报告(2000 年)”作为参考。该报告整个指标体系由 5 类 15 个指标组成。

①知识型职业：新经济是高技术、服务型和办公室职业主导的经济。因此，知识职业是衡量新经济的一组重要指标。它包括办公室工作、专业技术工作和基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口。

②全球化：全球化是新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这组指标包括进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企业就业占当地从业人员的比例。

③经济动态：相对传统经济，新经济更富于变化和竞争。衡量这一特征的指标包括新生和倒闭的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以及公司通过股市筹资数量占 GDP 的比例。

④向数字经济的转型：新经济的关键技术驱动力是数字化。衡量这一特征的指标包括网民占本地人口比例、WWW 域名注册数量占全国比例、信息网络建设指数、信息技术应用指数。

⑤创新能力：衡量高科技工作岗位比例，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比例、已公布的专利数量，产业研发投资等指标。

该报告利用 2000 年的数据计算上述指标及各地区的新经济指数。[1] 从各组指标的权重来看（见表 1），创新能力、知识型职业以及数字化三类比重较大，而全球化和经济动态与竞争比重小，说明中国的全球化以及经济动态与竞争水平还比较低。

---

[1] 为了衡量区域差异程度，每个指标的得分是按照下列原则计算的：对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计算基于均值的标准离差，并采用同向调整的方法以保证数值为正。为了消除指标的共线性，在指标分值计算与综合中，我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各个指标加权。加权得到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分值再除以五类指标中每一类的最高分的加总之和，得到的百分数即为该地的新经济指数。该指数主要反应各地区新经济进展的相对差异程度。

表 1　测度指标与最终权重（中国省市区新经济指数）

总分的赋权因子	权　　重
知识型职业	
办公室职位比重	0.54
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0.62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指数	0.55
全球化	
出口额比例	0.25
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比例	0.25
经济动态性	
注册与倒闭企业数占企业总数比重	0.09
股票筹资总额占省内生产总值比例	0.09
数字经济	
每千人口中使用因特网人数(2002)	0.82
www 站点数比例(2002)	0.77
信息网络建设指数(1998)	0.47
信息技术应用指数(1998)	0.87
创新能力	
高科技就业比例	0.44
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从业人员比重	0.82
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量	0.82
研发民间投资额比例	0.73

二　中国国内各地的比较分析

表 2 是中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新经济指数。

表 2　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经济指数

按照分值次序			按地域顺序		
位　次	地　区	分　值	地　区	分　值	位　次
1	北　京	97.0	北　京	97.0	1
2	上　海	73.3	天　津	59.1	4
3	广　东	60.0	河　北	42.8	18
4	天　津	59.1	山　西	42.2	19
5	福　建	51.6	内蒙古	40.8	25

续表 2

按照分值次序			按地域顺序		
位　次	地　区	分　值	地　区	分　值	位　次
6	浙　江	51.6	辽　宁	47.9	9
7	江　苏	48.4	吉　林	44.8	12
8	陕　西	48.2	黑龙江	39.4	30
9	辽　宁	47.9	上　海	73.3	2
10	山　东	47.0	江　苏	48.4	7
11	重　庆	45.4	浙　江	51.6	6
12	吉　林	44.8	安　徽	40.0	26
13	宁　夏	44.5	福　建	51.6	5
14	四　川	43.7	江　西	41.3	24
15	湖　南	43.5	山　东	46.9	10
16	广　西	43.3	河　南	41.8	22
17	青　海	42.9	湖　北	42.1	21
18	河　北	42.8	湖　南	43.5	15
19	山　西	42.2	广　东	60.0	3
20	海　南	42.2	广　西	43.3	16
21	湖　北	42.1	海　南	42.2	20
22	河　南	41.8	重　庆	45.4	11
23	云　南	41.4	四　川	43.7	14
24	江　西	41.3	贵　州	39.9	27
25	内蒙古	40.8	云　南	41.4	23
26	安　徽	40.0	西　藏	35.9	31
27	贵　州	40.0	陕　西	48.2	8
28	甘　肃	39.8	甘　肃	39.8	28
29	新　疆	39.7	青　海	42.9	17
30	黑龙江	39.4	宁　夏	44.5	13
31	西　藏	35.9	新　疆	39.7	29
全国平均		47.2			

将中国最高和最低分之间分为四个等值区段，从而划分各省、市、区为四级，如图 1 所示，从图 1 可以获得对新经济指数值的相对高低和分布的更加清晰的展示。

第一级与第二级：前两个领先的地区也正是两个平日竞争很激烈的地区——北京和上海，分别分布于中国的北部和中部，均有非常雄厚的传统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尤其是在经济数字化、职业和

产业转变以及创新能力方面堪称表率。不过北京、上海（包括广东在内）虽然在办公室工作方面得分较高，但是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仍然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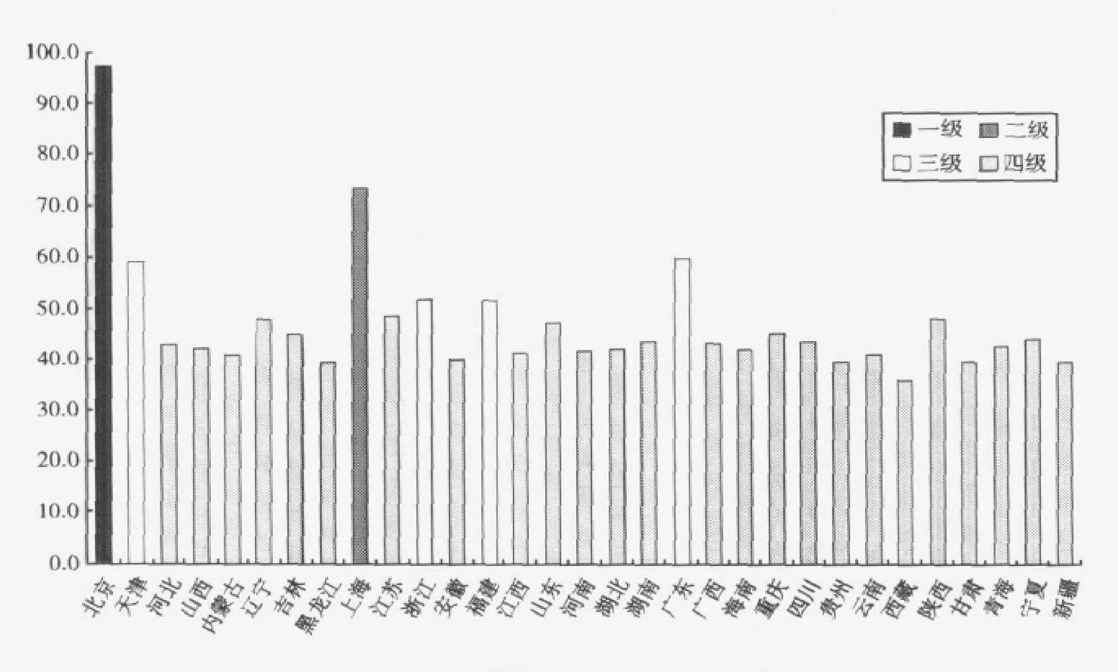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新经济指数得分与分类

尽管上海的人均 GDP 数字高过北京，但在新经济中北京确实以绝对优势压倒其他各省市自治区，成为全国新经济的旗手。北京作为典型的高科技地区得益于拥有众多的顶级国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企业研发机构，这使得它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各地区成为供“血”最为充分的地区。和北京相比，上海的科技工作者主要来自于企业研发机构和大学院校。上海，尽管与北京差距很大，仍然是国内新经济发展的榜样，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程度、经济活力等方面领先于北京。这两地也是国内经济改革的先锋。

第三级：在新经济中发展势头良好的省市是广东和天津，福建和浙江亦表现突出。广东省的经济活力指标明显落后，尤其是股票集资方面（请注意指标是相对本地 GDP 计算的）。不过港口地区具有更多的出口比例，从而外贸依存度更大一些。广东、上海、天津等前十名均是良港所在地或者邻近港口地区。不过排名靠前的地区出口的内容有着很大的差别。有些出口的主要是自然资源或者农副产品（如山东），有些是以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为主（如广东），

也有一些出口附加值较高或者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如上海和北京)。浙江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相邻的江苏相比较，在高科技人才的教育和吸引上仍然十分欠缺。

第四级：综观第四类地区，仍然可以发现一个不平衡规律，也就是有些地区表现出较强的发展后劲，如陕西省。江苏、陕西、辽宁、山东、重庆新经济得分紧贴第三级，尤其是江苏身处长三角，山东则临近北京，两者均占地理优势，有望优先进入第三等级。同时通过与当地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比较，江苏、陕西、辽宁具有比例更高的高科技人才队伍。

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到在新经济中远远落后的地区。在第四级中的大部分地区似乎还停留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上，缺乏创新，产业转变不大，而且有些闭关自守，经济缺乏动力。

三　新旧经济对比分析

很多在传统经济中表现良好的省份在新经济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同样，有些在新经济中指数较高的地区却并不是传统的经济强省。鉴于此，表3对各地的新经济指数位次和200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位次加以比较。表3可为各省市自治区的新旧经济实力对比提供直观参考。鉴于某一时点的人均GDP的相对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年累积的结果，所以它可以代表各地在以往经济中的综合表现。

表3　新经济指数位次与经济实力位次对比

地　区	最终得分	新经济指数位次	人均GDP位次	新经济中相对前进位次
北　京	97.0	1	2	1
天　津	73.3	4	3	-1
河　北	60.0	18	11	-7
山　西	59.1	19	20	1
内蒙古	51.6	25	16	-9
辽　宁	51.6	9	8	-1
吉　林	48.4	12	14	2
黑龙江	48.2	30	10	-20
上　海	47.9	2	1	-1
江　苏	47.0	7	7	0

续表 3

地　区	最终得分	新经济指数位次	人均 GDP 位次	新经济中相对前进位次
浙　江	45.4	6	4	-2
安　徽	44.8	26	22	-4
福　建	44.5	5	6	1
江　西	43.7	24	23	-1
山　东	43.5	10	9	-1
河　南	43.3	22	18	-4
湖　北	42.9	21	13	-8
湖　南	42.8	15	17	2
广　东	42.2	3	5	2
广　西	42.2	16	27	11
海　南	42.1	20	15	-5
重　庆	41.8	11	19	8
四　川	41.4	14	26	12
贵　州	41.3	27	31	4
云　南	40.8	23	25	2
西　藏	40.0	31	28	-3
陕　西	40.0	8	29	21
甘　肃	39.8	28	30	2
青　海	39.7	17	21	4
宁　夏	39.4	13	24	11
新　疆	35.9	29	12	-17

两种位次相关性显著但并不很高（相关系数为 0.616），很多地区的位次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很多省份在新经济浪潮中努力抓住机遇并且进步比较明显。其中最明显的是陕西地区。但也有一些省份在新经济进程中落后了——当然这种落后可能只是暂时的。这样的省份并不少，究其原因，往往是由于这些地区的经济是以传统农业和制造业为主，具备一定的经济活力但是却缺乏创新力，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应用上十分落后，在产业转型上（表现为附加值高的知识工作岗位）落后，从而依然滞留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新经济位次相对较低的还有内蒙古、湖北、河北以及海南等省、自治区，这些地区的落后均是因为在新经济的某一方面极其落后（譬如湖北、海南在整体产业转型方面动作缓慢，内蒙古在创新能力上

十分匮乏)，而在其他各个方面又表现不佳的缘故。

从中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变迁规律：传统经济中流传的偏远地区经济必然落后的观念将面临挑战。新经济为偏远地区创造了跨越式发展的良机，进步快的几个地区都重视科技创新，它们一般都拥有较强的科技实力，而且往往同时还伴生高科技企业群。虽不能绝对肯定那些重视和拥有高科技的地区将成为新经济中的佼佼者，但毫无疑问，忽视高科技作用的地区将在新经济中被淘汰出局。

四　中美对比分析

表4将中、美两国各指标的全国最高水平，以及两国综合指数最高的地区（北京和马萨诸塞州）的各指标水平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表4中仅列出可比指标（有些指标项目由于口径不同或者其中一方数据无法获得而不具可比性）。其中美国麻省数据为1999年之前的，主要是1996年或者1997年的数据，而中国北京的数据基本上是2000年的数据。

表4　新经济指标：中国与美国

具体统计指标	办公室职位比例(%)	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比例(%)	企业注册与倒闭总量占企业单位数比例(%)	股票筹资总额占省内生产总值比例*(%)
中国最高值	10.1	31.5	12.4	2.9	7.2
北　京	10.1	27.6	5.5	1.1	7.0
美国最高值	26.7	34.9	11.3	4.1	1.6
Massachusetts	26.4	34.9	5.4	2.6	0.3

具体统计指标	每千人口中使用因特网人数(人)	商务站点数比例*(%)	高科技职位比例*(%)	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量(件)	研发民间投资额比例(%)
中国最高值	150.4	23.4	2.7	45.6	2.0
北　京	150.4	23.4	2.6	45.6	2.0
美国最高值	520.0	46.0	8.2	1120.0	4.9
Massachusetts	390.0	35.0	7.7	830.0	3.8

注：标有*的指标其口径略有偏差，但可以作为参照。

从比较结果来看，中国绝对算不得后起之秀，两国整体上差距

甚大。国内在经济数字化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例如在线人口）与美国相比十分落后——尽管目前国内掀起了信息化建设高潮，然而真正要普及和应用信息技术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也是和产业、职业的转变过程相辅相成的：在新经济需要的生产服务型工作方面我们的差距表现在百分比上是将近两倍（10.1:26.7），放到绝对数量上差距却会进一步放大。差距最大的莫过于在专利拥有量方面。这一方面显示中国产品创新的速度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落后。另一个反映，就是研发民间投资的比例相对美国较小，不过这个差距与前几年相比已经大大缩短了，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之一。美国的新经济成长经历向全球昭示了网络和知识革命的强大推动力量，这使它在诸如生产力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等很多方面得到长足进步。

五 战略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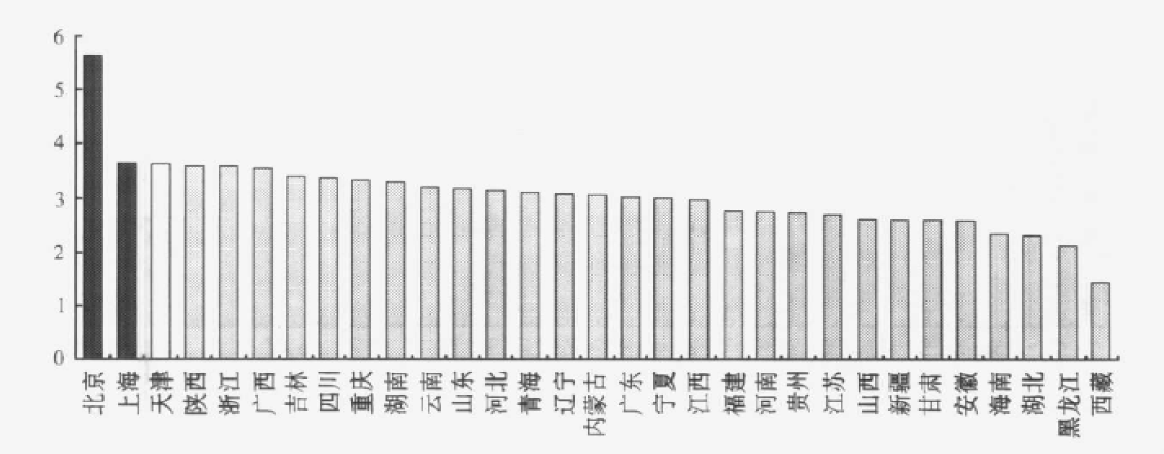
透过以上分析，以下两点可以作为中国新经济发展初期的主要特征。

①地区差距极化。图 1 所示是中国各地区新经济指数值分级。属于第一级的仅有北京，其分值达 97.0，比上海高出 23.7 分值，比位居全国末尾的西藏高出 61.1 个分值（参见表 1）。属于第二级的也仅有上海一个地区，其分值 73.3，虽仅为北京得分的 3/4，但却是西藏的 2 倍有余。属于第三级的有广东、天津、福建、浙江四个地区，其分值都在 51 以上，其中紧邻港澳的广东、紧邻北京的天津得分较高，而同属上海经济圈的浙江、福建得分较低。除以上三级，其余地区均属于第四等级。其中，江苏、陕西、辽宁、山东四省分值最高，非常接近于第三级。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的各个分指标的分类附图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两极分化现象，区域差异明显。表现为前三个等级的省区分布密度远小于最后一个等级的失衡特征，从而通常是极少数地区一马当先，而中间层薄弱甚至断层，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停留在最后一级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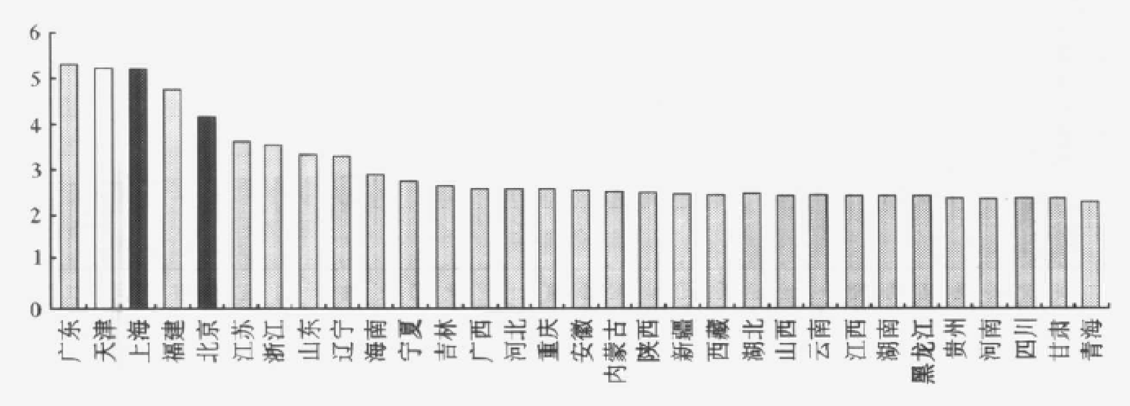
②呈现空间集聚。中国新经济发展在地域上极为不平衡，初步形成了“两极三区一省”的格局，即，北京、上海两极，以北京为中心的大首都圈、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圈与大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粤港澳地区，以及内地的陕西省。各个新经济增长极综合得分的悬

殊表明了新经济中地区发展的空间集聚性并不是原有集聚的简单延续或者有所减弱，换言之，新经济的集聚性依然明显。这一新经济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很多是有别于传统经济的。这些地区普遍拥有较为成熟的创新体系，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通过吸引国际投资和进行国际贸易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并且拥有较高比例的在线人口、国内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对信息技术应用以及电子商务等比较积极。而且这些地区不但汇集了众多知识人才在这里工作，而且也通过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聚拢了很多资本，同时经济的变动频繁使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多创新在这里繁衍。因此这一格局具有相对的持久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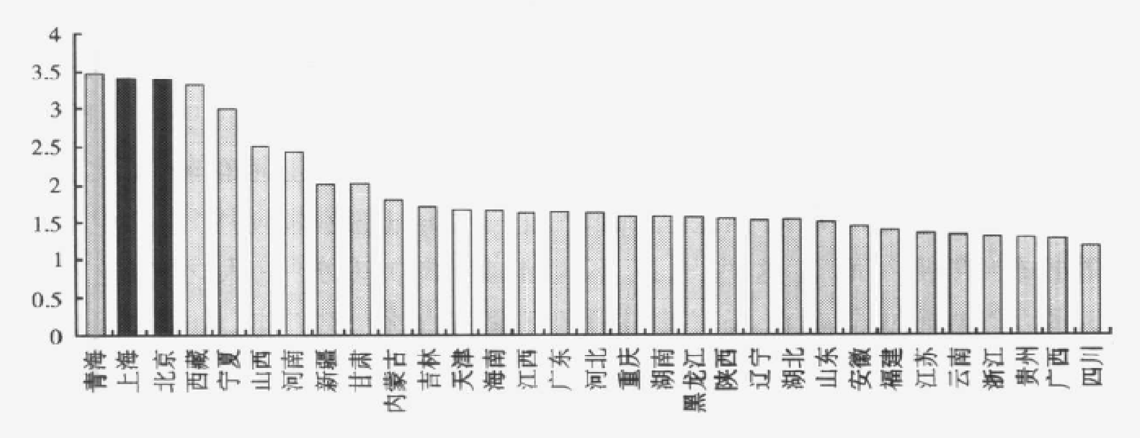
各地区新经济指数分类比较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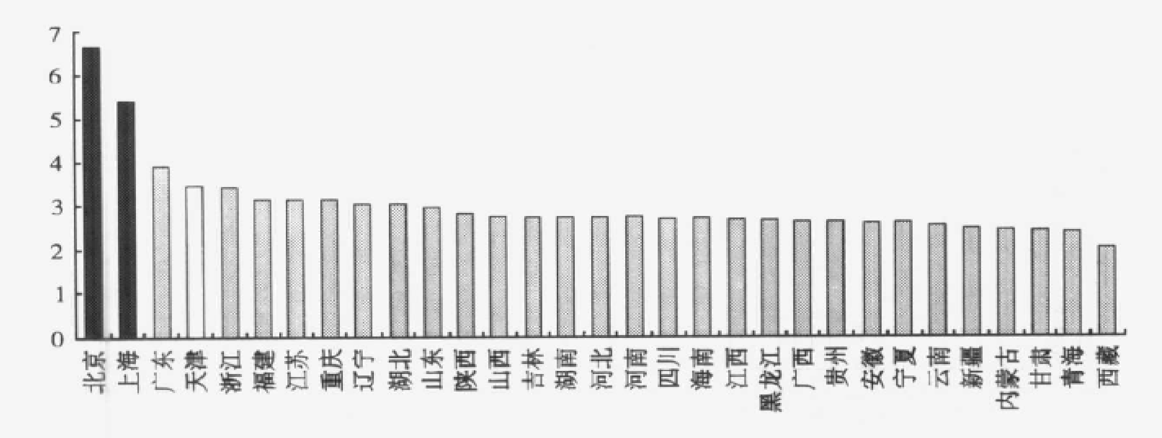
附图 1　知识型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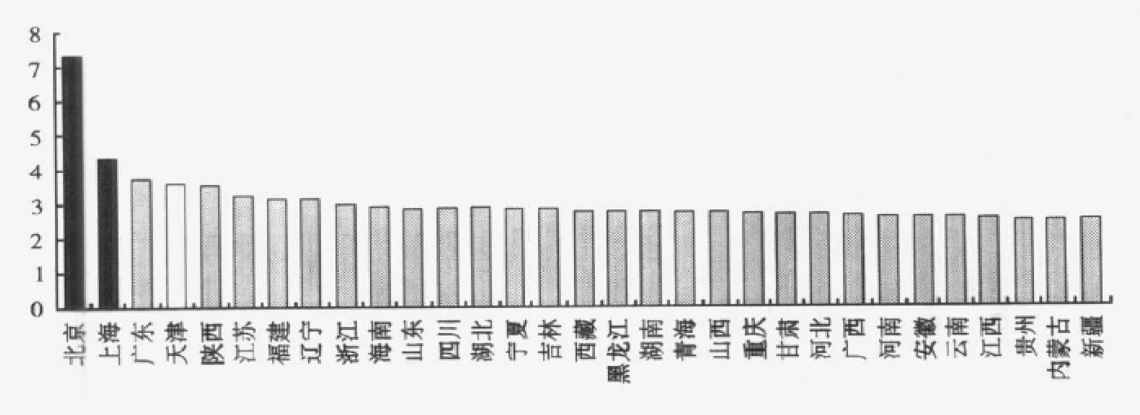
附图 2　全球化



附图3 经济动态



附图4 经济数字化



附图5 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杨开忠、王彩凤、周文兴等："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经济指数报告2000"，北京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3。

胡国成、韦伟、王荣军著：《21世纪的美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Robert D.Atkinson, The new economy of America PPI, 2000.

Carl J.Dahlman, Jean-Eric Aubert, Overview of China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Seizing the 21st Century, WBI (The full-length study has been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2001.

我国三大经济区区域科技竞争力比较研究

□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韩建安 李相银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作为中国经济的龙头有力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在这个增长过程中，科技的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传统的工业需要高科技的更新与改造，而且作为科技载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因此，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实力和持续增长的后劲，区域科技竞争力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通过考察我国三大经济区的区域科技竞争力及其差异，可以为我们制定相关产业政策、考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依据。

一　区域科技竞争力的内涵

对科技竞争力的研究大多是从由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提出的国际竞争力开始的，并在此框架下提出了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概念，而我国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大多是对产业科技竞争力的研究。许晓雯认为，科技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竞争力的动力；杨广青等认为，产业科技竞争力指一个国家（地区）某特定产业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实现科技进步，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刘勇从空间角度认为一个地区所有企业在该地区以外的市场竞争力的总和构成了该地区综合的对外经济竞争力，即区域竞争力。我们认为，区域科技竞争力既不同于由某一区域内所有企业的科技竞争力的简单加总，也不仅仅是一国的国家科技竞争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一区域特定的科技竞争力，是该区域

内所具有的科技实力及科技对该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能获取一切资源的能力，它由初始区域科技竞争力、潜在区域科技竞争力和现实区域科技竞争力所组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 研究方法及指标体系的建立

以往研究对指标体系所设置的权重很难令人信服，加上我国统计数据的偏差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灰色系统理论认为，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具有广泛的灰色性，及信息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它是从信息的非完备性出发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的理论，而不是从系统内部特殊的规律出发去研究系统，是通过对系统某一层次的观测资料加以数学处理，达到在更高层次上了解系统内部变化趋势、相互关系等机制。灰色系统理论的数学方法是非统计方法，在系统数据较少和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更具有实用性。本文采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关联度分析方法可以很好地减少其他方法的局限性。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我国三大经济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八个省市，其中以广东省的数据代表珠江三角洲，以江苏、浙江和上海的数据代表长江三角洲，以山东、河北、辽宁、北京的数据代表环渤海经济圈（由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天津的数据缺乏）。

根据区域科技竞争力的内涵，参考方旋的指标体系，我们认为，其指标侧重于对区域科技竞争力静态的描述，而现实情况是，某一区域的科技竞争力是不断变化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取向有一定的联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我们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一些调整，侧重于动态描述区域科技竞争能力的现状与未来，以及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我们引入了初始区域科技竞争力、潜在区域科技竞争力和现实区域科技竞争力三个一级指标。

初始区域科技竞争力是由人力资源、科技经费、科技意识、市场需求、劳动者素质等二级指标构成，这些二级指标对于区域科技竞争能力的基本条件有直接的表现，主要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方式。潜在区域科技竞争力是由专利、科技论文、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技术转移与扩散、技术合作与应用等二级指标构成，这些二级指标是对区域科技的潜在发展能力以及区域经济潜在发展能力的

具体体现。现实区域科技竞争力主要通过宏观经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产业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生活质量等二级指标体现，这些指标可以清晰说明区域科技发展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的对应关系。在3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下，还有29个可以量化的三级指标，从而构成对区域科技竞争能力研究的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区域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初始区域科技竞争力U1	人力资源(V1)	每万人口科技人员数(人/万人)(X1)
		每万人口科学家和工程师数(人/万人)(X2)
	科技经费(V2)	R&D经费占GDP比例(%)(X3)
		科技活动经费(亿元)(X4)
		地方政府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例(%)(X5)
	科技意识(V3)	人均图书消费额(元)(X6)
		万人因特网户数(户/万人)(X7)
	市场需求(V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8)
		居民消费水平(元)(X9)
	劳动者素质(V5)	每万人口大专及以上人员数(人/万人)(X10)
潜在区域科技竞争力U2	专利(V6)	每万人口专利申请数(件/万人)(X11)
		每万人口专利批准数(件/万人)(X12)
		发明专利批准数(件)(X13)
	科技论文(V7)	国际科技论文数(篇)(X14)
		每万名科技人员国内科技论文数(篇)(X15)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V8)	企业技术开发费(亿元)(X16)
		企业技术开发费占销售收入比重(%)(X17)
	技术转移与扩散(V9)	技术市场交易额(亿元)(X18)
		更新改造投资额(亿元)(X19)
	技术合作与应用(V10)	外商直接投资额(亿美元)(X20)
现实区域科技竞争力U3	宏观经济(V11)	GDP(亿元)(X21)
		财政收入(亿元)(X22)
	企业技术创新产出(V12)	新产品产值率(%)(X23)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X24)
		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X25)
	产业国际竞争力(V13)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X26)
	经济增长方式变化(V14)	万元GDP综合能耗(吨/万元)(X27)
	生活质量提高(V15)	人均GDP(元/人)(X28)
		人均邮电业务量(元/人)(X29)

三　区域科技竞争力评估模型

1. 指标特征值矩阵规范化

由于系统中各因素的量纲（或单位）不一定相同，这样的数据很难直接进行比较，且它们的几何曲线比例也不同。因此，对原始数据需要消除量纲（或单位），转换为可比较的数据序列。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在计算关联度前要将数列做规范化处理，即求出各数列的基于同一量纲基准上，在这里，选取比较值最大为规范化矩阵的指标标准。

指标特征值矩阵 $X=(x_{ij})_{n\times m}$

规范化矩阵 $r_{ij}=x_{ij}/\max x_{ij}$，$i=1,2,\ldots\ldots m$，其中 $0\leqslant r_{ij}\leqslant 1$，$r_{ij}$越大

（这里依据经济指标特性，选取最大值为指标规范化标准。r_{ij}越大，表明第 j 个指标对象的第 i 个因素评价越优）

2. 灰关联度分析

从各个指标评价对象中选取最佳值组成参考数据列，利用灰关联系数公式计算与第 j 个指标对象向量列的关联系数 $\xi_i(R_j, G)$，求出参考数据最优向量列与第 j 个指标对象向量列的关联度 $D(R_j, G)$。

其中

参考数据最优向量列 $G=(g_1, g_2, g_3, \ldots\ldots g_n)=(r_{11}\ r_{12}\ldots\ldots\vee r_{1m}, \ldots\ldots r_{n1}\vee r_{n2}\ldots\ldots\vee r_{nm})$ $\vee$ 为取大运算

第 j 个指标对象向量列为：$R_j=(r_{1j}, r_{2j}\ldots\ldots r_{nj})$ $j=1, 2, \ldots\ldots m$

$$\text{关联系数}\ \xi_i(R_j,G)=\frac{\min\limits_i\min\limits_j|r_{ij}-g_{ij}|+\rho\max\limits_i\max\limits_j|r_{ij}-g_{ij}|}{|r_{ij}-g_{ij}|+\rho\max\limits_i\max\limits_j|r_{ij}-g_{ij}|}$$

（ρ 为分辨系数，一般介于 0 与 1 之间，这里取为 0.5）

加权关联度 $D(R_j, G)=\sum_{i=1}^{n}w_i\times\xi_i(R_j, G)$（$w_i$ 权重）[5] [6]

这里选取相等权重，所以，关联度 $D(R_j, G)=\frac{1}{n}\sum_{i=1}^{n}\xi_i(R_j,$

$$G)\begin{bmatrix} a_{11} & K & a_{1n} \\ M & O & M \\ a_{m1} & L & a_{nm} \end{bmatrix}$$

四　研究过程与结果

1. 一级综合评价

①由表 2 数据可知，初始区域科技竞争力 U1 在 V1 上的规格化矩阵为：

$$R_{11}=\begin{pmatrix} 0.172 & 0.236 & 0.172 & 0.626 & 0.144 & 0.086 & 0.230 & 1 \\ 0.152 & 0.174 & 0.138 & 0.551 & 0.116 & 0.073 & 0.196 & 1 \end{pmatrix}$$

②初始区域科技竞争力 U_1 在 V_1 上的最优参考数据列向量 G_{11} 为：$G_{11}=(1, 1)$；

③初始区域科技竞争力 U_1 在 V_1 上的灰关联度矩阵 E_{11} 为：

$$E_{11}=\begin{pmatrix} 0.359 & 0.378 & 0.359 & 0.553 & 0.351 & 0.337 & 0.376 & 1 \\ 0.353 & 0.359 & 0.350 & 0.508 & 0.344 & 0.333 & 0.366 & 1 \end{pmatrix}$$

④初始区域科技竞争力 U_1 在 V_1 上的灰关联度 D_{11} 为：

$D_{11}=(0.356, 0.369, 0.355, 0.530, 0.348, 0.335, 0.371, 1)$；

同理，可计算出 U_1 在 V_2、V_3、V_4、V_5 上的灰关联度 D_{12}、D_{13}、D_{14}、D_{15}分别为：

$D_{12}=(0.665, 0.503, 0.577, 0.490, 0.510, 0.394, 0.443, 1)$；

$D_{13}=(0.399, 0.401, 0.387, 0.840, 0.370, 0.343, 0.357, 0.775)$；

$D_{14}=(0.697, 0.522, 0.532, 0.739, 0.510, 0.398, 0.391, 0.468)$；

$D_{15}=(0.347, 0.354, 0.341, 0.546, 0.344, 0.333, 0.399, 1)$。

潜在区域科技竞争力 U_2 在 V_6、V_7、V_8、V_9、V_{10}上的灰关联度 D_{21}、D_{22}、D_{23}、D_{24}、D_{25}分别为：

$D_{21}=(0.442, 0.366, 0.399, 0.613, 0.373, 0.346, 0.387, 1)$；

$D_{22}=(0.433, 0.455, 0.466, 0.553, 0.410, 0.490, 0.451, 1)$；

$D_{23}=(0.936, 0.663, 0.393, 0.739, 0.887, 0.357, 0.435, 0.522)$；

$D_{24}=(0.640, 0.542, 0.463, 0.632, 0.685, 0.460, 0.477, 0.716)$；

表 2　2001 年我国三大经济区八省市区域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数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广东	江苏	浙江	上海	山东	河北	辽宁	北京
U_1	V_1	X_1	30	41	30	109	25	15	40	174
		X_2	21	24	19	76	16	10	27	138
	V_2	X_3	1.27	0.97	0.61	1.78	0.65	0.46	1.07	6.02
		X_4	257.37	224.7	110.48	222.47	170.12	49.11	98.69	343.16
		X_5	3.09	2.08	3.1	1.71	2.53	1.67	2.37	3.12
	V_3	X_6	41.8	43.8	39.5	119.2	30.6	26.3	25.5	77.9
		X_7	571	559	501	1222	289	237	519	1529
	V_4	X_8	3484	2823	2835	2005	2789	1913	1421	1513
		X9	5038	4322	4772	12562	3751	2785	4789	8197
	V_5	X_{10}	356	392	319	1094	333	270	618	1684
U_2	V_6	X_{11}	355	140	278	792	124	70	179	880
		X_{12}	235	84	180	333	74	42	106	452
		X_{13}	301	244	174	242	333	197	346	946
	V_7	X_{14}	1472	2862	1596	3615	1341	401	1264	9704
		X_{15}	1665	1649	1994	2416	1764	2325	1885	3155
	V_8	X_{16}	143.08	110.31	36.2	98.82	127.8	20.93	46.89	38.66
		X_{17}	1.92	1.73	1.15	1.98	2.03	0.99	1.38	1.73
	V_9	X_{18}	54.0	52.9	31.7	106.2	32.2	4.7	40.9	191.0
		X_{19}	485	402	318	432	522	342	330	187
	V_{10}	X_{20}	136.6	69.1	22.1	42.9	35.2	6.7	25.2	17.7
U_3	V_{11}	X_{21}	10648	9512	6748	4951	9438	5578	5033	2846
		X_{22}	1161	572	501	610	573	284	370	454
	V_{12}	X_{23}	39.1	28.8	16.3	37.8	34.7	19.7	8.3	8.7
		X_{24}	1301	512	431	348	368	192	219	306
		X_{25}	64571	57177	51127	95393	55455	45576	48170	69539
	V_{13}	X26	23.4	26.73	4.13	19.6	8.90	2.05	16.5	44.10
	V_{14}	X_{27}	0.96	1.03	1.05	1.18	1.20	1.90	2.06	1.52
	V_{15}	X_{28}	13730	12922	14655	37382	10645	8362	12041	25523
		X_{29}	1005	401	629	1374	287	250	524	1561

数据来源：方旋：《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

$$D_{25}=(1, 0.502, 0.372, 0.420, 0.401, 0.333, 0.378, 0.363);$$

现实区域科技竞争力 U_3 在 V_{11}、V_{12}、V_{13}、V_{14}、V_{15}上的灰关联度 D_{31}、D_{32}、D_{33}、D_{34}、D_{35}分别为：

D_{31} = (1, 0.603, 0.454, 0.429, 0.598, 0.388, 0.387, 0.348);

D_{32} = (0.861, 0.542, 0.458, 0.772, 0.578, 0.443, 0.412, 0.470);

D_{33} = (0.504, 0.548, 0.345, 0.462, 0.374, 0.333, 0.432, 1);

D_{34} = (0.316, 0.342, 0.344, 0.376, 0.381, 0.767, 1, 0.495);

D_{35} = (0.470, 0.376, 0.411, 0.889, 0.355, 0.342, 0.386, 0.785)。

2. 二、三级综合评估

由以上的评估结果，运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可分别得到区域科技竞争力 U 在 U_1、U_2、U_3 上的灰关联度 D_1、D_2、D_3 分别为：

D_1 = (0.484, 0.401, 0.408, 0.647, 0.394, 0.360, 0.398, 0.906);

D_2 = (0.700, 0.447, 0.387, 0.521, 0.563, 0.379, 0.392, 0.755);

D_3 = (0.633, 0.420, 0.379, 0.578, 0.411, 0.434, 0.523, 0.586);

同样运用上述结果，可计算得到区域科技竞争力的总灰关联度 D 为：

D = (0.724, 0.401, 0.374, 0.580, 0.435, 0.385, 0.441, 0.931)。

即我国三大经济区几省市的区域科技竞争力由大到小的排序是：北京、广东、上海、辽宁、山东、江苏、河北、浙江。

同时，由以上的综合评价可知：

①初始区域科技竞争力方面，北京、上海、广东居前三位，评价指数分别为 0.906，0.647，0.484，其中北京的初始竞争力远高于广东，上海居中，这说明在科技基础方面由于北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无论在人力资源、科技经费投入还是劳动者素质方面都优于上海和广东，而广东的基础条件较差，特别是人力资源，其评价指数仅为 0.356，低于北京（1）、上海（0.530）和江苏（0.369），另外，科技意识指数（0.399）也较低，低于北京（0.775）、上海（0.840）和江苏（0.401），劳动者素质指数（0.347）位于北京（1）、上海（0.546）、辽宁（0.399）和江苏（0.354）之后，这就限制了广东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增长质量的提高。

另外，江苏、浙江、山东、辽宁四省的初始科技竞争力基本位于同一层次，其指数分别是 0.401、0.408、0.394、0.398，河北最低（0.360）。在人力资源方面，辽宁（0.371）位于上海（0.530）之后，高于其他省份。科技经费方面，江苏（0.503）、浙江（0.577）和山东（0.510）高于河北（0.394）和辽宁（0.443）。在

劳动者素质方面，江苏（0.354）高于浙江（0.341）、山东（0.344）、河北（0.333），这得益于最近几年江苏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②潜在区域科技竞争力方面，北京（0.755）、广东（0.700）和上海（0.521）仍处于前三位，由于北京是我国的文化中心，也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聚集地，因此其专利和科技论文居全国第一位，同样上海在这方面也高于广东。但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上，广东居上海和北京前列，三者的评价指数分别是0.936，0.739和0.522，同时由于广东临近香港，是外商投资的首选地，在技术合作和应用方面也高于上海和北京，三者的指数分别为1，0.420和0.363。值得说明的是，最近几年江苏在吸引外资方面势头迅猛，该项的评价指数（0.502）高于上海（0.420）和北京（0.363）。

山东的潜在科技竞争力在八个省市中居第四位，位于江苏（0.447）、浙江（0.387）、河北（0.379）和辽宁（0.392）之前，原因是山东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转移与扩散方面具有竞争力，这五个省份（山东、江苏、浙江、河北、辽宁）两项评价指数的比例依次为：0.887∶0.663∶0.393∶0.357∶0.435和0.685∶0.542∶0.463∶0.460∶0.477。

③现实区域科技竞争力方面，广东（0.633）、北京（0.586）和上海（0.578）仍居前三位，所不同的是广东的排名在北京之前，这主要是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广东的宏观经济和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较大。在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由于北京是研发机构的聚集地，技术转化率相对较高，其指数为（1），广东（0.504）、上海（0.462）位于其后。在生活质量提高方面，上海（0.889）在北京（0.785）和广东（0.470）之前。在经济增长方式变化方面，辽宁（1）、河北（0.376）的评价指数高于北京（0.495）、广东（0.316）和上海（0.376），辽宁作为我国的老工业省，其GDP的增长靠工业的推动，当然其万元GDP的综合能耗也远高于其他省市。其他五个省份在现实区域科技竞争力上的排名依次为：辽宁（0.523）、河北（0.434）、江苏（0.420）、山东（0.411）和浙江（0.379）。

④从三级综合评价的排序可知，北京（0.931）、广东（0.724）、上海（0.580）在我国三大经济区的位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科技、教育、技术转移和扩散、技术合作以及服务方面起着无

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增长极理论无法解释某些地区的飞速经济增长，但这种潜在的增长极仍起着作用，我们不应忽视之。另外，在这三个地区中，北京、上海整体上是作为大城市出现的，而其他省份中包含有农村地区，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价效果，大城市基础设施好、教育发达、劳动者素质较好、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指标也较均衡，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广东的实力。

五　结语与建议

从我国三大经济区的区域科技竞争力的比较中我们可知，广东、北京、上海的区域科技竞争力位于前列，辽宁、山东、江苏紧随其后，而河北和浙江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在初始科技竞争力方面，广东距北京和上海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科技意识以及劳动者素质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甚至在江苏之后，这说明广东的经济增长基础有待改善，在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科技意识方面较欠缺。在潜在区域科技竞争力方面，广东和北京差距不大，而上海在这方面有一定距离，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上，上海位于北京、广东和山东之后，同样，在技术转移与扩散、技术合作与应用方面上海仍位于北京、广东和山东之后。在现实区域科技竞争力方面，上海和北京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低于广东，其他几个省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浙江较低。从另一方面来讲，广东、北京、上海这三个代表我国三大经济区的中心区域，都有一定的辐射作用，是三大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更多地融入世界一体化大市场进程的加快，我们不仅要注重科技环境和科技意识的培养，注重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还要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关系，不能再出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低于制造业（《广州日报》2003 年 7 月 8 日 A11 版）的情况，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上要有一定的比例，同时各省市要利用各自的优势加强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增强省省、省市之间的科技交流，仿照广东与香港签署的 CEPA，建立官方的交流渠道，为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邓聚龙：《灰色系统基本方法》，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

高洪深：《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方　旋：《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

许晓雯等："区域科技基础与科技环境综合评价体系研究"，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 3 月

刘　勇："我国典型地区区域竞争力初步研究"，载《学习与实践》2003 年第 1 期。

杨广青等："区域产业科技竞争力的比较研究"，载《中国软科学》2003 年第 3 期。

我国三大经济带外经贸发展比较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
张汉林　李计广　石庆方

1994年10月，广东省政府提出了“珠三角经济区”的概念，[①]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东莞市、中山市、佛山市、江门市、惠州市区以及惠阳、惠东、博罗，肇庆市的端州区、鼎湖区、四会和高要，总面积为4.16万平方公里。从地理上看，香港和澳门则是大珠三角的一部分，在此我们将不涉及。长三角地区聚集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精英”城市，有4个城市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上海为直辖市，另有南京、杭州、宁波3个副省级城市。环渤海地区[②]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是我国科技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口岸最集中的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粮食、煤炭、原油等进出口物资中转基地。

一　长江三角洲2001～2003年经济和外经贸发展情况

1．长江三角洲2001～2002年经济和外经贸发展情况

①2002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情况。2001～2002年，长江三角

---

① 朱文晖：《走向竞合——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发展比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引自广东省统计局综合处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统计资料（1980－1994）”，第4页。

② 此处的环渤海地区是指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河北省、辽宁省在内的三省二市。

洲地区经济和外经贸发展迅速。2002年，长三角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100.84亿元，比2001年（16854.9亿元，缺舟山市数据）净增2245.94亿元，增长率达到11.76%，比全国8%的平均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以上，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8.65%。总量上，长三角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是珠三角的2倍，对全国的贡献，长三角地区也比珠三角地区高了9个百分点。上海、苏州、杭州和无锡分别以5408.76亿元、2080亿元、1780亿元和1560.66亿元，分列全国第1、5、8、10位，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达到6个，分别是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和南京。从平均总量看，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2002年平均GDP突破了1000亿元，达到1273.39亿元，比珠三角地区高1/5左右。从发展速度上分析，长三角地区15城市的可比价增速差距不大，最快的是杭州市为14.5%，最慢的是上海为10.9%，高低落差仅为3.6个百分点，应该说发展比较均衡。

②2002年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情况。2002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完成出口总额923.89亿美元，比上年（828.35亿美元）增加95.54亿美元，增长速度达到11.53%，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8.38%，比上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地区完成出口总额112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0%，占全国的比重达到34.6%，比上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总量上，长江三角洲地区比珠江三角洲少200亿美元，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城市平均出口总额61.6亿美元，而珠江三角洲地区9个城市平均出口总额超过125.1亿美元，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差距明显。从城市发展情况看，长江三角洲地区超过100亿美元的城市只有2个，分别是上海（320.55亿美元）、苏州（185.2亿美元），此外，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城市间发展不均衡比较突出，有4个城市出口不足10亿美元。

表1　2001年长江三角洲15城市外经贸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亿美元，%

城　市	国内生产总值	进　口	出　口	进出口	出口贸易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	国际投资开放度
上　海	4950.8	332.70	276.28	608.98	46.15	43.92	7.34
苏　州	1760.3	169.18	184.22	353.40	86.55	48.59	22.83
杭　州	1568.0	40.14	72.84	112.98	38.42	5.03	2.65
无　锡	1360.1	38.89	45.33	84.22	27.56	18.29	11.12

续表 1

城　市	国内生产总值	进　口	出　口	进出口	出口贸易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	国际投资开放度
宁　波	1312.7	26.47	62.44	88.91	39.34	8.75	5.51
南　京	1150.3	34.35	58.33	97.08	41.94	9.53	6.85
绍　兴	823.0	6.00	18.80	24.80	18.89	1.58	1.59
南　通	809.3	14.00	28.80	42.80	29.43	2.59	2.65
常　州	672.9	14.45	30.79	45.24	37.84	8.81	10.83
嘉　兴	604.3	10.52	22.17	32.69	30.34	2.71	3.71
扬　州	505.5	6.64	5.68	12.32	9.29	1.05	1.72
镇　江	502.7	8.30	10.35	18.65	17.03	4.57	7.52
泰　州	450.0	2.25	6.56	8.81	12.06	1.98	3.64
湖　州	385.0	1.73	5.76	7.49	12.37	2.10	4.51
舟　山	—	—	—	—	—	—	—
总　计	16854.9	—	828.35	—	40.64	159.50	7.83
全　国	95933.3	2436.13	2661.55	5097.68	—	488.24	4.21
占全国比重	17.57	—	31.12	—	—	32.67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商务部、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省统计信息网、南通统计信息网、苏州统计信息网、无锡统计信息网、常州统计信息网、《镇江统计年鉴2003》、镇江市人民政府网站、杭州市统计局网站、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南京市统计局网站、中国嘉兴、嘉兴统计信息网、扬州统计信息网、南通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湖州统计信息网、舟山市人民政府网站、浙江外经贸公众网相关资料整理而来。

表 2　2002 年长江三角洲 15 城市外经贸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亿美元，%

城　市	国内生产总值	进　口	出　口	进出口	出口贸易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	国际投资开放度
上　海	5408.76	406.09	320.55	726.64	49.01	50.30	7.69
苏　州	2080.00	178.69	185.21	363.90	73.64	48.14	19.14
杭　州	1780.00	46.26	84.81	131.07	39.40	5.22	2.43
无　锡	1560.66	45.96	51.45	97.41	27.26	17.40	9.22
宁　波	1500.26	41.08	81.56	122.64	44.96	11.03	6.08
南　京	1295.00	40.83	60.11	100.94	38.39	15.54	9.92
绍　兴	928.77	9.69	29.01	38.70	25.83	3.82	3.40
南　通	890.08	13.65	25.31	38.96	23.52	2.38	2.21
常　州	760.30	12.62	26.55	39.17	28.88	4.81	5.23
嘉　兴	706.11	11.48	25.48	36.96	29.84	4.81	5.63

续表 2

城　市	国内生产总值	进　口	出　口	进出口	出口贸易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	国际投资开放度
扬　州	558.93	7.14	8.01	15.50	11.85	2.56	3.79
镇　江	561.19	10.87	10.11	20.98	14.90	5.01	7.38
泰　州	504.26	1.53	4.20	5.73	6.89	1.81	2.97
湖　州	422.47	1.78	7.09	8.87	13.88	3.85	7.54
舟　山	144.05	0.52	4.44	4.96	25.49	0.11	0.63
总　计	19100.84	—	923.89	—	40.00	176.81	7.66
全　国	102398	2952.16	3255.69	6207.85	40.00	550.11	4.44
占全国比重	18.65	—	28.38	—	—	32.14	—

资料来源：同表 1。

③2002 年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2002 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实际利用外资 176.81 亿美元，比 2001 年的 159.50 亿美元增加 17.3 亿美元，增长率为 10.85%，比全国 12.67% 的平均增长率低近 2 个百分点。占全国引进外资总量的 32.14%，大大高于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吸引外资数量。15 个城市平均利用外资量超过 10 亿美元，达到了 11.79 亿美元。但是区域内部发展比较不均衡。既有上海（50.3 亿美元）和苏州（48.14 亿美元）引资数量 50 亿美元左右的第一梯队，也有无锡（17.40 亿美元）、南京（15.54 亿美元）和宁波（11.03 亿美元）这样引资 10 多亿美元的第二梯队，还有 10 个城市引资几亿美元甚至只有 1000 多万美元的第三梯队，而且从发展速度上看差距有拉大的趋势。

2. 长江三角洲 2003 年经济和外经贸发展情况

①2003 年 1～9 月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情况。2003 年 1～9 月，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城市经济均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1～9 月，长江三角洲地区 15 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6064 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 20.31%，比 2002 年底提高 1.6 个百分点。从增速来看，15 个城市增幅最高的为 17.6%，最低的 11.8%，均值达到 14.5%，远远超过全国 8.5% 的平均水平。15 个城市中有 6 个城市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千亿元，分别是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增速上，苏州以 17.6% 领衔，嘉兴列第 2 位，无锡以 15.3% 居第 3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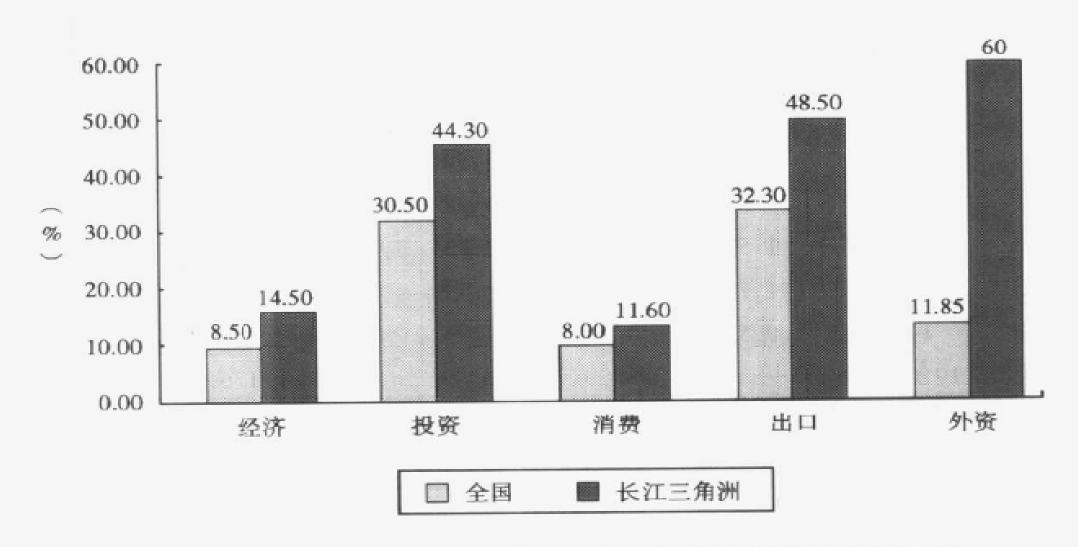


图 1　2003 年 1～9 月长三角 15 城市与全国经济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信息网相关资料整理。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03 年 1～9 月，长三角 15 城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357 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 21.4%，增速达到 44.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8 个百分点。1～9月，15 个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达到 11100 元，最低的也达到 6340 元，平均值为 8752 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0 多元，15 个城市中仅泰州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②2003 年 1～9 月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情况。2003 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出口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第 1～3 季度出口总额达到 977.39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31.76%，同比增长 48.5%，高于全国的 32.3% 水平。上海 1～9 月出口总额达到 351.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8%，增速为圈内第一；江苏前 9 个月的出口同比增长 48.6%，紧随上海之后位居第二；浙江以 41.0% 的出口增速位居第三名。长江三角洲省市中江苏省出口发展前景看好，原因有二：一是江苏省外商实际投资已超过广东省位列全国第一，而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为商品出口的增加提供了条件；二是江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进一步上升，前 9 个月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 245.0 亿美元和 14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7% 和 76.5%，在全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达到 60.8% 和 36.1%，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 7.0 个和 5.9 个百分点。

长江三角洲各省市进口同样保持快速增长。其中浙江省 1～9 月

进口146.7亿美元，已超过上年全年水平，比上年同期增长72.1%。进口增幅高出全国31.6个百分点，居沿海省市第2位，居圈内各省市第一，实现贸易顺差129.3亿美元，居全国首位。

③2003年1～9月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情况。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已被世人所瞩目，国际资本不断涌入，长三角各城市抢抓机遇，积极引进外资，2003年呈现一种“超强”态势：1～9月到位外资179.78亿美元，同比增长60%，占全国同期吸引外资的34.66%，全国引资成效居前的城市，几乎都在长三角地区。

15个城市中江苏利用外资总量和增速均明显高于浙江各市和上海。第1～3季度，江苏8市实际利用外资106.99亿美元，同比增长68.8%；上海为45.21亿美元，同比增长38.2%。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居前5位的有苏州（51.25亿美元）、上海（45.21亿美元）、无锡（20.86亿美元）、南京（16.09亿美元）、宁波（12.29亿美元）。浙江省7城市前三季度实际利用外资总量达到30.6亿美元，接近上年全年的水平，同比增长61.1%，高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

从实际利用外资分组看，绝对值10亿美元以上的城市有五个，即：苏州、上海、无锡、南京和宁波；3亿～5亿美元的有7个城市，即：杭州、常州、南通、嘉兴、扬州、镇江和绍兴；3亿美元以下的3个城市分别是：湖州、泰州和舟山。其中，舟山只有0.1亿美元。所有城市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增幅（11.85%）。

表3 长江三角洲15城市2003年1～9月外经贸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亿美元，%

城市	国内生产总值	进口	出口	进出口	出口贸易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	国际投资开放度
上海	4409.82	102.92	351.91	454.83	66.0	45.21	8.48
苏州	1898.60	229.04	214.90	443.94	9.37	51.25	22.32
杭州	1465.88	54.8	79.1	133.9	44.66	5.18	2.92
无锡	1402.4	49.44	51.52	100.96	30.38	20.86	12.30
宁波	1217.47	49.42	86.70	136.12	58.89	12.29	8.35
南京	1144.13	49.01	55.83	104.84	40.35	16.09	11.63
绍兴	760.47	10.27	31.69	41.96	34.46	4.38	4.76
南通	747.9	13.48	22.70	36.18	25.10	3.73	4.12

续表 3

城　市	国内生产总值	进　口	出　口	进出口	出口贸易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	国际投资开放度
常　州	647.78	12.6	24.8	37.4	31.66	5.46	6.97
嘉　兴	582.02	15.22	25.59	40.81	36.36	3.15	4.48
扬　州	459.1	6.47	7.69	14.16	13.85	3.11	5.60
镇　江	475.97	—	8.91	—	15.48	4.82	0.08
泰　州	409.22	—	4.65	—	9.40	1.69	3.42
湖　州	332.79	1.6	7.3	8.9	18.14	2.44	6.06
舟　山	110.68	0.7	4.1	4.8	30.66	0.12	0.90
总　计	16064.23	—	977.39	—	50.31	179.78	9.25
全　国	79113.73	2985.6	3077.0	6062.6	34.66	402.38	4.21
占全国比重	20.31	—	31.76	—	—	44.68	—

资料来源：同表 1。

二　珠三角外经贸发展及特点

1. 珠三角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珠三角一举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经济最活跃、发展最快地区之一，创立了经济发展的珠三角模式。从总量指标看，珠三角的本地生产总值从 1980 年的 119 亿元，上升到 2002 年的 9507 亿元，增长了 78.9 倍；珠三角本地生产总值占广东省的比重逐年提升，从 1980 年的 47.7% 上升到 2002 年的 81.4%，2003 年 1～9 月初步统计，上升为 84.0%；珠三角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也是不断上升，珠三角本地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2.6%，上升到 2002 年的 9.1%，2003 年 1～9 月初步统计，更是上升到 9.9%。

目前，珠三角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其中，电子信息产业等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尤其迅猛，居全国第一位。在此基础上，珠三角已经成为广东及全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基地。珠三角外贸出口额占广东省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28.2%，上升到 2002 年的 94.8%；占全国的比重，则从 1980 年的 3.4% 上升到

2002年的34.5%。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广东省的比重从1980年的47.6%，上升到2002年的90.4%，占全国的比重，则从1985年的15.9%，上升到2002年的27.3%。

表4　1980～2003年珠三角地区本地生产总值与广东省、全国比较

年　度	本地生产总值(当年价)/亿元			珠三角本地生产总值	
	珠三角	广东省	全　国	占全省比重(%)	占全国比重(%)
1980	119	250	4518	47.7	2.6
1985	304	577	8964	52.6	3.4
1990	872	1559	18548	55.9	4.7
1993	2265	3432	34634	66.0	6.5
1994	2984	4517	46759	66.1	6.4
1995	3899	5734	58478	68.0	6.7
1996	4534	6519	67885	69.6	6.7
1997	5222	7316	74463	71.4	7.0
1998	5833	7919	78345	73.7	7.4
1999	6439	8464	82068	76.1	7.8
2000	7379	9662	89468	76.4	8.2
2001	8364	10648	97315	78.6	8.6
2002	9507	11674	104791	81.4	9.1
2003.1～9	7811	9302	79114	84.0	9.9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历年)、"广东五十年"相关资料整理。

表5　1980～2003年珠三角地区外贸出口额与广东省、全国比较

年　度	外贸出口额(亿美元)			珠三角外贸出口额	
	珠三角	广东省	全　国	占全省比重(%)	占全国比重(%)
1980	6.2	22	181.2	28.2	3.4
1985	16.3	29.5	273.5	55.3	6
1990	81	222	621	36.5	13.1
1993	151	374	917	40.4	16.5
1994	357	502	1210	71.1	29.5
1995	461	566	1488	81.4	31
1996	537	593	1511	90.6	35.5
1997	614	746	1828	82.3	33.6

续表 5

年 度	外贸出口额(亿美元)			珠三角外贸出口额	
	珠三角	广东省	全 国	占全省比重(%)	占全国比重(%)
1998	663	756	1837	87.7	36.1
1999	674	777	1949	86.7	34.6
2000	847	919	2492	92.2	34
2001	908	954	2661.55	95.2	34.1
2002	1122.51	1184.65	3255.69	94.8	34.5
2003.1~9	1013.18	1067.10	3077.0	94.9	32.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历年)、商务部进出口统计资料整理。

表 6 1980~2003 年珠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广东省、全国比较

年 度	实际利用外资额(亿美元)			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额	
	珠三角	广东省	全 国	占全省比重(%)	占全国比重(%)
1980	1	2.1	—	47.6	—
1985	7.4	9.2	46.5	80.4	15.9
1990	17	20	103	85	16.5
1993	63	97	390	64.9	16.2
1994	84	114	432	73.7	19.4
1995	86	121	481	71.1	17.9
1996	98	139	548	70.5	17.9
1997	118	142	644	83.1	18.3
1998	118	151	586	78.1	20.1
1999	120	145	527	82.8	22.8
2000	125	146	594	85.6	21.1
2001	142	158	488	89.9	29.1
2002	150	166	550	90.4	27.3
2003.1~9	115	127	402	90.6	28.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历年)、商务部利用外资统计资料整理。

2. 珠三角地区外经贸发展现状及特点

2003 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推动了外经贸的发展，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2003 年 1～9 月，珠三角本地生产总值累计达 7810.87 亿元，出口达 1013.18 亿美元，同比增加 24.99%，实际利用外资达 114.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5%。2002 年，珠三角本地生产总值达 9507.48 亿元，同比增长 13.4%；出口达 1122.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0%；实际利用外资达 150.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6%（详见表 7～8）。

表 7　2003 年 1～9 月珠三角地区 9 城市外经贸发展情况

城　市	本地生产总值（亿元）	累计增加（%）	三次产业比例	出口（亿美元）	同比（%）	出口贸易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同比（%）
大珠三角	17856.35	—	—	1143.00	—	—	—	—
广东省	9301.99	13.0	6.8:53.3:39.8	1067.10	25.1	94.87	126.63	16.9
珠三角	7810.87	—	—	1013.18	24.99	107.27	114.85	18.5
广州市	2437.80	14.8	2.8:42.8:54.3	119.54	18.27	40.55	22.01	15.4
深圳市	1882.48	16.7	0.7:58.4:40.9	432.04	29.35	189.80	31.94	8.9
珠海市	347.62	17.2	3.5:55.8:40.7	48.57	46.08	115.55	6.15	4.6
佛山市	944.95	16.1	4.8:57.2:38.0	72.12	26.39	63.12	8.96	54.3
惠州市	407.01	12.9	12.3:60.9:26.8	48.44	11.41	98.42	10.62	26.4
肇庆市	361.93	9.8	24.3:39.0:36.6	7.94	22.91	18.14	4.49	16.6
江门市	505.26	10.5	9.7:49.3:40.9	26.63	21.21	43.59	6.07	1.1
东莞市	564.32	18.8	3.8:55.6:40.6	199.62	15.41	292.54	18.22	20.7
中山市	359.50	17.8	4.7:64.2:31.1	58.28	44.44	134.07	6.39	17.5
香　港	9586.81	—	—	114.96	-8.9	—	—	—
澳　门	458.67	—	—	14.86	10.2	—	—	—

注：美元和人民币汇率按 8.27 计，美元和港元汇率按 7.80 计，美元和澳元汇率按 8.03 计，港元和人民币汇率按 1.06 计，澳元和人民币汇率按 1.03 计。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省佛山市统计局、香港政府统计处、澳门统计与普查局相关资料整理。

①对外贸易发展快速增长。目前，珠三角地区已成为世界制造基地之一，已经具备了较强的配套生产能力，可以直接面向全球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从而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扩大进出口规

表8　2002年珠三角地区9城市外经贸发展情况

城　市	本地生产总值（亿元）	同比（%）	进出口（亿美元）	同比（%）	出口（亿美元）	同比（%）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同比（%）
大珠三角	23418.28	—	—	—	1308.76	—	—	—
广东省	11674.40	10.8	2211.05	25.3	1184.65	24.2	165.89	26.2
珠三角	9507.48	13.4	—	—	1122.51	24.0	150.00***	24.6***
广州市	3001.7	13.2	279.3	21.2	137.8	18.5	26.5	10.6
深圳市	2239.41	15.0	872.31	27.1	465.57	24.2	49.02	36.1
珠海市	410.64	12.4	128.39	31.0	52.04	37.4	9.37	9.2
佛山市	1168.66	11.3	—	—	78.88	24.1	10.02	57.2
惠州市	525.46	11.1	112.25	27.1	58.9	20	13.26	12.4
肇庆市	450.22	10.3	—	—	9.01	18.2	5.46	22.0
江门市	623.59*	11.02*	—	—	25.7*	-13.9*	7.24**	40.1**
东莞市	672.27	18.4	442.47	28.4	237.36	25.0	21.48	18.3
中山市	415.53	16.5	93.42	30.6	57.25	31.3	7.65	30.8
香　港	13353.88	—	—	—	167.85	-14.7	—	—
澳　门	556.92	—	—	—	18.40	-2.3	—	—

注：美元和人民币汇率按8.27计。* 2001年资料，来自江门市统计局；** 2002年1~11月资料，来自佛山市统计局；*** 其中，江门市的数据仅为2002年1~11月，来自佛山市统计局。

资料来源：根据《2003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广东省统计局、各市统计局、外经贸局相关资料整理。

模。2003年1~9月，珠三角地区出口1013.18亿美元，同比增长24.99%，出口增量占全省出口总增量的94.4%。然而，珠三角出口增幅与其他地区差距拉大。1~9月，全国出口总额达3077亿美元，同比增长32.3%，京、沪、苏、浙等省市的出口增势强劲。虽然珠三角出口也表现不俗，但与全国出口增幅比较，仍低了7.3个百分点。与主要省市比较，出口增势不如京、沪、苏、浙。

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9月，加工贸易出口增长23.1%，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9.2%。从经营企业看，外商投

资企业在珠三角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日渐显现，其出口势头增势不减；而三资、私营企业出口增长也十分强劲，1～9月，三资企业出口增长33.1%，私营企业出口增长1.7倍。

对主要市场出口形势良好。1～9月广东对香港出口增长22.0%、美国增长22.2%、欧盟增长37.7%、日本增长26.3%、东盟增长17.0%、中东增长39.8%、台湾增长15.3%、韩国增长54.8%。对上述主要市场出口额达955.3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89.5%，其中对香港、美国和欧盟的出口额分别达374.19亿美元、262.23亿美元和148.89亿美元。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带动整体出口增长。1～9月机电产品出口685.20亿美元，同比增长33.0%；高新技术产品（含部分机电产品）出口32.07亿美元，增长49.7%。增幅分别高于总体水平7.9个和24.6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4.2%和30.1%。

2002年，珠三角地区进出口贸易额排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香港特区、美国、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荷兰和英国。在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进口103.19亿美元，下降7.3%；机电产品进口552.14亿美元，增长43.2%；高新技术产品进口325.55亿美元，增长53.1%。

②珠三角利用外资增势良好。2003年1～9月，珠三角地区新签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达13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1%，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资9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分别占全省83.8%和89.4%。然而，2003年广东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增幅逐月回落，由1月份的49.6%回落至9月份的19.1%，这一状况与其他引资增长较快的省市形成鲜明对比。

外商投资项目规模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增资扩产保持良好势头。2003年1～9月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平均合同外资297.72万美元，同比增加58.29万美元。新批大项目多，总投资和净增资超1000万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32个，同比增加30个，合同金额74.39亿美元，增长9.6%。

珠三角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较大的行业为电子通信及设备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然而，第三产业正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增长点。2003年1～9月，广东第三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外资和实际吸引外资分别为31.72亿美元和29.4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60.5%和42.7%。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分别增长181.9%和47.4%，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增长146.4%和145.2%，金融、保险业增长542.5%、141.4%。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合同外资占总投资19.6%，实际吸收外资占27.5%，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3.8个和4.6个百分点。

发达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增势迅猛。来自德国、韩国、荷兰、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分别增长1.3倍、3.1倍、3.2倍和2.6倍；美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也分别增长35.1%、21.0%和24.4%。1~9月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排前十位的国家（地区）依次为：香港特区、维尔京群岛、美国、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荷兰、澳门、韩国和西萨摩亚。

三　环渤海地区外经贸发展现况及特点

2003年1~9月，环渤海地区本地生产总值达到22426.6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8.35%，位居三大经济区之首；出口额达到565.37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18.37%；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45.18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36.08%。2002年，环渤海地区本地生产总值达到27268.1亿元，出口额达到622.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80亿美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26.63%、19.13%、32.72%。

在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仍占据一定比重，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形成鲜明对比。制成品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是出口产品的主体，增速较快。2002年，北京市初级产品出口额4.8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8.2%；工业制成品出口额53.7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91.1%。天津市初级产品出口额11.8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0.21%；工业制成品出口额104.1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89.79%。山东省初级产品出口额46.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1.9%；工业制成品出口额164.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78.1%。辽宁省初级产品出口额35.1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8.5%；工业制成品出口额88.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71.6%。河北省初级产品出口额13.1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8.6%；工业制成品出口额32.8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71.40%。

表9　2003年1～9月环渤海五省市（包括部分城市）外经贸发展情况

城　市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进　口(亿美元)	出　口(亿美元)	进出口(亿美元)	出口贸易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国际投资开放度(%)
北　京		2462	425.3	135.2	560.5	45.41	17	5.71
天　津		1730.7*	107.03	101.02	208.05	—	14.25	—
辽　宁		4511.2*	86.23	100.05	186.28	—	32.26	—
其中	大连	1191	54.29	58.58	112.87	40.68	15.9	11.04
山　东		8640.14	131.9	186.9	318.8	30.51	74.5	7.13
其中	青岛	—	52.32	77.96	130.28	—	23.4	—
河　北		5082.6	22.3	42.2	64.5	6.87	7.17	1.17
其中	唐山	—	—	—	31297	—	0.83	—
	秦皇岛	—	—	—	74681	—	0.88	—
	廊坊	—	—	—	21632	—	1.16	—
总　计		22426.64	772.76	565.37	1338.13	—	145.18	—
全　国		79113.73	2985.6	3077.0	6062.6	—	402.38	—
占全国比重		28.35	—	18.37	—	—	36.08	—

注：北京市的进出口数据为1～10月份数据，＊天津市2003年1～9月GDP由以下方法计算而来：2002年GDP×0.75×112.5%；辽宁省2003年1～9月GDP由以下方法计算而来：2002年GDP×0.75×110.2%。

资料来源：根据《2003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商务部、山东统计信息网、青岛统计、威海统计信息网、辽宁省统计信息网、大连统计、沈阳市统计信息网、天津市统计信息网相关资料整理。

从引资结构来看，环渤海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领域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其中，北京市为39.42%，天津市为62.62%，山东省为84.97%，河北省为79.04%，辽宁省为58.21%。值得注意的是，环渤海地区第三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北京市达到55.55%，天津市达到36.04%，山东省为10.65%，河北省为13.21%，辽宁省达到30.10%。

表10　2002年环渤海五省市（包括部分城市）外经贸发展情况

城　市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进　口(亿美元)	出　口(亿美元)	进出口(亿美元)	出口贸易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国际投资开放度
北　京	3130	398.9	126.1	525.0	33.32	51	13.48
天　津	2051.2	112.3	116.0	228.3	46.77	10.7	4.31
辽　宁	5458.2	93.7	123.7	217.4	18.74	42.6	6.45

续表 10

城市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进口(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进出口(亿美元)	出口贸易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国际投资开放度(%)
其中	沈阳	1400	14.6	14.0	28.6	8.27	16.5	9.75
	大连	1406	58.4	71.5	129.9	42.06	16.03	9.43
山东		10552.1	128.2	211.2	339.4	16.55	65.2	5.11
其中	青岛	1518.2	63.54	105.71	169.25	57.58	23.8	12.96
	威海	1115	19.08	25.69	44.77	19.05	12.05	8.94
河北		6076.6	20.7	45.9	66.6	6.25	10.5	1.43
	秦皇岛	335.66	4.33	3.52	7.85	8.67	1.39	3.42
总计		27268.1	753.8	622.9	1376.7	5.46	180	—
全国		102398	2952.16	3255.69	6207.85	40.00	550.11	4.44

资料来源：根据《2003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3 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商务部、山东统计信息网、青岛统计、威海统计信息网、辽宁省统计信息网、大连统计、沈阳市统计信息网、天津市统计信息网相关资料整理而来。

四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外经贸发展比较

1.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外经贸发展水平比较

从经济发展总量来看，环渤海地区本地生产总值总量最高，2003 年 1～9 月达 22426.64 亿元，2002 年为 27268.1 亿元；长三角地区次之，2003 年 1～9 月达 16064.23 亿元，2002 年为 19100.84 亿元；珠三角最低，2003 年 1～9 月达 7810.87 亿元，2002 年为 9507.48 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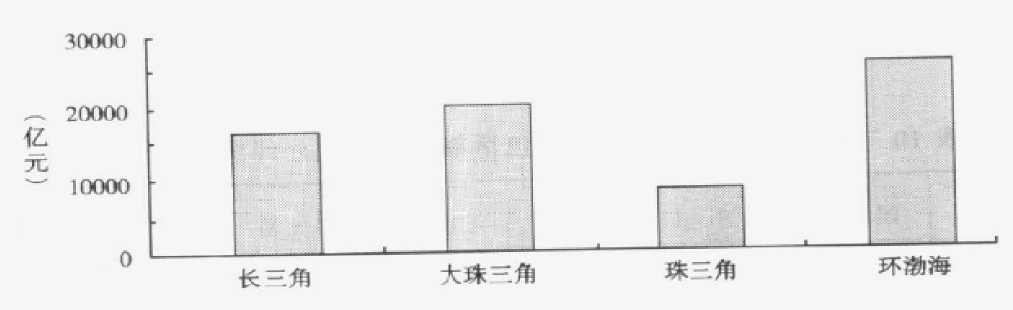


图 2　2003 年 1～9 月四地区本地生产总量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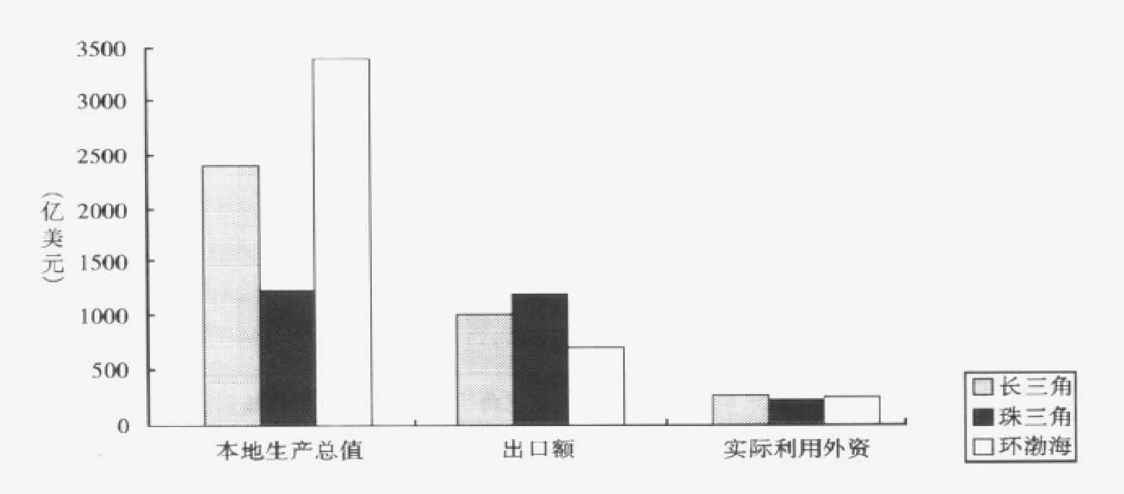


图 3　2002 年三地外经贸发展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从出口总额来看，2003 年 1～9 月，珠三角地区最高，达 1013.18 亿美元；长三角地区次之，达 977.39 亿美元；环渤海地区最低，为 565.37 亿美元。2002 年，珠三角地区为 1122.51 亿美元，长三角地区为 923.89 亿美元，环渤海地区为 622.9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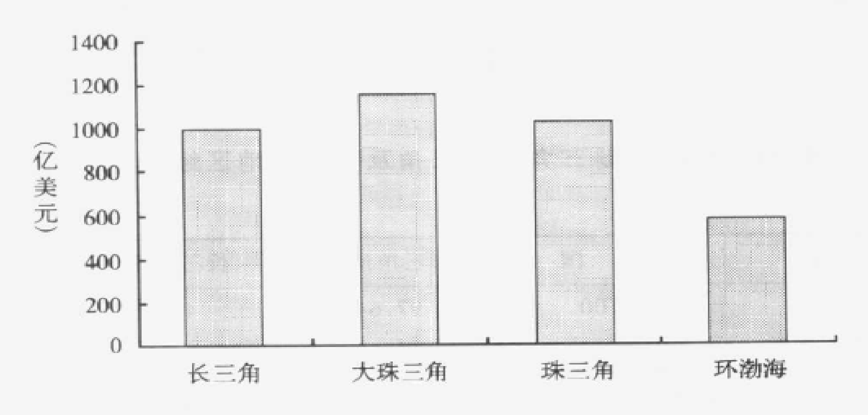


图 4　2003 年 1～9 月四地区出口额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从实际利用外资额来看，2003 年 1～9 月，长三角地区最高，达 179.78 亿美元；环渤海地区次之，达 145.18 亿美元；珠三角地区最低，为 114.85 亿美元。2002 年，长三角地区为 220.1 亿美元，环渤海地区为 180 亿美元，珠三角地区为 150 亿美元。

2. 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国际经济开放度比较

对地区经济开放度（Economic Openness）做出正确的估价，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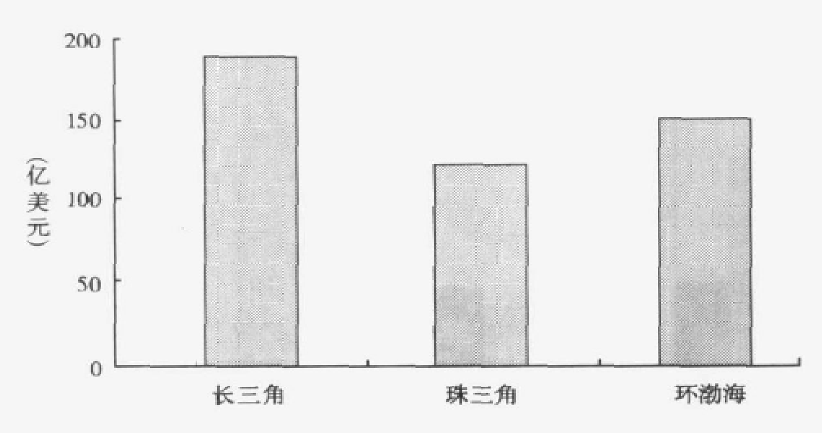


图 5　2003 年 1～9 月三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在此基础上决策未来发展，对指导地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领域，其变动趋势是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因此，仅仅考虑对外贸易难以正确度量经济开放度。为此，本文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指标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并以全国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分析。

表 11　2002 年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地区经济开放度

单位：%

类　　别	全　　国	珠三角地区	长三角地区	环渤海地区
出口贸易系数	40.00	97.64	40.00	18.89
国际投资开放系数	4.44	14.43	7.66	5.46

注：①贸易系数 = 进出口总额/GDP；出口贸易系数 = 出口总额/GDP。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三部分，而且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由于本文的着重点为货物贸易，本文着重分析商品贸易的系数。

②国际投资开放度 = 国际投资/GDP，用于衡量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国际投资按类型分包括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按资金流向分包括资金流入与资金流出。由于我国和地区对外投资数额很小，并受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根据利用实际外资额进行整理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从表 11 中我们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开放程度仍然位于全国首位。2002 年，珠三角 9 个城市的出口贸易系数高达 97.64%，比全国的比率（40.00%）高出 2 倍以上；吸引外资的开放度也达到了 14.43%，比全国 4.44% 的比例高出 3 倍以上。其中，东莞市、

深圳市、中山市和珠海市4城市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0%，东莞和深圳更是达到291.99%和171.93%。在吸收外资开放度方面，东莞市、深圳市、中山市、珠海市和惠州市5城市也已经超过了20%。这说明，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方面，珠江三角洲不仅起步早，发展程度高，而且最近几年也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

从最近两年的发展势头来看，长三角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在吸收外资方面。从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初，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南京等6个沿江港口城市，尤其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以及昆山、吴江等地台资工业园区的先后崛起，使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转移仅仅才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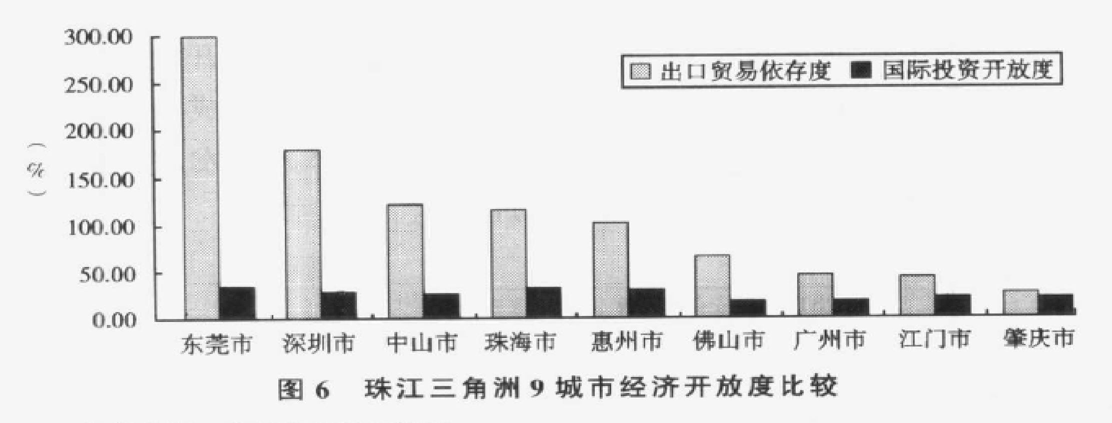


图6　珠江三角洲9城市经济开放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2002年，长三角地区的出口贸易系数和全国相同也是40.00%，而吸引外资的开放度（7.66%）也只有珠三角的1/2左右。这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珠三角地区拉动的，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是低水平的，目前的经济开放程度与水平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城市来看，苏州和上海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最高，苏州的出口贸易系数和国际投资开放度分别为73.64%和19.14%，已经与珠三角一些城市发展程度相当，上海的出口贸易系数也将近50%（49.01%）。苏州和无锡的外资和出口都取得了超常规发展，发展速度在40%以上。

从国内比较看，我国目前对外开放度的前沿阵地仍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珠江三角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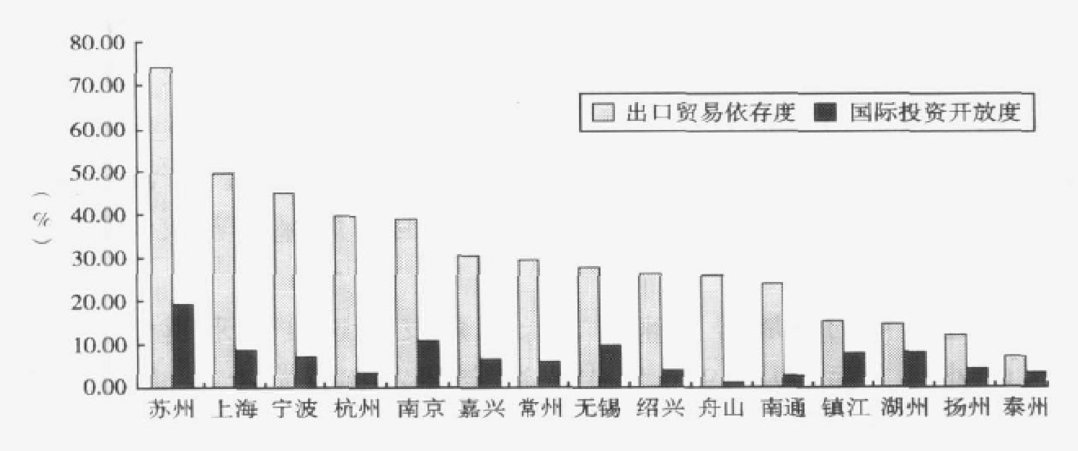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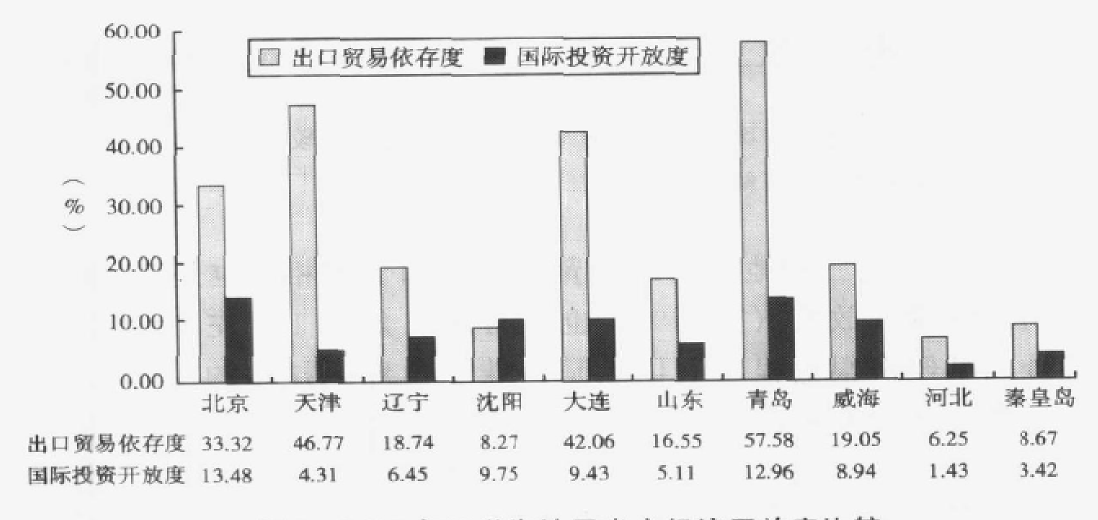


图7　2002年长江三角洲15城市经济开放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相比差距甚大，甚至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90年代以来，尤其是浦东及长江沿岸港口城市的开发、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心正从东南沿海向长江流域转移。地处沿海与沿江开放带结合部的长江三角洲以其区位、历史与人才的独特优势，正成为我国的经济、信息、金融与科技中心，在长江流域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及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北京	天津	辽宁	沈阳	大连	山东	青岛	威海	河北	秦皇岛
出口贸易依存度	33.32	46.77	18.74	8.27	42.06	16.55	57.58	19.05	6.25	8.67
国际投资开放度	13.48	4.31	6.45	9.75	9.43	5.11	12.96	8.94	1.43	3.42

图8　2002年环渤海地区省市经济开放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与上述两个地区相比，环渤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还很落后。2002年北京、天津、山东、辽宁和河北5省市的出口贸易系数只有

18.89%，大大落后于40%的全国平均水平。而吸引外资占GDP的比重（5.46%）也只比平均水平稍微高一些。尽快提升经济开放水平与质量，是环渤海地区本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从环渤海地区自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区域内部经济开放程度的地域差异极大，既有北京、天津和大连、青岛这样一些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沈阳等一些经济较为封闭的内陆地区。

3. 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出口商品结构比较

从三地区出口产品中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构成来看，珠江三角洲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最高，2002年广东全省出口制成品的比重达到了96.90%，而且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仍然保持了快速发展。2002年，在总出口增长24.2%的情况下，广东省机电产品出口726.57亿美元，增长31.2%；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09.66亿美元，增长39.0%，都超过了所有产品出口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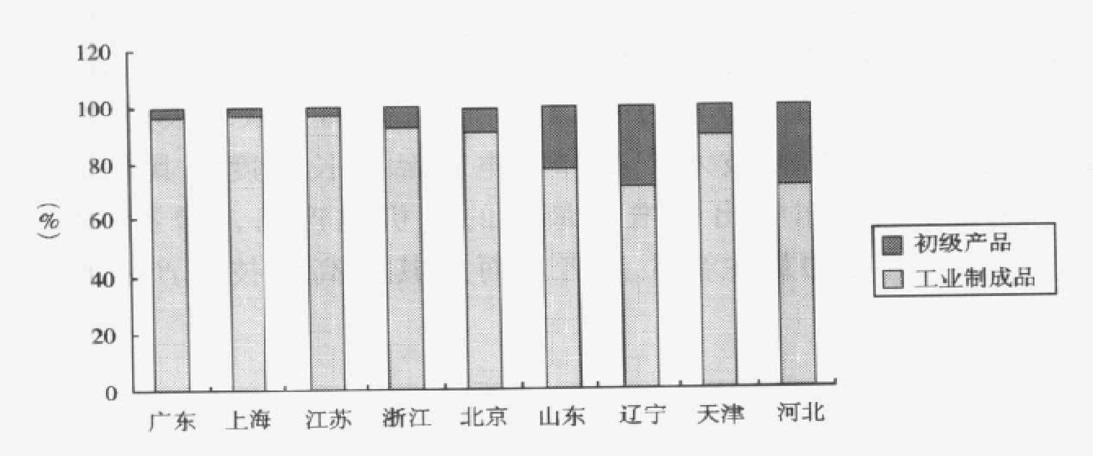


图9　2002年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地区省市出口商品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出口商品构成差别大一些，2002年上海和江苏工艺制成品出口虽然分别达到了97.11%和97.49%，但是浙江只有93.01%，这也说明其传统的农产品出口仍然占有一定地位，其农副产品加工品出口比重也比广东要高。然而，长三角最近两年的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加快，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江苏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机电产品出口211.9亿美元，增长51.4%，占全省出口总额55.1%；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突破100亿美元，达121.1亿美元，增长68.6%，占全省出口总额31.5%，其中计算机与通信产品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84.9%。上海市2002年机电产品出口也增长18.5%，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2.5%。

表12　2002年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地区省市出口商品结构

单位：%

省(市)	广东	上海	江苏	浙江	北京	山东	辽宁	天津	河北
初级产品	3.10	2.89	2.51	6.98	8.20	21.90	28.50	10.21	28.60
工业制成品	96.90	97.11	97.49	93.01	91.10	78.10	71.60	89.79	71.40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相比之下，环渤海地区由于外向型经济起步较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因此有着更多内陆地区的河北、辽宁和山东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仍未超过80%（分别为71.4%、71.6%和78.1%），河北和辽宁的初级产品出口将近30%，对其外贸和经济发展仍然很重要。而作为直辖市的北京和天津两市来讲，两地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也只有90%左右，分别为91.1%和89.79%。从增长速度来看，北京和沿海城市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增长速度比其他地区要快。2002年，山东省出口增长最快的是机电产品，增长32.5%，是全省出口增长的最主要贡献者。而且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45.6%。

表13　2002年三地区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

单位：%

类别	环渤海地区					长三角地区			珠三角地区
产　品	山东省	北京市	天津市	辽宁省	河北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广东省
机电产品	23.8	63.5	63.8	38.8	17.21	52.5	55.1	76.7	61.33
高新技术产品	5.38	44.6	39.3	17.06	1.53	23.3	31.5	37.1	26.14

注：浙江省为2003年1～11月份的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4．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出口市场结构比较

从三个地区的出口市场结构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三个特点：一是地域特征明显。广东紧邻香港，因此香港在其出口市场上的比重超过了1/3，达到了35.78%，这与广东的产品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有关。而日本和韩国是环渤海省市的重要出口市场，山东、北京、辽宁和河北的第一大出口市场都是日本（河北省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出口比重分别达到了25.44%、18.6%、37.85%和14.94%。韩国也是山东、天津、辽宁和河北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出口比重也都超过了10%。而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来讲，上海、江苏和浙江3省市的出口市场非常相似，排在前3位的都是美国、日本和香港。

表14　2002年环渤海地区出口市场结构

单位：%

山东省		北京市		天津市		辽宁省		河北省	
日　本	25.44	日　本	18.6	美　国	31.44	日　本	37.85	欧　盟	15.45
美　国	17.68	美　国	17.3	日　本	16.67	美　国	14.66	日　本	14.94
韩　国	15.50	香　港	13.6	韩　国	11.39	韩　国	10.24	韩　国	13.52
香　港	5.13	德　国	7.6	香　港	6.01	新加坡	5.07	美　国	11.97
德　国	2.73	韩　国	6.5	德　国	4.31	香　港	3.51	台湾省	6.80
英　国	2.20	匈牙利	3.5	新加坡	3.18	荷　兰	3.34	俄罗斯	6.29
荷　兰	1.91	荷　兰	2.3	印度尼西亚	2.86	德　国	2.45	东　盟	6.13
加拿大	1.54	马来西亚	1.6	荷　兰	2.30	朝　鲜	2.04	香　港	4.29
俄罗斯	1.50	—	—	马来西亚	2.19	英　国	1.18	印　度	1.99

资料来源：《2003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二是无论那个地区，美国都是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各个省市的出口市场中美国不是排在首位就是第二，这也与美国贸易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高度相关。

三是各个地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经贸关系都居于重要地位。香港是珠三角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长三角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而且是北京市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及天津和山东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台湾省在河北、上海和广东的出口市场中也占重要地位。

表 15　2002 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出口市场结构

单位：%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广东省	
美　国	22.85	美　国	21.33	美　国	19.34	香　港	35.78
日　本	21.84	日　本	19.75	日　本	13.63	美　国	24.97
香　港	9.73	香　港	8.53	香　港	4.79	欧　盟	13.03
德　国	3.81	韩　国	4.44	德　国	4.32	日　本	7.88
韩　国	3.62	德　国	4.27	韩　国	2.96	东　盟	5.16
马来西亚	3.32	荷　兰	4.10	阿拉伯酋长国	3.24	台湾省	1.81
台湾省	2.74	英　国	3.10	英　国	3.22	澳大利亚	1.24
英　国	2.53	台湾省	2.76	意大利	2.90	韩　国	1.22
荷　兰	2.41	新加坡	2.64	荷　兰	2.26	加拿大	1.14

资料来源：《2003 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5. 三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流向比较

总体上来看，三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的产业流向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九省市简单平均为 71.20%。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五省制造业引资比重均占 80% 左右。除了北京市，其余各省制造业引资比重均在 50% 以上。第一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小，九省市简单平均仅为 2.03%，第三产业九省市简单平均为 25.89%。

表 16　2002 年三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流向比较

单位：%

产业流向	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	北京	天津	山东	河北	辽宁
第一产业	0.70	1.26	1.11	1.63	2.41	0.74	2.93	4.82	2.66
农林牧渔业	0.70	—	—	1.63	2.41	0.74	2.93	4.82	1.56
第二产业	53.45	87.93	81.43	80.11	40.37	62.99	86.42	81.77	66.29
采掘业	0.03	—	—	0.12	0.07	0.12	0.25	1.26	1.33
制造业	52.99	87.93	79.04	79.25	39.42	62.62	84.97	79.04	58.21
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0	—	1.04	0.32	—	—	—	0.21	4.56
建筑业	0.33	—	1.13	0.42	0.88	0.25	0.69	1.26	2.20
第三产业	42.57	10.81	17.46	16.65	55.55	36.04	10.65	13.21	30.10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3.95	—	1.32	1.47	1.02	0.98	0.62	0.63	1.27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14.71	—	2.90	2.54	4.31	21.45	—	2.10	6.03

续表 16

产业流向	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	北京	天津	山东	河北	辽宁
金融、保险业	0.07	—	—	—	—	0.25	—	—	0.75
房地产业	2.46	—	6.80	1.84	4.45	2.45	2.41	5.03	15.36
社会服务业	19.75	—	4.24	10.10	43.58	10.29	2.48	5.03	6.16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0.13	—	—	0.08	—	0.25	0.07	0.21	0.02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0.17	—	—	0.08	—	—	0.10	—	0.00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33	—	—	0.54	2.19	0.37	0.27	0.21	0.48
其他行业	3.28	—	—	1.48	0.44	0.25	—	0.20	0.95

资料来源：根据《2003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相关资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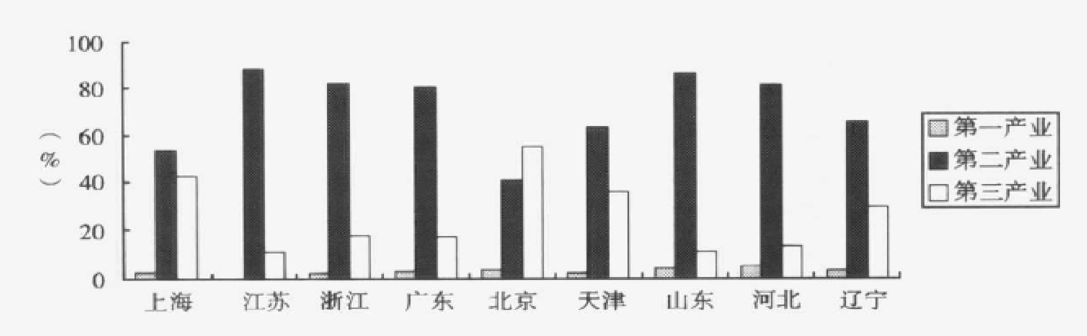


图 10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流向

资料来源：根据《2003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相关资料整理。

从三地区比较来看，环渤海地区第一产业引资比重简单平均数达 2.71%，高于长三角（1.02%）和珠三角地区（1.63%）。从第二产业引资来看，以珠三角所占比重最高，广东省达到 80.11%，长三角简单平均为 74.27%，环渤海地区简单平均为 67.57%。从第三产业引资比重来看，环渤海地区简单平均数达 29.11%，长三角为 23.61%，广东省为 16.65%；其中，上海市为 42.57%，北京市为 55.55%，天津市为 36.04%，反映了这三个直辖市相对较为发达的第三产业。

6. 三地区竞争力比较

从硬竞争力指数简单平均数来看，三地区不相上下，长三角最高为 0.597，环渤海为 0.58，珠三角为 0.559。从各项分指标比较

来看，长三角地区在资本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区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珠三角地区在结构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环渤海地区则在人才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表 17　2002 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硬竞争力指数比较

城市名称	人才竞争力	资本竞争力	科技竞争力	结构竞争力	基础设施竞争力	区位竞争力	环境竞争力	简单平均
长三角	0.569	0.443	0.321	0.754	0.653	0.601	0.837	0.597
上　海	0.858	1	0.939	0.766	1	1	0.95	
南　京	0.671	0.468	0.474	0.622	0.734	0.745	0.884	
杭　州	0.746	0.498	0.392	0.533	0.657	0.696	0.946	
无　锡	0.516	0.368	0.286	0.729	0.694	0.594	0.878	
苏　州	0.6	0.463	0.356	0.722	0.658	0.583	0.972	
宁　波	0.65	0.423	0.322	1	0.661	0.575	0.862	
南　通	0.545	0.27	0.186	0.538	0.604	0.549	0.731	
常　州	0.583	0.306	0.201	0.794	0.66	0.544	0.828	
嘉　兴	0.47	0.389	0.26	0.733	0.542	0.512	0.742	
绍　兴	0.485	0.383	0.223	0.988	0.571	0.493	0.871	
湖　州	0.404	0.378	0.074	0.878	0.485	0.492	0.68	
舟　山	0.301	0.365	0.143	0.745	0.574	0.428	0.695	
珠三角	0.577	0.434	0.285	0.780	0.535	0.520	0.782	0.559
广　州	0.74	0.713	0.541	0.955	0.651	0.841	0.955	
深　圳	0.765	0.602	0.351	0.767	0.751	0.591	0.847	
东　莞	0.562	0.357	0.246	0.884	0.495	0.499	0.607	
珠　海	0.422	0.252	0.209	0.497	0.558	0.495	0.845	
佛　山	0.569	0.357	0.173	0.792	0.492	0.455	0.733	
惠　州	0.459	0.36	0.226	0.807	0.419	0.45	0.595	
中　山	0.519	0.395	0.251	0.755	0.38	0.307	0.892	
环渤海	0.61	0.418	0.406	0.636	0.599	0.598	0.793	0.58
北　京	1	0.807	1	0.863	0.817	0.924	0.918	
天　津	0.598	0.502	0.549	0.719	0.658	0.726	0.703	
沈　阳	0.531	0.412	0.388	0.594	0.627	0.777	0.695	
石家庄	0.657	0.347	0.254	0.507	0.62	0.567	0.536	
大　连	0.562	0.431	0.297	0.682	0.738	0.537	1	
济　南	0.665	0.423	0.419	0.634	0.386	0.533	0.716	
青　岛	0.638	0.431	0.43	0.658	0.602	0.519	0.947	
秦皇岛	0.472	0.312	0.176	0.538	0.68	0.51	0.808	
烟　台	0.533	0.224	0.258	0.604	0.45	0.458	0.762	
威　海	0.444	0.294	0.292	0.562	0.413	0.431	0.843	

注：长三角地区指数由上海等 12 个城市的简单平均数代表；珠三角地区指数由广州等 7 个城市的简单平均数代表；环渤海地区指数由北京等 10 个城市的简单平均数代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相关资料整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从软竞争力指数简单平均数来看，珠三角最高为0.798，长三角为0.749，环渤海地区为0.648。从各项分指标比较来看，长三角地区在制度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企业管理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珠三角地区则在文化竞争力、开放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环渤海地区全面处于落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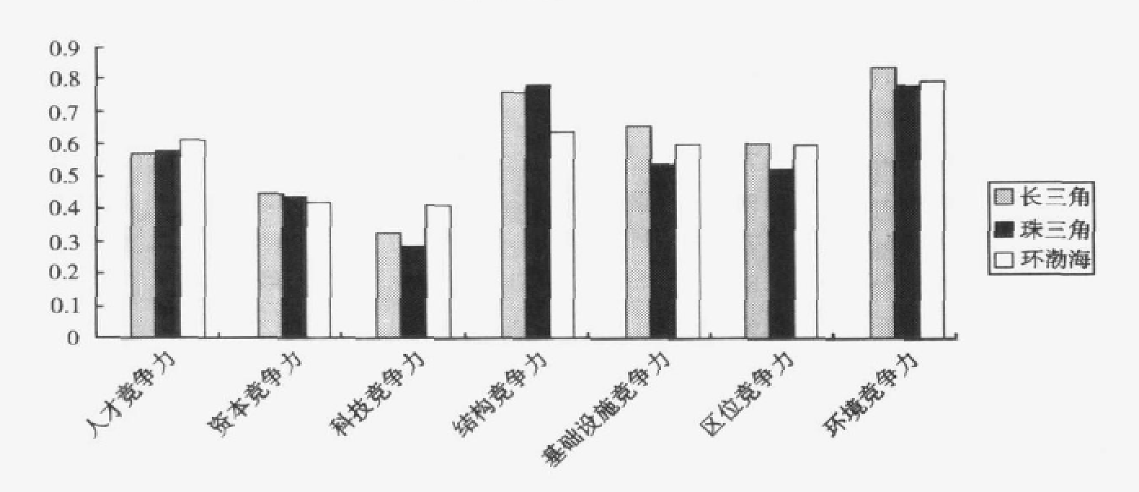


图11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硬竞争力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同表17。

表18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软竞争力指数比较

城市名称	文化竞争力	制度竞争力	政府管理竞争力	企业管理竞争力	开放竞争力	简单平均
长三角	0.803	0.872	0.715	0.829	0.528	0.749
上　海	0.934	0.928	1	0.885	0.718	
南　京	0.789	0.779	0.587	0.768	0.529	
杭　州	0.764	0.877	0.682	0.919	0.573	
无　锡	0.921	0.821	0.767	0.852	0.537	
苏　州	0.881	0.885	0.835	0.928	0.67	
宁　波	0.829	0.959	0.796	0.922	0.601	
南　通	0.814	0.823	0.611	0.781	0.466	
常　州	0.799	0.822	0.524	0.753	0.551	
嘉　兴	0.769	0.928	0.752	0.798	0.451	
绍　兴	0.84	0.904	0.732	0.799	0.484	
湖　州	0.685	0.909	0.633	0.799	0.435	
舟　山	0.609	0.833	0.666	0.739	0.323	

续表 18

城市名称	文化竞争力	制度竞争力	政府管理竞争力	企业管理竞争力	开放竞争力	简单平均
珠三角	0.824	0.826	0.709	0.824	0.809	0.798
广　州	0.871	0.759	0.834	0.938	0.694	
深　圳	1	1	0.755	1	1	
东　莞	0.746	0.835	0.685	0.671	0.899	
珠　海	0.704	0.733	0.727	0.765	0.731	
佛　山	0.787	0.783	0.648	0.75	0.618	
惠　州	0.779	0.77	0.631	0.785	0.932	
中　山	0.883	0.904	0.68	0.858	0.786	
环渤海	0.686	0.738	0.646	0.733	0.439	0.648
北　京	0.755	0.846	0.82	0.856	0.638	
天　津	0.587	0.677	0.593	0.661	0.454	
沈　阳	0.683	0.655	0.602	0.651	0.432	
石家庄	0.594	0.722	0.662	0.717	0.327	
大　连	0.679	0.722	0.584	0.686	0.491	
济　南	0.818	0.777	0.721	0.8	0.441	
青　岛	0.785	0.851	0.707	0.883	0.492	
秦皇岛	0.643	0.629	0.541	0.534	0.379	
烟　台	0.652	0.758	0.616	0.712	0.377	
威　海	0.659	0.744	0.611	0.829	0.363	

注：长三角地区指数由上海等12个城市代表；珠三角地区指数由广州等7个城市代表；环渤海地区指数由北京等10个城市代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相关资料整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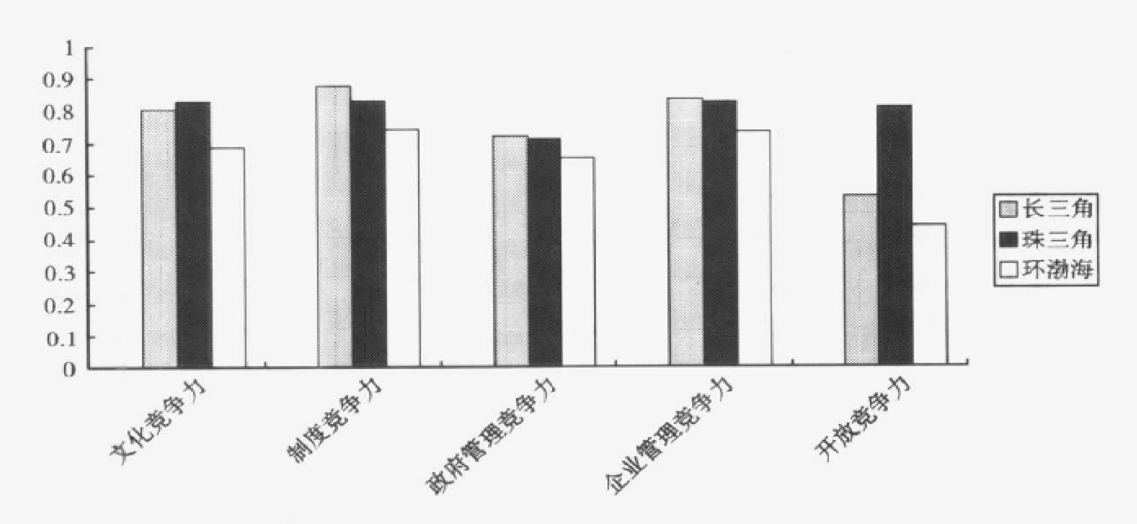


图 12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软竞争力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同表18。

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与二级城市现代服务业分工关系研究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李金勇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向俊波

一　问题的提出及概念的界定

在现代经济中，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已把现代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课题（杨伟民，2002）。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和居民消费规模及层次的日益提升，为现代生产及生活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按照产业更替的理论，城市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依靠工业部门的建立和扩张。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推动城市经济成长的原有动力逐渐减弱，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制造业面临的升级压力加大，经济的结构调整阶段来临，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但是，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存在这样--种倾向，即重视制造业，而忽视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区域范围内的非核心（边缘、次中心、分中心）城市，相对于蓬勃发展的制造业，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更显滞后。毫无疑问，核心城市应当加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以服务联结腹地，更好地为腹地城市提供更为全面的生产及生活服务，充分体现核心城市的中心地位。而作为承上启下的二级城市，自身也同样面临着其城市内部及分中心腹地功能所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在两级城市都同样致力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情况下，和制造业的融合与协作一样，两者之间的产业分工关系就成为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对于大都市圈内的二级城市，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与核心城市的博弈中处于劣势，要

实现自身的发展，必须寻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差异化竞争和错位发展。

本文的核心城市并不是按照我国人口统计口径来区分的城市分类，而是根据城市的经济实力及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功能定位来界定的。像长江三角洲的上海，珠江三角洲的香港及环渤海湾地区的北京，均是区域范围内的核心城市。相应的二级城市也是针对核心城市而言的，在区域范围内的城市等级体系中，处于仅次于核心城市的地位，具有区域分中心的城市性质，像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及杭州，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及深圳，环渤海湾地区的大连及青岛，都是区域范围内的二级城市。核心城市与二级城市在产业关系上，竞争与合作并存，以互补性的产业分工为主。

现代服务业是指工业产品的大规模消费阶段以后出现快速增长的服务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伴随工业化的展开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也称为补充性服务业。如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现代金融业；开发、建筑、装饰、物业、交易等房地产业；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业。另一类是工业化后期大规模发展的新兴服务业，如移动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信息服务业；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等新兴行业。作为第三产业（“广义”服务业）中高增长性和最具潜力的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二　国际比较：纽约与波士顿的现代服务业分工关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由于发达国家普遍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受成本、环境压力等原因影响，一般的制造业正在或者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美和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内地。发达国家城市已基本上实现了产业基础的服务业化。在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区或城市带中，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一般都是服务业占据主导，只是在服务业发展的部门、规模上存在着差异，基本上是一种水平分工的态势。他们的经验说明，现代服务业可以在都市圈和城市地带范围内实现水平分工，而不一定要采取全部集中在中心城市中的发展模式。以美国的东北沿岸城市地带为例，纽约在19世

纪开始崛起，逐渐取代了波士顿和费城成为东北沿海的首位城市，波士顿和费城也相应成为都市圈内的二级城市，但是，它们并未沦为围绕纽约的制造业基地，而是继续保持了产业的水平分工态势。我们可以从对波士顿的分析中看出这种水平分工的特点。

在美国独立以前，波士顿是美国最重要的港口、贸易中心和港口工业基地。在战后，波士顿工业化过程大大加速，制造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金融、保险、咨询等产业也随着制造业而发展起来，波士顿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中心。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纽约的崛起，波士顿成为美国东北大西洋沿岸的二级城市，但其现代服务业发展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相当的规模，具体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

①金融保险业。波士顿的金融保险业最早随航运业发展起来，在波士顿的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发展以及美国的铁路建设和西部开发中，波士顿的金融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纽约的崛起取代了波士顿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波士顿金融业特别是互助式地方金融发展仍然非常旺盛。波士顿的一些地方金融机构和银行正是在纽约崛起为全国金融中心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例如：北英格兰储蓄银行（North Eng Saving Bank，est.1870），洛克斯贝里高地储蓄银行（Roxbury Highland Saving Bank，est.1889）等。这些银行的基本目的是为社区提供银行服务和为地方商业活动提供贷款，而那些位于中心城市中的大型金融机构对这类金融服务并没有什么兴趣。地方金融机构还为本地的中小企业、个体业主、本地居民提供资金融通、养老保险、货物保险、购买住宅贷款等一系列金融服务。今天，波士顿的互助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仍然在全美国有重要的地位。

②证券交易业。波士顿的正式股票交易开始于1834年，早期交易的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票，随后，本地工厂股票、运河股票、政府债券等陆续加入，波士顿成了全美的股票交易中心。1923年，纽约股票交易所成立，纽约成为了全国的股票交易中心，但纽约的证券业务主要集中在外汇交易（占全球的16%），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占全球的14%），外国债券交易（占全球的34%）。与之对应，波士顿的证券交易所却以其金融创新而闻名。例如，波士顿交易所是全美第一个吸纳外国经纪人作为会员的交易所，是全美国第一个实现和国外证券交易所电子化连接的证券交易所。波士顿的证券交易所为股票交易提供最有秩序、规则最完善的市场，为投资者提供

着最好的金融服务，所以，全国很多公司仍然寻求在波士顿上市，特别是小公司和刚起步的公司（emerging companies）在这里上市相对比较容易。

③教育、研究和咨询业。波士顿集中了几所美国最有实力的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高等教育产业在波士顿一直比较发达。二战以后，波士顿的计算机和电子工业发展迅速，高技术的研究开发业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有重要的地位。一些法律咨询公司、会计公司等在波士顿的工业化以及二战后的高技术化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例如 Choate, Hall & Stewart 法律咨询公司。

④现代服务区在城市中的扩展。在早期，波士顿的现代服务业主要集中在靠近港口的州立大街（State Street）。波士顿的现代服务业区并没有随着纽约中心城市的崛起而萎缩，相反，却扩展到了 Devonshire Street 和 High Street。今天，波士顿主要的银行、会计公司和法律咨询公司就集中在那里。二战以后，波士顿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又使得连接几所著名大学的 128 号公路地区的高技术研发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从波士顿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大都市圈内二级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对于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大都市圈首位城市和二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是可以实现水平分工的。实现水平分工的关键在于二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必须实现和首位城市的错位发展。日本大阪都市圈的分工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大阪是商业中心；神户是优良的海港，主要发展港口服务业和物流业；京都则是著名的教育、科研和文化旅游胜地。

三　大都市圈城市产业水平分工理论的模型与绩效

现有城市间产业关系研究，一般侧重于描述和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过程和空间分布，而比较缺乏对城市之间职能分工的模型分析和绩效评判。在此，本文尝试以产业组织中垄断分析为基础，综合考虑现代服务业的特征、分布机制等因素，构建一个简单的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从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理论模型，并比较说明两种分工类型的绩效差异。

在研究现代服务业在都市圈内的分布时，假定某种现代服务业

都集中在首位城市中，这样就可以将首位城市模拟成某一产品的垄断供给者。假设需求函数 $q=D(p)$，其逆需求函数为：$p=P(q)$，$C(q)$ 为该商品的生产成本，需求和成本是可微的，首位城市的决策条件为：

$$\max\{pD(p)-C[D(p)]\} \quad \text{（公式 1）}$$

此问题的一阶条件是：

$$p^m-C'[D(p^m)]=\frac{D(p^m)}{D'(p^m)} \text{或} \frac{p^m-C'}{p^m}=\frac{1}{e} \quad \text{（公式 2）}$$

其中 e 代表在垄断价格 p^m 处的需求弹性

特别地，当逆需求函数为 p=a−bq，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等于 c（MC=AC=c）时，该产品的均衡产量为：

$$q=\frac{a-c}{2b} \quad \text{（等式 1）}$$

均衡价格为：

$$p=a-\frac{a-c}{2}=\frac{a+c}{2} \quad \text{（等式 2）}$$

通过以上分析，现代服务部门仅仅集中在首位城市中的高度垄断市场，其结果是：①因为首位城市具有该现代服务产品的独家定价权，所以垄断物品的价格偏高 $\left(\frac{a+c}{2}>c\right)$，供给不足 $\left(\frac{a-c}{2b}<\frac{a-c}{b}\right)$，需求受到压抑。②首位城市作为一个行业垄断者获得高昂的垄断利润 $\frac{(a-c)^2}{4b}$，而这种垄断利润的获得是以现代服务业需求者的高昂支出为代价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很大。③这种垄断造成区域间的服务贸易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形成了城市间的垂直分工状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这种高昂的垄断利润 $\frac{(a-c)^2}{4b}$ 的诱惑，不断会有新的竞争者加入，因而这样一种垄断的局面是不可能在长期内得以维持的。但是，由于规模效应等条件的影响，现代服务产品又很难达到完全竞争的局面，最后一般形成由数个特大城市垄断竞争或寡头竞争的稳定格局，我们对这种格局做出以下假定：①现代服务业分散在 n 个城市中。②每个城市供给者提供的产品是可以替代的。③该产品拥有形如假 p=a−bq 的逆需求函数。④每个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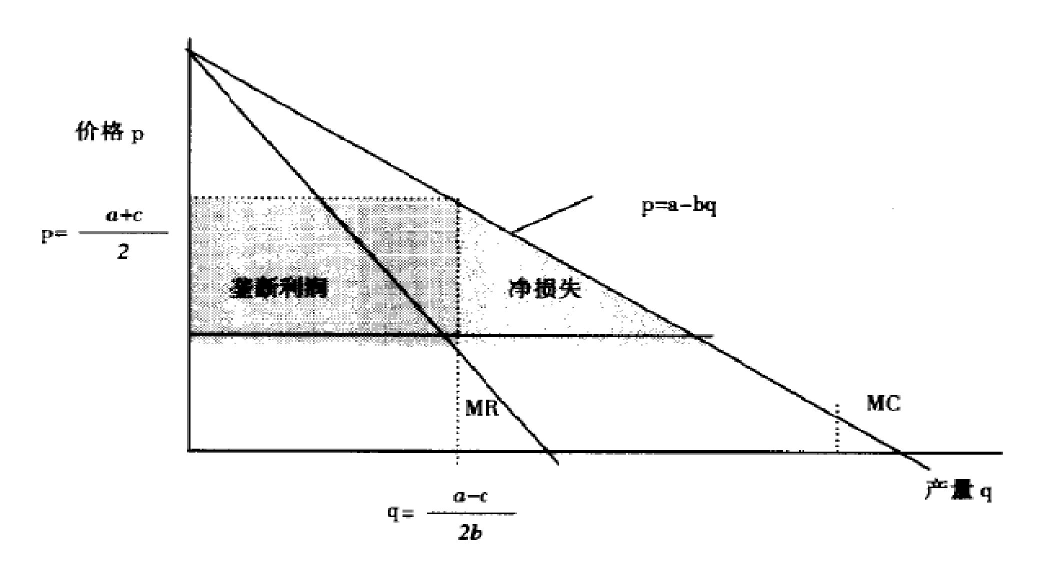


图 1 垄断利润和福利损失分析

面临着同样不变的边际成本 c，且固定成本为零。⑤各个城市提供的服务产品在一次生产活动中生产，且不能储存，即各个城市之间的博弈只进行一次。⑥不存在运输成本。对其进行的库诺特分析(即同时决定产量的博弈分析)：

城市 j 的利润为： $\pi_j(q_1, q_2, \ldots\ldots q_n) = (a - b\sum_{k=1}^{n} q_k)q_j - cq_j$

使上式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frac{\partial \pi_j}{\partial q_j} = 0$

则： $2bq_j^* - b\sum_{k \neq j}^{n} q_k^* - c = 0$

即：$bq_j^* = a - c - b\sum_{k=1}^{n} q_k^*$（其中 q_k^* 为第 k 座城市在库诺特模型中的最优战略选择结果）。

注意到上式的右端与城市 j 无关，因此，在均衡时，所有的城市的 bq^* 都等于上式右端，满足轮换对称的特点，即：

$$bq^* = a - c - bnq^*$$

解得： $q^* = \frac{a - c}{(n + 1)b}$ （公式 3）

总产量为： $\sum_{k=1}^{n} q_k^* = \frac{n(a - c)}{b(n + 1)}$ （等式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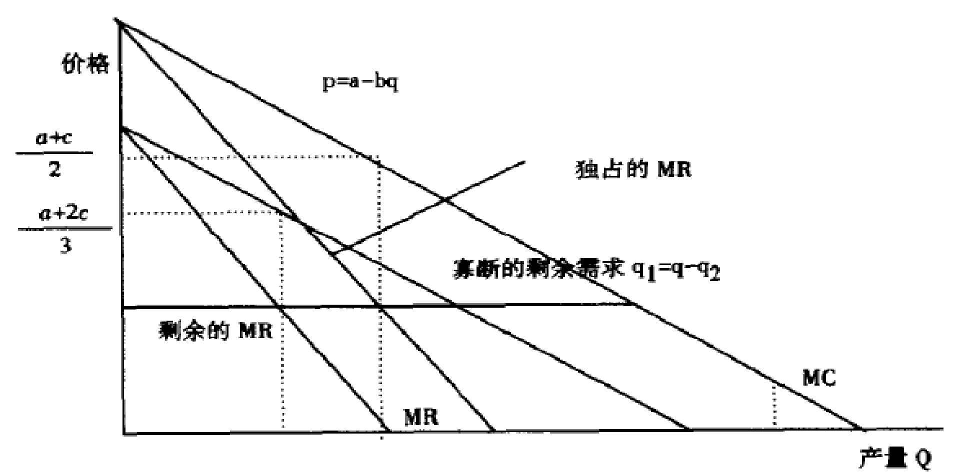
价格 p 为： $p = a - \frac{n(a - c)}{(n + 1)}$ （等式 4）

比较等式 3 和等式 1 有：$\frac{n\ (a-c)}{b\ (n+1)} > \frac{a-c}{2b}$ （n＞1）即垄断竞争的产量高于垄断时的产量（结论 1）。

比较等式 4 与等式 2 有：$a - \frac{n\ (a-c)}{(n+1)} < \frac{a+c}{2}$ （n＞1）即垄断竞争的价格低于垄断时的价格（结论 2）。

特别地，当 n＝2 即双寡头垄断时有：

$$q_1 + q_2 = \frac{2(a-c)}{3b};\ p = \frac{a+2c}{3}$$



注：每个供给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总的需求曲线减去对另一厂商的要求。

图 2　从独家垄断到双寡头垄断引起的价格下降

这种结构相对于由中心城市一家垄断现代服务业的情况，在绩效上来看，是有效的：①它有利于提高服务产品的供给水平（见结论 1）。②它有利于降低现代服务产品的价格（见结论 2）。③由于较高的现代服务业供给水平，以及现代服务业本身的外部经济特点，这种模式更能够促进整个区域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水平。④它所导致的是差别化竞争和相对水平的产业分工，能够规避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另一方面，这种将现代服务业分散到都市圈中的一些特大城市的市场组织结构，由于较薄利润和规模要求，排斥了其他竞争者的进入，从而是稳定的。克鲁格曼（Krugman，1995）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现代产业属于规模经济的不完全竞争部门，由于受产品规模经济影响和垄断利润的需求，供给者的城市的数量不可能无限增加，高额的初期投入成本（资金或智力成本）与进入门槛，使可提供产品的城市（寡头）数量就十分有限。

这种行业的空间上分布的市场结构接近于寡头垄断竞争。因此，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进全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我们既需要一个以促进有效竞争寡头主导型市场结构（魏后凯，2002），同样也需要一个促进地区竞争协作的行业寡头主导型的区域结构。

四 结 论

第一，纽约的崛起并没有使波士顿等周边城市沦为制造业基地，而是在服务业上实现了有效的分工。从波士顿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和二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是可以实现水平分工的，实现水平分工的关键在于二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必须实现和核心城市的错位发展。

第二，从产业组织学观点来看，相对于服务业首位城市独家垄断的情况而言，服务业在多个城市分散布局更有绩效，有利于提高服务产品的供给水平，有利于降低现代服务产品的价格，更能够促进整个区域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水平，它所导致的是差别化竞争和相对水平的产业分工，能够规避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时，这种将现代服务业分散到都市圈中的一些特大城市的市场组织结构，由于较薄利润和规模要求，排斥了其他竞争者的进入，从而是稳定的。

参考文献

马建堂："我国企业行为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经济研究》，1991 年第 11 期。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http：//www.chinagateway.com.cn/chinese/jingji/。

Office of Development, the City of Boston, Our Fortune is made, 1999, http: //www.cityofboston.gov/businesses/.

Coffey, W.J.& Bailly, A.S. (1990) .Service activit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system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2.

首都圈与京津冀

关于首都经济圈与京津冀大城市群的思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景体华

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指向

1.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的突起

①经济全球化将使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下移。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全球经济、政治各领域的复杂变化。催生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加入WTO的各国都必须按照WTO的章程、制度，即按照全球经济“游戏规则”行事。在各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制定或修正本国的规章制度时，实际上各国政府已经削弱了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力。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控制力的弱化，把各级地方政府推上了经济竞争的前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直接面对愈来愈激烈的国际竞争。

总之，一句话：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将使区域经济在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突起。

②区域产业集群与产业带形成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区域经济走上国际竞争前沿的形势下，产业集群，继而形成产业带，其战略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表现出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行业化在空间上的集聚，不仅要打破原来意义上的行业分割、区域分割，甚至正在打破国界。产业带形成了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区域经济大发展中，形成了区域经济竞争的新格局。

所谓产业集群，绝不是一种简单的企业集聚，而是一种以生态链形式组成的产业空间的集聚，即产业的上、下游之间，整体与零部件之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相互依存、衔接与空间上的合理组合，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紧密型的产业带。也可以说，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在这样的产业带中，主导产业的选择，以及与其带动的相关产业的合理结构与布局，将直接构造该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以及它所展示的生命力，主要得力于这种以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形成的产业带。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所形成的这种产业带，是经济全球化所必须经历的一种过程。而驱动这种进程的，是世界范围的激烈竞争。

2. 在区域经济中大城市的作用

①大城市的重要性显著强化。经济控制力的下移，区域经济在竞争中崛起，城市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个体单元，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区域经济中成为龙头。世界各大城市的重要性显著强化。各城市间的竞争也由此加剧。各城市政府推出各种战略和策略来增强城市的吸引力，争取成为全球市场网络或区域网络上的重要结点。[①]

②城市建设的生产性日益突出。[②] 主导全球竞争规则的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公认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力和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其数量、规模、经济实力和科技开发能力都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一个以跨国公

① 张庭伟主持："城市化作为生产手段及引起城市规划功能转变"，海外快递2002年第26卷第4期。

② 同注1。

司为核心的“国际生产体系”正在形成。由于每一家跨国公司都有数十亿乃至上百亿、上千亿美元的资产，其规模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财政预算还要大，所以预言未来这些巨型企业将成为世界性的权力中心，也并非危言耸听。目前，跨国公司正以其活动重塑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全球性规则，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

在这样的形势下，除了城市的大小、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的质量诸多“硬件”，还有财务税收、地价、环保、用地、用水、耗能等规范标准，以及文化氛围等“软环境”，都成为是否吸引投资者，特别是大跨国集团的重要条件，受到城市决策者的重视。原来作为“消费活动”的城市建设，已经越来越作为软硬环境的先期投入，嵌入到生产活动中，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条件因素。城市建设的两个目标：吸引外资；拉动内需越来越清晰。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面更新；城市内部空间的重新组合；城市定位与城市形象都成为在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互动中才能完成的事情。

③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区域经济的龙头。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城市的功能与建设活动的内涵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但是，城市一旦成为全球经济网络的结点，它也必是区域经济的龙头。没有区域经济的网络，也就不可能出现区域网络结点。同时，应当清楚：这种龙头地位，是与一组高增长的产业群所带动的产业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城市的竞争力就是产业的竞争力。这里，我们所以提出产业带，是因为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带，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控制力的弱化，国际竞争已经通过各个城市结点，直接转向产业活动。所以要通过城市结点，那是因为城市是产业集聚的空间结合部。

从世界近年来发展的趋势看，由于产业集聚，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大城市群。大城市群可以定义为：由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带把多个大城市圈聚合而成的一个高密度的关联紧密的城市空间。大城市圈是大城市群的核心或龙头。

世界目前已经形成了五大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欧洲西北部超级城市带。五大城市群已经成为最具世界竞争力五大增长极。可以预言：有能力进入 21 世纪国际竞争舞台的真正参与者，是由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支撑的大城市群。

因此，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就不能立足于一个城市在国际

竞争环境中的单打独斗；而应该把自己的城市圈放在由产业集聚经济带支撑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或者说要依托于区域性大城市群的发展战略。这是审视首都经济圈的一个新视角。立足于这一认识，那么，大城市群的形成，就是一个区域竞争力的整合，既包括产业结构的空间调整，也绝不可忽视空间的社会经济机制的调整。

我国城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的滞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二　首都经济圈与京津冀大城市群的现状、趋势与问题

1. 京津冀大城市群是我国的三大城市群之一

①已具雏形。1957年，法国学者戈特曼提出了“大都市带”的概念和形成的基本条件，他认为：一是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二是区域内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了自己的都市区，而且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地区有密切的社会联系；三是有便利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各城市间没有间隔，联系紧密；四是必须有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人以上；五是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的话，我国目前只有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具备形成这种大都市群的初步条件。[①]

实际上，大都市群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古代的人口和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晋、宋、唐时期出现多次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南移高潮。虽然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群是在近现代才形成的，但是，形成这样一种格局的深厚的历史积淀是无法改变的，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笔财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真正能够参与到国际竞争中的实际上是大城市、大城市圈、大城市群。就是说，21世纪国际竞争的真正主体应该是大城市圈、大城市群。机遇在呼唤，我们不能再等待。

---

① 倪鹏飞主编：《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第11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首都经济圈也应该在京津唐大城市群的这样一种迎接全球竞争挑战的理念下去考虑。

②三大城市群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是三大城市群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在驱动因素。在强调其重要性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国发展中内在的驱动因素。

第一，区域发展板块和城市群形成的大背景，是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终消费的升级与结构调整，使工业化的驱动力大大加速，这是形成新阶段的一个主要内因。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大幅提升。在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情况下，收入较高的地区和群体已经从万元级消费开始进入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大额消费阶段。汽车和住房都是以重工业为支撑的耐用消费品，在强有力的最终消费支持下，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钱纳里模型概括的工业化的第三阶段，即以资本品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来看，一旦工业化进入重工业大发展的第三阶段，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出现一个相对较长的快速发展时期。

近些年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建成了一大批交通、能源、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这些建设一方面为重工业提出了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在重工业对基础设施依赖性较大的情况下，也为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国也在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中，下力气抓机遇，为现代制造业在我国的兴起，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应该说，我国在进入工业化新阶段的过程中，比较稳步地增强了工业竞争力，同时，制造业的定位，已经站到了全球化这个平台上，瞄准的是世界制造业中心。这种战略定位是迎挑战、抓住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的历史性机遇的结果。

世界制造业中心要求有一批世界性的行业顶级企业。他们必须具有可以在世界竞争中立足的核心竞争力。而产业的区域集聚则是现代制造业形成这种顶级企业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第二，我国城市群形成的另一大背景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加速。1978 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明显出现逐步加快的趋势，特别是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大步进行。预计在今后的 20～30 年内，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将会转移到城镇。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移，其规模是世界史上经历

过这一过程的所有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有的学者预测，到2030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将形成一个人口总数为3亿人的高密度空间。[①] 预计华北与环黄渤海大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

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不仅没有如此规模，在时间跨度上也较长。我国是工业化的后发国家，赶超型工业化的进程不可能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去从容地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我们不仅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走过工业化先发国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还要应对劳动力从农业几乎同时向所有现代产业进行转移。就是说，区域经济和三大城市群必须具有相应的城市功能和产业集聚的支撑，才能承载大规模转移的人口。也可以说，我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要求新阶段的工业化为其提供产业支撑，而城市化形成的大规模人口的空间集聚，也为新一阶段的工业化准备了产业集聚的条件和空间。

总之，农村人口对现代生活模式和水平的渴望，将和城市人口对更高收入水平的追求汇成一股巨大的能量流，形成现有城市群和新城市群发展的无法抗拒的力量。总之，我国的城市化加速形成的激流和巨流，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城市群快速成长的重要内在推动力。

2. 京津冀大城市群与首都经济圈形成中存在的最根本问题

京津冀大城市群主要指的是以京津唐为骨干的城市群或城市圈。应该说，这一大城市群目前已经具有北京大城市圈、天津大城市圈和唐山城市圈。但是，大城市圈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最主要的原因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北京虽然已经形成了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格局，但是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新兴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还未完全确立，其与第一、二产业的高效链接与融合还有待进一步培育。所以首都经济与京津冀其他城市的差异性尚未展开，其独特的辐射力还没能充分发挥作用。

②除北京外，其他各地产业结构雷同，形不成具有层次结构的产业集聚。

③计划经济下的行政区划意识还比较强，跨行政区进行产业结

① 周牧之："经济发展呼唤大城市群"，《经济日报》2003年9月24日。

构大调整的机制目前尚没有形成。

④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国有经济比重比较大，私有经济的成长较长三角、珠三角弱得多。目前，国有经济改革还处于攻坚阶段，最活跃的私有经济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由下向上打破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进行跨行政区域的行业集聚和整合。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目前的情况仍然是各城市单打独斗，形不成互联互动的城市群。2003 年 9 月 17 日的《经济日报》第四版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饿着肚子"忙扩建》，说得是在环黄渤海的 640 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从南到北密集的四大港口（天津、秦皇岛、京唐和黄骅港）的扩建问题。这四大港口目前都吃不饱，但仍在进行"大跃进"式的扩资和重复建设。这不仅造成了吞吐能力的闲置和浪费，还必将形成区域内的恶性竞争。

为了适应加入 WTO 以后的竞争格局，不少地区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以行政区划为界的国内竞争过时了，以产业集聚为支撑的区域联动和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世界竞争舞台的主体。长三角和珠三角中的各大城市都在找准各自模式的基础上努力寻找区域合作的路径和空间，用合作博弈替代恶性竞争。加速区域经济的优化和提升，正在成为一种识时务的战略。京津冀的区域整合战略也应当抓住机遇，尽快出台。

三　促进首都圈与京津冀大城市群加速形成的政策建议

1. 北京、天津等大都市圈的规划与建设，都应当放在京津冀大城市群的基点上与以考虑。这是一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加剧形势下审时度势，发展理念的重要变化

如果把北京放在这一角度来看的话，应该说首都圈要因"势"而动，而这一"势"就是：第一，首都的发展正在形成了强大的聚集、辐射功能；第二，首都的发展需要产业的梯度转移；第三，首都的发展需要产业集聚；第四，首都的发展需要区域联动；第五，首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的优化。

首都圈的规划与建设要全面考虑以京津冀大城市群为龙头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带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这不仅有利于北京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避免大都市发展中出现的“城市病”，更重要的是还将奠定北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地位。

2. 京津冀大城市群的功能定位

从我国目前正在崛起的三大产业带的情况看，长三角和珠三角正在以蓬勃之势打造“中国制造”的东南板块，四省一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上海市）制造业的产值2002年已经占到全国制造业产值的49.4%，拿下了中国制造的半壁江山。

在世界经济的大调整中，抓住制造业正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梯度转移的机遇，发展现代制造业，构造世界性的制造业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首都大城市圈和京津冀大城市群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期，构造区域经济的制高点，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已经迫在眉睫。

在与世界经济大调整的互动中，我国经济结构与空间布局也在进行调整。在这种迅速发展的动态中，三大经济带都有一个功能性战略定位问题。但是，我们认为，首都大城市圈和京津冀大城市群的发展有着与长三角和珠三角非常不同的特点；区域性合作和协同发展，从观念到实际操作，都比长三角和珠三角要慢一些，也和对这种特点的认识有关。下面的思索虽然还是理论层面的问题，但是基本问题不说清楚，是难以形成战略性政策的支撑体系的。

①北京作为首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已经从一个典型的重化工业城市，变为全国惟一一个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在2002年超过60%的城市。在全国领先团队步入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即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新阶段之时，北京不可能再重走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回头路，那么战略性步伐该如何迈出，又如何在首都大城市圈和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发挥龙头作用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北京为了支撑首都的功能，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第三产业，开始显露出某些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但是，即使如此，它也是先头兵，不可能完全脱离进入重工业化过程的主力部队。它的第三产业将以为后续大部队服务的新型第三产业为主导。

②如何审视新兴第三产业在未来经济中的作用。一是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和深化。随着分工的细化，各经济部门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性的强度也加大

了。体现各部门内部相互联系的一个个专业性很强的服务部门逐步从生产各阶段自然分离出来，形成新的服务行业。生产的全过程都有这种专门服务的分离。比如生产的“上游”阶段，分离出来的专业化服务有：投资和新产品生产的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概念、品牌设计；市场接受程度与容量的研究、咨询服务，等等。在生产的“中游”阶段，与生产本身结合在一起的有：质量控制；设备租赁；后勤供应；保存和维修服务，等等。与生产并行的有：会计、人事管理、电信、法律、保险、金融、安全服务，等等。在生产的“下游”阶段的有：广告、运输、销售、售后服务，等等。[①] 可以看出，这其中已经包括了众多的生产性服务。与生产现代化并行而兴起的这些服务业称为新兴服务业，以和仅为居民生活服务的传统服务业相区别。总之，新兴第三产业的崛起是科技革命促进社会分工逐步细化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第三阶段，这种分工细化过程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程度，同时是一个国家科技现代化的标志。

二是如果仅仅看到诸多生产性服务从生产性企业分离出来，融入了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流，认识到此还是不够的。从近年来的趋势看，第三产业所覆盖的领域，有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知识流、技术流、人力资本流，等等，这些社会资源在新兴第三产业的运作中已经逐步流动化，这些活化的资源在新机制驱动下的聚集和流动，不仅囊括了生产领域各部门内在联系的方方面面，而且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主导作用，已经彻底改变了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地位。区域经济的迅速突起，也将得益于资源的活化和配置上的高效。

三是“知识经济”或称为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的“新经济”的兴起，对第三产业的作用更要拭目以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在进化中不断地演变：从自然资源、劳动，到资本，而在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则逐渐转向科学技术。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在世界各国取得重大进展，引发了工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技术进步的主导作用在

① 世贸组织：《1998 年国际贸易报告》，转引自张汉林，《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中国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

明显提高，并以强劲的态势推动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资本、劳动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角色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也将向更高层次演进。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密集型服务日益起着把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能力，强化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这些顶尖服务人才的流动和聚集则直接关系着高科技中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哪些国家的手里，哪些国家可以控制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四是新兴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行业，特别是信息和金融，涉及国家的主权、机密和安全。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到重要的战略高度。

总之，第三产业已经不再是仅为居民生活服务的一些传统行业，其中新兴服务业，不仅包括居民由于生活提高而新产生的一些消费服务需求，还包括生产性服务，而且其已经逐步上升为第三产业的主体。同时第三产业还在活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上起着独特的作用。

现代制造业需要新型第三产业服务相匹配。预计 21 世纪的头 20 年里，北京第三产业将完成内部结构调整。新兴第三产业的布局也将快速适应现代制造业的布局。

③随着传统产业的世界性梯度转移，发达国家将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展开新一轮的竞争和市场争夺。权威人士预计：以 IT 为主导的信息产业将从技术创新转向技术扩散；而下一轮技术革新的制高点将在生物技术产业。到 2002 年底，全世界生物企业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和瑞士八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只有印度进入竞争行列。在这一领先行列中，仅美国的生物企业就拿走了全球收益的 3/4。

预计首都将以其深厚的研究力量和高科技产业的实力，在新一轮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中找准目标，奋起直追。

④在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北京与其他城市将显示出较强的差异性。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北京将以第三产业的辐射力见长。新兴第三产业对跨入工业化新阶段的区域经济协作，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集聚将起到领航、保驾护航的作用，使首都经济圈和京津冀大城市群以崭新的面貌和实力，步入世界区域竞争的行列。

3. 战略：整合“双子星座”，形成京津冀地区区域龙头

从目前大城市群或区域产业布局的发展规律来看，以一个大城

市为核心，若干个具有专业化产业分工的中小城市或镇形成外围状的辐射区域。从空间上看，宛如一种鸟巢状的分层结构。区域资源按照产业链合理配置。

但是，京津唐地区却有两个直辖市，人们称之为“双子星座”。吴良镛教授称之为“双核”。权威人士认为，大城市群的活跃与世界级竞争力的形成，关键在于是否有世界级的超级城市作为龙头或内核。北京和天津虽为“双核”，但是2002年这“双核”的GDP总值（北京为3130亿元；天津为2000亿元）只等于上海一个“核”的GDP总值，更称不上世界级。所以只有“双核”共同携手，共筹共建环渤海地区的京津唐大城市群，才能争取尽早进入世界竞争的行列。

北京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天津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应该强化这种差异，并在这种不同构的情况下形成优势互补。

应该看到，我国北方大城市群发展的滞后已经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竞争力。迫切需要整合，需要在历史已经奠定的基础上，整合我们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空间，形成有利于大城市群形成的社会协调机制。

4. 强化城际间的交通网络

在整合“双子星座”，形成京津唐、环渤海地区区域龙头的大战略已定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强化京津唐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迅速完善大城市群之间的交通功能。同时，推动要素资源沿这些交通网络便利而有效地流动起来，形成“点线布局”大中小城镇相结合的经济带。

有一点必须引起注意：从世界大都市群的发展来看，以汽车为主的交通骨骼已经不可能支撑起高密度城市群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应该尽快形成以通勤铁路和高速铁路以及地铁为主的高速轨道交通体系。目前，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火车一天只有十几个班次，与东京至大阪的新干线高峰期几分钟对开一班不能相比。[①]

北京市的城市交通也要从北京经济圈的角度进行重新思索。城市群是以区域内各主要城市的城市圈的扩大，经济的辐射力加强为

① 世贸组织：《1998年国际贸易报告》，转引自张汉林，《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中国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

基础的。近年来北京的交通网络及其功能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如果以目前城铁速度为准的话，一小时的通勤圈仅为32.8公里，不仅低于高速交通网的50～70公里/每小时，更低于目前世界级大城市群的100公里通勤圈。

可靠消息指出，在天津和北京的协同发展上，有关方面已经有了思路。据悉，加强京津合作，改善两市之间的交通，已成为两市领导人的共识。两市已在酝酿策划京津唐城际铁路专线，增建2条京津高速公路，接通京津唐轻轨交通等建设方案。

城际间的交通网络是形成大都市圈的基本条件，京津唐城际间的交通网络的完善与强化，将成为京津唐经济迅速整合的加速点。

5.弱化行政区划，强化市场功能，培育新的经济区域的合作机制

在阻碍大城市群形成的因素中，行政区划已经成了各界具有广泛共识的最重要因素。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各级行政区划划分严格，行政管理以行政区划为限，已经成了一种定式。第二，政府对区划内的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过大。即使在经济改革已经深入的今天，由于京津唐地区国有经济份额较多，国有经济改革难度较大，从而使得行政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难以降低。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从利益机制上刺激了地方对经济的控制管理。从地方的经济利益考虑，以财权为中心的各自为政自有道理。

在这样的体制下，我国的地区经济具有十分强烈的地域属性也就不奇怪了。大城市群要求各大城市圈的功能有科学地分工，在分工基础上形成紧密地协作。这些分工与协作并不以地域属性为界。这就要求打破这种长期形成的以行政区划为资源配置限界的体制，在大城市群的建设中引入、培育区域合作机制。应该说，这种新的合作机制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必须进行大胆探索。既要考虑市场运作机制，也要考虑非市场运作机制，因为市场也有失效的领域，不是万能的。可以预料，这对我国的行政体制将是一次巨大的撞击，同时也是对市场功能的强化。我国的三大城市群都将接受这一洗礼，能够顺势而动者，将在改革中成为世界级的竞争参与者。

6.促进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与产业带的形成是大城市群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目

前，京津唐地区并没有形成能够凝聚本地区大中小各类城市的这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带。

形成产业带的基础是专业化分工。目前，这个地区形不成专业化分工的原因主在有两点：一是群龙无首。虽然北京和天津都想成为龙头，但是都不具有龙头式的企业或行业，经济辐射力不强。两个“双核”又存在着强烈的竞争动机，互补合作的动力不足。这状况如不彻底改变，就会形不成核心城市，带不起这一地区的城市群。二是在核心城市缺失的情况下，虽然环渤海地区围绕京津唐的诸多城市都处于城市开发的热潮中，但是都还没有从区域经济，从大城市群的角度去审视和规划，仍盲目地以能源和重化工业为主，形成结构雷同，相互之间进行低水平的恶性竞争。这种内耗式的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两大问题是京津冀城市群成长不起来的关键。而解决这两大问题的牛鼻子，是京津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变内耗式的竞争为合作式的竞争，把单打独斗变为京津唐城市群的真正的“双核”。

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以积极的姿态，冲破行政区划，打造跨区域经济带，撑起“中国制造”的半壁江山，京津冀也没有时间再等待了。

7. 产业整合与集聚，要同时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的生态产业链的形成

华北地区是水资源的匮乏区。水资源是制约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硬的约束条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①产业集聚的战略要以生态产业链的形成为基本条件。不仅要求主导产业的上、下游之间，整体与零部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之间相互依存、合理衔接，还要求其以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符合生态平衡的产业链。

②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产业的集聚要考虑相关带动的人口集聚。因此，空间格局以及空间规模经济，首先要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性给予充分地计算和考虑，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和人与生态的关系。

③在充分认识水资源短缺的制约性的同时，要看到华北地区水务市场的重要性。大城市群的建设，可以首先协同培育水务市场。

这一领域与区域高速交通网络的形成同等重要，而且商业前景要比前者更为看好。

④以人为本，通过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观要作为一种根本的理念深入区域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8. 以信息化促进区域规划和决策的科学化

在城市化激流冲击的形势下，以信息化促进区域的战略规划，实现区域决策科学化以及资源配置合理化，是当务之急。以地理信息为主的大城市群基础信息系统不是可有可无的。特别是在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形成区域聚集，城市的发展快步加速的情况下，城市的，以及城市之间的人口管理、地籍管理、交通管理、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没有动态的确切信息，如果信息系统不能走在前面的话，势必影响城市群的战略选择和正确决策。

由于城市与城市群的有关信息大都具有明显的空间定位特征，所以，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主干的城市与城市群的信息系统，应该说是城市与城市群社会、经济活动的神经网络，是现代城市和城市群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以前只要记住若干组数据就可以大致明确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势的话，在大规模的人流迁移，城市建设加速的今天，以往惯性的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了。

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主干的城市信息系统，从80年代初期在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立项，到首先走向沿海城市；从面向土地资源管理到面向城市规划，再到面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磨合、不断创新，成为不仅具有存储、查询、检索功能的空间信息载体，还具有了模拟、评估和科学预测的功能。[①] 显然，这对于现代城市或城市群的建设与管理是一种必要的智能工具。

从目前多数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来看，还局限于土地资源管理。虽然在交通、通讯、水、气管网等方面，已经从静态记录开始走向动态监测与模拟，但是对于动态人流、物流这样一些城市的最基本经济、社会元素的空间布局，还没有定式。

---

① 陈述彭主编：《城市化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第15~16页，科学出版社，1999。

据此认为，这方面的探索具有广阔的前景。在大城市辐射力逐渐加强，周围卫星城市环绕，城市群落由产业带的联系渐渐形成的情况下，龙头城市的建设与管理必将辐射所及腹地。在城市化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将快速发展，地理信息系统为主干的城市信息系统，也将通过联网而形成更大范围的信息系统，并逐步具有宏观调控的支持功能。

北京要强化以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为主干的城市信息系统。这对于北京在华北城市群，即京津唐城市群中的核心作用是相一致的。

首都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　孙久文

首都经济圈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共同组成我国东部沿海的三大经济圈，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区域。本文主要对首都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一　北京与首都经济圈的关系

首都经济圈简称首都圈，其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的直隶省。[1] 根据空间位置的关系和经济联系紧密的程度，首都圈可以分为两个圈层：内圈由五个地区组成，即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唐山市、廊坊市、秦皇岛市，外圈则包括河北省的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和沧州市等地区。总面积 17 万平方公里，近 7000 万人口，2002 年 GDP8000 多亿元人民币。首都圈内资源丰富，经济基础比较好，发展潜力巨大。

1. 北京在首都圈中的地位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有着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国务院对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北京被确定为四个中心：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中心，没有提经济中心。但是不提“经济中心”，并不等于不发展“首都经济”。强调首都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中心，这些中心的建设都在带动“首都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对北京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北京建设科技中心的具体

---

[1] 杨开忠主编：《持续首都》，第 97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体现和成果，同时也形成了“首都经济”的主导产业。

北京是首都圈的第一大中心城市。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北京本身的经济实力来看，北京作为“中心”的内涵，已经从过去“四个方面”的内容，扩大为现在“五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北京城市地位现状的正确描绘。

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首都圈的增长中心，是由于具有了下列条件：①北京具有较大的城市人口规模，目前总数已达1423万人；②北京具有较大的城市经济规模，2002年GDP为3130亿元，是上海的57.9%，天津的1.55倍；③北京具有较发达的科技实力和教育实力，作为全国的教育和科技中心，是全国智力最密集的区域。每万人中的在校大学生数为187人，居全国第一位，比上海的126人多55人，比天津的94人高一倍；政府部门的R&D经费支出为156亿元，高于上海的41亿元和天津的13亿元；④北京具有与上海、广州同一水平的国内最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⑤北京具有较发达的城市第三产业，2002年第三产业的总产值1920亿元，占GDP的61.3%，在各省市中居第一位；⑥北京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745亿元，对周边地区在商业、物流和综合服务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2. 北京与首都圈地区的经济关系

北京与首都圈地区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中心－边缘”关系。北京作为一个巨大的增长极，处于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都十分强烈的阶段，也就是说，在向北京聚集大量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有大量的生产要素从北京扩散出去。而且作为一个增长极核，北京对生产要素的吸纳和扩散作用，事实上已经超出了首都圈，扩展到全国。首都圈内另一大城市天津，是北方综合港口，是重要的金融商贸城市和工业基地，经济实力雄厚；与京津成鼎足之势的工业城市唐山，是北方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北京、天津、唐山三市之间三角状的广大地区，构成首都圈的核心区域，为实现首都圈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区域支持。从远期看，首都圈应建成以北京为中心，环京津唐城市群为依托，经济职能互补，分工合理，协调发展的都市圈。

对于北京与首都圈的关系，一直存在两种误解：其一认为是周边地区“服务首都”的关系，即周边地区以满足中央政府和北京城

市发展的各种需求为目标，而中央和北京市应当对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有所回报，这显然是停留在80年代的思维。其二认为是一种区域竞争关系，尤其反映在京津关系上，只看到竞争，看不到协作。笔者主张北京与首都圈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关系，即在平等发展的条件下共同获取区域利益的分工与协作的关系，除了在突发事件的特殊时期，都应承认这种共同获取区域利益的原则。

3. 北京经济发展对首都圈地区的拉动作用

首都圈内部的经济影响扩散，呈明显的同心圆式传递，从北京到内圈然后到外圈。所以，北京的经济增长，也必然通过区域经济的扩散效应，带动首都圈地区的经济增长。

目前对北京影响最大的事件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举办“奥运”为首都圈加强区域内的各种合作提供了契机，使加快不同地区的产业合作与分工成为可能。这种合作，不仅能使各区域充分利用优势资源，还有利于解决一些区域发展的共同问题，如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

奥运会将全面带动北京各类产业的发展。“绿色奥运”将促进北京的环保产业、绿色农业上一个新的台阶；“科技奥运”将给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新的增长空间；“人文奥运”将使北京的第三产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商业、旅游、金融、保险和体育等产业，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巩固提高，会展业、新闻传媒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将获得空前发展。据估计，从2002～2008年，奥运会因素将投资拉动GDP增长1989亿元，消费拉动GDP增长875亿元，合计2864亿元。[①] 奥运会对北京经济的拉动，将通过区域经济的传递，拉动首都圈地区的经济增长，共同分享举办“奥运”的好处。

二　北京与首都经济圈地区合作的主要途径

以北京举办奥运会为大背景，形成北京与首都圈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格局，应当是合作的基本原则。具体的合作途径，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

① 刘淇主编：《奥运经济研究》，第8页，北京出版社，2003。

1. 产业合作

①周边地区为北京市场提供农副产品生产的合作。目前，北京的绿化美化工程，对林木、花草、草皮等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北京庞大的消费人口，对鲜活农副产品的需求也很大。首都圈地区利用地理位置接近的优势在这方面将有比较大的作为：大力发展花木种植业，发展无公害蔬菜、瓜果的种植，发展现代养殖业，为北京提供优质的肉禽蛋奶等农副产品。

②首都圈地域间旅游业的合作。北京是国内旅游热点城市之一，2002 年仅接待国际游客就达 310 万人次。延伸旅游、构筑首都圈旅游的大市场，是首都圈区域合作的当务之急。天津、承德、秦皇岛和迁安、涿州、易县等地，原来就是旅游胜地，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本着“开放大市场，发展大旅游，构建大产业”的原则，整合旅游资源，把发展“奥运”旅游作为未来 5 年的大目标，使首都圈能够扩大旅游经济的受惠面。

③首都圈内部产业结构调整的合作。利用北京工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企业外迁的机遇，促进首都圈内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北京现有一些与首都功能不相符、特别是与首都严格的环保要求不适应的工业企业，退出北京是历史的必然。例如，首钢公司将一部分钢铁的生产转移到河北迁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北京类似的企业还有很多。首都圈的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有选择地接收退出北京的企业，建立与京津等发达地区互补的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当地的工业化进程。笔者曾建议在秦皇岛建立隶属北京市的滨海特区，其中的工业区可以专门用来吸引北京的转移企业。[①]

2. 市场合作

首都圈的核心区域京津唐地区，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但经济协作水平不高，这是事实，也是首都圈发展的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加强首都圈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点，应当是进行相互之间的市场合作。

---

① 孙久文：“关于调整北京区域经济布局、建设秦皇岛滨海特区的建议”，《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简报》2001 年 12 期。

都市经济圈的形成，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结果。对北京而言，开放市场以吸引各类资源向城市中心的集中，是北京能够持续发展的保证。北京作为中心城市，同时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有着极强的消费能力，而这个市场的需求又是北京自己所不能满足的。为了北京本身的发展，也为了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北京必须更加开放市场，给予周边地区平等的竞争机会，以市场来带动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对首都圈的周边地区而言，充分利用与首都空间联系的优势，抓住市场机遇，选择合适的产业、企业和产品，占领首都市场。其中，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吸引大企业来此建立以北京为市场的产品生产基地，是更加实际的选择。例如，在牛奶生产领域，上海的光明、内蒙古的伊利、蒙牛等企业，为在北京市场站稳脚跟，都在京郊的顺义、密云、延庆等地建立生产基地，客观上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3.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目前首都圈区域合作的薄弱环节，应当下大力气加强。北京、天津是有全国意义的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人力资源开发的能力很强，开发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全国。但是，近在咫尺的首都圈地区，却是人力资源开发十分不均衡的地区：中心城市的发达与周边地区的落后同时存在。

从北京与首都圈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来看，关键是要开发什么样的人力资源的问题。其中三个方面应当引起重视。

①重视培养企业家。首都圈地区的发展，最缺少的是企业家这类人才。但是企业家的成长，需要特定的环境，要积累经验和资本。对企业家的成长来说，地方政府的政策十分关键，到大城市开阔眼界同样重要。对北京来讲，应当鼓励和欢迎首都圈地区的农民来京打工；对地方政府来讲，应当制定政策吸引在京的各类人员回乡创业。

②重视培养地方官员的行政能力。北京应当为首都圈地区政府机构人员的行政能力提高提供帮助。北京的高等学校林立，各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培训中心、管理学院比比皆是。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周边地区的市、县、乡镇建立固定的联系，长期或短期帮助培训各类人员，也可以用互相交流挂职等方式进行培训。一批高素质的首都圈地区政府机构人员的出现，是该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的前提和保证。

③重视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大部分工作，应当是提高首都圈地区的全民文化素质。在这方面北京可以做的工作很多：鼓励北京的中小学校与周边地区的学校建立固定联系，鼓励为周边地区的学校进行教师培训，鼓励北京的企业家为周边地区建立希望中学和希望小学等。

总之，只要我们把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提到区域合作的层面上来认真对待，北京与首都圈地区的合作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4. 生态环境保护合作

北京的城市环境改善，离不开首都圈地区的合作，特别是河北省的北部山区。这些地区在首都圈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是：①生态、环境功能，为首都圈内的中心城市提供生态保护。②休闲功能，为中心城市的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③开发后备基地功能，为北京等大都市发展提供后备生存空间。

目前，这些地区存在的问题：一是以农林为主的产业结构，生产粗放，水平较低；二是生产占用山地面积大，造成环境的破坏；三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弱，缺少新的发展途径和致富手段。如果生态环境功能是这些地区的主要功能，那么在区域经济协调方面的经济补偿，就应当加大力度，以提高人均收入为目标，实现这些地区的现代化。

空间结构调整必然要求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应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林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限制数量，向集约要效益，并适量发展鲜活养殖业；二是工业化是山区发展的根本出路，集约发展山区生态型小型工业是提高山区人民收入水平的根本途径；三是结合生态屏障建设，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业。

三　关于首都圈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建议

1. 淡化行政区域经济的影响

整个首都圈，甚至其核心的京津唐地区，分别隶属于北京、天津、河北三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历史上，行政上的分割和控制，使首都圈内北京、天津两大城市及河北的各地市各自发展。市场分

割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行政力量的干扰制约了区内企业之间的市场运作。

虽然从远期看，行政区划的改革是最根本的解决途径，但近期这种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把首都圈经济发展的前途完全寄托在行政区划的改革上，那么我们在近期将无所作为。因此，要使首都经济圈有大的发展，就必须淡化行政界限的作用，淡化行政区域经济的影响，强化区域经济观念，以利益主体自愿结合为基础，开展区域之间的全方位、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冲破行政区域对经济发展束缚的具体建议是：第一，协调区域利益关系。同级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的作用是有限的，必须是高一级政府的协调，才能真正发挥影响。对首都圈来说，中央政府的协调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提高资源共享性。鉴于首都圈内主要经济中心不同的行政隶属关系，各区域可在共赢的条件下提高资源的共享性，包括积极推进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的共建和共享，促进跨区域性产业部门的共同发展等。第三，鼓励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首都圈受区内中心城市分工与合作问题的困扰已久，集中表现为两大城市北京和天津的关系上。如果相距120公里的京津两大直辖市，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将无法以整体观念解决首都圈发展的问题。所以，京津间的分工与合作是首都圈分工与合作的重点。加快京津两市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京津部分产业向周边地区扩散，是首都圈各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实现。

2. 重构首都圈内的区域经济关系

具体的构想是：以北京举办“奥运”为主线，提纲挈领，在鼓励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的前提下，以各地区现有的经济结构为基础，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出发，以区域为单位建立自己的优势主导产业群。北京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第三产业为中心，带动现代制造业、都市农业的发展；天津以现代制造业和物流业为主导，促进商业和城市服务业的振兴；河北省的唐山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秦皇岛巩固和提高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等，形成完整的、具有良好合作关系的首都圈的核心地域，共同带动外圈的发展。当然，建立优势主导产业群不等于其他产业不发展，而是采取由优势主导产业群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更合理的发展路径。

3．进行统一的区域空间规划，建立北京的“经济郊区”

北京周边地区现实的选择，应把北京看做是一个市场，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加强与北京的联系，而不一定非要通过行政或政府的手段来联系，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行政区域的调整来联系。过去我们曾经搞过京津冀的汽车生产协作和环渤海经济圈协作，形式有了，但并没有起到多少实质的作用。

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看到：现在北京市的中心区域已经发展比较成熟，如三、四环以内、中关村、经济技术开发区、CBD 等，下一步的任务是使经济增长的圈子能从地域范围上向外更快一些扩散，使经济总量上一个新的台阶。

经济总量是不是可以靠区域经济创新来实现呢？以上海为例，上海周边有一些很有实力的城市，包括昆山、苏州、无锡、嘉兴、湖州等，与上海相辅相成。北京和首都圈的空间结构调整，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北京的市域面积是上海的三倍，在北京市域内如通州、顺义、昌平、大兴等，可以建设一些经济副中心，使这些卫星城扩大到中等城市的规模，这样对北京未来的发展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北京郊区的空间毕竟有限，山区又占了 60% 以上，所以，建议把临近北京的一些地区，扩大为北京的“经济郊区”，即在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但经济上联系紧密的地区，有些城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北京的卫星城。可以作为北京“经济郊区”的地区有：河北的廊坊地区、保定地区北部各县和张家口地区南部各县等，应当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制定一个统一的发展规划。

京津经济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障碍因素的分析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　卢　卫　沈艳兵

北京与天津均为中央直辖特大城市，同处环渤海经济圈内。两市可观的经济总量、强大的产业基础、纵深的腹地以及毗邻咫尺的空间区位，使“京津联合”呼声甚高。但囿于两市经济发展一些深层矛盾和制度环境的缺陷，京津联合的意愿大于行动。本文从比较的视角，对两市经济现状、联合的主要障碍性因素以及加快联合的必要性进行剖析。

一　京津经济发展现状比较

1. 综合经济实力比较

天津和北京目前都是我国特大型的综合产业城市。由表 1 可显示如下特点。

①两市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呈连续增长态势。其中天津经济的两位数增长已持续了 12 年，北京则持续了 5 年。

②北京作为首都，其经济总量的绝对值和与全国对比的相对值都超过天津。但两市经济总量之和不抵上海。2002 年津京的 GDP 之和为 5263.9 亿元，低于上海一市 5408.8 亿元的 GDP 总量。

③天津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从速度上看，两市 GDP 的增长都呈强势，但天津自 2001 年后逐渐加速，城市 GDP 实现自 2000 亿元到 3000 亿元的增长，上海用了 3 年、北京用了 5 年，而天津计划只需 1 年，即在 2003 年实现。

表 1　京津城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比较

年　份	GDP 增速（%）		GDP（亿元）		人均 GDP（元）		占全国 GDP（%）	
	天　津	北　京	天　津	北　京	天　津	北　京	天　津	北　京
1996	14.3	9.2	1099.5	1615.7	12263	15044	1.62	2.38
1997	12.1	9.6	1235.3	1810.1	13739	16735	1.66	2.43
1999	10.0	10.2	1450.1	2174.5	15976	19846	1.77	2.65
2000	10.8	11.0	1639.4	2478.8	17993	22460	1.83	2.77
2001	12.0	11.2	1840.1	2846.3	22073	27527	1.92	2.97
2002	12.5	10.2	2051.2	3212.7	22380	28449	2.00	3.13

数据来源：相关年度的《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及《全国统计年鉴》。

2. 经济结构合理度比较

经济结构合理度是反映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直接体现了城市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京津在经济结构合理度上的差异，由表 2 显示如下特点。

表 2　京津国内生产总值经济结构比例

单位：%

年　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北　京	天　津	北　京	天　津	北　京	天　津
1996	5.2	6.1	42.3	53.2	52.55	40.7
1997	4.7	5.6	40.8	52.1	54.51	42.3
1998	4.3	5.5	39.1	49.4	56.58	45.1
1999	4.0	4.9	38.7	49.1	57.34	46.0
2000	3.6	4.5	38.1	50.0	58.31	45.5
2001	3.3	4.3	36.2	49.2	60.5	46.5
2002	3.1	4.1	34.7	48.8	62.2	47.1

数据来源：1997～2003 年度的《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

①两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呈逐年下降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在逐年上升，说明两市的经济结构正向合理方向发展。但相比较，北京的第三产业增幅高于第二产业，天津相反，第二产业增幅高于第三产业，说明北京的经济结构相对天津更为合理。

②北京的第三产业 1996 年就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是典型的

“三、二、一”结构，而天津还处在由“二、三、一”向“退二进三”的转化之中，第三产业提高的过程异常艰难。

③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 2002 年达到 62.2%，虽高于天津近 15 个百分点，也高于广州和上海，仍低于一些世界性城市，如纽约、香港的服务业比重均在 85%以上，其他一些国际城市如东京、新加坡的平均水平也在 75%以上。

3. 工业经济总产值与构成的比较

天津是我国近代工业发祥地，属于老工业城市，行业齐全、基础雄厚。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速发展工业。由表 3、表 4 和图 1，可显示京津两市工业发展的不同特点。

表 3　京津工业总产值比较

单位：亿元

地区＼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北　京	1853.3	1963.8	1991.9	2144.6	2707.4	2585.8	3373.5
天　津	2177.42	2450.21	2562.62	2751.37	3080.74	3366.53	3717.72

表 4　北京工业总产值按行业排序

序号	2001 年	2000 年	1999 年
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6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7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	医药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10	普通机械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饮料制造业

数据来源：相关年度的《北京统计年鉴》。

①在总量上，天津作为老工业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发展比北京更有优势，但北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一度超过天津，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北京工业虽居次位，但与天津的差距在迅

速缩小，至2002年已基本是旗鼓相当。

②在轻重工业比例上，天津重工业比例曾一度偏高，但近年的调整，已使轻重工业比例相对趋于合理，北京重工业虽然近年一直在控制发展，但目前仍高于轻工业（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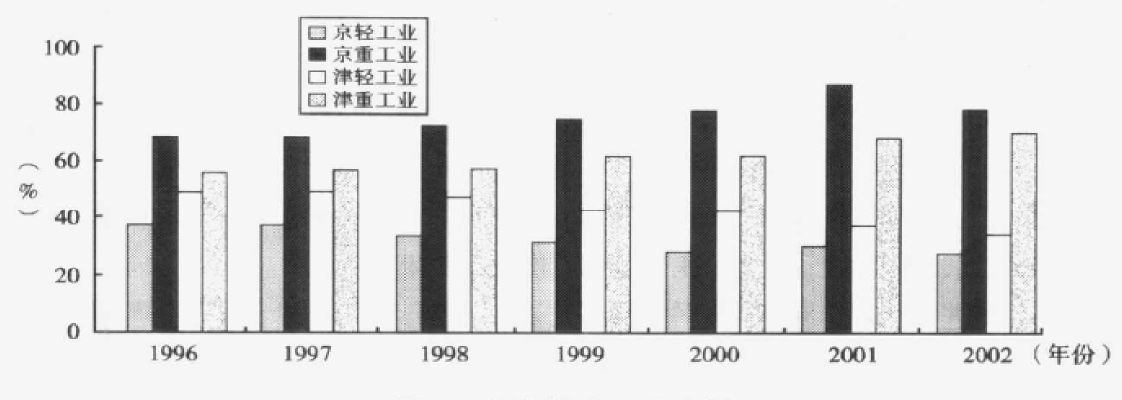


图1　京津轻重工业比例

③在行业排序上，两市明显趋同。主导产业均以资源密集型为主，作为两市工业最大支柱的电子、冶金、化工和钢铁产业总产值比重，近年一直在上升。由表4、表5可看到，按工业总产值排序，两市1999~2001年排在前10位的工业行业基本相同，且排序相差不大，处在第一位的都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由此可见两市工业结构同构现象严重，造成两市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局面，仍未达到经济规模。而且北京市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过分依赖重化工业，不符合首都城市性质和功能的要求。

表5　天津工业总产值按行业排序

序号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	石油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石油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石油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6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金属制品业
7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8	金属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9	普通机械制造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10	食品加工业	食品加工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数据来源：《天津统计年鉴》。

4. 对外经贸比较

一个城市的对外经贸发展水平反映了它与国际经济结合的广度与深度。京津两市一个是外国商社和企业总部云集的首都，一个是历史上的传统贸易口岸和北方大港，从表 6 可以看出两市外经贸发展的特点。

①从进出口总值看，京津两市进出口总额在全国都是排在较前位置，连续几年的数据显示，天津对外贸易发展比较稳定，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呈逐年上升趋势，2003 年更创 400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北京的波动较大，在个别年份有悬殊的差异。

②从进出口贸易额的平衡状况看，多年来天津的进口与出口的发展基本持平，说明天津在外贸进出口的产品构成、供销渠道上较为稳定；而北京的进口普遍大于出口，且差距有逐年扩大趋势，说明北京对外经贸近年发展迅猛，外汇供给充沛。

③从外资利用情况看，天津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吸引外资较多的城市之一，但从 2000 年始，北京实际利用外资额超过天津，这也说明北京的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一定程度上与天津形成了竞争态势，天津引资环境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改善。

表 6 天津、北京对外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值		出口总值		进口总值		实际利用外资	
	天津	北京	天津	北京	天津	北京	天津	北京
1996	82.97	53.87	40.49	20.86	42.48	33.01	29.8	15.5
1997	100.23	57.75	50.18	24.65	50.05	33.1	34.2	15.9
1998	106.16	305.1	54.99	105.2	51.17	199.9	30.6	20.6
1999	126.05	343.4	63.32	98.9	62.73	244.5	27.5	22.3
2000	171.57	116.5	86.29	46.3	85.28	70.2	28.2	30.1
2001	181.86	134.0	95.02	48.7	86.84	85.3	33.0	40.1
2002	228.27	525.1	115.95	126.4	112.32	399.85	38.96	17.9

数据来源：相关年度的《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

5. 城市核心竞争力比较

所谓核心竞争力也即城市发展最具实力和潜力的特色优势。总

体来看，京津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①两市共有的特色优势是科技、人才、资本实力。据不完全统计，两市的科研院所近千所，科技人员达到150万人，

②北京的综合竞争力上升最快，赢得奥运主办权就是明证。除了科技、人才竞争力全国第一之外，资本实力、消费实力、金融控制力仅次于上海，同时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不断吸引着海内外人才、资本和企业。

③天津的科技与制造业发展最具竞争力。人力资源丰富，资本存量大，投资回报高，科技产品产出全国第一。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临港工业发展条件优越，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

④两市核心竞争力充分互补。虽然目前两市存在产业结构、发展路径和目标趋同的弊端，但比较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市经济互补的历史久远、低水平重复建设少、民间性（非政府性）的经济交流如人才、科技、房地产、旅游日趋活跃。经过不懈地调整，如表7所示，两市“十五”计划的产业发展重点也开始有所区分。

表7　京津“十五”产业发展重点一览表

城　市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
北　京	养殖业、节粮牧业、特种养殖业、经济作物与优质专用粮	汽车、机械、化工、建材、冶金、食品、饮料、家具、包装、印刷、工艺	商贸服务业、金融、保险、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旅游、咨询、房地产、文体	信息、光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新材料、环保
天　津	种苗、水稻、蔬菜、畜牧、水产、果品	汽车、化工、冶金、机械装备	批发零售、餐饮、交通邮电、仓储、旅游、教育、社区服务	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现代医药、新能源、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与预测》。

二　制约京津联合的主要障碍因素

1. 历史性原因

京津的城市分工可上溯至明初。北京是行政中心，天津则是服务于京师的军事要塞和漕运中转地，到清代逐步发展成行政级别颇

高的"畿辅首邑"。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开埠和洋务运动，为天津奠定了现代工业和航运业的基础，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北京则由废都衍变为典型的消费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市的城市分工发生转变。天津继续作为工业城市发展，北京受当时"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认识的引导，致力于建设"经济中心和强大的工业基地"，至80年代也形成以重工业为基础，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因北京与天津的同构发展，导致城市分工的基础逐步丧失。在计划经济时代，两市都在自成体系的模式下发展，又均受到对方直辖市地位的排斥，相互掣肘的矛盾直至改革开放后逐渐突出，使津京各自的城市定位一直不够清晰，直到20世纪最后10年才有明确说法，但时过境迁、积重难返，要恢复京津传统的分工关系又谈何容易。

2. 缺乏联合的观念

多年以来，京津两市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而直辖市的桂冠与改革发展的压力，又使两市不得不选择各自为政的发展道路，合作的意识多是被学者一再谈起。为在2010年基本实现城市现代化，两市都制定了激动人心的规划目标和指标体系。但这些规划很少能够从区域发展的层面审视城市发展，无法以整体观念解决地区问题，无形中演化为对抗区域合作的借口与遁词。长时期的互不沟通，不仅无益于恢复两市的传统合作关系，尤其在一些竞争性合作领域，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和中伤。两地高层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联合的积极方面，而是过于关注消极方面，联合发展一谈再谈，具体措施却未跟进。

3. 行政地位的对峙

京津虽同处一个经济区内，但行政地位相当、经济实力相近，使得城市之间缺乏珠三角同属一省那样的共同利害关系；也缺少长三角以上海为绝对中心来统领整个区域的内在凝聚力。行政地位的对峙往往造成畸形的区域壁垒和无序竞争。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北京经济发展实际依附于服务首都炫目光环之下，在两市行政地位貌似平等关系中，又隐含中央对地方行政隶属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当城市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天津往往处在竞争的劣势位置。其后果一方面扭曲了北

京的城市地位和职能，加剧了首都的资源供给紧张和环境负荷；另一方面也使天津的资源、成本、区位等优势难以充分发挥。长此以往，必然是两败俱伤。

4. 产业布局不尽合理

多年来，京津在产业政策上求大求全，均强调“一个不能少”，导致产业结构自成体系、自我封闭，使得产业结构趋同加剧，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过度竞争和封闭竞争严重，许多重复投资与重复建设不仅造成不必要损失，还造成整个区域资源使用浪费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最为典型的早期如北京重化工业的上马，近期如京唐港的建设。由于长期缺乏协调区域经济产业分工的有效机制，在我国“入世”后形成的新一轮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两市都致力于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现代医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扩张，传统产业如化工、汽车、机械制造的竞争也不放弃，区域产业布局的不合理状态少有改观。

5. 区域壁垒

北京和天津两大都市比肩而立，发展经济的竞争性动机强烈，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动机淡漠。区域壁垒导致产业难以实现优势互补，已上升为本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首要矛盾。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是中国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地区间贸易壁垒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工业化的代价。随着国际跨国企业的进入和产业的梯次转移，京津两地过度的产业同构，必然使两地行业间贸易机会减少，导致产业链条缩短和断裂。这也是环渤海经济外贸依存度大大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根本原因。

6. 制度障碍

京津两市距离虽近，但分属不同行政区，中间还隔有河北的廊坊，区划不协调是制度安排不妥的难题。我国在特定时期形成的财政、投资、金融体制虽然为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提供运行平台，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过去一些体制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如城市财政体制，先后推出倾斜于地方的多种制度，虽然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但为了自身利益实行地区封锁，必然加剧市场分割，削弱了地区间的公平竞争。又如金融体制，地方政府控制了

银行信贷资金的投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行政区经济。再如投资体制，地方保护主义使得投资都限制在本区域内，扩大了地方投资，使重复建设愈演愈烈。比较而言，环渤海地区的制度障碍远高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制度协调的成本过高，也直接限制城市间有效合作。

三　进一步认识津京联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市场经济建制要求冲破行政区划的藩篱

在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的今天，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在市场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虽然诸如行政等级、行政干预等计划经济概念在逐步淡化，但行政区划由于直接涉及资源、矿产、人口、市场、土地等经济要素的人为分配，对于一个区域和城市的经济总量、功能特色、竞争力等既得利益均有直接的影响，改革的难度很大。目前开始的“十一五”计划前期论证，已明确提出要调整行政区划的要求，但调整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①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计划经济所讲的横向经济联合概念截然不同。两者区别在于多年形成的行政区划能否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做出更为积极的调整。从现实出发，在同一级行政辖区内的行政区划调整，阻力相对较小，如广东省的佛山撤市设区。但就京津言，任何一种对现有行政区划的重划或兼并，都不能不以损害某些既得利益为代价，短时间内也都难以奏效，何况两市间还存在一个外省的廊坊。可以预测，京津联合的行政区划障碍不会短期消除，但作为城市领导者，亟待改变分区而治的习惯性思维，才谈得上付诸行动。

②行政区划不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对行政区划提出更高的标准，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要求，加强和加快各种经济要素流动和有效配置。京津各自的特色和咫尺区位，存在着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天然的人缘、地缘和业缘优势，冲破行政区划的藩篱，不是要取消行政区划，而是让行政区划更为合理。而合理与否，还是要接受市场经济的长期洗礼。

③解决京津联合的行政区划问题，需要中央的统筹帷幄。京津城市虽有同样行政区级别，但天津长期处于首都发展的“阴影”之

下，一些歧视性政策如不能自上而下理顺，区域规划将难以实施。吴良镛教授“大北京规划”所提出的京津城市“双核网络式”发展，没有更多考虑京津合作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障碍和解决出路。市场经济发展也要借助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最终要在行政区划调整上有所突破。

2. 国内外的成功实践要求尽快启动京津联合

欧美各国城市带的发展迄于二战之后，典型的如荷兰的海牙——阿姆斯特丹，加拿大的渥太华——蒙特利尔，其后是亚洲国家如日本的东京——横滨、韩国的汉城——仁川等，都是首都与港口城市功能互补、结合发展的成功范例。此外，如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濑户内海等海湾型城市带的发展，均给京津联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以启示。国内几大经济圈近年为加强区域合作，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如长三角各城市主动接轨上海、杭州湾跨海大桥开工建设；珠三角与香港 24 小时通关、深港两地信用卡联网、珠港澳的跨海大桥也进入实施前期。比较之下，环渤海经济圈的行动最为迟缓，除了京津机场联合，目前的最新动议是两市间再建两条高速路，盛传很久的京津磁悬浮快速列车项目还未提上日程。

借鉴和比较国内外成功实践，京津联合还需从以下方面加强认识。

①京津的比较优势需要尽快体现。多年以来，两市都是按照自我完善的模式发展，缺乏合作的认识。北京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地位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矛盾突出，科技人才优势发挥不足。天津虽有较多产业发展潜力和资源、区位优势，但腹地萎缩、市场分割、产运能力闲置等问题严重。环渤海地区的生态系统脆弱，水资源短缺已严重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不尽快启动津京联合，优势会转为劣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机制将难以再造。

②环渤海经济增长已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2002 年三大经济圈的经济发展虽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但长三角人均 GDP 和地均 GDP 分别是珠三角的 1.16 倍和 1.73 倍，是环渤海的 1.43 倍和 2.14 倍。2002 年全国 GDP 增长 8%，而长三角经济圈达到 11.59%，珠三角经济圈为 10.8%，环渤海经济圈为 10.77%。2002 年的长三角（沪苏浙）共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9465.6 亿元，占全国的

21.9%，是珠三角（广东省）的2.4倍，是京津两市的3.6倍。[1] 这一颓势如不通过津京联合尽快扭转，有可能丧失诸多加速发展的良机。

③京津联合不是简单的1+1>2效果。城市就是一个庞大的巨系统，在一个经济区域内同时并列着两个城市巨系统，如能协调有序，必将产生更为巨大、多元的乘数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京津两市仍然处在各自发展阶段，区域内部的经济分散化大于一体化，分割强于依存，排斥多于合作，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区域内部，特别是城市群体之间形成的一些不合理、不平等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并不断强化。导致今天的环渤海经济无“圈”可言，之所以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关键是未处理好两市的分工协作关系。

3.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加速迫使津京不断逼近与融和

对世界经济而言，21世纪是环太平洋地区崛起的世纪，对中国而言，21世纪是城市世纪、海洋世纪。京津两市要在21世上半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加快自身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三化”并行的结果之一，将是津京城市的逼近与空间融合。具体分析，我们可有如下认识。

①在工业化推进方面，津京地区虽有较雄厚的发展基础，但两市都肩负着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之路，加速工业结构调整的重任。按照目前的思路，北京的工业发展提出轻型化的发展思路，天津把建立国际制造业中心放在工业发展的首位，并利用临港优势大力引进重化工业投资。如果两市工业能够坚持错位分工的共识，把握西部大开发、外资北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东北亚经济复苏等多种机缘，充分突出自身在政治、文化、科技、人才、信息、交通等单项和综合优势，加快混合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则两市不仅担负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也为城市带形成奠定物质财富基础。

②在城市化推进方面，北京东南部和天津渤海新区是城市化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已经表现出与世界城市趋海性走向相一致的特

---

① 陈耀：“三大经济圈发展特征比较与一体化推进战略”，《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9月22日。

点。北京六环路的贯通和亦庄开发区的扩张；天津武清的撤县建区和海河开发战略的实施，已经使两市建成区边界实际缩短到几十公里。以两市庞大的人口聚集规模和明显的经济势能落差而言，如果实施区域城镇体系规划、采取有效的行政区划整合（确定廊坊的归属）举措，加快大容量快速交通走廊建设，在两市间建立“一小时生活圈”，京津城市空间的融合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③在现代化推进方面，京津各自城市经济、社会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程度，均具国内前列，目前分别处在我国城市现代化评级的第一和第三位。共同欠缺的主要是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不高，或者说是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还不完善。如能以办好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不断加大京津区域性基础设施如空港海港、轨道交通、水资源供给、城市环保等的建设力度，则“奥运”后京津城市带发展，将会有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周绍熹、万新平主编：《跨世纪京津联合与发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朱　舜：《行政区域经济结构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景体华主编：《2003年中国首都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阎金明：《城市经济发展前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连玉明主编：《中国城市蓝皮书》，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

刘如海：“北京上海城市经济竞争力比较”，《城市问题》2000年4月。

陈　耀：“三大经济圈发展特征比较与一体化推进战略”，《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9月22日。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功能定位与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选择*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　颜廷标　崔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区域经济一体化速度明显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动、发展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先起之于珠江三角洲，继而是长江三角洲的整合，目前，环渤海地区特别是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被提到日程上来。与另外两个区域相比，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虽然呼声较高，但速度较慢。其障碍主要是三个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对传统体制下功能定位的依赖较深，而对新形势下的功能定位又认识差异较大。所以，如何对三地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对三地的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目前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特别是在规划"大北京经济圈"之后，需要从理性、科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重新对京、津、冀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在功能、地位、分工等进一步明确的基础上，从战略层面深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竞争力不断增强的特色区域经济格局。

一　京津冀区域与外部经济区域的比较与定位

1. 全国经济发展格局

①总体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三层次梯度。西部：拥有

---

* 本报告为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京津冀一体化中河北省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丰富的农牧、水能、矿产及旅游资源，但农业的总体水平不高，特色农产品生产尚处于初步阶段；工业则明显带有资源型的特点，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在工业总值中依旧占40%以上，总体上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

中部：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自然矿产较为丰富。相对于西部而言，中部经济已经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长期以来缺乏国家政策明显支持，中部既有的经济基础并未进一步形成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致使传统产业升级较慢。目前正处于东部和西部双向挤压之中。

东部：东部省份尤其是南部沿海区域的产业实力强劲，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高级制造、科技、服务业等行业都发展的较为突出。

②在梯度格局下东部地区发展方向。总体上说，由于体制、投资、劳动生产率等原因，我国东中西部的梯度差距还在持续增大，但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中部中心城市的迅速发展，这一差距将有所减弱。今后东部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前景将有三个方面：一是发展引擎作用将持续增强。面对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机遇，东部将继续成为外资首选，这一地区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推动力；二是高技术产业成为东部今后发展的重点，制造业高级化的发展势在必行；三是随着东部区域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其国际贸易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将持续增强。

2. 东部三个都市经济圈的角逐

东部的发展，其实是三大经济圈的较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先后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①经济总量比较：从人均GDP的角度看，长江三角洲为17459元，珠江三角洲为14976元，而京津冀地区仅为12424元，总体水平较低；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看，长江三角洲为11.02%，珠江三角洲为9.53%，而京津冀地区增长最快达到了13.2%。

②经济结构优化度：从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看，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第一产业都降到9%以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合计的比重达到91%左右，优化度较高。京津冀区域则存在较大差距，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在10%以上。这与河北经济综合水平较低有直接关系，也与京津二市的经济优化度、辐射能力有直接关系。

表 1　2002 年三个都市圈的实力比较

单位：元，%

区域	人均GDP	GDP（亿元）	经济增长率	三次产业结构比	固定资产投入增长率	外资增长率（基本建设投资）	城市化水平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增长率	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率
长三角	17459	23837	11.02	7.98:50.75:41.3	16.17	13.72	55	6.1	7.3
珠三角	14976	11770	9.53	8.78:50.43:40.8	9.51	14.72	49.6	-3.69	6.5
京津冀	12424	11386	13.02	10:45.36:44.64	10.67	-69.54	38.9	-8.42	6.9

注：因城市化指标缺少，城市化水平为 2000 年调查数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经济发展潜力：京津冀的产业结构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经济将会释放出强大的潜能；从城市化水平来看，京津冀地区城市化率仅为 38.9%，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将释放巨大的发展能量，推动这一地区经济增长；从人均收入的角度看，京津冀地区为 6.9%，高于珠江三角洲而落后于长江三角洲。

④对京津冀的总体评价：其一，京津冀地区在总体实力上处于较低层次，在发展上处于后发层次，无论从目前的总量还是从对经济发展的投入上都与另外两个区域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其二，在功能凸显上，竞争压力明显增大。经过近十年的发展，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已经发展为国内经济增长的引擎，先发的优势使得这两个区域已经率先分工，全国层次上的分工许多功能被两者抢先占领。而京津冀地区的优化组合尚未进入实质阶段，其面对的外部竞争已越来越大。其三，京津冀地区依旧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可以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化的推进、资源的整合，以及最终需求结构的升级中释放和发挥出来。

3. 京津冀经济圈的未来定位

①从功能定位上来看，京津冀区域将以特色加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趋同功能来定位。从上述的对比分析中可以揭示出：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正在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

心、制造中心。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处于对外开放前沿，在制造、贸易等方面占据优势，"大珠江三角洲"的提出更对提高这一区域的竞争力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形成金融、贸易、加工制造、旅游等中心。京津冀地区由于其不可替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优势，这一区域可定位于：中国重要的知识经济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基地；中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生产与加工基地；中国重要的现代物资流转中心与贸易集散地；中国文化与交流中心；中国重要的人才培育中心与信息交流基地；中国多功能和国际化的综合型经济区域。上述功能，既有京津冀地区的特殊定位，也有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趋同的功能。

②值得研究的是，京津冀地区有两个突出的功能，即政治与科技。一是从三个区域的核心城市比较看，京津冀区域带有相对明显的政治属性。上海、广州、北京都是区域经济、金融、贸易和物流的中心城市，但北京作为首都更有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背景，这为在世界政治文化活动和世界交往活动中获取竞争优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二是在知识创新上，京津冀区域具有明显的优势。京津冀区域大学和科研院所聚集，是主要的创新源，未来将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核心区域。通过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以及以此为契机的传统产业升级和高新产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三次经济结构调整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二 京津冀区域的内部互动机制分析

1. 京津冀区域的互动机制

①京津冀互动机制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其实质是将原来多个相互分割、自我封闭运行的独立经济区域，消除壁垒，形成一个在大区域开放分工、优势互补、良性运行的一个系统的过程。区域内的互动机制可以分四个层面。

一是宏观层面。从宏观上讲，政府的推动协调作用对京津冀的一体化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京津作为两个国际性城市，在区域内部的互动状态下应更多的侧重于区域资源配置和调控能力的提高，在战略的高度上发挥对区域形成"总部型"带动作用。河北在整个区域发展中处于承载的地位，在空间上也为京津两市的发展提

供了腹地，在互动的状态下应更多的侧重于加工、制造、流通等能力的提高，更好的实现与京津的有效对接，与京津形成能力上互补、战略上总分的良性定位。

二是企业层面。从最终实现方式看，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实质上是三地企业的分工与协作，并最终反映于企业的组织结构变动、产业的整合上，由“共和”式的发展布局向“王国式”企业组织形式转化。同时，三地企业的协同能力和协同程度的大小也直接影响到了政府的推动进程，企业与政府的相互促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作用点，这对于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是要素层面。要素市场是宏观层面、企业层面京津冀互动的基础和融通的关键。三地是否能建立高效的要素融通市场将对三地的企业发展，以及宏观上政府职能和城市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京津冀的要素市场总体发展缓慢，只有要素市场真正融合，才能形成对企业分工协作的支持，才能从微观层面上实现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多方面的支持与协同，为整个区域经济的互动构建深层的互动融通网络。

四是结构层面。京津冀一体化在经济的表现形式，其主要特征就在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区域内部人民生活需求的同步化。应该说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人民生活需求水平的提升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成败的重要标志和衡量标准。同时，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也会从很深的程度上影响到区域内部企业实体的运作和要素的配置，并最终实现产业的同构化和要素同质化。

结论。其一，区域内各主体在一体化的概念下将由原来的不同地区间的同质布局转向异质布局，同时各地方的产业结构也必然由原来的同构趋向异构，形成优势互补。这一点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中得到验证。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整体产业结构虽然趋同，但内部各城市的产业结构正向着趋异的方向发展。其二，就京津冀来讲，其区域互动在于通过政府、企业、要素、产业结构等多方面渠道逐步协调与融合：京津与周边环带的对接——环京津产业带产业承接能力提升——河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京津发展空间延伸——京津城市功能明晰、资源配置力提升、辐射能力增强、要素市场高效运作——京津冀都市圈的崛起。

②京津冀目前现状分析。从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现状来看，良性的互动机制尚未形成：京津冀三者的自我循环意识较强，从行

政关系上各自独立，协调成本较高；北京、天津辐射能力不强，只能顾及封闭的自循环，还没有达到溢出状态；区域内耗、低水平性竞争严重，还没有形成产业发展的梯度，河北也缺乏某些方面的产业承接能力。这些使得京津冀一体化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

第一，区域关系现状与问题。河北南北跨越700多公里，地区间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而京津双子星座式的匹配，在过去的时间里更多的是相互的竞争，只是近期双方出现了合作的意向，但行政区划的概念依旧影响较为深刻，双方的定位、协调都尚未达成协调一致，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是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其国际化大都市的竞争优势，同时也过多的以非市场的形式干扰了区域整体经济的融合；二是区域内部缺乏利益协调机制，区际经济摩擦较多。由于城市功能与定位过度重叠，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无法向更高层的战略方向转移。

第二，要素流动现状与问题。从要素在区域间的配置看，京津两市占据着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的绝对优势，因而在整个区域经济系统中处于高梯度的有利位置，而河北省则在这些要素方面严重匮乏，相对较为充裕的只有人力资源，但也缺乏高素质和异质化人才。

京津冀区域在要素上异质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是区域发展中的矛盾性问题。因为要素的异质化就直接意味着区域内部的分工中只能以垂直分工为主，但现实中又不能实现，从长远看对河北的发展有弊无益，而京津地区的发展也显然受制于河北整体“软硬环境约束”的牵制，这种实力匹配现状限制了京津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另外，由于区域自身的体制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生产中各类资金、物流、商流等要素在区域内的高效流动，这一点与浙江的“无为而治”所达到的高效流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河北省的经济实力问题。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河北经济实力较差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障碍。这一点对于河北来说，表面上可以明显的表现为行政区划对河北的直接影响，实则更多的是以河北省近年体制改革缓慢，民营经济发展落后为基础的。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方都是在近年的发展中，以各自的发展战略求得发展而最终走到一起的，其省市的行政区划在这一背景下也变得弱化了许多，这对于河北来说是值得借鉴的。如何

通过自身的发展反过来弱化行政区划才是建设经济强省的思维方式。

③对河北经济发展的启示。从一体化角度来看，河北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放在战略的高度，实现由过去京津冀各自发展到协同发展的角色切换，换句话说不是"你多一块，我就少一块"的问题，而是类同于企业内部"管理层"与"业务层"的协调运作问题，是深层次上分工与协作问题，是资源配置能力与生产制造能力的衔接问题。京津冀的互动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也是角色的演变过程。可以说，加快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快战略的转换、角色的转换是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2. 京津冀区域的优势互补分析

表 2　2002 年京津冀的经济实力比较

单位：元，%

地　区	人均 GDP	经济增长率	三次产业结构比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增长率
北　京	22577.02	22.63	3.0:34.8:62.2	15.75	-20
天　津	20369.02	10.29	4.1:48.8:47.1	12.69	34.78
河北省	9090.62	8.9	11.6:49.8:34.6	5.34	15.2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3》，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①京津冀总体经济实力比较。一是在经济总量方面，以三省市人均 GDP 来衡量，京津两市分别为河北省的 2.48 倍和 2.24 倍，反映出河北省与京津两市存在着较大的经济落差。从 2002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看，三省市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差距，北京为 22.63%，而天津、河北则分别为 10.29% 和 8.9%。由于已有的基础不同，这样的发展状况只能表明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京津来讲正在进一步持续增大，这是区域内部较为严峻的现实。

二是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北京的产业结构为 3.0:34.8:62.2，已经实现了"三、二、一"的结构调整，与"九五"期间相比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天津与河北则都为"二、三、一"的总体产业结构，而天津为 4.1:48.8:47.1，河北为 11.6:49.8:34.6，河北农业与第三产业的差距较大。这进一步反映了河北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进程较慢，相对农业所占比重较高，而服务业由

于缺乏成熟工业体系的过度也显得缺乏后劲。

三是从市场的开放程度看，京津两市由于享受开放城市、沿海城市、开放区、开发区等优惠政策，在引进资金、扩大出口等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相比之下河北省的对外开放步伐虽然在不断加快，但在利用外资、外贸出口等方面的能力差距较大。“九五”时期，河北实际利用外资虽是“八五”期间的3.3倍，但在规模与效应方面，则进一步拉大了同京津的差距。

②京津冀的产业竞争力比较。从表3的对比情况看，京津两市作为首都和直辖市加工生产和金融、保险等方面都有天然的优势。相比之下，河北的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比重偏高，而畜牧、林果及水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第二产业内部，主要以能源、原材料工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为主，产品结构上则以粗加工为主；第三产业内部，以生活服务的商贸、餐饮和交通运输业为主的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其比重都超过了京津，而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科技及旅游等新兴服务业则发展迟缓，尤其是科技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仅为1.12%，与北京的8.56%差距明显。这总体反映出河北产业结构的优化度低。

表3　2002年三省市主要行业比较

单位：亿元，%

地区		工业	交通运输	批发零售	金融保险	房地产	社会服务	教育文化	科技
北京	增加值	874.15	235.56	256.32	469.44	163.12	322.6	212.16	171
	占所在行业比重	78.29	11.79	12.83	23.49	8.16	16.15	10.62	8.56
天津	增加值	909.24	230.88	196.38	73.08	97.66	135.59	85.52	30.37
	占所在行业比重	90.75	23.92	20.34	7.57	10.12	14.05	8.86	3.15
河北	增加值	2695.69	554.91	550.06	184.25	115.16	154.54	154.27	23.64
	占所在行业比重	88.5	26.18	25.95	8.69	5.43	7.29	7.28	1.1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京津冀科技创新能力的比较。在京津冀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河北的优势主要来自于产业科技创新，而京津的优势既有知识创新，也有产业科技创新，知识流动能力也较强。按照一般情况，

三省市在科技创新上的优势匹配及网络互动，应为各自的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区域内部配置和相互支撑，但从这一框架中可以看出区域科技能力的现实，造成了河北产业发展的低层次。

④对河北的启示。其一，要按逻辑次序推进河北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加强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再工业化的良性循环体系，以产业科技创新为依托，通过重点优势产业尤其是制造行业的发展，带动全省工业化向高级阶段的推进，并以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加速，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最终通过信息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形成进一步促进工业化的良性循环。

其二，培育良性的产业内部梯度。从京津冀的资源配置看，京津都是城市经济，而河北为省域经济，因此河北在今后的发展中将更多的面临着来自京津的产业转移，这需要河北的产业布局形成良性的发展梯度，更好的发挥承载和对接的作用。从河北自身产业的先进性考虑，鉴于目前河北省产业内部的行业水平普遍不高、梯度不明晰的情况，应考虑以传统优势产业为支柱层，以高新技术为替代层，其他产业为弱化层，形成三层次、有限目标的产业良性梯度。

其三，加大产业科技创新力度。京津冀区域的石油、化工、冶金、建材、轻纺是主要的支柱产业，但从全国的情况看，尤其是在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竞争中，仍然存在着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工艺落后、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不强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发挥京津冀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整体优势，加大河北省在这些重点产业中的科技投入与创新，从而在与外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素质，更好的形成京津冀能力的互补与良性互动。

3. 区域空间重组框架下的产业布局

①河北省的空间布局。从河北的区位来看，北临内蒙古、辽宁等生态农业和重工业较发达地区，东临渤海与日、韩相望，西临山西等中等梯度发展省份，南临山东等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中高梯度省份和都市密集区，内部则拥有京津构筑的双核动力，这些形成了河北目前的空间构架。从理论上分析，河北内部从空间构架上分为四个空间层：一是核心区，即津京两市及城际沿线以县为单位构筑的卫星城，这是空间构架的区域核心；二是流动区，由近邻京津（一

小时车程）的城市构成，其中包括：保定、唐山、廊坊等市县；三是承载区，由外部车程三小时左右的区域形成，包括：张家口、承德、石家庄；四是地方空间，主要由前三层向外扩展包括邯郸、沧州、邢台、衡水等地区。

②空间布局下的分工。一是强化区域内部的通道建设，以发展物流产业为重点，形成石家庄——北京——秦皇岛的物流传送带。一方面发挥石家庄的省会作用，形成对南部城市的拉动；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秦皇岛的欧亚陆桥的枢纽地位，尽快在整体上形成由轴线到各分支的网络化物流体系。

二是强化区域内部经济要素尤其是技术、人才、资金的融合与自主流动。重点发展北京——唐山——廊坊——天津——保定的菱形区域，依托京津的资源配置能力，形成各类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并最终向均质化方向发展。同时，依托要素的高效流动，充分发挥菱形区域原有的制造业如石油、化工、新材料等方面的传统优势，强化该菱形的重点产业，形成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强化区。

三是培育新兴的增长区间，构筑高中低梯度匹配的产业格局。在空间框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既要有目前的主力区，又要构筑新兴的增长区。从这一点讲，河北有三个次区域：其一，以保定、唐山、廊坊等城市构筑的环京津科技创业带。以科技的互补流动为依托，通过高新开发区、创业园的建设，加速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培育高新技术的增长极。其二，张家口、承德构筑的生态旅游区，两市的总体经济水平较低，在工业上没有优势，因此，应更加注重生态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争取在服务业上得到迅猛发展，现有的工业和农业应向绿色化和高品质化发展。其三，以石家庄为核心的南部自循环区。主要考虑石家庄为省会城市，有一定的辐射能力，北京对其的影响力较小，可通过实力的壮大形成冀南区域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实现京津与郑州、济南等城市的对接。

三　京津冀一体化条件下河北省经济发展的立体定位

在京津冀一体化条件下河北省的产业定位，主要是以外部省份尤其是南部发达地区的对比为参考系，以协调为基础从互动的角度

给出产业功能方向定位，以现实情况为出发点，从优势互补的角度给出产业重点定位，并以区位为框架从空间布局角度给出产业梯度定位。

1．功能定位

在京津冀的互动发展过程中，河北的“角色”主要是京津产业梯度的承载者、资源的提供者和产品的制造者。其相应的功能从能力匹配的角度看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制造与设计开发能力匹配，发挥河北“制造中心”的功能。持续提高已经具有的优势产业制造能力，特别是提高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制造能力，培育形成制造中心，并逐步推动制造中心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二是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匹配，发挥河北“科技呼吸场”的功能。在巩固和强化自身产业科技创新优势的同时，加强对京津知识成果、技术成果的吸纳与转化，推动产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与京津形成科技创新的互补。

三是推动物流配送能力的整合，发挥河北“物资集散中心”的功能。北京的国际化水平与天津港的物流优势，形成了以京津为中心的现代物流中心，河北省要通过物流网络的重组，加快各类要素如科技、资本、信息等在河北的流动，形成与京津网络对接、流动通畅的现代物流体系，进而更好的发挥承载作用，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四是与京津的需求相匹配，建立形成主要为京津服务的绿色食品供应基地的功能。吃是人的必需品，北京与天津两大城市每年消耗蔬菜、果品等副食品量很大，环京津区域是理想的绿色食品供应中心。河北省可以绿色农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第一产业，主要包括无公害绿色蔬菜产业、畜牧产业（特别是穆斯林畜产品业、奶牛业、养猪业和禽类养殖业）、设施花卉业、园林业和农业生态休闲业等产业。

2．产业重点定位

与京津两市相比，河北省产业竞争力状况如表 4。从表 4 的对比情况看，河北在三次产业中应主要着重于以下具体行业。

一是在农业方面，河北省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较小。由于京津

对环保的要求，尤其是“奥运”的影响，在开发专用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和出口创汇方面市场前景较好，需求较大，河北可定位于发展高效、优质农业，同时河北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农业产品的深度加工是农业发展的另一重点定位。

表 4　河北与周边产业的实力对比

外部(都市圈)对京津冀的影响			河北的产业定位		京津对河北的影响	
资源型工业	→	压力趋弱	→ 粗加工业	←	压力很弱	← 资源型工业
技术型工业	→	压力大	→ 高级制造业	←	压力较大	← 技术型工业
传统服务业	→	压力大	→ 传统服务业	←	压力很大	← 传统服务业
新兴服务业	→	压力很大	→ 新兴服务业	←	压力很大	← 新兴服务业
优质农业	→	压力中等	→ 优质农业	←	压力很弱	← 优质农业
高新产业	→	压力大	→ 高新产业	←	压力大	← 高新产业

二是在工业方面，河北省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河北自身要发展就要以工业为主导；另一方面外部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级制造方面的压力很大。河北在此产业上的定位可分为近期和长期两层。近期河北应定位应与传统优势产业的改造升级、实现向高级加工的过度紧密结合起来。长期来看河北应以“高级制造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化”为辅作为产业定位。

三是在服务业方面，河北面临的内外部压力都很大，应重点定位于资源优势性行业和地域性服务业的发展，如旅游业、教育和文化产业、房地产业等，采用差异化战略进行发展。

3. 梯度定位

河北产业的空间梯度定位，主要是在现有特色的基础上，依据承载能力和总体的协调布局来分梯度的进行定位。具体可从几个次区域来布局。

一是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次区域，主要定位于“外资外贸加工区”和“高科技产业密集区”。一方面依靠其众多的港口和通道优势，形成对外部的开放和对区域内部的外向拉动；另一方面是与京津合作的重点区域，是承载京津辐射的主要地域。

二是张家口—承德次区域，主要定位于“绿色环保区”和“高新农业示范区”。一方面发挥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旅游等人文

产业；另一方面发展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深加工基地，成为河北绿色农业的重点区域。

三是石家庄—邯郸—沧州—邢台—衡水次区域，主要定位于"商贸流通区"和"制造业基地"。一方面发挥石家庄的华北重要商埠优势，构筑河北南部边缘区域的自循环；另一方面，以低梯度产业为主与环京津区域形成良性互补。

四　河北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思路与方案

1. 产业结构调整思路

出于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布局的考虑，河北依旧还会在较长的时间内处于垂直型分工位置上，但产业的空间梯度将会持续拉大。长期来讲，在区域整体产业结构趋同、生产要素同质的过程中，河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产业结构将是一个渐进的调整过程，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总体思路将会持续一定时期，而河北三个次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则是建立在各自产业比较优势和特殊的空间架构下的，是目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大变量，河北今后的产业调整思路就是要以此变量为突破点，推动功能特色的显现和提升，并最终在总体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上表现出来。

2. 调整方案

①通过空间重组带动产业重组。一是唐山、廊坊、保定构筑的环京津经济区，要以区域主导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调整为基础，充分利用区位优势，通过科技园区建设和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提高优势产业的生产能力，实现与京津在能力上的对接和深度整合。

二是张承次区域，一方面要注重农业结构的内部调整，通过对农副产品生产和流通布局、分工、协作等现有情况的优化，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体系；另一方面注重工业和服务业的有限目标选择，通过重点的园区建设和再造以及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特色工业和文化旅游业。

三是以石家庄为核心的南部区域，要形成以商贸流通、纺织化工为特色的传统工业区，要强化次区域内部的自循环及由此形成的产业比较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在津京冀一体化进程中甚至与外部其

他区域空间的整合中处于主动地位。

总体来说以空间重组带动产业重组就是要把产业的比较优势纳入空间框架内，并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形成匹配合理、特色分明的整体产业结构框架。

②通过产业重组，实现产业特色的显现和提升，并形成次区域间的互补性协调发展。一是以唐、廊、保经济区为主体，以张承经济区和石家庄邯郸等南部城市经济区为辅助，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先着力支撑主经济区的发展，并最终形成对另外两个次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带动。

二是推动唐、廊、保经济区在生产能力提高的前提下，与京津由垂直分工为主转为水平分工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对河北整体经济发展形成互补性带动，从而一方面客观上推动了京津冀一体化由“点”到面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产业发展在空间上的良性梯度。

三是重视和推动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以地区产业的集聚形成发展特色，再以产业特色推动区域集聚和持续提高。

③通过以三个次区域的融和互动推进宏观产业结构调整的实现。一是以三个次区域为产业调整基础，通过现有产业基础的互补，形成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调节机制，并以此形成宏观三次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模式。

二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培育形成河北内部新的增长极。由于京津对河北的影响从空间上是渐次推进的，且津京的资源配置能力在时间概念上也是有所波动的，这样在河北整体的产业调整中就有机会在现有城市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增长极，进而反过来推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持续进行。

五　河北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举措

1. 通过制度创新为产业结构调整扫除内部障碍

一是河北省应注重营造良性的体制环境，规范政府行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任务就是要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主要的支持应体现在建立健全各种政策法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进行产业调整的基础。

二是加快省政府和各市政府职能转变。河北省的各地方城市要

在总体区域和各自所属次区域的发展规划下，正确地分析现有产业比较优势，既要顾全大局还要形成自身的产业特色。

三是重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加快放宽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解除民营经济市场准入的障碍，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融资环境、服务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通过民营资本的引入，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多元力量。

2. 通过基础平台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程

一是组建京津冀联盟机构。为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富有成效的合作，需要建立高层次、全方位的组织平台，一方面推动三省市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发挥河北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调节和疏导作用。

二是加大对公共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强各类环境建设和科技实验平台建设，“筑巢引凤”，通过京津或外部企业的引入，实现通过外部资本的引入，以及相应技术与管理的引入，促进结构调整的优化升级。

3. 以观念创新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思路的深层发展

一是加强整体角色与次区域角色的转变，进行观念的创新。多年来，京津冀为了获取地方利益，长期实行灰色的贸易保护、市场垄断的封闭经济。要通过能力的对比，以角色的转变促进区域一体化观念的增强。

二是加强企业层面的组织观念创新。无论从京津冀一体化的角度看还是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看，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企业。为避免区域间过度的企业竞争，京津冀应共同组建跨地区、多功能、外向型企业集团，通过观念上的改变结合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深入展开，为区域内部尤其是三个次区域间的合作互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4. 以技术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换代

一是强化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进一步充分发挥河北省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力军作用，强化其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要注重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建设，重

点形成150家省级以上的企业技术中心；二要引导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扭转企业重技术改造、引进轻研发投入的局面，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推动高科技产业化进程。高新技术产业化战略是河北省在市场竞争中谋求局部技术和产业优势的必然选择。河北省主要是利用发展高科技的后发优势，集中有限目标和资源，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从而以高新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推动河北经济整体的跨越式发展。

三是以开发区、创业园、一体化基地为依托形成具有浓郁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通过高新技术开发区、农业科技园区、民营科技园区等基地建设，充分发挥其带动、引导、示范作用，成为辐射作用显著、区域特色鲜明、发展速度迅猛、拉动经济强劲的产业集群，并最终走以产业集群促产业特色，以产业特色促产业集群的循环发展道路。

5. 通过完善机制形成产业结构内外部的协调运行

一是要素市场的高效融通机制。要素市场的形成对产业的发展乃至最终的结构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京津冀三省市应从要素的角度出发，深入解决要素在区域内的高效流动问题，建立三级要素市场：一为整体区域级市场，侧重于京津两大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二为次区域市场，侧重于不同特点的区域对重点要素的供需流动；三为基层区域市场，侧重于对基层农副产品、小商品市场的培育。总体上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和高效融通的市场机制。

二是三省市的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三部分。首先，形成合理公正的区域利益关系，在进行角色转换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利益关系的总体协调；其次，在三省市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等主体间形成定期会议制度，加强沟通与合作；最后，形成利益协调准则，防止区域间的恶性竞争，从根本上消除矛盾，推动三省市产业间的协调发展。

三是产业的进出机制。其一，应排除地区市场进入障碍。这主要是有些地区以非市场手段来阻止外地产品的竞争，阻碍产业的集中与规模经济的发展。这种市场分割已经成为影响三省市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重要障碍。其二，建立行业进出的正常秩序，消除行

业进入和退出障碍。打开产业进出之门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河北应尽快实现企业进退的市场化方案，为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奠定开放、有效的政策环境。

四是产业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产业结构的调整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如产业调整中的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问题，垂直分工对河北更多的意味着就业人数的增加，而水平分工则意味着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降低普通劳动力人数，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都需要从宏观上协调。

上海与长三角

关于长江三角洲构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思考*

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研究中心　夏永祥
苏州大学商学院　成涛林

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著名地理学家简·戈特曼便提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将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2002年11月举行的以“如何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为主题的第十四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提出了以沪为中心连接苏浙14市，构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设想。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一　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城市发展概况

1. 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概述

作为我国三大城市连绵区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跨沪、苏、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新格局与区域经济整合研究》的成果之一。

浙一市两省，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 15 个地级以上城市。

长江三角洲主要部分为长江入海口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湖泊、河渠密集，水陆交通发达，工业门类齐全，农业条件优越，商品贸易发达，城镇密集。该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明清时代，本地区农业转向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使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形成了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市镇，为长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城市之一，也是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的首府，始终是长江三角洲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扬州在清代中叶以前也是世界级的大都市，其繁华程度不逊伦敦、巴黎，后来随着徽州盐商的消亡及运河时代的结束，扬州很快就衰落了。苏州、杭州有着千年以上的城市历史，自古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杭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商贸、文化中心。鸦片战争期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上海成为第一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上海成为远东的国际大都市，逐步成为我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大都市，成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首位城市。

2. 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特点

①城市化水平较高。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本地区有大、中、小城市 54 个，拥有 1000 多个建制镇。这里，我们用城市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指标来衡量本区城市化水平。根据 2001 年各市的统计资料，计算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大致为 41.5%，高于我国平均水平近 10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城市化水平超过 70%，南京达到了 50%。我们所应用的上述指标中城市人口是指具有城市户籍的人口，而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存在城乡户口划分，尽管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仍然把他们统计为农村人口，所以本地区的实际城市化水平要比计算的数据要高些。

②初步形成以上海为区域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一级中心的城市群网络体系。城市为充分发挥其集聚与辐射功能，降低物流成本，一般都布局在交通线上。因此城市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与交通息息相关的，而交通也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在古代特别是隋唐

以来，水运在整个交通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基本沿京杭大运河及长江等河流分布。现阶段长江三角洲地区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五种运输方式得到发展。发达的水陆交通网便于大中城市的集聚与扩散，大部分城市用地扩散都是沿交通走廊展开的。直至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布局基本上是沿着沪宁、沪杭铁路以及长江和沿海而展开的。其中，沪、宁、杭三市构成了本地区的三个支点，形成一个大三角，支撑起了以上海为龙头、宁杭为两翼，其余 12 个城市为腹地的城市网络体系。

③中小城市发展迅速。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道路是大中小城市并举，适度发展大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因此，中小城市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重要环节。在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这一地区占有 1/4 强。以苏锡常为例，“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其乡镇企业发达程度的生动写照。苏锡常三市所属 9 个县级市经济实力雄厚，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2002 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中，张家港、江阴、昆山、常熟分列第 3 至 6 位，太仓列第 8 位，前十强中占了半壁江山。正是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的独特机制，这与国外著名的大城市群主要依赖少数几个大城市的扩散有所不同。

④各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尽管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实力强，然而区域内各城市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见表 1）。

表 1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经济实力比较（2002 年）

城市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GDP（亿元）	人均 GDP（元）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财政收入（亿元）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
上海	6340.5	1334.7	5408.8	40639	7740.6	2022.3	50.95	50.3
南京	6597	563.3	1295	22908	1973.3	264.9	47.87	15.5
镇江	3843	267.1	561.2	21030	—	56.8	37.99	5.0
无锡	4650	438.6	1601.7	36632	2447.1	200.9	41.50	20.2
常州	4375	343.2	760.3	22260	1167.0	102.9	36.83	9.8
苏州	8488	583.9	2080	35723	3465.9	290.8	37.35	48.1
南通	8001	780.3	890.1	11380	—	87.4	34.84	2.4
扬州	6638	452.2	558.9	12368	673.4	55.6	38.56	2.6
泰州	5790	503.6	504.3	10018	579.8	53.1	36.29	1.8

续表 1

城市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GDP（亿元）	人均GDP（元）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财政收入（亿元）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
苏中南八市合计	48382	3932.2	8251.5	20984	—	1112.4	39.55	105.4
杭州	16596	636.8	1781.8	28150	2400.3	257.1	42.95	5.2
宁波	9365	546.2	1500.3	27541	2000.2	262.2	37.71	12.5
嘉兴	3915	332.4	706.4	21268	936.2	72.5	34.10	4.8
湖州	5817	257.1	422.5	16454	459.3	38.5	33.73	3.8
绍兴	8256	433.6	928.1	21414	1471.4	85.0	33.26	3.8
舟山	1440	97.8	146	14910	120.1	15.7	40.96	0.1
浙北六市合计	45389	2303.9	5485.1	23808	7387.5	731	37.98	30.2

资料来源：各市2002年统计公报，“—”表示无法查找。

注：本文把长江三角洲城市中位于江苏省的城市称为苏中南城市。

从表1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水平是：上海一枝独秀，遥遥领先于其他14个城市，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五市经济实力也较强，领先于除上海以外的9个城市，且苏中南地区总体发展水平高于浙北。

二 对长江三角洲构建世界城市群的分析

1. 城市群的概念

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①] 它

① 姚士谋等：《中国城市群》，第3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

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高密度的聚落；二是一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枢纽；三是拥有发达的网络结构；四是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目前，一般认为世界上有五大城市群，分别是：①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②美国五大湖大城市群；③日本东海岸大城市群；④英国大城市群；⑤欧洲西北部大城市群。其中，以美国东北部的“波士华”城市群和日本东海岸城市群最为典型。

2．长江三角洲构建世界城市群的优势分析

综观世界上发展成熟的大城市群，无一不是在良好的区位和自然条件基础上形成强有力的经济实力，从而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照国际上五大城市群，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构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①具有面向海洋、依托长江、倚靠内陆发达交通联系世界各地的区位优势。长江三角洲地区临靠东海、黄海和长江，集“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于一身，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为两条轴线的“T”字形开发模式受到国家的重视，成为我国国土开发纲要的重要指导思想，而长江三角洲正处于这一交接点的核心位置。因此，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高度和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来看，作为沟通长江流域腹地和海外国际市场的长江三角洲都具有良好的区位，这为本区域内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②经济实力雄厚。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20 多年的飞速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的地区，其经济实力已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素有“金三角”之称。各城市依托上海已形成了经济实力强、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群体，区内城市工业技术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配套齐全，资源加工能力强，人口密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综合经济效率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且大多数城市具有一定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其中汽车、钢铁、石化、电气、信息等一系列产品以及提供的金融、保险、商贸、航运、电信等服务在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见表 2）。

表 2　长江三角洲经济地区在全国的地位（2002 年）

类　别	GDP（亿元）	人均 GDP（元）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财政收入（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进出口额（亿美元）
长三角	19145	25288	25434.6*	7597.4	3865.7	185.9	42.32	1752.2
全　国	102398	7972	95449**	43202	16386**	527	33.72	6208
长三角与全国的比值	0.187	3.170	0.266	0.176	0.236	0.353	1.255	0.282

资料来源：由 2002 年各市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公报整理而得。

注：* 数据表示缺少镇江和南通资料，** 表示为 2001 年资料。

③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84 年国务院确立的沿海开放城市，本地区就有 3 个，1990 年，国务院又提出开放开发浦东的宏伟计划。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其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具有一定基础的交通通讯设施网络而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近年来，大量外资从珠江三角洲转向长江三角洲，反映了外商普遍看好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前景。同时一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和相当数量地方性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更是增强了城市综合实力与国际贸易的外向度，为本地区城市群的发展增添了活力。2002 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实际利用外资 185.9 亿美元，进出口额 1752.2 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 35.27% 和 28.22%。

④交通网络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既有沿江城市，又有京杭大运河流过，已建成通车的沪宁、沪杭、宁杭、苏嘉杭高速公路，江阴长江大桥、南京长江二桥，加上已有的南京长江大桥、沪宁铁路，正在施工中的沪湖高速、润扬长江大桥、沿江高速、苏通长江大桥、新长铁路，已经列入规划待建的还有贯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京沪高速公路、沪杭高速铁路、宁启铁路、南京长江三桥以及连接上海与崇明岛、南通之间的跨江隧道和跨越杭州湾大桥。港口方面，上海港和宁波港的货物吞吐量已进入我国沿海港口的前五位，南京是我国最大的内河港口。同时，在建的大小洋山的国际航运中心深水港，将通过越江隧道和跨海大桥，把北仑、舟山、乍浦以及南通、苏州等港口连接起来，形成专业分工、快速发达的集疏运体系。航空方面，除浦东、南京禄口、杭州、宁波、南通等机场外，浦东国际机场二期工程也正在进行，完成后年旅客运送量将达到 4600 万人次以

上。正是这些发达的交通网络，在长江三角洲内以至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巨大的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⑤有以上海为中心的龙头城市。所谓“龙头”，就是引导、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或发展极。中心城市对其腹地发挥龙头作用，是指中心城市为其腹地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综合服务，以其巨大的技术经济能量向其腹地进行辐射和扩散，从而带动其腹地的区域经济更快发展。[①] 上海之所以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一是有区位优势，二是有实力。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国际航线上，从上海到东京、汉城、香港、曼谷等城市的航程几乎相等，使得上海成为亚太地区的交通枢纽。同时上海又是中国东部海岸带和长江入海口的交汇点，海陆交通十分方便，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和广阔的经济腹地。上海城市的辐射功能也很强。目前，世界许多跨国公司都把驻华总部放在了上海，如飞利浦、通用，国内一些知名企业如春兰、杉杉等也把公司总部迁到了上海。据我们在昆山、太仓、绍兴、宁波等地区的调查采访，政府管理者都认为这几年的进步都依托了上海的发展，无论是人才、技术、资金，还是引资开发工作，以及改革的方案设计，都密切观察上海发展的动向，以此作为自己城市发展战略的思考点。上海大小洋山深水港的建成，将更加强化上海的对外开放地位，使其龙头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高（见表3）。

表3　上海市经济在长江三角洲和全国的地位（2002年）

类　别	GDP（亿元）	人均GDP（元）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财政收入（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进出口额（亿美元）
上　海	5408.8	40639	7740.6	2158.4	2022.3	50.3	50.95	726.6
上海与长三角的比值	0.282	1.607	0.304	0.284	0.523	0.271	1.203	0.415
上海与全国的比值	0.053	5.098	0.081*	0.05	0.123*	0.095	1.511	0.117

资料来源：根据表2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注：* 数据表示全国的相关数据为2001年。

① 陆炳炎等：《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第6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⑥各类专业批发市场的迅速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在长江三角洲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大批消费品批发市场、生产资料批发市场、工业品批发市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群。如张家港妙桥羊毛衫商城、绍兴柯桥轻纺城、常熟招商城、吴江盛泽丝绸市场、海宁皮革皮装市场等。第一，批发市场群的建设大大加快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化进程，而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进程加快也有利于其市场群的发育与完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第二，世界上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实践说明，由批发业和零售业所组成的商品流通产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份额将逐步上升。由于长江三角洲批发市场领域具有高弹性劳动力就业，因而成为农业劳动力转化的重要吸纳容器，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第三，各种专业批发市场集聚了重要的原材料和各种名优、土特产品，然后再向外扩散，使区域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辐射能力和商品、生产要素的输出量迅速增长，扩大了利润，增加了积累，从而扩展了城镇的辐射与集聚功能，推动了城市群的发展。如绍兴柯桥轻纺城，其主导产品布匹的辐射能力可达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所有省区的主要城市。[①] 第四，各专业市场的蓬勃发展增强了市场信息对企业生产的引导作用，对于带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长江三角洲构建城市群的问题与劣势分析

①核心城市上海与国际大都市标准尚有差距。所谓国际大都市，即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范围较大，与周边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形成大都市连绵区；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人文资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中的某一个方面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在国际上或区域范围内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重要的影响。衡量国际化大都市主要有人均 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城市人口比重、外汇市场日成交量、人均居住面积、市区绿化覆盖率等指标。虽然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首位城市，但在上述指标中与纽约、伦敦

① 姚士谋等：《中国城市群》，第 180 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

和东京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比还尚有较大差距。第一，从经济总量看，2002年上海GDP仅占全国的5.3%，而国际大都市一般都在15%以上。第二，从产业结构看，2002年上海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0.95%，就业构成中第三产业比重为47.21%，与纽约、伦敦、东京相比差距较大，后者均在70%以上。第三，从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看，上海外资银行入驻较少，虽然证券交易所运行速度和容量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名列前茅，但在证券市场规模、国际化水平及监管制度建设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而纽约证券市场集中了全球59%的证券市场融资业务。第四，从人口密度看，上海人口密度为2089人/平方公里，东京的面积只有上海的1/3强，人口密度却为上海的2.8倍。第五，城市交通方面，上海市内部交通体系不发达，缺乏大运量的地铁与高架轻轨铁路，人流、车流较为混乱，没有像东京、大阪那样的地铁运输系统。第六，政府职能方面，目前上海政府对企业微观运行干涉仍然过多，行政色彩较浓，与发达的市场经济政府职能有较大差距，其管理体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第七，人均绿化面积方面，2001年上海市区人均绿化面积为5.56平方米，而纽约、巴黎、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都在10平方米以上。

②行政区划分割导致各城市各自为政，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滞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按行政区划组织经济活动并以经济总量衡量干部政绩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个省市都力图建立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诸侯经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许多方面有所表现。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城市分属二省一市，其中有一个直辖市，2个省会城市和1个计划单列市，行政隶属关系非常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条块分割、恶性竞争，甚至以邻为壑的不良风气导致一些区域性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工程进程缓慢，更为严重的是，还干扰和制约了区内企业之间的市场运作，形成了所谓的板块经济。因此，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网络事实上存在着上海、南京、杭州三个板块，它们各自有一个经济联系相对更为密切的核心层城市圈。如上海板块的沪苏锡，南京板块的宁镇扬泰和杭州板块的杭嘉湖绍。国内外成功的实践证明，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优化区域内资源配置、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能力也就越强，受益也越多。但从目前总体上看，长江三角洲区域内

分工合作与对外开放的进程相比，还尚有差距。许多城市在积极发展对外合作的同时，却疏于区域内协调，出现了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相割裂的现象。由于经济一体化进程滞后，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得不到优化，各城市之间在对外开放中出现了恶性竞争、肥水外流的现象。例如，外贸出口低价竞销，吸引外资不计成本，导致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主导作用加强，而本地区大中型企业在区域内的整合能力却比较弱，这些发展趋势是令我们所担忧的。[1]

③区域内各主要城市除与上海加强合作外，而与其他城市之间缺乏必要的横向联系。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城市，上海对其他14个城市的辐射作用是各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群形成的重要动力。各城市都愿意加强与上海的各项合作，向上海靠拢，甘心做上海的配角，这些可以从杭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十五”规划中看出，因为上海的龙头地位暂时不可动摇。但各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相互协作则就显得是那么的不重视。其中一方面是缺乏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而导致交通不便，如苏州与南通虽然隔江相望但经济联系却不密切，南京与杭州之间缺乏铁路联系；另一方面受行政区划、地方利益的束缚，这也是深层次的原因。例如南京与上海既不敢竞争也无意合作，而着重加强与周围其他水平较低城市的联系，营造比较稳定的辐射腹地和势力范围。苏州与杭州一方面分属两省，行政级别不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互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两市在空间上与上海等距离，而上海向外扩散的指向决定着彼此利益的得失，使得两市处于有形或无形的竞争之中。无锡与常州长期以来各自为战，导致产业同构率极高。

④城市内部市区与市辖市（县）之间矛盾尖锐。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实行了市带县体制。由于大量乡镇企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县域经济得到很快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步与地级市的市区平起平坐，甚至超过它们。2002年，苏州市下辖的张家港、昆山、太仓三市人均GDP分别以42783元、52078元、40096元而超过了苏州市区34475元的水平。县域经济实力的上升必然导致行政上的独立性加强，从而形成地级

---

[1] 姚锡棠等：“从全球角度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文汇报》2002年3月8日。

市与县级市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矛盾重重且难以协调。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手段，县级市在没有统一规划的情况下，各自重复建设，浪费严重，并在地域上争抢地盘，导致土地利用的不合理和不协调。近几年来，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例如，杭州把萧山、余杭两市并入自己的市区，常州将武进市，无锡将锡山市，苏州将吴县市分别并入了自己的市区，以增强市区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但深层次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⑤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互补性较弱，且城市间分工不明确。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矿产资源匮乏，区内自然条件相似，各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皆以加工工业为主，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十分显著。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提出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测算出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一般都在 0.9 以上，仅是舟山与其他 14 个城市相似系数稍低，但也在 0.7～0.8 之间，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十分严重。在上海、南京、杭州三市的“十五”规划中，各市都强调要大力发展信息、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纺织、精细化工等产业，势必会导致产业结构趋同状况进一步加剧，这些产业的竞争将会趋于白热化，这同长江三角洲产业整合与重构是格格不入的。另外，从各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除上海外，各市均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居中。以苏锡常为例，三市的主导产业基本上都是机械、纺织、化工、冶金、食品，各行业的比重也十分接近。在产品层次上，纺织业的纺、织、染能力大体相当，纱、布、服装品种和产量不相上下，轻工、机电产品齐头并进，产业结构趋同使得各地区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使得投资和生产分散，降低了地区的整体经济效益。[①] 由于城市个性不突出，势必造成各城市在同一层次上的重复投资和相互竞争，导致生产能力闲置和资源的浪费。

⑥城市建设用地较为紧张，用地结构不尽合理。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多地少，据 2001 年的统计数据，本地区占全国 0.97% 的土地，养着占全国 7% 的人口，可见土地承载量之大，土地资源十分宝贵。近年来，由于开发区的竞相建设，征用了大量的土地，造成土地资源流失，农业用地大为减少。本地区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有的县市

① 郭占恒等：“长江三角洲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1 年第 4 期。

仅有0.45~0.53亩，还不足全国人均耕地的一半。同时，大量小城镇的建设和乡镇企业也占用了大量的土地。由于人多地少，城市按人口平均占有建成区的面积数低，限制了城市现代化设施的建设，束缚了城市各项用地按比例合理发展。用地紧张，建房见缝插针，给老城区改造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严重打乱了城市总体布局，同时也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

⑦区域环境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导致长江三角洲地区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人类自身只顾眼前的短浅利益，缺乏全局观和长远观，在谋求发展时产生了“外部不经济”行为。一方面，乡镇企业由于缺乏合理布局，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使污染扩散到农村；另一方面，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污染。目前，京杭大运河一年中有大半时间处于黑质期，太湖2/3的水面富营养化，各种污水排放量达32亿吨/年，为全国的10%，但流域面积仅占全国的0.38%，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严重污染了水环境，使得本来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太湖流域出现了普遍的“水质性缺水”现象。由于早期工业发展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使得后期治理不仅增加了难度，而且加大了治理的成本，导致不必要的浪费。例如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采取的“零点行动”，下大力气整治太湖流域污染问题，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效果并不明显。同时，由于本区河水流域纵横交错，省际、市际边界的水污染必然相互扩散，引起省市间的经济纠纷。如苏州南部地区一些企业工业污水不加处理而直接排入太湖，使得处于下游的嘉兴、湖州鱼塘养殖业蒙受重大损失，影响人民生活的正常饮水，导致苏州与嘉兴、湖州两市的矛盾，进而扩大到江浙两省，最后只好由国家环保总局出面协调处理，问题才得以解决。此外，本区大气污染、酸雨等对城市建筑、工业设备、农作物生产及人民生活等均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 对长江三角洲构建世界城市群的若干建议

1. 以申办世博会为契机，把龙头城市——上海建成世界级城市

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成功，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

机。既要以现代化世界级城市标准来建设上海，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又要不断强化上海对外的辐射功能，因此，未来上海发展应围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主线。除了充分发挥已有的自身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科技实力、管理水平、开放环境等优势，还要不断强化创新和服务功能，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三个中心”。第一，大力培育和发展电子信息、现代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第二，在政策上推动国内知名企业将总部、销售中心、研发中心迁至上海，利用上海信息、资金和人才聚集的优势，优先发展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技术产业，使上海真正进入世界级城市行列。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与监管，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步伐，促使银行机制与素质尽快达到同国际大银行竞争的水平，并积极吸引大量外资银行进入参与竞争。第四，积极推进信息港工程建设，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和信息市场培育，大力发展信息咨询、信息加工业。第五，加大市区内各项交通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整治城市环境。

2. 各地加强合作，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

上文提到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我们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单靠一个城市将显得力不从心，合作则可以取得双赢和多赢，倘若各城市能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得到的将不是“1+1=2”，而是一个发挥城市群的集合能量的过程。从历史来看，长江三角洲从来就是一个浑然一体、唇齿相依的自然——经济联合体，形成了彼此间悠久的经济联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这种联系将更为密切。而目前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的合作还是停留在低水平上的。一是缺乏跨区域组织以协调长江三角洲经济环境的发展。二是缺乏跨区域的大型企业合作，通过资产重组形成大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①] 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应该设立一个跨行政区域的管理机构。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下各城市往往各行其是，只顾本部门发展，以往建立的由各城市计委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联席会和由各市常务副市长组成的市长联席会来协调地区内合作事务，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① 陆炳炎等：《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第13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效，但仍没进入到更具现实意义的发展层面，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其主要原因在于组织松散，没有权威性，只在浅层上展开对话与合作。在这里打个比方，假如某次联席会形成了一项决议，要求各城市怎么怎么做，如果该城市认为该项决议对自己有利，则会不遗余力地去贯彻执行；反之，如果对自己不利，而对整个区域有利，即使在长远看对自己也有利，领导人也不会去执行。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政绩短期化，另一方面是如果不执行，对自身也没有害处，因为政绩考核、人事任免等还在自己的上级政府，而不是联席会。所以联席会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这样就影响了一些有利于城市群发展政策的实施。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例如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它是美国国会授权集规划、执行和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机构，使田纳西河流域的整治开发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建议成立一个权威性较强，且高于各个城市等级的专门机构来专门就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有关发展问题进行统筹规划、协调政策与利益。例如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管理委员会，委员会隶属国务院，各城市主管市长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参加，由国务委员担任负责人。委员会应具备规划、组织与协调的职能，做到权和责相统一，委员会仅就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事务进行管理，对于区域内发展事务具有决定权，但不干涉地方具体管理职能。

3．加强重点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

基础设施是发展经济的硬件，应该在充分发挥长江内河航道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航空、铁路、高速公路和管道运输，建成合理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发展创造高效、便捷、安全的综合运输条件。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开发长江深水航道和深水港。大家都知道，长江口有几处水位比较浅，其航道已不能满足现代化港口发展的需要，沿江港口的潜力未得到发挥，与国际大港口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要大力发展深水港，在建的有上海大小洋山深水港、宁波深水港。第二，加强一系列高速公路、铁路和大桥的建设。上海和杭州应联合实施杭州湾建设，打通上海与宁波北仑港以至浙江台州、温州、丽水地区的通道。实施上海至南通长江口越江工程的建设。苏州、南通应合作进行苏通长江大桥的建设，以打通到欧亚大陆桥桥头堡——连云港的陆路铁道，扩大

对苏北地区的影响力。另外还有宁启沿江铁路、南京长江三桥、苏州至上海的第二条高速公路、浦东机场第二期工程建设，等等。通过各种交通设施的建设，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任何两个地级市之间畅通无阻，发展4小时都市圈，也就是说在4小时之内任意两个地级市之间可以乘车到达。在这当中，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协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应加强统一规划、合理分工协调有方，避免和制止目前在港口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竞相抢建码头泊位、乱占岸线的状况。应整合长江三角洲港口资源，共同形成以上海为中心、浙江和江苏为两翼的组合港，以形成一体化的巨型港口系统。

4．强化产业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群落

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全球层面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上看待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整合。要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特征，深化产业分工，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征。国外大城市圈的成功实践证明，一个经济区域要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必须有一个服务功能齐全的核心城市，形成分工明确、层次清晰的产业群。例如，美国波士顿城市群中，纽约是经济中心，费城主要是重工业中心，波士顿是教育科研、高技术产业中心，华盛顿是世界各国中少有的仅以政府行政职能为主的政治中心。长江三角洲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区内既有上海这样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为发展目标的城市，又有江浙两省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相互之间在产业上有很大的互补和合作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在发挥苏浙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重塑各地区的分工与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落。上海应重点发展金融、贸易、航运、信息服务等服务业，成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综合服务中心，苏中南地区是我国工业总产值最高的地区，以轻纺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为主，其中纺织、石化、家用电器具有比较优势，如波司登羽绒服、春兰空调、小天鹅洗衣机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均名列全国前茅。此外，丝绸、陶瓷、工艺品为地方特色工业。未来几年内苏中南地区仍将以上述工业为主体。浙北工业部门结构与苏中南相似。第三产业应以旅游业和专业批发市场为发展重点，可形成以古城古迹为主的宁镇扬旅游区、环太湖的苏锡常嘉湖五市应共同做大做强的太湖旅游区，而单兵突进或双

向的局部合作则难以使各自的旅游业强大起来。宁波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海岸线资源，非常有利于港口海运业和临港型工业的发展，如炼油、石化。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还需要通过改革和重组，使钢铁、石化、汽车、家电和信息等产业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规模效益。以汽车工业为例，世界上汽车制造业的单厂经济规模是年产100万辆。而本地区内的一些厂家，如上海大众、南京跃进，与国际标准相比，远远未达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规模，必须进行整合，改变“小而全”的落后发展模式。

5. 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前面已讲到，各城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无一例外地造成了环境污染。现在各地已经开始密切关注环境治理问题，并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一些地方没有认真地把环境治理坚持下去，只是当做一场运动来搞，或是应付检查，使得一些地区治理后又走上污染道路，同时加之各地区之间配合不够，影响了整体治理的效果，所以必须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利益来发展经济的方式，走集约化可持续发展道路。具体做法有：第一，产业整合应同环境保护与整治相结合。第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制定长江三角洲区域统一环保规划，加大环境治理和环保执法力度。第三，以水资源治理为重点，控制沿江钢铁、石化、建材等重污染企业的规模和布局，实现“三废”达标排放。第四，采用低能耗的先进工艺和技术，提高城市能耗效率，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如城市应提倡液化气汽车，用电动助力车代替摩托车。

6. 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我们认为政府职能改革是诸多建议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上述建议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因此，放在最后一点讲。首先，政府应弱化经济功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地方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团体，应从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定位出发，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和义务，主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而不是直接领导当地经济。良好的经济环境可以引导市场，实现真正的经济腾飞。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应当体现

在改革上，而不是表现在投资和争取高发展速度上。改革走在前，速度慢不了，老是争速度，速度也上不去。实践证明，发展环境越好的地方，经济发展就越迅速，这也是许多外资企业进入各类开发区投资办厂的直接原因。其次，要转变政府的行为方式。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行为方式更应与国际接轨。曾经有人说过，中国加入WTO后受冲击最大的不是农业等，而是我们的政府，因为政府会失去许多不应有的权力。政府行为必须与现代化、市场化和提高效率的要求相适应。第一，增强政府行为的公益性，坚决杜绝“寻租”、“造租”等腐败现象的发生。政府应该提供所有民间团体和个人都能进行公平竞争的均等机会，实行普惠和非歧视原则。第二，增强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和透明性，对于重大决策应该广泛听取群众和专家意见，形成民间团体和个人掌握了解政府有关政策和方便向政府提供意见的机制。实践证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成为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的主要环节。

参考文献

陆炳炎等：《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姚士谋等：《中国城市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年。

陈　维：“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魅力的培育与比较”，《上海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厉无畏、王振：《中国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苏州市统计局：《苏州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新探[*]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王洪庆　朱荣林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问题的提出已有20多年的历史，然而在这20多年的发展中，其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却远远低于欧盟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其一体化程度也并没有大的提高，一体化发展的格局远远没有形成。看似容易的事为何做起来如此的难，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一件事，因此，研究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是一件紧迫而重要的课题。本文提出推进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以制度性一体化保障功能性一体化的实现，先易后难、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分工协作、有序竞争等。

一　以制度性一体化保障功能性一体化的实现

1. 制度性一体化与功能性一体化的关系研究

经济一体化包含两种性质：制度性一体化与功能性一体化。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指的是，根据各国（或各地区）达成的协议和条约，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的，有明确的制度性安排的一体化进程。功能性经济一体化指的是成员国之间（或地区间）在经济各领域中实际发生的各种障碍的清除及经济的融合和依赖性的增强。

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它的功能性活动主要体现为各

* 基金项目：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2003年度资助项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国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各种方式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使国家间或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相得益彰，促进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各成员国的国际竞争地位；而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则是在前者发展的基础上，彼此认识到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加以规范和指导，从而达成某种协议和条约。功能性经济一体化虽然代表了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性内容，代表了各国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但在这种自发力量支配下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活动往往是不稳定的、脆弱的；而制度性一体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协议、条约的方式，将国际经济关系加以巩固和经常化，因此它成为经济一体化走上正轨的直接因素，功能性一体化从中获得了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不仅如此，制度性一体化的发展对功能性一体化的深化指出了方向并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制度性一体化与功能性一体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 欧盟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众所周知，欧盟是二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快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其运作机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彼此实施一致的政策。《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应了特定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 300 项立法。1993 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 1999 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同时为了保证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效实施，欧盟要求各成员国让出部分经济主权，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到目前为止欧盟已建立了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3. 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建设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务院曾建立过上海经济区办公室，但不久便夭折，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严格，办公室没有足够的协调能力；二是没有统一的章程，无章可循。而在主权国家内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不需要复杂的法律程序、高昂的管理成

本，而只需要在统一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下，在长江三角洲各地区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通过协调各地方的法规和经济发展战略，制定适合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需要的统一协议，就可以顺利实现。

①建立最高层次的决策协调机构。建议进一步提升已有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长联席会议”的功能和职责，特别是需要突破一般的对话协商的范围，使之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各个领域发展的协调机构，可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负责统筹整个区域经济活动的重大事宜以及布局建设。根据区域经济各地区分工的特点与内容，制定该区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与战略目标，即区域经济发展总纲要的具体设想与前景规划，以此作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行动指南。

②建议由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城市的协作办、经贸委、财政税收、金融等部门组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可下设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处、产业结构协调处、金融协调处、市场协调处等分支机构，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做出的规划和有关决定，负责组织实施区域内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的有关业务。

③加强法制。根据欧盟运行的经验，一个重要的具体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和统一市场的建立，要在签署共同条约的基础上，将这项国家主权交给一个跨国机构行使，其目的是为了制定和执行共同体市场的政策和法律，及时解决涉及共同体市场的法律争议。同样，实现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制定三省市的共同政策和法规，以形成区域内部平等竞争的环境，每个城市一旦加入这一组织都必须遵循联合章程，确保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顺利进行。可以颁布《长江三角洲协调发展管理法》，设立相应的法制机构，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设立跨地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法院等，在协调组织内部如有城市明显违反联合章程规定的有关事项的，应由各城市联合进行制裁，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统一执法。

二　先易后难、重点突破、循序渐进、逐步完善

1. 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化与完善的过程，呈

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而每个阶段又有不同的内容。从发展比较成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来看，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51 年 4 月 18 日正式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即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欧洲六国内部建立了没有关税、没有配额、没有其他进入壁垒，从而可以实现煤钢产品生产流通自由化的共同市场，并在生产领域对煤炭、钢铁等工业部门直接计划调节。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后，产业联合促进了各成员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于是他们希望将一体化推广到所有的经济部门，扩宽其成员国的经济合作领域，1958 年 1 月 1 日《罗马条约》生效，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实现了商品的自由流动和共同农业政策，并在 1975 年完成关税同盟。1993 年 11 月 1 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实现了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1994 年 1 月 1 日开始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1999 年 1 月 1 日，启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实现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欧盟从成立起经历了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经济同盟（economic union），在此期间，一体化范围不断扩大且向纵深方向发展，其合作领域延伸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2.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及突破口

①产业一体化。产业结构雷同现象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间相当普遍且严重，已成为提升该地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障碍，因此，产业一体化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合作的产业领域范围不同。产业的协同发展难点在于行政区划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体制障碍。

对于第三产业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选择旅游、信息、商贸、金融等作为突破口，先行实施，然后向其他产业领域扩展。选择旅游业作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的突破口的原因在于：长三角地区旅游资源各有特色，是一种互补型的关系，其合作性大于竞争性，联合开发旅游资源，是各地区发挥旅游资源优势的内在要求，并且能够实现多赢。同时由于旅游业的投资收益率高、见效快，故投资渠道多，投资方式多，易于吸引各方资金。另外旅游产业的产业关联性很强，与许多产业有密切联系，如：基础设施产业（公路、铁路、航空等）、区域环境保护、文化产业、商业、餐饮业、旅馆业、旅游

品生产等的发展。不仅可以繁荣当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还可增加就业。因此，选择旅游产业作为突破口体制障碍较小，启动快，效益明显。具体措施如下：第一，以世博会为契机，组建长江三角洲旅游管理协会，此协会为非政府组织，可由上海大的旅游公司牵头，联合杭州、南京等各地的大型旅游公司共同组建，共同协调旅游路线的安排、旅游景点的建设以及住宿、饮食、购物、娱乐、安全等。第二，建立由各城市政府共同参加的经济协商制度，负责解决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共同开发和利用问题。同时各地方政府要对长江三角洲旅游管理协会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如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出台、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治安的改善、社会的稳定等，为旅游业的共建联合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第三，各级地方政府要支持旅游公司、酒店、宾馆等行业的跨地区的资产重组，完善和健全产权市场建设。

对于第二产业即工业，工业结构雷同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一体化发展的难点和最大障碍，也是各专家讨论的热点，根据唐立国（2002）的计算，苏南地区（南京、无锡、镇江、常州、苏州），苏中地区（扬州、泰州、南通），浙北地区（杭州、嘉兴、湖州），浙东地区（绍兴、宁波、舟山），在这些地区内部各城市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都在 0.95 以上，无锡和镇江的相似系数竟达到 0.998。因此，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领域的竞争性远远大于其合作性，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很大。产业的空间整合主要是通过政府创造适当的环境，由企业作为主体来运作，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要从以政府为推动主体转变到以企业为发展主体上来，切实做到政企分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自愿、互惠、互利等原则。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企业集团该不该组建、何时组建、如何组建都应该取决于企业而不是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原则（要素的流动是利益导向的），不可人为的规定某地区应该发展何产业、不应该发展何产业，否则不仅不会实现联合发展，而且还会影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因此，对于目前工业结构调整问题的建议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作用首先是为企业创造一种合作的政策环境，清除各种关卡，取消各种障碍，统一收费标准，统一物价管理，统一市场竞争规则，统一招商引资政策、制定政策和法规并监督实施，维护公共秩序，确保物畅其流；其次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经济联合的硬环境；再次是协调区际间

的利益冲突，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最后是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加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法制经济转变。在此基础上，生产要素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地区间的优化配置。

另外也可考虑相邻城市间共同开发建设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等，避免目前各城市在招商引资方面的过度竞争，同时也利于相关产业的集聚。

②基础设施一体化。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讯网络体系建设，是确保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支撑。因为区域重大交通项目的建设，不仅会降低区域间的交流成本，促进商品、要素和投资的区际流动，同时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带来巨大的区域发展乘数效应。目前，长江三角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已基本形成，需要重点突破的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水利综合开发治理、环境保护等。

具体措施如下：以大小洋山港的建设为契机积极调整和优化区内港口群的功能和布局。第一，依托上海市的经济、金融、贸易、服务等强大功能，大力提高国际集装箱运输的比例，扩大国际集装箱的中转规模，尽快建成腹地型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第二，宁波、舟山等港口要建设成为上海港的深水外港和中转港。宁波北仑港其功能除了服务宁波、浙东、浙南等地区集装箱外，还要通过改善陆域的集疏运条件，以扩展箱源腹地和增加集装箱吞吐量。作为上海深水港的重要补充，同时宁波港还要争取作为更多国际直达班轮航线的挂靠港；舟山地区的诸多岛屿型港口，其主要功能是利用水深优势以大宗散货中转、储存为主的水水中转基地。第三，长江沿岸港口（南京以下各港口）要逐步形成协同发展的内支线港和喂给港。

在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同时要积极加强陆路交通建设，特别是跨行政区的交通建设，以配合国际航运中心功能的充分发挥。同时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还会加强各行政区间物流业的发展。另外还要利用崇明越江隧道和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兴建，积极构建长江三角洲区域性交通体系，促进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建设。

③市场一体化。包括产品市场一体化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实质上是通过劳动力、资本、技术及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来体现的。因此，产业一体化会带动产品市场一体化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同时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也为产业一体化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因此，市场一

体化与产业一体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目前，产品市场一体化的格局已基本形成，急需解决和完善的是金融、人才、产权等要素市场的一体化。

对于产权市场一体化的建议如下：首先要统一长江三角洲的产权交易市场，即把上海现在的产权交易市场扩展为更大范围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把各地现有的地方产权交易市场调整为上海这一主市场的分市场，形成从上至下的垂直管理系统，统一产权交易法规。同时还要重点培育各地的优质产权交易中介机构，发展跨地区的产权交易中介业务。

④投资一体化。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环节，它有利于防止盲目、重复投资、产业雷同等。投资一体化有利于产业一体化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实现，通过经济联合体制定统一的投资政策，指导区域成员的投资行为，从而提高重大项目的投资效益。目前，重点突破的领域是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一体化，如港口、机场等项目的建设以及对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投资等。对于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要立足于整个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要考虑其辐射范围。对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可以实行技术合作和共同投资等。

⑤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前期可能只有某一方面的协作与联合，如某产业的联合或某项投资的联合等。当其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实现一体化发展时便达到了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它是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

三　小结：分工合作、有序竞争

1. 一体化的实质就是分工协作、有序竞争

一体化组织的产生源于分工的不断深化和企业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一体化组织就是通过在经济上的某种方式的联合来共同分享分工协作带来的经济利益。同时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又会提高生产力、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从而促进整个地区经济最大限度的增长。因此，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各个地区的分工协作、有序竞争来提高整个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各个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以及以竞争促合作、以合作促竞争、促发展是经济一体化的动力。

2. 分工合作、有序竞争的建议

①协调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招商引资政策。以开发区建设为例，开发区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载体，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招商竞争的日趋激烈，原先较低起点上曾行之有效的招商引资方式已逐渐暴露出容易形成各自为政的无序竞争，导致重复引进、资源浪费、甚至利益受损等种种弊病。尤其是上海与苏南之间争项目、争投资、争人才、争技术的现象相当严重。这种各自为政、恶性竞争的局面，必然不利于区域内中心城市的发展，难以形成长江三角洲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使国际竞争力下降。因此，必须按照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实行区域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协调招商引资政策，避免效率低下的重复设置和无序竞争。

②实现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从“行政区经济”到“区域经济”的转变。长江三角洲同为太湖流域，同属吴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特殊的地缘关系和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区域经济单元，但由于长期的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的矛盾，以及长期的“官本位”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导致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经济发展格局，因此三省市各级政府要转变“行政区经济”的观念，以整体利益为重，要树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大市场”的观念。充分认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意义、作用等，切实打破条块分割、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布局，组建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乃至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实现企业间的有效联合和区域间的产业传递。区内各省市政府在其各自的区域范围内同样要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布局”、“政企分开”和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组建发展企业集团。

改革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指标，进一步淡化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在我国中央或上级部门对于地方政府领导人功绩的评价，总是以各种经济指标衡量，如地方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增长情况、税收情况，等等，因而这种评价方法在无形中就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的纽带作用和企业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此，为了实现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必须进一步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淡化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改变传统的政府对微观经济

的过度干预现象，真正实行政企分离，淡化行政区的直接经济功能，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利益格局。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采取“引导而不直接干预”的做法，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改善区域的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加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政策和法规并监督实施，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等。通过政府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加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法制经济转变。

③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是继续加大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的力度，让各个市场主体在自由、公开、平等的条件下积极参与竞争，形成一个有序的竞争体系，避免恶性竞争的出现。二是要为资源的充分流动创造体制条件，要充分尊重各主体的自由交易权、民主权，阻止资源在流通过程中的设卡行为，提倡个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长江三角洲整体利益。三是政府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危害整体利益的行为主体实施制裁，做到有法可依，限制非理性行为的发生，保护市场有序竞争的实现，维护长江三角洲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黄烨菁：“对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探索”，《世界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

汤　碧：“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3期。

刘志彪：“协调竞争规则：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石”，《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景普秋，罗润东：“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朱金海：“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唐立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何雄浪、张海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第2卷第3期。

潘志纯：“加快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刘君德：“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经济的制度性矛盾与整合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与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　陶希东
甘肃省张掖中学　赵鸿婕

一　世界博览会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自从1851年5月1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博览会（简称为世博会）以来，世博会已经走过了151年的历史，先后总共举办了40届。尤其是第一届由维多利亚女王通过外交途径邀请10个国家参加、为期161天、630万观众参与的伦敦世博会，开创了自由贸易的先河，向人类预示了工业化生产时代的到来，它的所有展品代表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类的无限想像力。它的成功举办，为后来的历届世博会与奥运会几乎具有同等重要和全球规模盛会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从此，世博会被誉为"经济、科技与文化界的奥林匹克盛会"。[①] 时至今日，先后举办过1853年纽约世博会、1855年巴黎世博会、1862年伦敦世博会……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以及2005年即将举办的爱知世博会等。每一届世博会均展现着当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及其成就，同时也展示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也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反映人类历史进步的"台阶"。

中国政府自1982年开始先后参加过10次世博会，以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展览内容吸引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不仅展示了不断进步发展的中国新形象，而且与各举办国、参展国建立了良

---

① 李浩明、戎兵："世界博览会：人类进步的舞台"，《文汇报》2002年12月4日。

好的合作关系。综观世博会151年的举办历史发现，世博会这一巨大展示活动所需要的经济实力和设施要求决定了主办国始终是发达国家，而且一般都是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当今国际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世界博览会这一国际经济科技的奥林匹克盛会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除发达国家外，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要求举办世界博览会。于是，中国于1993年被国际展览局接纳为第46个成员国以后，中国政府在1999年正式宣布并全面启动了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申办工作。我国在世纪之交的“申博”之路，是全面体现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决心、中国市场的魅力和前景、安全稳定的发展格局等的过程。2002年12月3日中国成功获得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权，正是对中国和上海改革开放、文化进步、社会文明、竞争实力的直接体现，同时对世界博览业的发展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综合性世博会，其独特的感召效应，将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世界博览业的影响力。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再创新局面。

二　2010年上海世博会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现实意义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是继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更加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又一次实质性措施，也是继申办奥运会成功以后再次向世人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成果的崭新机会，将对全面提高上海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和促进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会带来强大的推动力量，产生积极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成为上海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的“加速器”

改革开放为上海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连续13年保持高速增长，人均GDP已超过4500美元，超出全

国平均水平约 3 倍，已经步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地区行列”。[①] 在高位上运行的上海亟须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大项目作为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推动力，而世博会正好成为这一主要推动力。这是因为世博会是各国展示和交流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成果的盛会，是一个连接国内和世界的舞台和窗口，它能够全面推进中国、上海与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广泛接触与融合；可以扩大国际交往、提升国际地位、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促进上海熟悉国际惯例，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提升上海城市形象，发挥上海品牌的积极效应；促进上海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获取商业机会和经济效益。例如有专家估算，在上海大都市范围内，世博会的建设、举行、会后三个阶段的经济效应将使上海的经济有可能争取 10～20 年平均两位数增长，实现 2010 年人均 1 万美元，2020 年达到 2 万～2.5 万美元，从而进入较高层次世界级城市的经济行列。[②] 因此，以世博会为动力，上海建设世界级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步伐将大大加快，也将加快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正如上海市市长陈良宇的话说，上海举办世博会无疑就像装了一个“加速器”。

2. 全面推动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海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质量和工作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世博会举办期间必将对上海市的会展用房、接待游客的餐饮、住宿、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会对上海现有的城市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了圆满成功地举办世博会，必将对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调整和再投资建设，也会更新和提高现代化管理的科技水平。所有这些，必将成为上海城市建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有助于上海城市功能优化升级、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提高城市辐射能力、推动服务产品的系列化和标准化。

3. 世博会能直接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化和层次化发展

一个地区现代经济和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准就是经济活动的人员、资金、物资和信息交流的频度和节奏，世博会期间世界各地

---

① 胡雄飞：“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新动力”，《文汇报》2002 年 12 月 4 日。

② 诸大建：“造就世界级城市”，《文汇报》2002 年 12 月 4 日。

政界、商界、文化传媒界等各界人士的汇聚，必将引起高密集的人员流、资金流、物资流和信息流，所有这些与常态的经济活动流量相比就是一次难得的商机。具体而言，就是能够对上海的旅游业、商业、餐饮业、交通服务、传媒业、现代设计业和金融等服务产业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有助于获得规模化、高水平的新发展，进一步增强上海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和辐射能力。

4. 有助于形成亚洲地区经济繁荣、名副其实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不仅直接促进上海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发展，而且也是周边城市经济发展的一大契机，将给整个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乃至长江流域经济带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正如 1970 年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带动了日本关西经济带持续 10 年的经济增长一样，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也将通过基础设施、观光旅游、城市发展、产业投资等区域性的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联动效应，推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区域合作和经济增长，从而促进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亚洲经济繁荣、名符其实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

三　转轨时期的“行政区经济”——急需改变的现实挑战

上海成功获得了 2010 年世博会的举办权，为了要保证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发挥出其最大的综合效应，这不仅要靠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人民的积极支持参与，笔者以为，当前更重要的应该是，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各成员城市全面弱化行政区划界线的分割作用，充分利用世博会的机会，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加强相互支持和密切合作，构筑一个真正能够实现辐射、呼应的无疆界的一体化都市圈。只有这样，才能将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成一届最成功、最精彩、最难忘的世界博览会，也将在最大限度上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而恰恰相反，在当前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由于市场发育相对不成熟，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等原因，区域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态势，[1] 行政区划界线成为

① 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每个省、市、县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与规划、生态环境治理等经济活动的最大范围，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大于理性化的合作。这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内，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展、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行政和区域壁垒的弊端已经显得非常明显。

当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背后，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各成员城市之间仍存在着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体系、重复建设、市场分割、相互设置关卡、基础设施分割、政府行政保护、区内外区别对待、无序化争投资、争项目、争人才、生态环境分而治之等诸多“行政区经济”现象，人为地分割了原本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相对完整的经济单元，严重制约了长三角都市圈所具有的城市群体效应，难以发挥整体性竞争优势。最为明显的表现在：2002 年江苏与上海的汽车行业之争；为了吸引外资，一些城市政府已突破“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底线，暗地执行“五免五减半”，甚至“十免十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土地价格的恶性竞争；目前长三角竞争手段单一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重构现象，15 个城市中选择汽车的有 11 个，选择石化的有 8 个，选择通信产业的有 12 个，苏锡常三地前五位产业完全一样；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环保局各自为战，受各地政府牵制过多，长三角流域只有 20% 污水得到处理,[1] 等等。最近几年，虽然长三角都市圈连续召开了数届关于成员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城市发展论坛，为实现大都市圈内部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寻求出路，但由于缺乏一些能够给大家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受益的建设项目，在实践当中普遍存在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务虚”状态，真正的一体化发展成效较小，合作积极性不是很高。我们认为，当前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新要求，也对全面发挥 2010 年世博会的综合和扩散效应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当前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都市圈急需解决的现实性问题。

四　空间整合、加强合作、实现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措施

2010 年世博会的举办不仅为上海和长三角都市圈的共同发展产

① 瞿明磊、王丰：“大上海‘核聚变’”（1～4 篇），《南方周末》2002 年 12 月 5 日。

生直接的推动作用，而更重要的则是为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各成员城市之间的跨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和平台。为了全面发挥世博会直接和间接的集聚与辐射效应，笔者以为，应当在离 2010 年的 6 年时间里，长三角都市圈各成员城市以世博会为契机，切实从都市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转变传统的各自为政观念，报以诚恳、平等的合作态度和整体、开放、互利的观念，弱化行政区划界限对城市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通过空间整合、加强合作和一体化发展，在机制、制度、政策、法规、市场、管理等方面确实构筑起一个统一的运作机制和操作平台，为今后长三角都市圈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世博会的带动效应、共享世博会利益创造条件。具体而言，近期内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从战略高度出发，上海应做好 2010 年世博会的全新规划工作

举办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是上海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而进行高水平、高质量的场馆规划建设是获得成功的首要任务。对上海来说，应按照中央批准的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根据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进一步开拓创新、扩大开放、坚持发展，朝着建设“四个中心”的目标迈进，搞好 2010 年世博会的基础设施、财政预算、展览计划、参观接待等的系统规划和筹办工作，为出色地、高水平地成功举办世博会夯实坚实的基础。[①]

2．转变观念，不要把省市行政界线当“国界”，树立市域观或区域观乃至全球观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不存在孤立的城市，并且竞争环境由内部竞争开始转向外部的国际竞争。世博会的举办就是我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直接体现，有助于提高长三角都市圈的对外竞争实力。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长三角都市圈的各级城市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城市发展战略时，不要把眼光只停留在自己行政所辖的那一块地方上，也不要把省市行政界线当“国

① 人民日报社论：“为世界增添异彩——热烈祝贺我国获得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权”，《人民日报》2002 年 12 月 4 日。

界”，从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 WTO 的新形势出发，尽快树立新型的市域观、区域观和全球观，从国家利益和大都市圈的整体利益出发，从长计议，取长补短，主动协调和配合举办世博会的相关事宜，主动接受世博会的辐射扩散效应，以此寻求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为“共赢共荣、一体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政策环境。

3．统一规划和联合建设都市圈基础设施，努力构建互通互连、共建共享、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

快速便捷、高效安全、互连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是实现长三角都市圈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世博会参观游客进行跨区旅游考察的根本基础和保证。近期内，长三角都市圈成员城市从满足世博会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出发，在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中必须突破行政分割，树立大市场、大交通的指导思想，在统一规划和联合加强铁路、公路网络化建设的同时，充分挖掘水运、港口和航空潜力，建立各种运输方式联运的快速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还要特别注重都市圈内部信息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和互通互联建设，以网络型光缆干线网为主，以数字微波通信网为辅，形成宽带、高速、安全可靠的都市圈信息通道，全面提高都市圈的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同时要积极寻求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股份化投资新机制。

4．以市场原则实行跨行政区产业组织的重组，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封锁格局，尽可能减少对市场运作的障碍，促进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完善和发展

长三角都市圈各主要城市可实行工商联手，互设商场、市场、连锁店、专卖店，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各种类型的交易会和定货会，加大商品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改善都市圈商贸流通体系，共同培育、建设并开放面向本区和全国的大型商品和物资市场。在此基础上，可成立省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协调处理省际之间的贸易争执，促进区域内乃至区域外城乡之间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的相互交流和自由流动，实现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功能互补。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培育产权市场，促进企业跨地区的兼并、收购和联合，积极培育和发展一批区域性的、代表

长三角都市圈走向国际化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通过经营规模化、功能多元化、管理科学化、营运国际化，实现资本扩张和市场扩张。[1] 在大企业集团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型垂直分工和互补型集团分工，来推动整个都市圈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为世博会争得更多的商机做好准备。

5. 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寻求区际利益平衡和共同受益的新机制

我国长三角都市圈内部出现的行政区经济现象，是在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下形成的过渡型区域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惯性，难以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难以在世博会举办前8年时间内得到全面彻底的解决，在一些跨区性重大建设项目上仍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为了寻求一种每个城市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都市圈整体利益最大化，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根据当前长三角都市圈涉及三省市的特征，借鉴国外大都市区的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诸如“长三角都市圈建设委员会”或“长三角都市圈城市联合委员会”或“长三角都市圈联盟”或“长三角都市圈一体化促进委员会”等，并赋予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与举办世博会有关的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以减小内耗，增加认同。

6. 加强诚信重建工作，积极发挥第三部门力量，培育有利于大都市圈经济合作的区域新文化

加强诚信建设是获得世博会商机、加强合作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途径之一。为此，在长三角都市圈内要注意营造以上海市为首的诚实守信的大环境，建立包括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和个人在内的全社会信用体系，积极探索和制定长三角都市圈《企业信用制度试点暂行办法》、《个人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和《城市政府信用制度条例》等规章和条例，规范信用数据的获取、信用评估及使用程序，保障信用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建立“失信成本”远高于

---

① 郭振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整合的基础和重点”，《上海改革》2002年12月15日。

"守信成本"的惩罚机制，为在世博会上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创造条件。另外，要根据治理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长三角都市圈范围内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包容、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产业机理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张祥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黄建富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长江三角洲是指上海市全部、江苏南部与中部地区以及浙江东北部地区，该区域总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人口7534万人，约占全国的6%。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结构和不同功能的大中小城市通过交通网络、商品网络、技术网络、资金网络、人才网络和信息网络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分工、互补、交流和竞争的城市群体系。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一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体系

长江三角洲地区现有15个地级以上城市、67个县及县级市、1479个建制镇，地级以上城市、县及县级市、建制镇三级比例为1:4.5:94.5，从而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并举、城市等级较为完善的"金字塔"结构。从城市的经济地位和综合实力来看，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由中心城市和次级城市群构成。

长江三角洲地区拥有15个地级以上的中心城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城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城市，即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形成了我国密度最大的城市带。上述城市构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体系，是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的主体。

以中心城市为基础，长江三角洲还形成了5个次级城市群：①上海都市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3个层次，即中心城区、卫星城镇（6个）、外围小城镇（31个），具有典型的都市区空间结构特点。②以南京为中心的宁镇扬城市群。包括南京、镇江和扬州3个中心城市和丹阳、扬中、句容、高邮、江都、仪征6个县级市。③苏锡常城市群。包括苏州、无锡、常州3个中心城市和常熟、张家港、太仓、昆山、吴江、吴县、江阴、宜兴、锡山、金坛、溧阳、武进12个县级市，具有城乡一体化的大都市区特征。④通泰城镇群。以南通、泰州为中心，包括如皋、通州、海门、启东、泰兴、姜堰、靖江、兴化等县级市及其下属小城镇。由于这一地区城镇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城镇间联系不密切，属于潜在的二级城市群。⑤以杭州为中心的杭州湾城市群。包括位于杭州湾北翼的杭州、嘉兴、湖州，位于宁绍平原的宁波、绍兴以及海岛城市舟山共6个地级市，萧山、余杭、建德、富阳、临安、平湖、海宁、桐乡、余姚、奉化、慈溪、诸暨、上虞、嵊州等14个县级市。

二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一个特定地区范围内的城市空间集合体，是一个内在联系紧密的系统，其外部空间结构表现为一定的轴线、圈层和网络特征，充分反映了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的整体结构。

1.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轴线特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明显表现出按照一定的轴线发生联系，这种轴线的方向和路径具有一定规律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主要分布在沪宁、沪杭、杭甬三条交通轴线上，形成“之”字形空间格局。沪、宁、杭是三大节点城市，联结这三大节点城市的沪宁、沪杭、杭甬铁路、高速公路、江河沿线和沿海地带是产业集中和城市分布的主要轴线。沿线城镇稠密且分布均匀，平均每30公里一座城市，基本形成了大中小城市梯度发展的城市连绵区。尤其在苏锡常地区，许多城市工业区与小城镇几乎沿着铁路、大运河和高速公路发展，形成“交通走廊式”的城市分布格局。这些城市自然条件

相近，产业关系紧密，又具有地方文化的内在亲和力，相互之间有充分而且必要的合作基础。

从城市之间的联系和扩散效应来看，以上海为增长极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了三条基本传导方向和运动路径，即：①北线，大致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京；②南线，包括上海→嘉兴→湖州→杭州→宁波；③东线，即上海→绍兴→宁波→舟山。上述三条基本运动路径所依赖的交通框架分别是：长江沿岸河港航运、沪宁铁路和沪宁高速公路；沪杭、杭甬铁路和沪杭、杭甬高速公路；东部沿海城市的远洋港口运输。总体上来看，上海这个增长极主要是沿着铁路扩散的，沿江扩散轴和沿海扩散轴属于次一级扩散轴。

2.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圈层特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实质，是上海依靠其通达的城市外部交通框架来实现其经济关联城市的空间联结，根据经济的内部关系和空间距离的远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表现出一定的圈层特征。

按照经济关联度的大小，围绕着上海经济增长极，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可分为 3 个圈层，联系紧密度从里向外逐渐减弱。第一圈层包括苏州、无锡、杭州和宁波。这一圈层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达到40%左右，第一产业的比重在 10%以下，民营企业发达且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和财税来源，人均 GDP 在 1200～2400 美元之间，开始向发达阶段迈进。第二圈层是南京、嘉兴、绍兴、常州和镇江。这一圈层产业结构处于“二、三、一”阶段，人均 GDP 在 1800 美元左右，工业发展迅速，主要集中在机械、汽车、电子等行业。第三圈层包括扬州、南通、湖州和舟山。该圈层的民营企业发展较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大，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城市规模较小。

依据空间距离的远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可分为 4 个基本圈层（表 1）。按照交通经济的一般规律，边际流量成本是运输空间距离的增函数，距离中心城市越远的地区边际流量成本就越高，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的地区边际流量成本则越抵。因此，随着与上海的空间距离拉大，接受上海辐射的程度就越低，并呈现出梯度递减的趋势。

表 1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层次结构

层次序号	城市范围	与上海的空间距离	层次序号	城市范围	与上海的空间距离
1	苏州、嘉兴	50～100 公里	3	常州、杭州、绍兴	150～200 公里
2	无锡、南通、湖州、宁波	100～150 公里	4	镇江、扬州、南京	200～300 公里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3.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网络特征

随着基础建设的加强和经济交往程度的加深，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网络特征已经初见雏形。以沪、宁、杭、甬等中心城市为核心，周围散布着 11 个地级中心城市和众多的小城镇，形成相互交错、联系紧密的网络复合型空间结构，往往一个城市的延伸部分又是另一个城市的发展部分。以高速公路、铁路、航运、远洋运输和航空共同构建的现代化交通系统，以及以沪、宁、杭为主要节点的综合信息系统为基础，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成为城市之间联系的动脉。随着洋山深水港一期、浦东国际机场二期、市域铁路网（沪杭磁悬浮列车项目)、崇明岛跨江通道、杭州湾大桥等大型交通设施的建设，使未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将大大缩短，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将更加明显，城市之间的联系将更加密切。特别是随着高速公路网的相继建成，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距离将进一步拉近，上海到宁波、杭州、南京等长江三角洲城市的陆上行程将控制在三小时内。2003 年上海投入施工的高速公路里程数为 300 公里，预计到“十五”期末，建成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 580 公里，届时上海到苏浙的高速通道将增至 6 条（表 2)。

表 2　上海与苏浙两省相连的高速公路

名　　称	起　止　点	建设情况
A4 公路(莘奉金)	A20 公路(外环线)——浙江省界	已建成
A7 公路(亭枫)	A30 公路(郊环线)——浙江省界(新农镇——枫泾)	已开工
A8 公路(沪杭)	A20 公路——浙江省界	已建成
A9 公路(沪青平)	A20 公路(外环线)——浙江省界	东段、中段已建成
A11 公路(沪宁)	真北路立交——江苏省界	已建成
A12 公路(沪嘉浏)	真北路——江苏省界	已建成

资料来源：张奕：《构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三小时交通圈》,《解放日报》2003 年 3 月 23 日。

三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产业机理分析

1. 产业关联效应

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各城市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等均存在显著的差异，为各城市间产业的互补性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随着区域市场运作体系的逐步完善，必将要求提高地区间产业合作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协作向更高层次的产业整合发展，促进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城市之间的互补性水平分工及处于不同层次城市之间的配套性垂直分工。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产业关联效应集中体现在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沿江、沿海和周边城市群等三条空间关联渠道。

①沿江产业带。由上海指向南京方向的沿江产业联系路径是长江三角洲临水型产业带的重要发展脉络，已经形成了原材料、汽车制造和重化工业的产业走廊。在原材料方面，南京是我国鲁宁长途石油输油管道的终点，从而使南京成为长江中下游和三角洲各地城市石化和炼油产业的原油供给基地。汽车制造业是现代生产体系中关联度极高的产业门类之一。目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汽车制造产业体系中，已经形成以上海大众和通用两个大型汽车制造公司为龙头，联结南京汽车厂的中型轿车生产基地，共同构成了汽车及零配件生产加工基地的空间发展格局。同时，沿江地带日益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钢铁、石化和冶金等重工业发展的空间走廊。

②沿海产业带。长江三角洲地区集中了我国最大的河海港群，目前拥有万吨级的港口达 26 个。在总生产运装规模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总吞吐量达 35 亿吨，占全国港口吞吐能力的 70%。由上海以南至杭州湾北部的宁波、舟山、镇海、绍兴一线，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临海型产业带的重要脉络。这条产业带利用沿海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以石化、钢铁、冶金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原材料和能源产业带。

③周边城市群产业带。与上海毗邻的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城市，在历史上是与上海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上述城市直接将对技术要求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输入进来，作为该城市的主导产业。

在改进和嫁接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普通电子产品、家电制造、农副产品加工、轻纺和通讯产品配套等产业的专业化生产规模，进一步提高了与上海都市区经济的产业耦合性。

2. 产业转移效应

①产业梯度转移。上海城市经济的战略重点转变引发了上海部分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关系向城市外部的空间转移，直接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海将汽车、通讯、电站成套设备、钢铁、精细化工等确立为重点发展行业，而将纺织、玩具、塑料制品、五金、皮革、针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调整和转移的对象。上海进行城市产业转移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压缩落后传统城市支柱产业的生产规模，让出有关产业的生产和销售市场。例如 1999 年以后，经过限产压缩，上海纺织业的产值由占城市全部工业产值总量 22% 下降至 10% 以下，并在周边地区迅速培育出一批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生产型城市。上海城市经济体系中的食品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工业也向邻近的江苏南部地区和浙江北部地区进行空间转移。二是通过生产技术转让以及技术人员的跨区域流动对上海本埠传统企业或产业进行改造和嫁接，实现产业的空间转移。采取建立企业联盟、合作生产、虚拟经营等不同形式，实现了玩具、五金、机械制造、轻纺产品等产业门类的空间置换。三是通过外包加工的形式，上海将一批新兴工业的部分生产工艺程序、配套生产以及部分原有产业的外延生产直接转移到周边城市进行。目前，实施直接生产转移的城市产业门类主要包括零部件、各种包装耗材、元器件等，由此相应地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周边城市包装材料工业、塑料制品和机械加工等产业的发展。综上所述，上海进行产业结构梯度空间转移的具体做法，无疑成为导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化的一项重要经济基础。

②企业微观转移效应。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功能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即企业的中枢管理功能集聚于大城市，生产加工功能分布在中小城市）的形成与完善，推动着城市功能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成为城市群形成、城市经济圈联动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上海对周边地区的企业形成了强

大的吸引力，导致了浙江和江苏的部分企业纷纷迁往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空间转移一般可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实现部分转移。如万向集团在上海建立了上海万向投资、上海万向进出口；西湖电子集团在上海建立了上海西湖电子；德力西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德力西等。第二种是将公司总部转移至上海。如杉杉集团把总部转移到上海，主要生产加工基地留在浙江，同时在两地建立销售网络，在原创地与上海之间开始形成企业空间分工体系。到2001年12月底，浙江驻沪企业已达5万多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2000多家，集团公司50多家，在沪企业的投资额高达500亿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经济效应。

3. 产业聚集效应

①高新技术产业聚集效应。高新技术产业在长江三角洲的聚集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现有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和常州，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逐步形成了环太湖和沿沪宁、沪杭甬铁路线的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带，其轴线与铁路干道和产业布局相重合，形成强大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促进了城市之间的联动发展。目前，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我国电子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诸多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以微电子、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居全国领先位置，许多城市已经成为高科技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集聚地。如上海日益成为长江三角洲高科技产品的集聚地和扩散源，上海以张江、漕河泾等高科技工业园区为载体，集中发展航空航天技术、信息产品、新材料和微电子等高技术含量产业，实现了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诱发了长江三角洲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使得高科技群落正在本地区逐步形成，促进了城市之间的联系。在外商直接投资诱发的IT产业集聚过程中，对先行企业的跟随造成企业的“群集”特征十分明显。在沿沪宁高速公路的经济带上，产业链的凝聚效应正在吸引IT厂商候鸟般地到江苏“扎堆”，电脑主板、笔记本电脑、显示器、键盘、鼠标、UPS电源、通信、硬盘、扫描仪、微处理器等诸多产品的制造已蔚成气候。以苏州为例，苏州是全国利用外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已经形成了围绕龙头企业配套协作的企业群，如以明基电脑、全友电脑和华宇电脑为核心的

IT 企业群。

②传统产业集群效应。传统产业的集群效应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汽车、钢铁、石化等产业群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城市之间的关联性。值得关注的是，长江三角洲的“特色产业群”推动了市场交易规模和辐射半径的扩张，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浙、苏两省以专业化商品市场为主，形成了“专业化商品市场群落＋特色产业群落”的产业发展模式，而浙江的“特色产业群”尤为典型。随着专业市场的不断发展，扩大了产业的经营规模，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于是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不断崛起。在浙江众多的企业群落中，任何一个功能完整的企业群落都是生产性企业群落与商贸服务性市场群落的共生集合体，市场群落与企业群落之间的这种相依相伴、相辅相成的内在共生关系被称为“并联耦合性”。中小企业与专业市场相互促进，或是产业催发市场，或是市场带动产业，市场与产业联动发展，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特色产业为主体的区域特色经济。浙江“特色产业群”的结构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趋异性，产生了具有不同主导行业的城市，如杭州形成了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环保设备等新兴产业群；宁波市基本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轻纺、机械、建材、港运为支柱的产业群；嵊州形成了领带产业群；绍兴兴起了纺织产业群，从而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

“特色产业群”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形成了产业空间密集带，实现了各城市基于特色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由于“特色产业群”之间的差异性，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奠定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脉络。

四　结论及建议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密度最高的城市群，在空间结构上明显表现出轴线、圈层和网络三大特征。产业发展、交融和变迁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源动力，正是由于产业关联效应、产业转移效应和产业聚集效应才催生

了现代化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格局。

随着长江三角洲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强和综合实力的提高，大中小城市在商品、服务、人口和资讯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将会更加紧密，促进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五流”的加速，以带动城市群联动发展的格局。为了更好地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区域政策的整体性

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分属三个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制度因素所造成的行政区分割导致不同行政区域的政策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矛盾，形成了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是目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在制订政策时应综合考虑该地区的综合因素，加强政策的整体性，注意政策的纵横向协调。特别要克服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倾向，通过联手制定和协调各城市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为多元化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要进一步强化一体化管理体制的建设，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成立政府层面的协调机构，如组建“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委员会”，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以区域共同发展为目标，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宏观调控手段，构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格局。此外，还要注重民间企业之间协调机构的建设，开展技术协作、协商、制定生产标准、交流信息、避免恶性竞争等。

2. 协调区域利益关系

利益分配问题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地方保护主义顽疾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地方保护的实质是保护地方利益，由于产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别较大，每个地区都不愿放弃高收益产业，因为这些产业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因而重复建设屡禁不止，城市间产业的合理分工难以形成。城市间利益的协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来进行调节。一是要联手共建区域性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利益调节中的主导作用，弱化区域利益调节中的行政干预手段。二是要构建长江三角洲产权交易共同市场，通过资产纽带联系，实现企业之间和城市之间的资产重组和利益整合。三是要逐步打破地方利益主体、

经济主体和管理主体"三位一体"的传统格局，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调控行为。

3．合理进行产业定位和分工

长江三角洲大中城市应根据未来共生演绎形成的各自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确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地位和分工关系。城市之间合理的角色分工与通力合作，有利于避免各城市产业功能的重复建设，实现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强大的互补性优势提升该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国际性城市群的战略目标。因此，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合发展、共同繁荣"的原则，在都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联合投资建设等领域，努力实现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功能互补，为实现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

4．建立区域性投融资管理机制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需要建立统一的投融资管理机制，促进资源在城市间的合理流动。第一，应建立区域共同发展基金，使协调机构具有相当的经济调控能力和投资管理能力，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第二，要建立规范化的民间融资机制。长江三角洲地区民间资金较为充裕，但目前大多数民营企业仍以亲友间相互借贷和各种集资为主要融资方式，制约了民营经济的改造升级和企业规模的扩张，因此要适当开放金融领域，以民间资金为基金建立民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等。第三，要打破所有制和地域限制，积极鼓励生产要素跨地域流动，鼓励个人和企业跨区域投资和创业。

5．构建区域信息联通体系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长江三角洲应尽快建立健全政府——中介机构——企业、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各相关中介机构之间、企业之间纵横相连、快捷畅通的信息联通网络及其运行机制，促进信息的高速流动。可以建立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无锡、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信息网络系统，同时建设长江三角洲网络型光缆干线网，辅之以数字微波通信网，形成宽带、高速、安全可靠的信息通

道。特别紧迫的是要建立企业信息、产业信息、法律信息和专业性公用服务信息网络，以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方勇、张二震：“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5期。

石忆邵、王克强：“长江三角洲地区协调发展的特征及问题探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周玲强：“长江三角洲国际性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00第2期。

谷人旭、殷为华：“论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的形成及其核心城市上海的功能定位”，《地域研究与开发》2001年第1期。

张奕：“构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三小时交通圈”，《解放日报》2003年3月23日。

上海城市国际化经营的战略思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石建勋

一　城市国际化经营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城市经济在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城市功能不断提升，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已成为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载体。城市的国际化经营就要求城市决策者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角度，以城市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目的，按照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对城市的功能进行科学规划，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对城市进行经营管理，以业主管理的身份将城区的土地、基础设施、公用服务设施等资源及资本推向国际国内市场，把城市建设本身看做是一个既有投入又有产出的经济运行过程，把城市的土地资本、地域空间及其他经济要素视为最大的国有资产来经营，从而使城市建设走上"投入——产出——再投入——更大产出"的良性发展轨道，实现城市职能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经济产业合理布局，共同构成一种和谐的力量，实现城乡人口合理、有序、快速的流动，促进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城市经济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推动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根据远景规划，上海将最终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成为具有综合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经济总量达到亚洲经济中心城市的水平。根据这一发展目标定位，无论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人文角度看，上海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区域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国内大城市的功能定位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将上海发展成为与纽约、巴黎、东京、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并驾齐驱的国际功能定位问题。

与同期国际社会比较，多年来上海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一直呈较快增长势头。但是，与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相比，无论是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城市发展规划、城市的服务功能、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城市的管理、国际大都市的影响和作用的发挥都有很大的差距。如何以国际著名大都市为参照系，将国际化的城市经营理念引入到上海城市建设与管理中，制定和实施上海国际化的城市经营战略，是当前上海新一轮大发展的战略课题。

二　城市的国际化经营与管理模式

传统思维定式给我们设定，城市是给人们提供生产生活条件的无偿服务型、共享型的公共产品，政府对其只投入不收益、只建设不经营。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的眼光重新认识和审视城市，必须用经营的理念重新审视政府对城市管理理念，必须按照国际化城市的经营与管理模式进行经营管理。国际化的模式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城市资源市场化与国际化

城市资源市场化就是把城市作为资本、作为经济实体来看待、来经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盘活资源，以资源为资本，用资本吸纳国内外资金，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无米之炊”。城市资源的国际化是要有把城市资源放到世界范围来经营的意识，不仅对国内而且也对国外开放，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上海南京路国际化改造方案的确定就是上海城市资源国际化经营理念的具体表现。

2. 城市建设产业化与国际化

城市建设是事业更是产业，本质属性是一种经济行为。因此，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像抓工业、农业、商业经济那样抓城市建设，注重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引导和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城市建设，彻底改变城市建设政府投入、无偿使用的旧模式，真正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基础产业和龙头产业。同时，应该面向国际市场进行产业化建设，按照国际标准来建设、吸引国际资本投入城市建设、引入国际水平和经验的规划、设计、建设、监理等理念参与城市建设。

3．城市管理企业化与国际化

应将城市管理与市场经济结合，使城市管理自身也融入城市经营的范畴，改变以往由政府独揽的城市管理方式，实现城市管理的社会化、企业化。城市管理国际化是指城市的综合服务和管理要以国际大都市为参照标准，要为国内外的人员、机构和企业提供国际水平的管理服务。

4．城市运行规则的国际化与现代化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城市政府运行规则不仅受到国内制度的制约，而且受到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的游戏规则所约束，即所谓的运行机制的双重化。对中国城市来说，当前最紧急的是按照 WTO 的基本要求全面清理城市的运行规则，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废除，尽快建立起符合 WTO 的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游戏规则。

5．城市功能定位的国际化与区域化

参与国际分工，并在国际分工中不断提升城市价值与竞争力，是国际化城市的主要特征。

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其功能定位首先而且必须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城市，由于核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会在空间形态上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主的人和生产要素高度密集的星云状结构的大都市带。这种空间聚焦，将会带来大都市带两大功能：一是枢纽功能。即是人口、物质、资金、观念、信息等各种可见与不可见要素汇聚的枢纽。二是孵化器的功能。导致各种新思想、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从而形成对其他地区的示范和导向。在这里，形态一体化的含义，就是要形成有利于发挥这两大功能的空间布局结构。

自几个世纪前的产业革命以来，都市圈一直发挥着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无法替代的能力，这要归结于城市群强大的集聚功能。作为城市群的最高发展形态，都市圈的集聚功能更是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从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看，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二战后全球城市化进程的集中体现，是在现代交通、通讯条件下人口、资金、物资、技术、信息高度集聚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有人甚至认为 21 世纪是都市圈的世纪，经济的主要动力将越来越源于都市圈尤其

是大都市圈，都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纵览世界5大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美加大湖都市圈，这些都市圈都代表着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力量，不仅是国际经济、金融、商贸中心和控制中心，也是世界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和国际信息制造加工传播中心。它们在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具有枢纽作用，是连接国内国际的接点和产生新技术、新思想的"孵化器"，具有强大的国际辐射能力和"场效应"。

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是全国发展速度最快、投资环境最佳、经济内在素质最好的地区之一，包括苏浙沪"二省一市"，地区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处于世界都市带的第七位；人口约75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位于世界都市带的第一位。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GDP1.9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21.4%，实际利用外资112亿美元，占全国的18.9%，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5－10年，随着洋山深水港和沿海大通道的建成，长江三角洲完全有可能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和循环，建成世界上人口最多和规模最大的大都市圈。

上海的区位优势、长期的历史积累和现实经济优势条件决定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地位，上海有条件完全应该成为区域结构优化、资源高度积聚的核心增长极。这里，关键是要发挥上海核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极化效应：成为跨国企业、国内大企业、国际性组织、各类行业协会的集聚地；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中心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示范基地；成为国际性要素及商品市场的集散中心；成为高层次、国际性的要素市场及区域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人才流、技术流的集散地；成为区域综合交通网络的主枢纽。

三　上海城市国际化经营的战略措施

1．按国际标准和国际大城市的功能进行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龙头，是城市功能分区与空间布局的基石。上海要建成国际化的大都市，在规划上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按照国际化城市的标准进行规划，摆脱现代城市的“水泥森林”形象，摆脱浮躁与压抑的感觉，使城市成为人类最适合居住生活的生态和文化环境。第二，上海的城市规划要体现世界区域经济中心的功能完善与合理布局，提高城市的市场吸引力和辐射力，使上海成为最适合国内外投资者进行投资贸易发展的地方，使上海的功能布局能够很好地发挥“长三角”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作用。第三，上海的城市规划要有前瞻性，以超前的思维做好城市规划，力争二三十年不落后，注意为未来发展留下余地和空间，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摆在规划的重要位置。第四，上海的城市规划要有特色性，特色是一个城市的灵魂，要充分考虑上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利用好上海历史沉淀的海派文化、凸显上海传统商业文明和历史景观特色。

2. 按国际化和市场化要求进行城市资本经营

现代社会，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土地收益呈正比例关系，城市的投入也可以通过土地收益来实现回报。世界许多城市的资本营运，正是抓住了土地资本这个关键，通过健全土地资本营运机制，使土地收益成为城市财政收入和城建投入的重要来源。经营城市就是利用市场机制经营城市土地，最大限度地盘活土地资产，把自然资源转化为滚滚财源。

土地资本营运的基本思路是：第一，城市土地统一管理，存量土地有偿使用，土地供应总量控制，城市土地储备经营，经营性用地公开拍卖。具体营运中，引入竞争机制和商品化经营，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可以采取竞价出让、招标拍卖、协议出让、开发建设捆绑上市、土地置换、综合开发等多种方式。第二，营造土地概念，酿造热点，实施旧城改造。上海的房地产开发不应仅仅是建造一个房子、一个家，更重要的是营建一个社区、一个社会，营建一个概念。就是在经过综合分析市场的基础上，赋予区域开发一个主题概念。第三，土地再生资本——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即把各级政府无偿投资建成的可经营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如水、电、路、广场等公用设施）的经营管理权，按照“政企分开，管理与经营分离”的原则，通过依法招标、拍卖、租赁、承包等方式有偿转让给国内外客商、企业法人、个体私营者管理，将获取的收益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3. 学习借鉴国际大城市管理经验，实施投融资及经营管理机制创新

上海要学习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大城市的经验和做法，在城市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企业的参与，由一般行政性管理转变为经营性服务。采取“谁投资、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管理模式，积极吸引国内外资金参与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逐步引导那些带经营性、商业性的公用设施管理部门走市场化运作、产业化经营发展、企业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的路子。

具体来说就是要积极探索对市政设施在投融资、建设、使用、维护等全过程的体制创新，实现从政府投资行为到企业经营行为的转变。第一，深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吸收国际资本和民间投资参与城市建设。鼓励各种社会资金投资建设和经营城市基础设施，探索特许权经营、BOT、BLT等多种方式。第二，加强城市公用事业的改革，坚持积极探索、稳步推进“行业管、社会办”的原则，在管住管网和线路的前提下，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公用事业的发展，并区分不同类型，实施分类指导和企业化经营管理。第三，积极开展市政设施的资产化经营。进一步扩大市政公用设施有偿使用、有偿服务的范围，转让部分市政设施经营权，推行有偿使用。第四，强化和完善政府对市政设施建设和经营的监督、管理，即明确政府对市政工程管理的职责，按工程建设分阶段管理，做到各司其职。按市政建设与经营程序，协调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避免重叠交叉或管理脱钩现象。

4. 搞好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走可持续发展

按照国际上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城市综合竞争力必须考虑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包括人口）、生态子系统（包括资源与环境）三者的集成和匹配。但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相比，城市环境愈来愈重要。像东京、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大都市，以及像新加坡、香港、汉城这样的洲际性大都市，都先后提出了21世纪建设生态或循环型城市的战略目标。面对这样的挑战，上海应主动走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之路，正确处理经营城市与保护资源环境、生态建设的关系。挖掘城市现有潜力，实现城市建设由外延扩张为主向调整改造为主的转变，发挥规模效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环境是城市的名片，环境是生产力和竞争力。要把环境改造作为提升上海形象、推进城市资本营运的切入点来抓。要推行系统管理，按系统工程原理通盘考虑城市开发建设中的地下管道、地上建筑、商业网点、文卫、小区路网、物业管理等一系列城市公用配套设施建设，体现城市资本营运的联动效应和整体效应。要实行人本管理。把城市美化、绿化、亮化作为事业来办，作为产业来经营，营造适宜市民居住、生活的城市环境。这是最大的可持续，从而使得城市成为一个交通便捷、空气清洁、适合人居、企业挣钱、温馨有爱的地方。同时注意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建设和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促进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

5．加强城市的国际公关宣传，创世界城市品牌

在国外，将一座城市作为一项产品请一些专业的公关策划公司进行设计、包装和推广是很常见的事。上海“申博”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形象公关，上海把世博会做成了和北京办奥运一样，是全国人民的事。2001 年上海承办 APEC 会议也使上海几乎成了全世界的焦点，堪称中国城市营销的成功案例。上海城市的国际公关宣传已经走在了国内其他城市之前。但是，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加，上海城市的国际公关宣传和世界大都市品牌的打造工作还要加强，还要持续做下去，而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某一项国际活动。经营城市与经营企业一样，塑造品牌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应有国际品牌意识和名牌战略，打造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可以选择国际著名公关公司，将上海市作为一项产品进行形象公关，以“塑造上海独特的魅力”为目标，达到宣扬城市精神、提升上海的知名度及国际影响力的目的。

与此同时，城市品牌的国际化经营要注意抓好现代国际城市的形象创新工程体系，即从城市物质空间环境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民生活系统等“三大系统”入手。一是城市物质空间环境系统的创新，主要是提高城市空间环境的品味，美化环境，塑造城市新形象，新特色。特色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没有特色，就没有魅力；二是社会组织系统的创新包括管理系统及保障措施。要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建立高效廉洁的城市管理机构和组织管理体系，以及多元化、社会化和企业化的城市管理机制；三是

市民生活系统创新主要包括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市民意识与市民精神的创造以全面提升城市文明水准。

6. 上海要在“长三角”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核心作用，谋求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和区域布局三位一体的协同发展

随着“长三角”都市通勤圈、通学圈、购物圈、产业分工圈的扩大，行政区经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城市做大做强的阻碍增大。如何打破城市之间的行政区划限制，形成鲜明的城市定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加速区域内城市间的分工和合作，无疑是打造“长三角”大都市圈的最重要命题，也是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重要课题。

从国际经验看，都市圈内核心城市的兴起，都会引发周边城市和地区功能定位的调整。在日本东京大都市圈内，城市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千叶为原料输入港，横滨专攻对外贸易，东京主营内贸，川崎为企业输送原材料和制成品。在跨区域管理上，纽约都市圈内总体松散，但专业性领域则步调一致，1921 年就成立了纽约港和新泽西港的联合港务局，运行 82 年，状态良好。1961 年，纽约都市圈内 3 个州又成立了联合交通运输局。这些联合机构的权利是“具支配能力和规划能力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在日本，各个城市虽各自为政，但事关都市圈内协同，则由国家决定。

上海在制定未来产业发展、城市布局、道路交通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规划时，必须精心运筹，充分考虑与长江三角洲和沿江经济带的分工与协作。在上海的商务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上海需因势利导地进行产业结构的提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上海要从长江三角洲和全国的发展需要出发，冲破地区观念，走向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产业结构定位。上海要与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实行错位竞争，着重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新技术产业及第三产业，使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的产品研发中心、科技服务中心，和周边城市形成“前店后坊”的分工协作体系，要从政策上鼓励实行跨地区企业兼并和重组。

中国经济需要世界级的城市群支撑，但是，只有纽约 1/5 大小的上海无法单独承担支撑中国经济的重任，需要整个长江三角洲的共同支持。上海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在中国乃至世界确立经济、贸

易、金融、航运中心地位，只有依托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广大腹地的发展才能实现。根据这一发展目标定位，上海在这个经济区域内，要起到龙头作用和核心作用，应发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作用。第一，上海尤其要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打破地域界限，敞开大门，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对国内外的投资者实行“同等待遇”，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形成高效、规范、配套齐全的服务网络，使上海成为各地创业者的乐园；第二，上海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和扩散效应，强化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功能，形成区域资金集散中心，在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进入上海的同时，加快对内拓展的步伐，为域内和其他地区发展建设融通资金；第三，上海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与区域内其他城市接轨，不应自成体系。同时拓宽流通渠道，积极为域内商品走向国内、国际市场提供服务，形成长江三角洲的商品集散中心。

7. 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构造上海信息化的国际城市

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信息的全球化，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首先应该是信息化的国际城市。这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二是城市信息产业发展及应用水平；三是政府的信息化建设与服务水平。

在上海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服务能力，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基础设施资源，加快建设电信多业务智能平台、互联网数据中心、数字集群电话和集约化通信管线等一批新一代的信息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水平。以促进科学进步和艺术繁荣，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和治安能力，通过信息化社区服务将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连接在一起，从而全面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要努力完善并促进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互动机制，使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三个关键环节形成良性循环。加快发展信息网络重在培育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努力促进三网融合，提高普遍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就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而言，上海要充分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推动服务创新，不断增强对外辐射功能，进一步向长江三角洲、

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拓展服务空间和服务领域。与域内大中城市合作建立信息交互网，完善信息流通机制，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化信息服务体系。围绕大力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加快形成数字化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新模式，通过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管理服务水平，使上海真正成为信息化的国际城市。

参考文献

连玉明：《学习型城市》，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

扬　珍："企业战略对城市战略制定的启示"，《城市发展研究》2002 年 3 月。

刘天泽："城市经营与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研究》2002 年 3 月。

王维工、浦再明："加速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构想"，《解放日报》2003 年 1 月 20 日。

广东与珠三角*

关于珠三角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功能定位的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21 世纪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城市圈间分工、交流、合作、竞争诸关系的日益强化。只有大城市甚至大都市圈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21 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

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之一。从经济方面看，珠三角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从城市方面看，珠三角也是中国城市化和信息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在 WTO 和 CEPA 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

* 本篇的一组文章，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承担的广东省委委托的重点项目的系列报告。课题组组长：刘品安，副组长：成建三，成员：杨志云、曾鸣、宁咏梅。主要执笔人：刘品安，其他执笔人：成建三、杨志云。

作，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提升整个中国在全球的国家竞争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还是行政区经济，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的各种矛盾，使区域内统一的共同市场难以形成，最终导致这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的成本加大，增长速度放缓，严重地阻碍了珠江三角洲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才能整合珠三角各种资源，使珠三角在全球区域经济竞争中发展成为辐射力更强大的大珠三角经济圈，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竞争力，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一　珠江三角洲行政区划调整势在必行

1. 行政区经济必须革除

行政区经济是指在既定的行政区划范围内，由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它是以国内区域经济的分割为特征，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一种区域经济。

以行政区域为单元的地区经济利益格局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国的各级政府经常按行政区来组织和调控经济发展。所以出现这一局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行政区除政治功能外，还有自己的经济功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各级政府既有发展经济的责任，也有发展经济的冲动；二是中国的各级政府不仅拥有组织和调控经济的工具，而且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有能力参与经济活动；三是各级政府不仅要对行政区内企业、居民负责，还要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政绩的好坏又常与下级政府管辖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相关联。

由于上述背景，行政区经济有其存在上的合理性，其对国家经济的成长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行政区经济有着以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行政区经济源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行政区经济的运作条件下，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而且带有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因此，一个行政区的“经济”，往往

以一个区域甚至一个国家的“不经济”为代价。第二，行政区经济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经验表明，如果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相近，则区域内的需求结构和偏好也会相似，市场间的隔离会小，而区域内专业化分工的机会就会增大。反过来，则会导致需求与供给关系的弱化。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区域之间的利益摩擦因之激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贸易壁垒，实行市场封锁，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

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区经济”特征，这种“板块经济”模式使得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备受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和束缚。由于各级行政区划层次较多、分割繁细（珠三角横跨9个地级市），一个城市群可能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在发展目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环境保护等方面，城市群区域与各行政区域之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都有可能存在明显的冲突，集中表现为区域行政壁垒对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导致要素流动与进入成本偏高，致使区域资源要素不能顺畅流向优势区位——城市，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城市群的发展。同时由于区域内城市不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局来正确定位，导致城市之间缺乏整体规划与协调，在珠三角经济生态格局里，出现了争资源、争项目、争中心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其一，不合理的重复建设。集中在一些利润潜力较大的产业领域，以及像港口、机场这样的基础设施领域。不仅表现为数量多，而且表现为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在利用的方法上还缺少协调。机场方面，在珠江三角洲方圆200多公里的面积内，共有五个机场，香港、广州、深圳、澳门及珠海，合称“A5”，除珠海外，其余均为国际机场，尤以港、穗、深三者均具相当规模；港口方面，深圳港已对香港港口形成了巨大冲击，而广州在此之后仍启动其“南沙大港”计划，东莞也不甘示弱地要斥巨资建设虎门港，在两侧，珠海港和惠州港从来就不相信自己不能成为华南大港；会展场馆方面，珠江三角洲一些市镇近年来由于缺少规模和布局，互相攀比、抢建滥建会展场馆，有的市有3、4个大型会展场馆，造成资源浪费和会展业的过度竞争。据有关调查，目前全省较具规模的会展场馆有200多个，而利用率却只有40%左右。

其二，产业结构雷同。在区域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企业是市场主体外，政府也是具有地方利益的市场主体。因此，在当前地方政府以GDP、税收、就业等为基本考核目标的约束下，作为区域产业政策行为主体的政府选择也是市场化的，其行政博弈的出发点是本地利益的极大化。在这一前提下，各地发生的摩擦、争端和各地达成的协作、协调只能是利益博弈的选择，是市场化的交易过程。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从80年代开始均实行“赶超战略”、“逆向开发战略”，即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导致经济区各地把投资的重点集中在投资少、见效快的少数几个行业上，致使区内产业结构雷同，减弱了经济区内分工和规模的双重效益，并引发区内竞争的白热化。80年代中期的彩电大战、冰箱大战就是因为各地产业结构严重呈趋同态势而引起。到了“八五”时期，各地投资热点又惊人相似：广东沿海等地受香港产业转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战略等因素影响，加之利益驱动与信贷、财务等约束机制不完善，珠江三角洲内产业结构严重趋同。据1994年统计资料，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工业产值主要集中在食品工业（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服装工业（包括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其产值占了全部工业产值的50.65%。尤其是电气、电子这两个行业，产值占了全部工业产值的26.24%。其中，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珠海这两个行业的产值均超过20亿元；江门的电气行业产值超过20亿元；东莞、惠州的电子行业的产值超过20亿元。90年代中后期所有珠三角城市的主导产业又都定位在高新技术产业，深圳要搞IC产业，珠海也要搞，东莞、广州也要搞。

其三，不少地方在开放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由于省市之间、城市之间及县域之间存在高低不等的一道道行政性障碍，隶属于不同行政主体的产业开发区实施的是背靠背的招商政策，各城市的招商条件并不透明，商务成本缺乏正常的梯度。本应是成本导向下的企业投资经营行为与追求地方利益的政府行为合在一起，使得同类产品及上下游生产能力难以相对集中，产业链的分工协作关系出现断裂，或不经济地扩大了空间距离。在这种背景下，外商投资企业不论其产业属性和专业特长，一概成为各城市政府部门的争夺对象。

第二，行政隶属关系“重叠”，矛盾重重。即在同一经济区域甚

至是同一行政区域内，本因经济关系引发也可用经济方式解决的问题，却因当事各方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同而又矛盾重重，即使处理也不是按经济规律而往往按行政手段加以解决。近年来，治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打假”之所以频频受阻，“清障”之所以屡屡被困，相当程度上也正是缘于这种变了味的“属地管理”式的地方保护主义。

2. 经济区经济势在必行

经济区经济是指在一个自然区域内，不同行政区域以相同或互补禀赋要素为基础，以共同发展目标为纽带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如果说行政区划是按行政手段，对相互关联的自然区域进行的人为划界，那么经济区则是按经济关联度，对不同行政区域重新进行的自主组合。前者是“分”（行政划分），后者是“合”（经济融合），两者有不同的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现代区域经济之所以必然要从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主要是因为。

①从我国行政区划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历史及相互关系看，行政区划的稳定是相对的，变动是绝对的。而且从本质上说，行政区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意识和行政色彩的国家行为，属上层建筑范畴，而经济区则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其存在和发展有自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行政区划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基础需要，必然要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发展。经济区的发展往往会突破既定行政区划的框架，最终形成更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新型区域格局，同一经济区内的经济一体化势在必行。

②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看，从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势在必行。从 21 世纪开始，以“入世”为标志，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的逐步推移，增强国际综合竞争力，将成为一个国家称雄国际舞台的第一要务，地区的对外形象特别是国家的整体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因而必须打造新型的行政区划和区域经济格局，以适应国际发展新趋势和竞争新局势。珠三角作为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三大经济区域之一，由于受行政区经济的传统束缚，无论是规模还是自身的水平，都还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这不仅限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制约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更直接影响了国家国际形象和综合竞争力的整体水平。

③从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看，建立以跨行政区城市体系为主导模式的新型经济区经济格局，是我国城市化道路长期探索的客观选择和当今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以大城市为主，大中小城市协调并举"的发展对策，是我国城市化道路长期探索后的客观选择；另一方面，不同行政区划间的城市以协调互补实现共同繁荣，是当今世界区域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城市规划的先行者们认为：解决城市问题不能局限于各自狭隘的单一范围内，必须走联合协调互补之路。美国学者芒福德在阐述其区域整体发展理念时指出："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为此，自 20 世纪 50 年代始，美国沿大西洋中部，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在 600 公里长、100 公里宽的地带，建立了由 5 个大都市和近 200 多个中小城市组成的世界上最早的大都市连绵带。日本则建立了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成为亚洲大都市连绵带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目前这几大都市圈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3．长三角的区域整合

目前，长三角的区域整合行动之迅速，力度之大是空前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如今出现急剧变化，城市间快速交通网络呈现出全面接轨态势，农民向城市迁移，经济一体化措施纷纷启动，以工业化为重心的社会发展进程开始转向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行的新阶段。

①从城市带走向大都市群。近年来，席卷整个长三角的城市化浪潮使连接各城市间的乡村地带急剧缩小，城市边界纷纷汇合，第一次出现与纽约、东京、伦敦等世界级城市相似的大都市群。

2002 年以来，在 10 万平方公里的长江三角洲各板块，城市规划大调整、大改造和大开发全面启动。上海市城乡一体化进程，2003 年在整个 6000 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全面铺开。苏南板块各大中心城市改造拆迁面积均超过百万平方米，城市建设投资均以百亿元计。2001 年，南京市城市规划面积从 2753 平方公里扩张到 4700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逾千万。城市规划面积首次超过农村地域，城乡发展格局出现历史性转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长三角经济区连续 10 年以全球领先的经济增长速度极大地推动了该地区现代化进程。曾经以"鱼米之乡"

著称于世的苏南地区，1975年工业创造的国民财富首次超过农业，如今传统农业在苏南已经消失，产业化、工厂化已经成为第一产业的主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2002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长三角15个城市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达到5.9:51.8:42.3。根据江浙两省的社会发展预测，到2005年，长三角苏南板块和浙江北部杭嘉湖以及宁绍地区将基本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而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过程。

成千上万的农民正在告别世代居住的乡村家园，向城市迁移。统计资料表明，1997～2000年，江苏省总人口增加21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增加1099万人，乡村人口减少881万人，人口增长首次全部表现为城镇人口的增加。目前，长三角苏南板块按照人口划分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60%。

②"3小时都市圈"呼之欲出。2003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掀起规模浩大的"路桥运动"。以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快速交通网络体系，在建设、管理和技术上取得一连串突破。浦东磁悬浮铁路交通示范线开通，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长江口跨江大桥相继开建，沪崇（崇明岛）苏（南通）大通道启动。

长三角公路大动脉沪宁高速公路开始扩建8车道，宁杭高速以及连接苏（州）沪杭的高速公路全面兴建，将使长三角高速公路形成内外两个大环网。5月21日，苏嘉杭高速公路江苏浙江交界收费站实现二合一，这是长三角公路运营上第一次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成为走向联合运营的开端。5月25日，11条连接长三角各大板块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规划浮出水面。未来5年内，从长江口北岸南通市，到杭州湾以南的宁波，西至南京的1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一个纵横交错、通江达海的现代化快速交通网，将把长三角15座中心城市、55座中等城市、1446个小城镇全部纳入"3小时都市圈"。区域经济专家认为，长江三角洲"3小时都市圈"的交通计划，将极大推进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带来生产力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

③长三角推行"一体化"。2003年以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先后带领两省高层党政代表团，在江浙沪进行穿梭考察访问，首次就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形成融入长三角的战略共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表示，把联动发展推上一个新台阶。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许多方面迅速迈出实质性脚步。4月10

日，江浙沪三省市的工商部门在杭州签署了一份合作会议纪要，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等方面推行“一体化”。内容包括：三省市之间企业异地办厂实行市场准入政策，鼓励民营企业跨地区投资；在省际开通著名商标保护“直通车”；共建三地工商管理部门办案协作机制以及共建企业信用监管体系等。

长三角地区集装箱运输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最近开始启动，通过组建长三角跨省市的运输集团，拓展陆上货运交易中心功能，实现资源共享。

2003年以来，上海的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向江苏浙江的一些大企业直接发放贷款。据统计，目前在上海市的内地投资中，来自江浙的投资占50%。如今，环杭州湾5万多家企业中，有一半以上已在或即将在上海设点和建立总部。

长三角20多个城市2003年开始实施各地人员资格证书的互认和衔接，从而实现长三角内各地教育、培训、考试的资源互通、共享。

无锡、上海两地的公交公司2002年在全国率先推出“一卡两地刷”，两地市民可以持本地公交IC卡在对方城市的公交、出租车以及上海的轮渡、轻轨、地铁等交通设施上使用，目前沪锡两地异地刷卡已经达到了每月1万次以上。

世界城市发展趋势和长三角的区域整合给我们总的启示就是：在WT0和CEPA背景下，大珠三角区域间协同发展日趋重要，势在必行。而协同发展的基本对策和途径是，必须扭转目前各城市之间联而不合，合而不一的局面，合理调整行政区划，最大限度打破城市之间的行政区划限制，加速区域内城市间的分工和合作，推动跨区域城市群的形成，促进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重大转变；通过“整合”，实现“规划同筹、产业同布、市场同体、交通同管、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保同制、旅游同线”，提高整个大珠三角的国际竞争力。

二　形成政府协调机制，打造珠江三角洲三大都市圈

珠江三角洲目前的行政区经济造成了各城市间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的恶性竞争等后果，

严重阻碍了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区域竞争力，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珠三角必须借助WTO和CEPA的契机，打破现有的行政区经济，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重大转变。珠三角各城市群应以“大珠三角”都市圈的视野，审视自己的角色，重新考虑城市群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使珠三角在全球区域经济竞争中发展成为辐射力更强大的大珠三角都市圈，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

在空间格局上，珠三角地区要形成两条发展主轴、三大都市圈，呈网络状发展。两条发展主轴分别向香港、澳门延伸，一条是广港发展轴；一条是广澳发展轴。三大都市圈分别是中部都市圈（广州、佛山）、东岸都市圈（深圳、东莞、惠州）、西岸都市圈（中山、珠海、江门）。

中部都市圈：广州和佛山在历史、人文、传统以及经济联系方面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更需要进行积极的资源整合。单一的广州和单一的佛山的可持续发展远不如广佛联合可持续发展强，因为广佛的联合是以其互补性为基础的。

产业联动是一个都市圈的核心，广州、佛山两地在产业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比如广州的基础工业、装备工业近年发展很快，而佛山的制造业主要以轻型为主，以前佛山不少工厂的生产线主要从国外进口，而广州的重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就可以起到替代的作用。又比如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可以为佛山制造业的技术改造提供条件，这方面是一个潜在的广阔市场。相比于佛山，广州在金融、教育、物流等服务业方面更具有优势，佛山没有硬性地提出第三产业的发展比例而只是提出要提高质量，就是考虑到主动接受广州产业辐射的因素。

大广州都市圈是珠三角经济区的内核，强强联合将带动整个珠三角的发展，起到1+1＞2的作用。

根据大广州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和发展趋势，其城市定位为：洲际性综合型国际化城市，努力打造成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东岸都市圈：深圳与东莞、惠州不仅地理上山水相连，产业联系也相当紧密，目前深圳与东莞、惠州在电子信息产业等领域，共同发展成为国际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形成具有紧密分工协作关系的企业群。同时，深圳目前拓展空间十分紧缺，有资金有项

目但没空间。而惠州情况则相反，发展空间广阔但缺资金少项目。但三地分别由不同的城市政府管辖，行政管理上存在的利益本位化，使经济社会难以形成相互协调发展。将深圳、东莞、惠州整合为大深圳有利于区域内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更好促进粤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大深圳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和发展趋势，其城市定位为：洲际性专业型国际化城市，努力打造成亚洲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制造中心城市、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花园式海滨旅游城市。

西岸都市圈：中山、珠海、江门三市同处珠江西岸，无论人文地理还是产业联系既紧密又雷同，既同构又互补，三市合而为一共同重点发展依托于港口运输的大工业，如能源、重化工、机械工业及高技术的医药微生物工程，国外和国内并重的旅游业和以物资转运为主的港口贸易等第三产业。这对提升珠江西岸经济，打造西岸大都市经济圈至关重要。

根据大中山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和发展趋势，其城市定位为：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努力打造成华南地区的现代物流中心城市、旅游休闲海滨花园城市。

珠三角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建设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温家宝总理2003年访港时强调，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要统筹考虑，发挥最大效益。香港、澳门、广东三地高层领导也多次表示，要认真研究粤港澳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问题。CEPA的签订、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升级等因素，推动了内地与香港，特别是粤港之间经济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粤港澳之间体制差异和历史形成的种种障碍导致了三地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弊端，如区域内出现的港口、机场重复建设等问题，已经成为大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各自为政，缺乏协调与合作的典型例子。这些大型基础设施辐射半径已经超出城市或区域的范围，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城市之间基础设施的建设缺乏区域协调，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既不利于实现合理高效的区域资源配置，同时也降低了已有设施的服务水平。

因此，珠三角深化区域合作，首先应从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协调与合作开始。要立足长远发展，从战略的高度，从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带动包括华南、西南和中南部分地区在内的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高度，统筹规划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对区域内的港口、机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整体布局和功能定位进行合理分工，综合协调和规划建设，以充分发挥区域内大型基础设施的战略功能，体现其战略意义。

一 建设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枢纽港群为中心的港口体系

珠三角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出口加工区，世界出口货物总量的50%集中在东南亚及华南，而这其中五成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由于国际间的制成品贸易大部分是通过集装箱运输完成，珠三角很自然成为中国集装箱进出口的主要地区。2002年，深圳、广州、珠海、中山等珠三角地区主要港口的年集装箱吞吐总量已经超过1000万TEU。据预测，到2010年，仅珠三角生成的外贸集装箱量将突破3000万TEU，2020年将达到4000万TEU。如果再加上与西南、中南等周边地区交通联系的疏通和改善而带来的大量内地省份外贸集装箱货流，届时珠三角地区集装箱运输市场规模将更加可观。

然而，珠三角是港口货运量最高的地区，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港口最密集的地区。由于行政区划上的分割和双重管理的现行港口管理体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的减弱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增强，使得港口业市场隔离，形成“地方割据”式的行政壁垒，导致珠江三角洲各港口之间愈演愈烈的“重复建设、盲目发展”的不良竞争。其表现之一是近年来各市竞相提出“以港兴市”战略，为了求得港口建设的重点投资，往往片面强调个体优势，从而掀起了地方色彩浓郁的盲目建港热，造成珠江三角洲地区过高的港口密度，战线过长，投资分散，且大量占用江海岸线，浪费深水岸线资源，货源组织、经营等方面相对比较混乱。表现之二是各港功能定位不明确，不少港口纷纷打出主枢纽港的旗号，谁都想成为“龙头老大”。表现之三则是各地竞相发展集装箱港口，造成箱源的分散和流向的不合理，并造成港口的资源与能力的大量闲置和浪费。为了改变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亟须根据区位条件和港口条件对珠江三角洲区内港口资源进行合理规划，明确功能，并制定相应保障措施，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层次清晰、干支衔接、功能完善、管理高效的港口体系。

具体的发展构想是：建设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珠海港和惠州港组成的枢纽港群，形成以香港港为中心，以深圳港、广州港、珠海港、惠州港为补充的一港带四港的华南国际集装箱组合枢纽港群，粤港联动，共同发展。

深圳港应重点发展为国际集装箱枢纽港。近几年来，深圳港发

展迅猛。2002 年深圳港货物吞吐量 8766.7 万吨，国内排名第八；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761.8 万 TEU，国内排名第二，世界排名第六。集装箱装卸是深圳港的强项，自建设至今已经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653.89 万 TEU，近 5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45%。集装箱码头的装卸效率和经营手段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已经有 34 家中外著名集装箱船运公司在深圳港挂靠，开辟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 69 条。深圳港具有良好的港湾资源，东西两大港区分别位于东西两段海岸线上。西部港区位于珠江伶仃洋的矾石水道东岸，水深港阔，具有天然的深水航道并可建深水码头，是我国少有的深水河口港湾。东部港区位于大鹏湾内，湾内水深 12～14 米，港区少淤，掩护条件好，是天然的深水良港，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华南地区大宗物资中转的理想港址。深圳港的基础设施已粗具规模，为港口的可持续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硬件条件。目前，东部盐田港区三期工程和西部港区深水出海航道——铜鼓航道工程已开始动工建设。深圳港口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包括陆域集疏通道建设，港口后方物流中心建设，出海航道及共用锚地建设，港口消防、港口航行安全监管等支持保障系统的建设，港口 EDI 系统的建设都已逐步展开。这些项目配套建成后，深圳港口的硬件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1996 年，国家又批准设立盐田港保税区。盐田港保税区的基本功能是为盐田港区的集装箱业务提供保税仓储，中转拆拼箱及必要的出口加工服务。港口保税区的启动，将使盐田港区具备加工出口、转口贸易、保税仓储三大功能，加快深圳港的集装箱运作机制向国际惯例靠拢。

广州港应发展成为以大宗散货中转为主目标，适当发展集装箱运输的综合性枢纽港。广州港是我国沿海枢纽大港，2002 年货物吞吐量达到 1.53 亿吨，在全国沿海枢纽大港中，排在上海和宁波之后位居第三。2002 年广州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217 万 TEU，在全国排名第五。广州港优势突出表现在腹地经济发达，货源充沛，港口设施的公共支持保障系统比较完善；有良好的公路、铁路和航空疏运系统；港口后域面积大，发展空间广阔；同时由于广州是华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信息中心，已初步形成了向国内国外两大扇面辐射的航运网络和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服务平台。

从发展现状来看，惠州港和珠海港都远远比不上深圳港和广州

港，2002年，珠海港货物吞吐量为2240万吨，其中集装箱33万标箱；而惠州港目前年吞吐能力只有160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只有20万标箱。但从长远来看，两者都有发展成为枢纽港的潜力。

珠海（高栏）港是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深水良港，位于珠江口最南端，距远洋航线最近；主航道水深达13.4米；港区规划岸线总长50.5公里；在规划期内重点建设南水、南迳湾作业区；到2020年高栏港区将拥有泊位42个，其中深水泊位32个，形成港口吞吐能力7150万吨/年。虽然珠江三角洲东岸与西岸地区因区位条件差别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西岸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东岸，但目前西岸的珠海、中山、江门三市的集装箱生成量估计已达到250万TEU，已有条件形成一个200万TEU的集装箱干线港。今后随着珠港澳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改善东西两岸的陆路交通条件，珠海将由陆路交通的末梢一跃成为门户节点，西岸将获得与东岸同样的区位优势。在香港、广州南北辐射的作用下，如果再加上西岸充裕的土地、良好的环境优势，有理由相信西部地区将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逐步缩短与东岸的经济发展差距。届时，珠江三角洲西岸的集装箱生成量将会大幅度提高，据预计，到2010年西部地区集装箱生成量将达到680万TEU，也即是说西部地区已完全有条件形成较大规模的集装箱远洋干线港。另外，珠海高栏港临港化学工业专区被列为国家“十五”期间全国18个大型化工基地之一，已成为珠海市和广东省重化工业发展重点。作为临港工业的重要依托，高栏港还必须为化工专区的发展提供充分的配套服务。有鉴于此，以高栏港为主体港区的珠海港，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应是以外贸集装箱和干散货、石油等大宗物资运输为主的综合性枢纽港。

惠州港虽然目前发展状况并不十分理想，但其同样是华南地区不可多得的天然深水良港。惠州港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是京九铁路南端最便捷的出海口，也与位于大鹏湾的盐田港相邻。目前惠州港已建成1万～15万吨级码头泊位5个，5000吨以下泊位13个，并已开通了至香港的定期货运航班，是粤东地区重要的油品、液化气集散地。随着南海石化项目的启动，并带动相关大型石化工业项目在区内的落户，惠州港依托石化工业基地，其吞吐量必将会得到飞速的增长。目前，惠州港的油气库容量已达63.3万立方米，在建和拟建的容量还有176.4万立方米；估计5至8年后，惠州港仅油气化工产品吞吐量就将达到5000万吨。因此，作为大亚湾重要门户

的惠州港，应建设成南中国海最大的油气中转枢纽港，专门为石化工业提供配套服务，与香港、深圳港分工协作，一起组成华南地区大型主枢纽港群。

除上述的广州港、深圳港、珠海港和惠州港以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其他中小港如虎门港、中山港、江门港、肇庆港等应发展成喂给港，以构成珠三角地区分工明确，层次分明，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的港口体系。

二　建设以香港机场、广州机场为中心的大珠江三角洲航空港体系

目前，珠三角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香港、澳门7个机场（其中佛山、惠州机场属于军民两用机场），是全国机场最密集的地区，在5个主要机场中，有4个拥有国际航班业务。从目前经营条件看，由于本地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商务、旅游等需求集中，机场客货吞吐量都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珠海机场除外）。但由于5个机场在空域上相当重叠，设计规模合计超过9000万人次，必然导致业务上激烈的竞争。为了避免过度竞争，造成资源的浪费，需要对区内主要机场进行统筹规划，以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功能明确，布局合理的航空港体系。具体的设想是：形成以香港机场、广州机场为枢纽，深圳机场、珠海机场为香港机场附属机场的民用航空运输体系。

1. 广州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除香港机场外最具有实力的一个机场。按国际航班计，它是中国第三大机场，机场跑道长3300米，能起降波音747这种大型飞机。机场非常靠近市中心——仅有6公里的距离。由于地方狭窄，联系城市及地区的公路交通不足，其发展受到局限。1990年，它是中国最大的客运机场。自1995年以来，因受到来自深圳、珠海机场的竞争，以及自身条件制约，其客运量增长趋势有所放缓，但它目前仍然是国内第三大客运和货运机场，2002年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1601.44万人次，机场货物吞吐量59.26万吨。

白云机场既不与铁路也不与海港直接相连，代替它的花都新机

场也是如此。将于2003年建成的花都新机场距市中心28公里，拥有3800米和3600米东西两条跑道，首期建设规模以满足2010年旅客吞吐量2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00万吨进行设计和建设。飞行区等级为4E，可满足B747和A340飞机等目前世界上各类大型民用飞机全重起降。航站楼及附属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客机坪86万平方米，可同时停放60架飞机，货机坪5.5万平方米，可同时停放5架大型货机。与旧机场一样，新机场将主要服务于华南地区的旅客运输，其多式联运设施有限。虽然随着客运量的增加，航空货运量也将大幅度增长，但是，它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港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广州机场的发展方向是综合性的国际航空枢纽港。

2．深圳机场

深圳机场于1992年建成，由于市场区域重叠，深圳机场的启用对于广州机场有明显的分流作用，但对香港的影响却不大，因为香港机场受独立航空地区、航空权和司法权的保护，这些权利即使在1997年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后，仍然得到《基本法》的保障。

深圳机场的跑道长3400米，能起降波音747飞机，它坐落在深圳西部河岸，距市中心32公里。深圳机场的优势有赖于其毗邻香港，能获得香港、内地之间的一部分客运业务。其航空货运量近年来随着客运量的增长也发展很快。2002年，深圳机场年客运量超过935万人次，货运量突破27万吨，已成为国内第四大客货运机场。但是，由于同香港赤腊角机场在空域上相当重叠，再加上两机场间便捷的水陆交通，深圳机场必须加强同香港机场合作，由香港机场注资入股，甚至是控股，以便进行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两个机场的合作对双方无疑是双赢，香港机场可以利用深圳机场运价和机票低的特点，在开拓内地业务时降低成本，而这也意味着通过联运、转运，深圳机场的货运量和客运量都会有大幅增长。因此，深圳机场发展方向应是香港机场的附属机场。

3．珠海机场

珠海机场位于三灶岛上，距市区31公里。机场按4E级ICAO标准规划、建设，其年处理能力为10万班次，年客运量1200万人

次，年货运量为60万吨。现有一条长4000米、宽60米的跑道，一条与其平行长4000米、宽44米的滑行道，在效果上接近建成两条跑道。跑道可以每小时37个起降频率起降747—400s飞机，并且可全天候24小时运行。停机坪占地面积27.7万平方米，靠近跑道有17个泊位，较远处另有4个泊位。目前的货运站占地面积2160平方米，年处理能力为3万吨。机场区面积很大，有11平方公里。现在停车场可容纳5000辆车。即使不再扩建、修造第二条跑道，如果现有航空处理能力的50%～100%能服务于货机，则每年可处理250万～500万吨空运货物。如果建成第2条跑道，其航班年起降数可提高到25万班次，机场货运量也会按比例提高。

由于多种原因，珠海机场目前运营状况很不理想。但凭借机场的区位优势和现有条件，以及便捷的对外综合交通网络，珠海机场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面向东南亚的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港。珠海机场应在立足于积极开发国内客货运市场的同时，争取成为对外开放的口岸，开放航权，探索与香港机场合作，以机场优质资产与香港机场共同开展航空货运业务，吸引国际航空货运巨头进驻，努力将珠海机场建设成为中国国际航空快递分拨中心，大力开发航空附属项目如民用飞机维修，借此盘活存量资产，提高经济效益。

三　调整港深珠澳大桥建设方案，重构大珠三角道路交通网络

路通，车通，财通。“广东制造”和“香港服务”的结合，是珠三角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根据测算，珠三角城市与香港的距离每减少1%，制造业、服务业中外资企业数量便分别增加0.6%和0.35%左右，制造业中外资投入金额增加0.4%～0.6%，服务业中外资投入的金额增加0.2%～0.7%。

国际贸易的经验表明，服务供应商多不愿意为3小时行程以外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国际性买家同样倾向于在3小时内到达卖家的厂房。港商多倾向投资于距本部仅3小时行程的厂房，3小时不能到达的地点，就会被认为距离太远，难以管理及经常到访。所以，大珠三角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充分考虑“3小时效应”。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珠江东岸的深圳、东莞、惠州与香港陆路相连，香港公司以及在港的外国公司的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流向这里，使其经济受益巨大、发展迅速，成为香港经济腹地。调查显示，港人跨境旅游，83%的人都是到深圳、东莞、广州；香港跨境的货运，90%以上来往深圳、东莞、惠州；跨境的客运，88%来往深圳、东莞、广州、惠州。而目前珠江西岸地区与香港之间隔有宽阔的珠江出海口，经济关联度相对较低。与香港的密疏关系，对珠江东、西两岸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形成了今日两岸经济的差距。20年前，珠江西岸的中山、珠海与东岸的深圳、东莞，在人口和GDP两方面旗鼓相当。如今，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多。在广东省工业企业50强中，深圳、广州、惠州、东莞就占了39席，而西岸则寥寥无几。

作为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高等级交通基础设施，必须与两岸公路网络中高等级公路衔接，同时还要考虑与珠江口港口、机场、发展用地等方面的联系，以通过大桥的建设达到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共享。因此，作为联系东西岸的交通基础设施必须考虑以下原则：要有利于东西两岸的平衡与协调发展；有利于区域基础设施的共享；有利于使珠三角西岸城市接受香港的经济辐射；有利于将香港、深圳置于交通网络的中心；有利于两岸产业的整合；有利于珠三角城市群的合理发展。在这些原则下还要考虑与两岸的交通网络良好的衔接，以尽量减少与城市交通的相互影响，最大限度发挥设施的能力为区域发展服务。珠江口未来可能建成的大桥方案有多个，由于在不同区位建设的大桥，甚至同一区位的不同方案对区域协调的作用都有很大差异，再加上大桥建设耗资巨大，因此，大桥的建设既要视区域发展的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还要对大桥的建设方案进行深入的研究评估，力求在功能上尽可能替代其他方案承担的功能。

香港合和集团胡应湘提出的港珠澳大桥“Y型”方案，是从香港的大屿山向南海延伸，在深水海域填海分别建两个人工岛，中间以海底隧道连接，在接近陆地时作“Y型”分岔，一条通往珠海，另一条接澳门。这座“Y型”桥预计全长29公里，静态投资预计为150亿港元，动态投资预计将达200亿港元。“Y型”方案可以大大促进粤西的发展，加强香港、澳门与珠海三方的联系，达到“三赢”的局面。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及利丰主席冯国经提出的“双Y”型大桥方案。首次将深圳纳入港珠澳大桥的范围，以达到“四赢”的局面。“双Y型大桥”比“单Y型大桥”长9公里，投资增加50亿元。

"双Y"方案较之"单Y"方案具有下述几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沿海高速公路因此联通。建"双Y"，能一举两得，即不用另外建一座深珠大桥就可以通过"双Y"联通沿海高速公路，再通过深圳连通广州，那么南中国海这个世界级的大城市带就名实相符了。第二，连接深圳可增加1/3的运量，光是大桥本身的效益回收就可以大大提高。(据有关方面预测，建港深珠澳大桥可使香港每年生产总值增加200亿港元，并提供2.5万个就业机会，若能使珠江西岸地区与东岸地区的发展差距拉近1个百分点，广东每年的GDP可增加数百亿元人民币、出口增加数十亿美元及吸引外资增加数亿美元。若把两个地区的GDP差距拉近12%，西岸地区每年的利益可增加200亿元以上。如果只建港珠澳大桥上述各种效益将减少25%左右)。深圳这么一个区域性的重要城市如果不进入"双Y"及整个大网络，那么不仅对深圳不利，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大珠三角形成一个整体对外进行全球竞争，最终可能是对港澳和珠海也不利。第三，沿海高速公路一旦因"双Y"联通，不但使大珠三角区域构成一个网络城市，还能通过高速公路联网，东可以经梅观高速和深汕高速一直通上海，西可以一直通广西。这样一来大珠三角就同时还是一个大枢纽、大中心。这在全球的竞争力就更强了。只有如此，才能共赢，才能使整个区域构成互为相通的网络，才有利于作为一个整体对外进行全球竞争，才有助于南中国海的世界级城市带的早日形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大的气魄和前瞻性，要在全球竞争眼光下考虑问题，我们的参照系应该是世界级的如纽约、伦敦、东京这些大城市带。而在我们内部，则要讲共赢，而不是独赢或部分赢。

粤港产业合作与发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在CEPA框架下，粤港产业的合作与发展应按照“前瞻性、全局性、务实性、互利性”的原则，在今后的10～20年内，努力将广东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香港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共同把“大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为实现上述目标，粤港要进一步推进两地资源的更充分整合，提升粤港“前店后厂”的合作水平。把广东的制造业、技术、市场、劳动力、资源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金融、管理、人才等优势结合起来，促进香港作为商贸物流平台与广东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整合，共同营造大珠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举的格局，提高整体国际竞争力，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一 审时度势冷静应对，抢抓机遇顺势发展

CEPA的签署，对广东而言是一次发展的重大机遇。粤港两地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本来就联系十分紧密，两地的经济融合与依存度已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经济共生带”，CEPA尽管面对的是整个内地市场，但广东仍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外省要抢走这个商机不容易；更重要的是，自改革开放至2002年底，香港投资内地累计逾1.59万亿港元，而这些港资的大部分投在珠三角。其中，香港回归6年来，广东实际利用港资543.9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实际利用港资的53%；香港在内地投资设厂6.3万家，其中的5.3万家在珠三角。而服务贸易包括银行金融、物流运输、律师、会计、咨询服务，等等，都是以制造业为依托的，制造业越发展，

服务业也就越发展，珠三角将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香港服务业在此地必大有可为。因此，除非出现特殊情况，香港服务业的大部分都会在“家门口”掘金而不会舍近求远跑到其他地方发展。然而，世事无绝对。必须清醒地看到，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广东当年有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优势，如今，全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在崛起，当年广东对外资独具的吸引力不再是优势，相反，国内许多省市还会用更大胆的改革，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便捷、高效的办事效率，更人性化的服务与广东竞争。因此，港商舍近求远去掘金的特殊情况不能说绝对不会出现，但竞争将会十分激烈，有些表现可能出人意料。在全国风起云涌争相发展的情况下，广东应强化忧患意识、先机意识，一定要把香港在第二次重大发展机遇中属于我们的商机，牢牢地抓到手。要达此目的，与香港接壤的深圳等珠三角地区尤其要率先抢抓机遇。因此，必须要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和判断CEPA对于香港的产业发展意味着什么，对于深圳等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又意味着什么，会产生什么效应，怎样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地去应对，去发展。

在大珠三角经济圈形成过程中，粤港之间通过建立以出口加工导向的产业基地的区域合作，在货物贸易、服务、投资等方面已成为重要伙伴，形成了紧密往来与依赖关系，经济整合格局事实上已形成，如果以CEPA为契机，用新的经贸机制和制度性安排去规范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那么整个区域合作和产业互动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各方的发展空间将会更大。

1. CEPA对香港产生的作用和效应

①将为香港的工商、服务业提供巨大的市场。从2004年1月1日起，内地将对原产香港进口金额较大的273个税目的产品实行零关税，2006年1月1日起，对273种以外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得益于中国内地市场的单独关税区经济体，香港工商界、服务贸易界亦由于实行零关税而获得空前博大的内地市场和发展空间，从而处于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

②香港的工业产业将得到进一步复苏。由于CEPA提供了大量的内地市场，将导致香港的产业复苏和就业增加，供销两旺的局面有望逐步形成。香港与内地将更有条件按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调

整经营的区域布局，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益。但绝对不会导致香港在内地的产业大量回流，特别是生产要素型的企业大批回流香港会有困难，这不仅是因为香港的生产要素价格太高，还因为香港已经形成了后工业化社会新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即是说，香港的留港企业处于或争取占领当今世界产业链的中上游，并作为珠江三角洲与内地企业处于世界产业链中下游的补充和提升，才能形成互补之势，香港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只有在现有的产业基础之上，通过提高产业的集约程度和科技含量，通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从而实现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③香港的服务贸易将通过 CEPA 大举进入内地。根据 CEPA 的安排，17 个行业将先于世界贸易组织许可的开放时间表进入内地市场，有的行业如建筑及房地产、物流、运输、分销、法律及视听服务方面，内地对香港的开放程度将超过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香港作为以第三产业包括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其服务贸易亦将由于获准进入内地市场而大有作为。

④内地人流将为启动香港消费和繁荣香港做出贡献。由于 2004 年 7 月 1 日前内地允许广东省居民个人前往香港旅游，特别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将大量进入香港，有利于拉动香港的消费、旅游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旅游业每增收 1 美元，社会综合效益增收 3～5 美元，引进外资相应增加 3 美元，每直接就业 1 人，就能为社会提供 3～5 人的就业机会。

⑤CEPA 成功签署对澳门具有示范效应。据有关部门称，内地有望在 2003 年 10 月与澳门签署 CEPA，其基本框架由三大部分组成，并争取在 2004 年初实施，使香港、澳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联动，这对澳门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利好。

2. CEPA 对深圳产生的作用和效应

①将使深圳重组本地市场的商品结构，对内地消费市场有冲击、有补充。但由于香港 85% 以上的制造业已经迁往内地，目前当地制造业的规模有限，又主要是名牌产品和高档产品，因此形不成对内地商品市场的全面冲击。

②人们的消费选择趋向多元化和高级化。预计深圳的消费品市场及相关市场由于香港地产商品的涌入，商品结构的内在有机构成将大幅度提高，有利于市场的消费选择，深圳人将可以十分方便地

买到香港的名牌产品，甚至买到更加价廉物美的名牌产品。

③有利于推进深圳的改革进程。CEPA要求在七个方面加强双方的合作，如通关便利化必然要求双方提高通关效率，建立双方信息通报制度，改进双方商品检验检疫水平，提高质量标准；如加强中小企业合作，中医药产业合作，对推动政府与企业的改革、管理都有益处；再如促进电子商务、加强贸易投资、提高法律法规透明度等均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改革进程，从而有利于降低双方的合作成本，提高双方的综合竞争力。

④带动深圳第三产业发展并提升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由于商品流通将刺激和带动大量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因此，深圳的物流业、商业、旅游业、地产业等第三产业将加快发展速度，从而有利于改变并提升深圳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有利于深圳向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推进。

⑤将强劲拉动深圳的经济增长。由于贸易自由化将会引发更加频繁的相互往来，使得CEPA必然涉及深圳的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将强劲拉动深圳的经济增长。这种发展趋势已经体现在深圳物流业的动向之中，如深圳的集装箱运输在2003年前五个月已经超过高雄港，增长的速度也快于高雄港。

⑥将大大提升深圳城市的国际化水平。由于深圳在香港与内地的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中首当其冲，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将迎来新一轮的外资投资热、商品贸易热和服务贸易热，由此而引发的“马太效应”将促成深圳经济新一轮的良性循环，加上香港的国际化人才大量进入深圳，将大大提升深圳的国际化城市的水平，加快深圳向国际化城市迈进的步伐。

3. CEPA对珠江三角洲产生的作用和效应

①由于香港经济辐射半径的力度不同，内地各地区各城市的购买力度不同，使得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在承接香港商品进入的时候，进口力度最大，购买力度最强，贡献比率最大，互补性最强，经贸合作关系也将最紧密。

②珠江三角洲二龙戏珠的“双核模式”将有望形成。珠江三角洲二龙戏珠的“双核模式”将在广佛都市圈和深港都市圈的强大中逐步形成，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广州不像上海对长江三角洲具有压倒其他各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区域辐射力和绝对优势，所以难以形成

一个龙头的格局；原因之二是由于珠澳都市圈经济总量相对弱小，目前还很难形成左右局势的气候，故三龙探宝的模式还有待未来发展。深港经济一体化是深港都市圈形成和稳固的基础，而深港都市圈又是珠江三角洲二龙戏珠“双核模式”形成的前提。

③有利于珠江三角洲的整体整合。由于CEPA有利于深港经济一体化，亦有利于形成深港都市圈。深港都市圈的金融、物流与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形成气候，广佛都市圈的重化工业、文化教育中心地位是历史的延续，加上深港都市圈的形成将与广佛都市圈的城市功能相错，城市功能相错与产业的非同构有利于珠江三角洲的整体整合、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④为深圳、珠江三角洲以及内地提供了兑现世贸承诺的适应期。由于CEPA中的若干安排，如对香港建筑及房地产、物流、运输、分销、法律及视听服务方面的开放措施，比较兑现世贸的承诺更加提前、更加宽松，这不仅有利于香港利用内地市场优先掘到丰厚的第一桶金，而且还有利于深圳、珠江三角洲以及内地为迎接兑现世贸承诺提前练兵，有利于应对国际跨国公司的一体化进入，并因此而赢得了一个适应期和缓冲期，既避免了来自外部的冲击，又合理地安排了内部的双赢。

二　以CEPA为新契机加快深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以此带动推进珠三角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促进大珠三角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应对WTO和CEPA，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推进深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以此带动推进珠三角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促进大珠三角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按照这一思路，我们提出，下一步深圳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积极推动与香港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资源整合、产业合作与合理分工，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建立适应国际化城市功能需要的新型产业体系，使深圳与珠三角城市群一起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生产基地，使深圳成为现代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采购、配送中心，以贸易和各类服务业来推动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实现这一目标既有助于提升深圳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档次，又可为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20 世纪 80 年代，深圳通过承接国际特别是香港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一些传统行业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钟表、玩具、箱包、服装、鞋、电话机、自行车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90 年代，深圳又抓住国际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剥离制造环节并在全球重新布局的历史性机遇，从低附加值的受托加工入手，迅速挤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高新技术产业得以起步和发展。现在，深圳的计算机、程控交换机、网络设备等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份额越来越大，成为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仍以加工组装为主，或者是在公知技术基础上的二次开发，拥有核心技术的高新技术产品不多，整个产业的附加值和抗风险能力较弱。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大力提高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对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努力实现从单纯的加工制造向加工制造与研发设计相结合转变，从依靠承接产业转移、接受订单向接受订单和用自己的核心技术组织生产、甚至给别人下订单相结合转变，从垂直分工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结合转变。因此，我们要在继续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高度重视原创性技术、工艺的开发，使深圳成为研发、制造、设计中心。具体说，一是从大力引进加工制造业入手，逐步向采购、研发延伸，实现加工贸易落地生根和升级转型。IBM 和富士康就是成功的典范。IBM 1994 年进入深圳，仅仅是进行计算机装配，现在已经在深圳形成个人电脑和笔记本生产链，并设立了采购中心、研发中心、软件中心和物流中心。2003 年将形成 200 万台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能力，主要销往亚洲和欧盟，出口额可达 20 亿美元，成为 IBM 在全球的重要生产制造基地。富士康 90 年代来深，从计算机接插器件开始，发展成精密模具、主机板卡和整机于一体的完整计算机生产加工商，以及游戏机、手机、光显示器生产商，2002 年出口 43.9 亿美元，2003 年可达 50 亿美元，并与英特尔和惠普成立了联合实验室。二是大力支持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华为、中兴拥有的专利占国内 IT 产业的一半左右。此外，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增强传统产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在服装、珠宝、钟表、家具、玩具、家用电器等方面和香港联手制造，增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

同时，紧紧抓住 CEPA 的机遇，积极开展与香港在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上的合作。随着CEPA的实施，香港有条件在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增值部分，实现较大的发展，双方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有助于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比如，双方应尽快着手研究深港接壤地区的合作开发问题，在深圳河河套地区划出1平方公里土地先行启动，作为双方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建设、共同管理的IC产业园和科技研发基地。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香港在引进国际高科技核心技术方面的有利条件和资本充足、市场机制完善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深圳和内地人力成本低廉、科技研发能力较强的优势，解决当前高科技产业缺“芯”少“魂”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珠三角地区信息产业链条，提升产业的档次和核心竞争力。再比如，深圳中小科技企业较多、创业资源比较丰富，香港服务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加强双方在创业投资体系建设方面的合作，既可为深圳的科技企业发展服务，也为香港的资本市场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香港在金融、法律、会计、中介等服务领域拥有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士，具有国际水准。要紧紧抓住CEPA实施后香港服务业将向内地扩张的机遇，加强两地服务业合作，优先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会展、中介和信息服务等六大产业，大力提升深圳服务业的水平，目标是要将深圳建成连接香港和内地的国际化服务中心。特别是要借鉴香港的经验，为生产者提供财务管理、咨询管理、IT管理、物料采购、研究开发、库存运输、生产运作等高水平服务。这一系列服务，将深圳打造成国际化城市，打造成支撑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全球供应链的管理中心，支撑深圳制造业的发展，形成第二、三产业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在金融业发展方面，从整个国家来看，金融领域的扩大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中央可以利用深圳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完备的优势，以推进深港金融合作为突破口，允许深圳先行先试，为全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积累经验。一是在全国整体利率改革框架下，允许深圳进行以贷款利率为主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具体来说，就是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水平，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自行确定具体的利率水平，同时相应对贷款利率浮动方式、计结息方式和加罚息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活跃金融市场，推进金融创新。二是允许深圳开办香港人民币现金回流业务。据香港金管局测算，每年

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的人民币现金总额约500亿元，但滞留在香港的人民币现金存量仅有13亿元左右，再扣减经合法渠道回流境内的人民币现金约300亿元，由此得出每年经非法渠道（如地下钱庄）回流境内的人民币约200亿元。因此，开办人民币回流业务，为人民币回流提供合法的渠道，非常必要。这不仅对于央行提高货币监管水平、准确掌握人民币现金投放、探索境外人民币管理经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相关外汇管理制度，促进跨境小额贸易发展，提升深港金融合作层次，提高两地金融服务水平，丰富金融业务品种，促进深港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增长。三是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2000年9月起，深交所暂停新股发行，但创业板迟迟未能推出，对深圳金融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创业板市场尽快启动，对于完善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目前，创业板市场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启动创业板市场的时机日益成熟。如果考虑到创业板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可以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在不改变现有证券市场法规、上市标准、发行审核程序和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将具有成长性及科技含量的中小企业集中到深交所上市。时机成熟时，将这些上市企业整体划归创业板。这样做有利于减少对现有市场的冲击，也有利于创业板平稳出台，发挥市场的整体功能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对深圳下一步证券交易市场的发展，还可以研究探讨深交所与香港联交所的合作问题。最近香港联交所提出愿与深交所在创业板层面上联合经营，即一家公司，经过一个审批程序后，可同时在港深两地的创业板分别以港币和人民币买卖。同时，积极推进深交所的股份化，这是证券交易所发展的一个方向，目前香港联交所已经股份化，如果深交所能够股份化，将有利于双方开展各项合作。这样符合深港经济一体化要求，也是建设一个国际化、开放型的证券交易市场的重要步骤，将对我国证券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外，为了配合深港金融合作需要，可以在深圳率先进行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于香港和境外证券市场）试点，一方面满足香港方面“北水南调”的愿望；另一方面为国内资本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进行探索。四是鼓励香港的中小银行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这样可以进一步完善深圳的中小银行体系，为深圳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广的融资渠道、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好的金融服务。同时，也促进香港金融服

务向内地延伸，帮助香港中小银行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物流业发展方面，进一步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联手香港共同打造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深港两地集装箱合计 2500 万标箱，占全球的 1/3。目前，深圳港口的承载能力已严重饱和。2002 年，深圳港集装箱年吞吐设计能力为 385 万标箱，实际完成 762 万标箱，能力缺口达 377 万标箱。据预测，到 2005 年、2010 年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 1200 万标箱和 1600 万标箱，加上目前深圳在建的泊位，届时深圳港集装箱吞吐能力缺口仍高达 375 万标箱和 775 万标箱。为了满足深圳集装箱运输快速增长的需要，应加快盐田港三期和大铲湾港区的大型集装箱专用码头的建设步伐，与香港港口形成合理分工和互为补充的关系，构建面向全国和东亚的批发市场。比如我们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已经很成熟，已经成为面向全国的市场。其主要做法：一是把我们的市场向城市居民延伸，建立配送中心和服务超市，目前在深圳已有 200 多家；二是向农村延伸，建立大型常年供应的基地，并形成以市场为龙头的产储运和信息、金融等服务一条龙的产业链，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三是向农村生产基地服务延伸，比如种子、肥料、农药供应和农产品拍卖技术标准服务等，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大市场、大流通有机结合起来，十分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此外，要抓住加入 WTO 的机遇，利用深圳港口的有利条件，建立大型汽车批发交易市场等。

在旅游业及其他服务业发展方面，共同开展深港旅游互动和海外联合推介工作，打造深港区域一体化旅游新形象。希望进一步放宽深圳居民赴港旅游、公务的政策限制，允许深圳户籍市民持个人身份证自由进出香港，促进深港两地人员的自由往来。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会展、信息服务、中介服务、社区服务等，开拓服务业新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

三　建立粤港新型经济功能区，进一步加速大珠三角经济融合发展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广东而言机会很多，但是策略要把握好。广东要更积极主动与香港整合，建立协调机制，协调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制度，同时一定要主动拿出一系列的服务业项目，开辟新的经济功能区。经过我们实地考察和多次邀请有关方面

专家研讨，我们提出在惠州的稔平半岛建立粤港新型经济功能区。初步设想为600平方公里土地，征用期为50年。新型经济功能区域内，一切香港特区现行的行政及司法制度仍然适用。它有自己的警察、执法队伍、消防及紧急救援部门、市政卫生管理机制及人员去维持治安、保护产权、保障食物与环境的卫生。在该功能区内，除了基本的即租即用办公楼及先进的配套设施外，一些预留地段可让跨国企业设计及兴建度身订造的生产建设。区内又设有保税仓库，储存未完税的高增值半制成品。配套的住宅区内更附设医院、学校、商场及社区中心。区内建渡轮码头，提供渡轮服务，直接往返功能区与香港的特定口岸点。

该功能区参照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具体项目给予相应的特殊政策，港人在功能区创业视同在香港，税收上粤港平分，充分利用香港市场、信息、资金、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优势，粤港合作共同开发。该功能区重点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不能只是制造业，服务业一定要进去。这样做可以解决内地的高科技人才，内地的研发机构能够流入；解决香港经济辐射功能能够有效支撑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要搭建高科技产业化平台，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是高科技产业，能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形成良性互补，提升国际竞争力，对“大珠三角”区域而言，具有现实发展意义。至少在三个方面，香港在搭建高科技产业化平台上的优势是无法取代的。首先是通过香港的融资途径，为企业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将来甚至可能上升为蓝筹股；其次是香港的市场，因为香港对国际市场的敏锐度是非常高的，而且非常方便，利用香港的人才市场，开拓整个全球的科技市场；最后就是香港的信息市场，是全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利用它，高科技企业可以更快更多地获得高科技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可能竞争“服务贸易特区”，广东动作要快，要抢先。如果广东不抓紧制定与更紧密经贸关系配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项目，上海将抢先，因为浦东已经被国家批准为服务贸易的先行试验区，而这次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服务贸易，浦东有可能向中央提出作为这次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服务贸易试验特区。广东千万不要坐失这次良机。

深圳的发展与香港的繁荣稳定

——大珠三角新一轮的经济合作焦点问题评述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圳如何定位发展与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深港及大珠三角新一轮的经济合作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CEPA的签署，它的意义就在于其所创造的结构模式开创了香港与内地特别是香港与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型关系。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总量增长以及区域市场专业化、多样化和一体化的形成，将对重构大珠三角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贸易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国际经验看，都市圈的兴起都会引发核心城市及周边城市和地区功能定位的调整。在日本东京大都市圈内，城市之间的定位十分明确：千叶为原料输入港，横滨专攻对外贸易，东京主营内贸，川崎为企业输送原材料和制成品。然而，目前珠三角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在于城市功能定位始终不是很明确。20世纪90年代，深圳、广州都率先提出要建成国际现代大都市，城市功能都向综合性发展，分工合作不协调，与香港的关系也不明确。而一个区域内真正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只能有一个，如果香港是中心，那广州、深圳就只能是次中心，不可能都问鼎世界级国际化城市。城市功能定位的不明确必然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在当前尤为迫切的是，必须重新审视深圳以及整个珠三角与香港的关系，准确定位，树立新的战略思想和实施正确的对策与措施。

一　从国际国内的战略高度去重新认识和把握深圳的定位，充分发挥深圳在大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深圳的定位，主要应循两条基本的思路。一条是“经济特区”的思路，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续保持和发挥深圳经济特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另一条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思路，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深圳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循着这样两条基本思路，就可以看到，深圳的定位不同于国内任何其他城市，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应该而且完全有可能发挥出独特的和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当前，深圳的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自觉地把深圳的发展放到实施“一国两制”、推进改革开放、落实东西部加快发展“两个大局”这三个国家战略中去考虑。

1. 从确保“一国两制”顺利实施的角度看，深圳应充分发挥作为香港最直接后方腹地的作用，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远发展

确保“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当初中央决定创办特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发挥作用。当前，香港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经济增长趋缓，失业率和财政赤字维持在高位，到2002年约有20多万个负资产家庭。1999～2002年香港的主要经济指标分别为：实际GDP增长率为3.1%、10.5%、0.6%、2.3%；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为3.2%、－0.6%、－1.6%、－3.0%；失业率为6.2%、4.9%、6.2%、7.2%。目前，香港周边的新加坡、台北、曼谷、吉隆坡等城市一直保持非常强的经济成长性，香港的亚太经济中心城市地位有所削弱。

香港的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及地位有所削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产业方面。香港与新加坡等相比较，其国际中转的功能明显不如别人，香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内地。在过去的20多年中，香港的制造业陆续转移到内地，特别是转移到珠三角地区，2001年末香港三次产业的比重达到0.1∶13.4∶86.5。香港在

借此成功实现产业转型之后，制造业出现“空心化”，而强大的服务业又由于香港与内地分属两个关税区等的限制，使其未能与珠三角、国内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了整个香港经济的发展。为此，中央做出了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实施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的战略决策，支持香港恢复经济竞争力，这将对香港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圳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一，深圳是香港进入珠三角和内地的重要“跳板”。实施CEPA，香港产品零关税、服务业进入内地以及贸易便利化安排，都涉及深港两地的衔接与合作。特别是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目前大规模北上的可能性不大。由于深港地缘上毗邻、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相似、人员往来频繁等原因，加上深圳服务业有较好的基础，深圳成为香港服务业拓展内地市场的首选之地。深圳主动应对CEPA，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进一步降低营商成本，对香港服务业拓展发展空间，将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从而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

第二，深圳是香港在大珠三角经济区城市群中发挥龙头作用的重要战略伙伴。进入21世纪，最有力的竞争将出现在大型的城市和城市群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扩大整体区域竞争力的最佳选择。而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中，龙头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香港就是大珠三角地区乃至整个华南经济当之无愧的龙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GDP总量，占内地和港澳GDP总量的20%，其出口总额占全球商品贸易额的4.6%。香港一直是珠三角地区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到2002年广东累计引进的外资中约70%来自香港，香港的企业在珠三角雇用的人数达到1000万～1100万人。香港和珠三角地区之间的贸易（包括经由香港的转口）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绝大部分，珠三角大约70%～80%的出口商品通过香港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时该地区80%的进口也经由香港。粤港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产业分工合作体系。下一步，香港要在大珠三角地区更好地发挥龙头作用，深圳不仅是珠三角连接香港的接驳口，更是香港带动珠三角、辐射华南、中南、西南地区经济的重要战略伙伴。

第三，深圳是内地通过香港出海的重要通道。香港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迅速成

为世界最具成长性的经济体，目前已拥有世界第一的外资吸纳能力和世界第六的外贸出口能力，中国经济已经而且必将越来越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多个连接国际走向世界的通道，香港、上海、北京等都是可以担当这样重任的城市。特别是香港以其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优越的区位条件、完善的市场体系、与国际经济的紧密联系、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更能发挥突出作用。今后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在“引进来”的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更好地发挥香港连通国际的作用，而在“一国两制”下，要更好地发挥这一作用，必须深港联手，深圳连通国内、香港连通国际，共同成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南方大通道、大门户。

第四，深圳是支持香港成为亚太经济中心的后方腹地。2010年中国将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融合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新的重要因素。而从地理区位上看，香港位于亚太主要航线的黄金中点位置；从城市功能上看，香港又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因此，香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中国与大中华经济圈，乃至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这对我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对强化我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但香港要真正实现上述目标，发挥上述功能，关键取决于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华南经济、整个中国经济的融合与合作程度。这其中深圳作为香港最直接腹地的支持作用非常重要，主要在于：香港和深圳经济同为外力推动的开放型经济，具有极强的动力同质性；在区位、港口等自然条件上具有共同性；香港国际化的服务业和深圳国际化的制造业具有高度的产业互补性；香港的资金、市场和深圳的土地、人力和科技具有高度的要素互补性；香港与深圳在经济制度、法律、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着制度资源的互补性。通过两地资源的有效组合形成深港经济体，可以大大降低营运成本，可以进一步提高两地市场化、国际化、产业化水平，可以全面提升两地竞争力，产生巨大的聚合和扩散效应。

总之，无论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远来看，香港、深圳唇齿相依，共存共荣。没有香港的发展，就没有深圳的发展；没有深圳更大的发展，同样也不能更好地促进香港的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

深圳要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继续发挥特殊作用，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做出特殊贡献。

2. 从我国加快改革开放的角度看，深圳应该继续发挥改革的试验场和开放的门户作用

2001 年以来，我国正式加入了 WTO，与东盟签署了“10 + 1”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最近又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安排。这一系列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重大战略转变：即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由行政审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以市场为主导的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以我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 WTO 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这无疑将使我国经济更广泛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而要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关键的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形成有利于对外开放的体制和环境。”深圳经济特区过去在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试验场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应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的进程中继续发挥探路示范作用。另外，在新一轮的开放中，按照我国加入 WTO 所做的承诺，一方面我们在获得进入他国市场的同时，要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逐步放开一些敏感领域，既有传统垄断行业，又有幼稚行业，还有一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说，我们在获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会对某些产业、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冲击，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应该说，在过去的 1 年多我们只是初步经受住了加入 WTO 的考验，随着 WTO 5 年过渡期很快结束，我们还将经受更严峻的考验。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怎样参与国际分工，怎样扬长避短，怎样适应国际惯例，不少领域都还存在许多未知的课题。为了更好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与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关系，客观上需要选择一些符合条件的地区率先进行探索，发挥试验田和示范区的作用，为全国积累更多的经验来防范和抵御可能的冲击、难以料想的困难。经济特区有这方面的条件和优势，更应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和使命。

3．从贯彻落实“两个大局”思想的角度看，深圳应该成为率先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为全国的发展特别是华南、中南、西南地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继续贯彻落实好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思想尤为重要。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指出的，新的历史时期，在促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同时，我们仍然要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不仅可以为壮大国家的整体实力做出更大贡献、为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提供更多支持，而且还可以为全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积累和探索经验。具体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可以带动整个华北、东北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可以带动整个长江流域，以香港、深圳、广州为中心的大珠三角经济圈则可以带动华南、中南、西南地区。就深圳而言，经过20多年的发展，深圳已成为东部地区很有实力、很有竞争力和很有发展潜力的重要城市；为深圳创造一些条件，加快深圳的发展，对于贯彻落实“两个大局”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可以使深圳在促进和带动华南、中南、西南地区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央和广东省委一直对深圳的发展寄予厚望。过去，中央要求深圳经济特区要发挥好“四个作用”，即：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的试验场作用，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的窗口和基地作用，在我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进程中对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深圳经济特区仍然要继续发挥好这“四个作用”，具体来说，深圳应成为：促进香港繁荣稳定、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经济中心城市的重要腹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的试验场；扩大对外开放、连接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户；辐射、带动内地特别是华南、中南、西南地区共同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

排头兵。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化城市，建设成为重要的高科技城市、现代物流枢纽城市、金融中心城市、海滨旅游城市、高品位的文化和生态城市。

深圳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好作用，实现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宏伟目标，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深港合作，促进经济的融合，实现深港之间政策上互动、产业上互补、市场上互融、发展上互利。深圳要充分认识香港的龙头地位和作用，主动接受香港的带动和辐射，成为香港发展的重要腹地。

二　拓展深圳城市发展空间，整合资源，进一步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大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进一步推进深港合作，促进香港稳定繁荣，必须对深圳的城市空间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拓展，以扩大深港的经济发展腹地。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在经济领域、城市建设、居民生活等方面迅速广泛融合，深港都市圈逐渐形成。仅以居民生活为例，近年来深港两地居民同城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随着深港两地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在深圳投资、工作和居住，深圳利用外资的60%来自港资，近儿年深圳商品房约10%由香港人购买，初步统计已有5万套。深圳已经成为香港居民休闲、娱乐、购物之地，每天往返深港口岸人数达25万~35万人次，节假日人更多。目前，深圳已基本没有可供成片开发的土地，深圳自身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制约，许多大的项目没地方安排，更不要说作为香港的腹地，支持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深圳人口的快速增长，特别是特区内过度拥挤，给城市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对深圳的城市发展空间进行战略性整合与扩展已迫在眉睫。城市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高度发展和高度繁荣的城市，其经济一定要有直接腹地的支持。美国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它只有930平方公里，其制造业只占GDP的9.2%，主要是服务业，它有强大的经济腹地，包括有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26个县，面积3.24万平方公里，金融和其他服务都集中在纽约。东京市区面积只有2187平方公里，但横滨和千叶成为其直接腹地，共同构成日本著名的京滨工业区，东京的工业产值居日本

全国第一，物流业也是如此，京滨和大阪两大物流带支撑了日本70%的经济发展。香港只有1100平方公里土地，600万人口，也极力想拓展发展空间。深港合在一起只有3000平方公里，约1500万人口，腹地显然太小。

土地资源的匮乏已经严重制约了深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圳地处香港和广州两个大城市之间，面积狭小，缺少经济发展的腹地。深圳的总面积为1952.84平方公里，只有上海的1/3、苏州的1/4、北京的1/8。19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所剩可用面积已十分有限，未来城市的国际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和布局，一方面需要提高和改善对土地的使用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扩大深圳的发展空间。

深圳市总面积1952.84平方公里，其中特区内395.81平方公里。全市规划可建用地760.69平方公里，剩余可建用地301.21平方公里。按目前的速度开发（每年约为26平方公里），大约还可以使用10年。深圳的成本费用已经很高，通讯支出和工业用电成本高于台北和汉城。更为突出的是，由于地域狭窄，目前深圳的地价已经比周边城市明显高出很多，可建用地的日益减少将不可避免地诱发整个营商成本的进一步上涨。从地理位置看，东莞的凤岗等三镇在地形上较深楔入深圳北部，给深圳整体的交通规划和城市建设带来不便。深圳与东莞、惠州不仅地理上山水相连，产业联系也相当紧密，但分别由不同的城市政府管辖，行政管理上存在的利益本位化，使经济社会难以形成相互协调发展。

深圳早期的发展具有粗放型的特点，土地规划与实际开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规模性的工业园区很少，工业用地的不足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瓶颈”，严重制约了深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综合分析并认真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我们初步提出拓展深圳发展空间的大、中、小三个方案：

方案一（小方案）：将东莞市管辖的凤岗、塘厦、清溪三镇和惠州市管辖的原惠阳市、大亚湾区、惠东县划归深圳。深圳市的总面积达800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44.2万人，使深圳GDP总量增加299.2亿元，达到2540亿元。

东莞市凤岗镇面积10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2.4万人，GDP总量约14.2亿元；塘厦镇面积13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7.6万人，GDP总量约34.1亿元；清溪镇面积14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8.2

万人，GDP总量约21.2亿元。

惠州市的原惠阳市面积191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8.3万人，GDP总量约115.1亿元；大亚湾区面积26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5万人，GDP总量约15.1亿元；惠东县面积339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6.9万人，GDP总量约98.5亿元。

将上述镇、县（市、区）划归深圳有利于区域内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进一步扩大深圳的发展空间。

方案二（中方案）：将东莞市管辖的塘厦、凤岗、清溪三镇和惠州市划归深圳。深圳市的总面积达1359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06万人。深圳GDP增加595亿元，总量约为2834亿元。

惠州市现辖两区三县，面积1115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23.7万人，GDP总量约525亿元。所辖两区三县除龙门县外，均属珠江三角洲地区。惠州已建立了以电子、纺织、机械为主的支柱产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业已成为优势产业。其中TCL、德赛、麦科特、华阳等四家企业进入了广东省70家大型企业集团行列。惠州距香港很近，陆路只有70公里，水路47海里，可与深圳共同成为香港的腹地。而且，惠州的TCL和联想等大企业的研发和应用中心目前都已设在深圳，经济上两地已形成紧密联系。将惠州整个划归深圳，给深圳带来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增强了深圳对东部山区的辐射力，会更好地带动和促进粤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方案三（大方案）：将东莞市和惠州市划归深圳，深圳市的总面积达1557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418万人。深圳GDP增加1197亿元，总量约为3436亿元。

东莞市面积2465平方公里，人口589.8万，GDP总量约为672亿元。东莞已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以电子资讯产业为支柱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是国际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和中国重要的外贸出口基地。现代化的制造业体系中包括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食品饮料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将东莞和惠州划归深圳，形成大深圳，将对珠江三角洲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与香港联手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国际化经济区域。

上述三个方案各有所长，比较而言，第二方案优于第三方案，第三方案优于第一方案。我们认为第一方案扩展的面积较小，对深圳而言发展的战略意义不明显，同时还把惠州变得支离破碎，创伤

很大，不利于惠州的发展。第三方案虽然使深圳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加，总量上去了，与第二方案相比，虽然多了东莞，但新增的可用土地并不多，因为东莞所剩的可开发用地并不多。而第二方案在总量上和规模上比较适中，尤其是增加了较大面积的可开发用地，根据我们对相关地方的调查和座谈所反映的情况看，惠州是持赞成和支持的态度，但领导层有一定的阻力。东莞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有两种主流意见，一种是坚决反对，因为这样不利于东莞的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只划三镇不如全部划给深圳。综合利弊，我们倾向于第二方案。

提出上述方案基于如下理由：

深圳当前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正向生产性的服务业（如金融、贸易、物流、通讯、信息、咨询等）和高新技术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和优化，加工制造业正向周边地区转移，经济扩散和辐射的趋势和效应明显，区域经济、社会和行政资源的整合条件已经成熟。

首先，深圳城市的空间拓展有利于冲破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形成区域产业结构新的整合。深圳城市空间的拓展不仅有助于加快深圳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更有利于珠三角各城市间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城市功能上的联系和分工，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整合（如消除了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行政区划上的分割，将其连成了一个行政管辖整体，有利于海岸港口资源合理统一的规划开发），冲破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形成区域内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城市格局：北部以广州和佛山构成“广佛经济区”；西岸以珠海和澳门构成“珠澳经济区”；东岸以香港和深圳构成“深港经济区”。深圳扩容之后，一方面深圳和香港“一都两市”共同充当大珠三角龙头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和巩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大珠三角的资源整合和整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其次，深圳城市的空间拓展有利于加大深圳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辐射力，通过“贴牌效应”进一步带动周边落后地区的发展。国际化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强的经济辐射能力，深圳市要成为国际化城市，经济总量和经济区域的扩大就显得尤为重要。惠州等地划给深圳后，深圳在20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政策上、体制上的优势，将通过空间的拓展扩大到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贴牌效应”和品牌扩散效应，带动惠州等

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可以增加深圳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另一方面有助于区域内的企业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和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再次，深圳城市的空间拓展有利于港深之间优势互补共同构建新的产业基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和带动香港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进一步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在CEPA的前提下，深港边境必将进一步放开，深圳城市地域的扩大间接地加大了香港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回旋余地，缓解了深港两市由于区域狭窄而引发的城市功能矛盾，有利于解决香港营商成本过高的问题。深港之间可以利用扩容后的区域（惠州）共同构建新的产业发展园区，扩大高新技术产业、重化工业、港口及临港工业、制造服务业等方面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方面可以解决香港“有市场没产业，有项目没场地”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刺激和带动香港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进一步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

置身于珠三角区域经济带中的广东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一　城市经济：广东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

近年来，在广东的经济发展中，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迅速崛起，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互促进，使城市经济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目前，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化水平接近7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外贸进出口总额分别占全省比重高达69.7%、65.8%和93.6%（2002年）。珠江三角洲城市工业发达，有一批在国际、国内市场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企业、大公司，产业集中度高，产业配套能力强，其中电子通讯产品制造业和家用电器制造业具有世界级的规模。“九五”期间，珠江三角洲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都超过两位数，从各市近两年的实际增长和“十五”计划看，未来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如果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初步实现了工业化，那么未来20年，广东经济发展将有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发展的主线将集中于城市化，城市化将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国际国内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那些注重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地区，经济发展更具有主动性和可持续性。

当前全球竞争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大都市区之间综合经济实力的较量，需要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城市的发展。广东经济未来在国际和国内竞争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因素或条件的形成，一是取决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整体

经济实力；二是取决于这一城市群中产业的合理分工；三是取决于这一城市群与港澳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而这些因素或条件的最终形成，则需要有明确的、清晰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以及科学合理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近几年来，欧美各国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城市发展及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把城市功能定位及城市发展中产业结构的重新部署作为新一轮调整的重点。如美国的丹佛市就重新把该市的功能定位为“一高、二现代”（高新技术研发，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服务），把该市从“制造型城市”转型为“服务型城市”；日本的东京、大阪，韩国的汉城、釜山等城市也正在进一步地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城市间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城市之间重新洗牌，扬长避短，重新打造和提升“城市特色竞争力”。这种动态和趋势，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注意。面对世界经济发展这些新的动态，面对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厚积薄发、日益崛起的时候，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怎么发展？广东的城市发展及城市产业结构如何调整？广东能否保持并怎样保持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21世纪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战略部署，也直接影响到广东能否建设成经济强省和文化大省进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事关重大，涉及全局。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当今全球竞争，从竞争主体上看，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大都市之间综合经济实力的较量；二是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合作。这两者实际上代表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广东、珠三角的发展只有把目光投向城市、投向中国的大背景，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更为清晰的道路。

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称，国际上已经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带视为世界六大城市带之一。它们分别是：以波士顿和华盛顿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城市带；以多伦多、芝加哥为核心的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大湖城市带；以东京为核心的从东京、横滨到大阪的日本城市带，以伦敦为核心的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的英国城市带和以阿姆斯特丹、鲁尔区、巴黎为核心的西北欧城市带，还有就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带。目前，我国主要有三大都市圈，除珠三角、长三角外，“京津唐”都市圈已粗具雏形（以北京、天津长约百公里的辖区为轴心，以东西百余公里内的唐山、保定为两

翼)。这样在我国沿海地区将形成三大都市区，相互竞争，并肩发展的格局。由这“三驾马车”共同拉动中国经济起飞的态势正在形成。从近几年的发展看，虽然广东省目前在经济总量上仍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但在新一轮城市经济的竞争中，尤其是在城市体系内部的分工协作上，无论观念还是实践，珠三角都已经比长三角慢了半拍。珠三角城市带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都市圈雏形的经济群落，在整个发展思路和城市间的彼此定位上必须要有根本的变化。

首先，要改变过去那种“小国寡民、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城市发展理念，必须重新洗牌。即使是香港，也不能总是就香港本身来谈香港。试想一下，如果香港没有广阔的内陆腹地，没有业已全面形成的与内地的经贸关系，没有与珠三角在产业结构上的互为补充，没有一个大华南经济圈的意识，香港能有发展空间吗？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习惯于“无为而治”，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优势是很明显的，它体现了民间的创业特点，由此也形成了珠三角小城市的活力。但凡事都有两面，正由于政府是“无为而治”，虽然当初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但到了今天，随着改革的深化，就出现了很多的错位。当经济发展到需要用“有形的手”来调控“无形的手”的时候，需要“有形”和“无形”这两只手统一整合的时候，“无为而治”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它的种种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计划经济不发达，看起来是坏事，但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却是好事。自由放任是广东搞活经济的必经阶段，但绝非永远过程，更不能形成“无为而治万能论”。广东经济进入 90 年代以后，问题出来了，由于没有解决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政府调控乏力，产业结构失衡，社会普遍崇尚投机。因此，有人形容广东是强势民间、弱势政府，而上海和华东的情景则恰恰相反。

拿华东跟广东相比，也就是 10 年工夫，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长江三角洲长成了一个经济巨人。上海除了中央的强力支持之外，应该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背后还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比这两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个非常值得广东思考的问题，也是应该引起广东省委高度重视的问题。长江三角洲之所以后来居上，蓬勃发展，除了重视市场作用外，还充分发挥了“有形的手”的作用。今天来看，上海在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分工、生产力配置、

城市功能的定位上有许多值得珠三角思考的地方。

在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和城市体系的构建上，长三角的协调机制很值得珠三角借鉴，长三角现在已形成了一市两省（上海、江苏、浙江）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常务副市长、副省长每年都召开一次协调发展联系会，重大问题和矛盾当即拍板，当场解决。上海、江苏、浙江本来都是各自独立的省级行政单位，但现在不仅江苏，浙江，甚至江西，都想成为上海老大哥的小兄弟。这是为什么？这就涉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圈中各个城市和区域的定位和发展思路了。上海的城市定位已经非常清晰，就是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从而带动长三角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上海的辐射半径非常广泛，整个城市规划根据车程提出了四个半径的区域概念：一是半小时车程辐射区；二是一小时车程辐射区；三是两小时车程辐射区；四是四小时车程辐射区。所谓半小时车程辐射圈，就是以上海的人民广场为中心，辐射到上海各区的每个角落，上海市区之间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交通网络的布局都以此为依据；一小时车程辐射圈已经到了周边的苏州、嘉兴等地区；二小时车程辐射到南通、常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地；四小时交通圈已经包括了南京。这10年，上海围绕着这么一个区域的概念做城市规划，结果把整个长江三角洲都给规划进来，把长江三角洲7000万人口都给覆盖了。

还有广州与香港这两个中心城市，能否走出自我循环，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把大上海的发展思路对比大华南，如果我们真的能按照华南经济圈和国际城市群的思路来进行功能配置的话，很多问题便容易解决了。这时候，谁能够成为城市经济时代的心脏起搏器，谁就能够占据制高点。上海已经起到了长江三角洲心脏起搏器的作用，但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广州还不行，“能量”还不够，比香港还差一点，香港单独也不行，而广州与香港结合起来，这个区域经济的心脏起搏器就能发挥作用。香港就相当于上海的陆家嘴，而深圳、珠海就相当于浦东开发区一样，至于沿线地区的港口码头就相当于上海的港口。广东其他地区如珠三角地区的加工产业，就相当于昆山、苏州，如此一来，就构置了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关系，城市之间的功能定位都容易理清楚。

二　明确以经营城市为重点的发展思路

现代城市不但要求要建设好、管理好，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不是单纯的投入对象、建设对象和管理对象，而且是可供开发利用的主体。经营城市是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创新。

经营城市的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传播并受到关注。什么是经营城市？目前有不同的概括和解释。我们认为，所谓经营城市，是从政府角度出发，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城市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资源、人文资源等进行优化整合和市场化运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促进城市功能完善，提高城市素质。其中，自然资源主要是指城市的土地、山水、空间等；基础设施资源主要是指城市的电力、道路、桥梁、通信网络以及市政公用设施等；人文资源主要是指城市的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科技资源和政府资源等。由以上几类资源派生出来的资源还有信息资源、品牌资源、形象资源和注意力资源等，这些都是可供经营的城市资源。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城市经营资源的内涵和外延还将不断丰富和扩大，新的资源将不断被开拓和产生，经营城市的内容将越来越广泛。例如，有的城市原本一些似乎看来不值钱的城市空间，如果用新的思路去装扮它、运作它，就会改变原有的属性。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一切构成城市空间和功能的载体，无一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劳动。因此，城市是有价值的客观存在，是社会漫长发展中积聚的巨大财富，城市也是最大的国有资产。经营城市，就是要把城市有价资本要素进行优化组合，使静止的资产富于活力，通过市场化营运，从而达到资产增值，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城市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载体，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成为城市之间争夺的对象。城市的土地、公共建设等资源，开始从非经营性资产逐步转化为可经营性资产，市场配置城市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提高。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政企分开，引进竞争，对大部分的城市资源实行市场化经营，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城市普遍处在现代化发展的大规

模建设阶段，建设资金普遍紧缺。建设资金的来源既靠城市自身的积累，又靠引资借债。但是借债总是要还的，城市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负债不能超过GDP增长允许的尺度，关键在于实施“以城养城”，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选择。要通过对现有城市国有资产资源的重组、拍卖、租赁、转让、抵押、有偿使用、冠名等多种经营运作方式，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资产，筹措建设资金，加快城市建设，改善和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城市财富的节约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使城市更“值钱”。

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化便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都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即怎么从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过渡到今天的经营城市。建设城市大家都懂得，建设城市找市长，哪个地方修了一条路，哪个地方建一栋高楼，统统市长过问。现在有很多市长就喜欢搞政绩工程，动辄大兴土木、旧城改造，这是很初级的标准；中级水平就是在管理城市上比较到位，把一个城市搞得像一个花园，像辽宁的大连、山东的青岛，在城市管理和城市经营的探索上都很有特色；但是城市发展到了今天，更多的市长开始全面地考虑如何提高城市竞争力，使城市最大限度地增值的问题。这方面上海是一个范例。一个城市经营得好，其对资源的配置和周边地区的辐射力非同一般，小则带动周边的经济齿轮，中则形成一个大区域的首位性城市，大则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所谓的大上海引领中国，就是因为大上海把自身的城市经营当成一个龙头来做，结果带动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华南经济圈的广州、香港，还有深圳，中心城市，怎么经营好自己，怎么确立各自的角色分工，怎么在国际平台上形成你支持我、我支持你的互动格局，按照城市体系的构架整合起来，形成了重大的辐射效应是至关重要。

对广东的城市特别是国际城市和中心城市来说，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发展重点将是城市的信息化、知识化和柔性化。城市的信息是整个经济与社会的信息化，集中在城市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技术发展经济和社会。城市的知识化（学习型城市）是发展知识密集性的产业和服务业，使城市具有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城市的柔性化是指城市的政府和企业对外界变化的反应能力，这些对在经济全球化中形成自身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对广东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在现阶段，城市发展不再是单纯的发展

经济和产业，而是要为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珠江三角洲城市普遍存在的“工业立市”思路应该有所转变，在认识上要明确以经营城市为重点，明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发展的主角而不是配角。深圳、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建设经验证明，优良的环境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广东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方面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以联网、宽带网为主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为主的城市和城际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以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艺术活动中心为主的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以文物古迹和古城区为主的自然人文景观基础设施建设等。

城市的经营管理是广东城市发展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需要在WTO规则的要求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建立起透明、高效、精干、廉洁的政府管理体制。学习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营管理经验，尽快将广东城市的经营管理水平与国际城市接轨。

三　未来广东城市发展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广东经济未来在国际和国内竞争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因素或条件的形成：一是取决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整体经济实力；二是取决于这一城市群中产业的合理分工；三是取决于这一城市群与港澳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而这些因素或条件的最终形成，则需要有明确的、清晰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据此，我们认为，广东未来城市发展总的思路应当是：以建设广州和深圳两个国际城市和一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中心城市及一大批优长专业镇为中心，形成层次分明、功能协调的城市体系和差别化、个性化的城市产业结构，以城市建设、管理和产业优化为重点，提高、完善城市功能，整合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与港澳的关系，全面提升区域整体综合竞争力。

1. 在目前广东已基本形成的城市发展格局上，考虑建设四个层次的城市体系

第一层次是建设广州和深圳两个国际城市，主要抢占战略制高点和发展先机，为广东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打下坚实基础。作为国

际城市，应具有：①对世界经济有相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②集中了较多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经济组织，是国际资本集散中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控制和影响全球经济活动；③具有很高的经济开放度，通行国际惯例和国际法规，生产性服务业发达，具有快捷的高速市际和市内交通系统；④国际性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集散中心，国际性新思想、新技术、新体制的创新基地等。这应该成为广州和深圳发展目标新的定位。

第二层次是建设一批区域中心城市，主要是通过城市的撤并，整合资源，形成较强的综合实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可考虑把珠海与中山合并，组合一个实力强大的珠三角西部中心城市；这类城市主要有，珠江三角洲西部的珠海（中山）、江门和中部的佛山，粤东的汕头，粤西的湛江，粤北的韶关等。

第三层次是建设一批产业中心城市，主要建设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制造业基地，重点培育产业聚集、产业规模和产业配套能力，这类城市主要有东莞、惠州、肇庆等。其中珠江三角洲东部城市以电子通讯产品制造业为主，西部城市以家用电器制造业为主。

第四层次是建设一批优长专业镇，以制造业为主，主要进行某个或某几个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数目不一定多，要求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2．形成差别化、个性化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

经济全球化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广东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广东产业将主要根据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产业结构不一定要求全面，但要求有相当的规模、较高的专业化和相对低廉的成本。

在产业政策上，对广东各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应该一般性地提三次产业的比例要求，应根据不同层次的城市提出不同的产业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广东城市发展的产业政策总方针宜为：“快三稳一、二、三并重”，在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基础上，国际城市应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主要是生产性的服务业（如金融、贸易、物流、通讯、信息、咨询等）和高新技术的研发；区域中心城市重点是第二、三产业的平衡发展和综合配套，侧重第三产业，主要功能是对周边地区经济的带动和对周边地区产业的服务；产业中心城市和优长专业镇，主要发展第二产业，发展侧重点是产业的聚集和产业规模，

城市的部分服务功能应该由邻近的区域中心城市去完成。在另一层面上，应更多考虑区域整体发展而不是个别城市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电子通讯产品制造业和家用电器制造业形成世界级的生产规模，形成了产业连片的城市群，这是由国际产业分工和结构调整所决定的，正是由数个城市承接的产业规模形成了它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在产业政策上，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内部，东部地区主要侧重于产业的升级和优化；中部地区主要侧重于产业的配套和整合；西部地区产业（如家电制造业）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在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上，应有更多的引导，包括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这种实质性的引导。这种区域性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使广东经济更具有竞争力。

四　珠三角主要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布局

1. 广州：发展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强和巩固中心城市地位

①主要特征：广州已经成为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孵化和应用的重要基地；高新技术支撑传统产业的发展和转型，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第三产业发展相当快；发展都市型、知识型产业。②以交通运输设备的生产、机器设备的制造业、建筑房地产、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的制造业、电子通讯制造业为第二产业的支柱产业。③以金融保险、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交运仓储（物流）为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真正意义上的大企业较少；进一步处理好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服务业的档次不高。⑤对未来的发展的新规划：重振制造业的雄风，大力发展服务业（金融、保险、仓储、社区服务、商贸）；提升服务业档次；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电子、软件、移动通信、计算机外围设备）；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的辐射力，吸引更多大型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加快“一岛”、“一谷”、“一园”三大体系的建设，着力培育三大产品：移动通信、数字视听、集成电路；建设三大基地：软件、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光电子产业。

2.深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打造港口型城市

①主要特征：深圳高新技术园区是珠江三角洲最为成功的高新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其支柱产业；金融业发展受到一定的挑战；特区的政策优势已逐渐失去，城市地位有所下降。②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为第二产业的支柱产业。③以金融保险、商贸旅游、现代物流业为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难于吸引高级人才，与上海相比处于劣势；与香港的进一步合作进展不快。⑤对未来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规划：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和支柱产业。金融业为其另一支柱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谋求与香港进一步合作，提升城市地位；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带，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园区的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现代物流三大支柱产业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深圳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首先，是坚持创新的发展思路，形成发展现代国际港口大都市的新优势。所谓创新发展，就是要打破常规，努力开拓新的业务，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新优势：一是形成规模优势，加快建设和完善港口设施，提升港口等级；二是形成专业化服务优势，加快口岸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形成符合国际标准的港口服务系统，提供全方位、高质量、高效率的港口服务；三是形成城市和港口管理的体制、机制优势，以适应加入 WTO 后港口管理与运作的新形势。

其次，要坚持产业化、多元化的发展思路，使港口成为深圳经济的新增长点。港口不仅是国家对外贸易和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而且围绕港口所形成的临港产业是现代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战略的高度研究和重视临港产业的发展，确定临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重，并从政策上给予支持。

因此，深圳应该按照港口型国际化大都市的客观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从港口城市的规模化发展向港口城市功能的现代化发展转变，努力实现体制规范化、经济外向化、城市功能化、金融国际化、交通网络化、城建现代化、产业高级化，使各种功能互相配套、相互促进。按照这一要求，深圳就应该突出专业型国际化城市的功能，大力发展现代专业化服务体系，积极建设商业中心区和中心商务区，发展和拓展港口功能，突出传统文化旅游区，在经济战略性调

整、商业中心区和中央商务区的建设、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信息化、城市管理现代化等方面实现突破，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换代与港口城市功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以新的形象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本，带动深圳的全面发展。

3. 惠州：加速国企改革，走集团化发展道路

①主要特征：坚持“工业立市”的方针和“抓拳头、创名牌、搞集团、增效益、通网络”的发展思路；五大集团企业成为其经济的主要支柱，集团化优势明显；高新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占工业的半壁江山；培育交运仓储、信息服务、社会服务业为三大支柱产业；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②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电器机械为第二产业的支柱产业。③第三产业重点发展旅游业。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中小企业发展欠佳；旅游业有待进一步规划和发展；农业薄弱、第二产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滞后；难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不高。⑤对未来发展的新规划：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和电器机械；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纺织服装、食品饲料、建材；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培育国际性跨国公司；以大亚湾为龙头，惠阳、惠城区、仲恺高新区为中心，博罗、惠东为两翼，龙门为后部的发展规划；以数码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为经济支柱；培育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

4. 东莞：打好城市、外贸、民营三张牌，建国际制造业名城

①主要特征：乡镇一体化的、新兴的加工制造型工业城市；以电子、机械、服装、塑料、化工为主的外向经济；高新技术、电子信息产品尤其是电脑资讯产品的配件的生产在该市集中度高；民营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②第二产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机械电器制造业、服装、塑料、化工。③第三产业重点发展商贸旅游、餐饮业（尤其是酒店业）。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城市建设规划落后；环境污染较严重；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旅游资源不足；第三产业层次不高。⑤未来发展规划：把东莞建成“国际制造业名城”为特征的现代化中心城市；产业重点放在制造业、商贸、科技信息服务等；建成中心区和高新技术区；建设著名的大学科技城；努力实现信息化、工作化、城市化；打好城市牌、外贸牌、民营牌；实现

三个转变：加工型城市转化为现代中心城市；依靠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提升第三产业，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速城市化进程；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环保技术产业，重点发展生物制药和软件产业。

5. 珠海：兴办大学城，发展高新技术，突出三产优势，建立和发展港口工业和物流业

①主要特征：大办工业，尤其是高附加值工业；大力开发旅游项目；大办大学城，高校产业化经营；高新技术产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奖励高精尖人才，力图在技术难关上有所突破，力争每年在国家科技进步奖上获大奖；科技兴市，科技兴农；已培育一批大中型企业。②第二产业重点发展集成电路、印刷电路、电子通讯设备、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石化原料及制品。③第三产业重点发展交通、通讯、仓储、商贸和餐饮。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人气不旺；工业基础欠缺；招商引资力度不够；劳动密集型企业比重大；欧美发达国家在珠海投资少。⑤未来发展规划：做好五大功能区和三大基础的规划；大办大学园区、大办实业；以软件、电子通讯、化工、生物制药、三高农业为五大支柱产业；加快休闲度假、海洋海岛旅游开发；产业以电子信息、计算机软件业、生物医药为主，重点扶持和发展光机电、新材料；重视技术攻关项目的突破；以高栏港的建设和发展启动临港工业和物流产业发展。

6. 佛山：重点加快信息技术、光机电一体化、智能化家电等产业的发展，其中顺德要以制度创新为依托，努力打造“家电名城”

①主要特征：乡镇企业发达，体制优势明显；传统家电制造业继续保持支柱地位；初步形成以高档家电、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制药为主的产业结构；高新技术、电子信息发展较快。②第二产业重点发展家电、电子通信、食品、纺织、金属制品、家具。③第三产业重点发展旅游和传统服务业。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工业结构单一，过分依赖传统家电产业；城市化水平滞后；引进外资不足；人才奇缺；政策引导功能不强；中小企业管理不完善；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不高；工业品以消费品为主，附加值低；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较小，层次不高；工业分散，土地利用率低。⑤未来发展规划：形成以高档家电、电子通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制

药为主的产业结构，继续保持家电的支柱地位。加速城市化进程，大良、伦教、容奇改镇设区；整合现有工业区和工业用地、合理调整工商业布局；发展文化、水乡、工业、农业、购物、美食等项目的旅游；全面推进“青山、碧水、蓝天”环保工程；大力发展高档家电、电子通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制药；抓好专利工作、保护知识产权；强化企业为主体的技术产品开发机构；政府加大科技投入。

此外，中山市要加快特色镇的建设和发展，以电子信息、食品饲料、医药工业、包装印刷、金属制品、纺织制衣、家具、建材为支柱产业；规划和发展一区（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园（民营科技）、三基地：健康医药基地、精细化工基地、包装印刷基地。江门市要发展侨乡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旅游业发展，继续搞好江门台商工业区和高新技术工业区。肇庆市要应用高新技术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肇庆市要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改造食品材料、机械仪表、纺织服装、林产化工等传统产业。

五　以华南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群建设为中心重点，将现代物流业培育成新的支柱产业

港口经济在广东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广东是外贸大省，90%以上的外贸货物是通过港口集装箱运输完成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出口加工区，自然成为国际集装箱进出口的主要地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70%的国际集装箱处理量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受到土地、交通和营运成本的制约，发展空间有限，珠江三角洲港口群必然要承担起发展远洋集装箱运输的功能。

随着珠江三角洲和整个华南地区集装箱货源的大量生成，华南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群的建设已迫在眉睫，其战略定位应当是：以珠江三角洲为基础，以深圳、广州、珠海为依托；以吸揽华南、西南地区箱源直接进行远洋运输为目的；以物流中心为载体，集国际商品、资本、信息、技术等集散于一身的多功能的新型港口群。

当前，应积极建设深圳、珠海和广州集装箱深水码头，以此为枢纽和节点，发展现代物流业，将其培育成为广东省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东、西、中联动，梯度发展的格局。

六　重新整合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与港澳的关系

为适应国际经济形势发展，香港和澳门正在对各自城市和未来发展方向重新定位。传统的粤港澳关系正发生许多新的变化，香港产业的一些上游和下游部门如设计和营销正在向珠江三角洲转移，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也正在向珠江三角洲扩展，港澳和珠江三角洲旅游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热点，很多方面都需要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当前特别需要对粤港澳经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交通运输为主的基础设施的衔接、有关人员的进出等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和规划。

七　主要政策建议

建议成立省一级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发展领导机构，对珠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进行研究、规划和协调，当前主要做好几项工作：一是粤港经济自由贸易区的规划，在区域范围上，在考虑深港关系时，也应注意到珠澳关系，考虑到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发展；二是珠江三角洲物流规划；三是对港澳服务业（金融、保险、贸易、旅游、运输）开放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研究；四是加快完善珠江三角洲综合交通体系规划，重点是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和建设；五是尽快明确珠江三角洲远洋集装箱港口布局。

区域核心城市比较分析

国际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

——近十年北京与上海空间发展管理体制的比较分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　黄士正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上海与北京相继提出了建设国际城市的目标。90 年代的 10 年间，在国际城市的建设中，两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空间迅速扩张，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城市功能结构和功能布局急剧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背景下，上海和北京的城市发展始终伴随着制度的变革、政策的调整。源于实践的制度与政策创新往往是在一些大的发展项目的建设中取得突破的。本文主要通过上海浦东和北京中关村两个案例的分析，对两市近 10 年空间发展的制度变迁做一回顾和比较；简要介绍上海与北京国际化战略的提出，分析两市不同的区域发展基础和制度环境；以上海浦东和北京中关村为案例，分析城市发展中管理体制的变革；通过分析对北京今后的政策导向提出建议。

一　建设国际城市的战略定位与区域发展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产业的带动下，世界经济出现了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金融国际化和世界生产向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地区全面转移。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80年代，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90年代初，上海、北京等中国大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国际性中心城市的目标。

1. 上海开发浦东和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战略定位与发展背景

上海，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远东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1978年以前，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1/3～1/4。80年代，随着4个沿海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80年代的10年间，上海GDP占全国的比重从7.1%下降到4.1%。上海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早在1983年，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有关学者就提出上海向多功能中心发展和开发浦东的建议。1986年，国务院在对《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从1986年到1988年，上海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探讨上海的发展和浦东的开发。1990年4月，中央做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定。随着浦东建设的启动，对浦东和上海战略定位的认识也逐步深化，1992年最终形成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即以浦东的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战略定位。

2. 北京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战略目标与发展背景

浦东的开发、开放实际上打破了在8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思想禁锢；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大城市开始参与世界城市体系中国际中心城市的地位竞争。在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中国的大城市开始重新审视中长期战略规划。

北京，中国的首都，第二大城市，有800多年（1153年金中都

起）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走了一条与上海同样的工业化道路。到70年代末，北京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重工业基地。80年初，中央书记处对北京的建设做出了四项指示，明确提出，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发展要适合首都的特点，今后基本不再发展重工业。1983年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确定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两个中心”的城市性质。80年代，北京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但城市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要不要发展经济和怎样发展经济”。80年代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为北京的发展展现了新的前景。

1991年北京开始重新修订总体规划，1993年国务院批复实施。重新修订的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1995年，北京进行了新一轮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战略规划。

3. 京沪两市战略定位与制度环境的比较

从京沪两市国际化战略目标的表述看，上海的“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是明确的功能定位，北京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定位并不明确。从战略措施上看，上海一开始就有大规模新区开发的国家战略支撑，北京则没有。

这种差别，一方面反映了在90年代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中，上海与北京的战略地位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透视出，在国家的制度架构下，北京与上海有不同的制度环境。北京作为首都，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上海则有相对宽松的自治空间。战略地位的不同，导致北京CBD的建设比上海陆家嘴的开发晚了将近10年。不同的制度环境，也使得北京与上海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制度变革有不同的路径，北京的改革比上海有更大的难度。

二　新区建设中的制度变迁：浦东与中关村的比较

1. 浦东开发、开放中管理体制的演变

开发浦东，是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所著《建国方略》中提出的

设想。1949年以后，上海曾多次提出和讨论浦东开发。90年代初，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开始实施。浦东最初的规划控制区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靠浦西老市区，面积约350平方公里（1992年扩大为522.7平方公里）。

在90年代的浦东开发中，浦东的行政管理体制做过三次大的调整，从管理体制上看，浦东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①1990~1992年。浦东350平方公里的规划控制范围内，含三区两县：南市、黄浦、杨浦三区和上海县的部分地域，以及川沙县全县。开发初期，为了快速起动建设和实现在体制机制上的转变，上海市在浦东新区建立了行政协调的管理体制，即原有的三区两县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变；设立浦东开发办公室，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对浦东的开发建设进行总体构思、组织协调；市各委办局凡有需要的，在浦东设立开发办（处）；设立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对新浦东区开发进行总体规划研究和设计。

这种开发建设管理与日常行政管理并行的管理模式，在浦东开发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保证了开发初期规划和政策设计的快速、高效。但传统的低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浦东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以后，上海市对开发初期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

②1993~2000年。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将黄浦、南市、杨浦三区和上海县的浦东部分，从原行政区划出，撤销川沙县，设立浦东新区。1993年初，成立了中共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和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新区工委为中共上海市委的派出机构，新区管委会为上海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新区管委会下设10个局办。新区不设人大和政协，由市人大和市政协派驻联络处。浦东新区的管理体制有以下特点：一是党政合一、政企分离；二是高级别、高受权，新区工委和新区管委会，均为副省级，享有计划单列市的权限；三是高度精简、统一。当时，上海市政府有100多个委办局，浦西的每个区县也有50个左右的局办。浦东管委会下设10个局办，800个编制，比浦西的区县减少了一半。

浦东新区的管理体制大体延续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模式。高级别、高授权，有利于突破旧体制的束缚，有利于争取和行使国家优惠政策；高度精简的政府机构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90年代浦东新区的高速发展，与这种精简、统一、高效的管理体制有很

大关系。

但作为经济转型和大规模开发期特定的产物，浦东新区的管理体制又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和“非正常”的特点。如新区政府对土地开发和引资的过多控制；人治；党政合一而没有正常组织机构；在50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没有区一级人大、政协，形成体制“空白”。

③2000年至今。90年代后期，国家对浦东新区的优惠政策逐渐弱化，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基本结束。2000年，在浦东开发、开放10周年之际，上海市政府决定撤销浦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体制，正式建立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浦东新区行政管理体制回归到正常的政治架构。

从90年代初的行政协调、大规模开发期的特区管制，到90年代末的行政回归，浦东新区管理体制的演变，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因为在体制的变化中，资源配置的基础，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不断市场化的过程。

2. 中关村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与上海浦东不同，北京中关村的最初发展带有自发性。中关村科技园是在80年代“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80年代初，中科院的一些科研人员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批科技民营企业。80年代在西北郊的中关村地区，科技民营企业不断聚集，自发形成了电子产品“自由市场”的“电子一条街”。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以中关村为核心的西北郊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高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90年代末，试验区重组为“中关村科技园区”，重组后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一区五园”(海淀园、昌平园、丰台园、电子城、亦庄园)，形成了环绕北京中心城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带”。2000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建设，在海淀园的中心区动工兴建科技园区的商务功能区——“中关村西区”。从管理体制上看，中关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①1988～1997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设立初期，建立了以区为主的管理体制。试验区设立办公室，作为海淀区政府的派出机构。1992年北京市又批准设立了丰台和昌平两个科技园区。1995年经国家科委批准，丰台和昌平两个科技园区划入试验区范

围，形成了“一区三园”的格局。三个园区仍由各区管理。

②1997～1999年。1997年，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即“大管委会”，建立了“一区三园”统一的管理机构。大管委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但主要工作是统计、协调，三个园区仍以各区县管理为主。

③1999年至今。1999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市和科技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中关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北京高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电子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园区划入中关村科技园区。至此，中关村科技园区形成了“一区五园”的格局。新的中关村科技园的管理架构，分为三个层次。上设由北京市、科技部、教育部组成的中关村科技园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一位副市长任主任，北京市相关委办局的负责同志兼办公室成员。办公室同时又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管委会，各园区是管委会的成员单位。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协调、联络、信息咨询、推介和研究。五个园区中亦庄科技园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城由北京电子工业集团管理，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由区县管委会管理。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管理架构和办公室的管理职能看，这是一个北京市与中央部委，市区职能部门与区县政府间“协治”的管理模式。“协治”[①] 近些年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园区管理中引入“协治”的管理模式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

3. 浦东与中关村的比较

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北京中关村的建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城市国际化进程中两个成功的案例。90年代的10年间，浦东的GDP增长了13.3倍，年均增长21.3%，浦东新区GDP占上海全市的比重上升到19.8%。中关村90年代末，技工贸总收入1679亿元，上缴税费总额61.6亿元，对北京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

---

① “协治”（governance，也译为“管治”），指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通过谈判签订双边协议，解决合作中的利益关系，并形成法律文本，通过联席会议或其他组织形式，履行协议，形成法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关系。

上海浦东和北京中关村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典型。

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靠高起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吸引外资，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中关村则自发起步，利用本地资源，培育民营经济，从渐进积累到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中关村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比浦东晚了将近10年。

从管理体制的演变看，浦东的开发，大体延续了改革开放初期特区的模式，组建高级别、高授权的派出机构，在强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下，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利用优惠政策，集中开发、集中建设，实现短期内的超常规发展。在完成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以后，新区的管理体制回归到“常态”的体制架构。中关村，则在原有的体制架构和自然形成的市场环境下，由当地区一级政府派出低级别的服务、协调机构，整合区域资源。随着园区的扩张，出现了市区两级政府双重协调，地方政府与中央部门协治的复杂的区域治理结构。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中关村是在原有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浦东有更复杂的区域背景。

三 结论与建议

90年代初，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标志着中国的大城市开始参与世界城市体系中“中心城市”地位的竞争。90年代以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以“国际城市”为目标的城市建设和功能调整，伴随着我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伴随着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和大规模的新区建设。在这一进程中，城市空间发展的管理体制不断变革和创新。如果说上海浦东的“特区”制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城市空间发展管理体制的一种普遍的模式；北京中关村重组后的“协治”则代表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城市空间发展管理体制变革的一个新的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初期，靠划定一定区域，采取强政府和优惠政策导向的“非常态”的特区治理模式将逐渐淡出。通过“协治”，整合区域资源；通过“协治”，解决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协治”，吸引外部投资，将成为在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空间发展管理新的制度选择。

“协治”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不同利益主体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利益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当地居民，等等。“协

治”就是通过协商、谈判，解决（行政体系下不能或者很难解决的）不同利益主体间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形成一种超越行政体系的特殊的法制化的秩序，“协治”谋求的结果是“双赢”。

不同于行政的等级体系，“协治”不存在金字塔式的科层结构。因此，行政级别对等，不是“协治”的原则，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是平等的谈判方。

“协治”对于区域背景复杂的北京来说，尤其重要。因此，中关村重组后的治理模式对于今后处理空间发展中北京市域内各区域之间、北京与周边省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处理地方与中央各部门、中央驻京单位的关系都有借鉴意义。

城市空间扩展与区县一级的区域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协治”要充分发挥区县一级的积极性，发挥区县一级政府在协商、谈判中的主导作用。把“协治”机制和制度的操作层面建立在行政级别较低的区县一级，实际上有利于避免行政权威的不当干预；有利于建立超越行政体系的法制化的秩序，解决那些行政体系下不能或难以解决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参考文献

万曾炜、袁恩桢等：《透视浦东 思索浦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鲍　克：《中国开发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

张京祥：“试论中国城镇群体发展地区区域/城市管治”，《城市问题》1999年5月。

张京祥：“城市与区域管治及其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城市问题》2000年6月。

京、津、沪、穗、渝制造业的成本比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施昌奎

为了进一步振兴北京的现代制造业，完善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市委、市政府决定重点解决制造业投资成本偏高的问题，特别是降低制造业的土地成本，以吸引外资来京建立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为了弄清北京制造业的成本状况，我们比较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等城市制造业的直接成本，并对北京制造业成本偏高的成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进而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一 京、津、沪、穗、渝制造业的成本现状

从京、津、沪、穗、渝制造业的土地、劳动、用电和用水四个方面的对比数据上看，北京制造业的直接成本明显偏高。

1. 北京制造业的土地成本偏高

北京制造业的土地成本，无论是从基准地价和土地使用费上看，还是从土地拍卖价和高科技企业优惠价上看，其土地综合成本在全国都是较高的。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①北京、上海、重庆和武汉的土地基准价格比较。从北京、上海、重庆和武汉四个城市的优质地价上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城市中心区，从1级、2级和3级商业用地的加权平均价格上看，北京最高，上海次之，重庆第三，武汉最低；从1级、2级和3级住宅用地的加权平均价格上看，北京最高，上海次之，武汉第三，重庆最低；从1级、2级和3级工业用地的加权平均价格上看，上海最高，北京次之，重庆第三，武汉最低（详见表1～4）。

表 1　北京市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地价区类	出让金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		土地开发及其他费用		
	商业	公寓	住宅	工业	市政及四源	小区建设配套	城镇拆迁费	近郊区县征地费	远郊区县征地费
	(1)	(1)	(1)	(1)	(2)	(3)	(4)	(5)	(6)
一类	3200～5400	3000～4600	2000～2700	320～540	460～800	150～400	5900～7800	150～450	—
二类	2400～3200	2200～3000	1500～2000	240～320	460～800	150～400	5900～7800	150～450	—
三类	2000～2400	1800～2200	1000～1500	180～240	460～800	150～400	5900～7800	150～450	—
四类	1500～2000	1400～1800	800～1000	140～180	460～800	150～400	5900～7800	150～450	—
五类	1000～1500	1000～1400	600～800	100～140	460～800	150～400	5900～7800	150～450	—
六类	500～1000	500～1000	400～600	70～100	460～800	150～400	5900～7800	150～450	75～180
七类	400～500	300～500	150～400	30～70	460～800	150～400	5900～7800	150～450	75～180
八类	70～400	70～300	50～150	25～30	460～800	150～400	—	—	75～180
九类	50～70	40～70	30～50	20～25	460～800	150～400	—	—	75～180
十类	40～50	30～40	20～30	15～20	460～800	150～400	—	—	75～180

基准地价计算公式：(1) ×容积率修正系数＋［(2)＋(3)］×容积率＋(4)×调整系数＋(5)或(6)＝基准地价（每平方米用地）。

表 2　上海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土地级别	综合		住宅		工业	
	毛地	熟地	毛地	熟地	毛地	熟地
1	—	8798	—	—	—	—
2	—	6225	—	6225	—	7055
3	—	4565	—	4565	—	4565
4	—	3320	—	3320	—	2075
5	—	2324	—	2116.5	—	1369.5
6	1162	1660	1162	1660	332	788.5
7	913	1245	913	1245	290	581
8	664	—	664	—	249	—
9	456.5	—	465.5	—	215.8	—
10	332	—	332	—	182.6	—
11	166	—	166	—	149.4	—
12	滩涂待定					

表 3　重庆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级别＼用途	商服业	住　宅	工　业	级别＼用途	商服业	住　宅	工　业
1	7090	1650	1350	11	980	265	220
2	5880	1450	1200	12	650	230	185
3	4490	1050	980	13	450	190	150
4	3590	850	750	14	300	165	130
5	2950	600	550	15	250	150	120
6	2640	470	450	16	230	138	115
7	2400	410	400	17	200	126	110
8	1900	360	350	18	168	115	105
9	1600	320	300	19	132	106	102
10	1300	300	260	20	110	102	100

表 4　武汉市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级　别	1	2	3	4	5	6	7	8	9
商　业	6470	4250	2230	1530	1060	750	600	453	375
住　宅	2520		1910	1320	870	600	450	300	
工　业	375				270	225	180	150	

从优质地价上看，北京的产业用地价格与上海相比虽然还有一些竞争优势，但与武汉和重庆相比，北京的工业用地价格就太高了，北京工业用地价格是重庆的 3 倍，武汉的 10 倍（见表 5）。

表 5　北京、上海、重庆和武汉四个城市的优质地价比较

单位：元/平方米

均　价＼地　区	北　京	上　海	重　庆	武　汉
商　业（1、2、3 级土地加权平均价）	7750	6529	5820	4317
住　宅（1、2、3 级土地加权平均价）	5500	4703	1383	2316
工　业（1、2、3 级土地加权平均价）	3670	4565	1176	375

再从中等地价上看，北京的工业用地价格与上海相差无几，与武汉和重庆相比，北京工业用地价格还是太高，北京中等工业用地价格是重庆的4.2倍，武汉的6.5倍（见表6)。

表6　北京、上海、重庆和武汉四个城市的中等地价比较

单位：元/平方米

均价＼地区	北京	上海	重庆	武汉
商业（4、5、6级土地加权平均价）	2930	2434	1966（7、8、9级）	1113
住宅（4、5、6级土地加权平均价）	2130	2365	363（7、8、9级）	930
工业（4、5、6级土地加权平均价）	1470	1411	350（7、8、9级）	225

从劣等地价上看，各个城市之间的土地价格差距并不太大。这说明在城市郊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不明显的（见表7)。

表7　北京、上海、重庆和武汉四个城市的劣质地价比较

单位：元/平方米

均价＼地区	北京	上海	重庆	武汉
商业（最后3级土地加权平均价）	350	321	136	475
住宅（最后3级土地加权平均价）	310	321	107	350
工业（最后3级土地加权平均价）	205	182	102	150

②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的土地使用费比较。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五个城市的对比数据来看，按照土地使用费用标准的高低进行排序：上海第一，北京第二，天津第三，广州第四，重庆最低。其中，上海旧城区的土地使用费用综合标准比北京要高出10%左右，但上海浦东新区的土地使用费用综合标准却比北京低50%。这说明上海的浦东新区制造业土地使用费用与北京相比是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

北京和上海的土地使用费用标准在全国可以说是最高的，以北

京为例，北京的土地使用费用标准是天津的8～9倍，广州9～10倍，重庆18～20倍（详见表8）。

表8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的土地使用费用标准比较

单位：元/平方米·年

城市 \ 地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海(不含浦东)	一般工业	100	90	70	30	20	12	9	6	3	—
	高新企业	80	65	40	2	5	4	3	2	1.5	—
上　海(浦东)	一般工业	70	30	20	10	7	5	3	—	—	—
	高新企业	35	20	5	3	2.5	2	1	—	—	—
北　京	工　业	—	70	35	20	15	12	10	8	6	5
天　津	工　业	15～30	7～10	5～8	3～5	2～4	1～3	0.5～2	—	—	—
广　州	工　业	8～12	6～10	4～8	2～6	—	—	—	—	—	—
重　庆	工　业	3～6	3～6	1.6～2.6	1.6～2.6	1.2～2.2	1.2～2.2	—	—	—	—

③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土地拍卖价格比较。为了让大家对土地拍卖价格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们选择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四个城市中具有一定可比性的土地拍卖价格进行比较。北京以众人关注的广渠门五块土地拍卖价为例，上海以长宁区仙霞西路土地拍卖价为例，天津以河北区金钟路土地拍卖价为例，深圳以大梅沙土地拍卖价为例。

表9　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可比土地拍卖价格比较

城　市	区　位	面积(平方米)	成交价(万元)	单价(元/平方米)	中标人
北　京	广渠门	487800	315889	6476	广州富力
上　海	仙霞西路	34154	7430	2175	上海友谊
天　津	金钟路	33840	6411	1895	天津骏达
深　圳	大梅沙	268000	40599	1515	深圳万科

从表9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土地拍卖价格对其他城市来说几乎是天价。北京同等区位的土地拍卖价格是上海的2.9倍，天津的3.4倍，深圳的4.3倍。

④北京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用地优惠价格比较。以北京海淀区工业用地优惠价格为例，与产业配套能力极强的“珠三角”相

比，工业土地价格也仅仅低5%～10%左右，这个优势恐怕难以弥补其他方面的劣势，也引起不了产业界的瞩目（见表10）。

表10　北京海淀区与“珠三角”地区工业用地优惠价格比较

地　　区	北京海淀区	广州市区	江　门	惠　州	佛　山	珠　海
价格（万元/亩）	30	33.3	16	30	36	38.7

再以科技园为例，天津开发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用地价格进行大幅度地调整，其降低幅度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是史无前例的，最低地价降至每平方米10元，这个价格只相当每亩6666元，完全是一个象征性的地价（见表11）。

表11　北京、天津和珠海高科技企业用地优惠价格比较

地　　区	北京丰台科技园	珠　　海	天津开发区
价格（万元/亩）	30～10	5.3～10	2～0.66

2．北京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偏高

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来说，吸引跨国公司进驻本地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跨国公司人员的工资进行一下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对我们了解三地的劳动成本，从而比较三地的竞争优势是有帮助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2002年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跨国公司非制造业员工年薪的状况。

根据全球第二大员工福利研究机构美国翰威特咨询公司的调查，2002年北京、上海、广州跨国公司非制造业员工年薪北京最高，上海次之，广州最低。

从地区比较来看，跨国公司非制造业一般员工的平均年薪，北京与上海没有什么差别，上海比广州高25%；专业人员北京比上海高17%，上海比广州高10%；高级经理北京比上海高5%，上海比广州高5%。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看2002年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跨国公司

制造业员工年薪的状况。

根据美国翰威特咨询公司的调查，2002 年北京、上海、广州跨国公司制造业员工年薪广州最高，上海次之，北京最低。

从三地比较来看，跨国公司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薪广州比上海高 20%，上海比北京高 25%；专业人员的平均年薪广州比上海高 24%，上海比北京高 18%；高级经理的平均年薪广州比上海高 10%，上海比北京高 9%。

对非制造业来说，由于北京是中国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金融、法律、信息、设计、咨询等服务业人才需求的数量大、层次高，所以，非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北京聘用服务业人员的成本也就相对比国内其他城市高出一些。同样道理，上海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又比广州要高，所以上海非制造业跨国公司员工的平均年薪也就比广州高（见表 12）。

表 12　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跨国公司非制造业人员工资比较

单位：元/年薪

人员 地区	一般员工	专业人员	高层经理
北　京	50000	70000	400000
上　海	50000	60000	380000
广　州	40000	55000	360000

对制造业来说，情况正好与非制造业相反。由于广州制造业在全国几乎是最发达的地区，机电、电子、热处理等各类制造业工人和技术人员需求量也相对大，所以，制造业跨国公司人员的薪酬水平相对来说也是全国最高的。而上海的制造业发达程度又比北京高，所以，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平均年薪上海也就比北京高（见表 13）。

表 13　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跨国公司制造业人员工资比较

单位：元/年薪

人员 地区	工　人	专业人员	高层经理
北　京	20000	55000	270000
上　海	25000	65000	290000
广　州	30000	80000	320000

3. 北京制造业的用电成本偏高

制造业是用电大户，所以，一个地区工业用电价格的高低对发展制造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北京的电力主要靠外省输送，工业用电比较紧张，而价格也相对较高，这对北京发展制造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表 14　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综合电价比较

单位：元/千瓦时

综合电价 \ 地区	北京	天津	上海	广东
商业电价	0.68	0.530	0.742	0.803
普通工业电价	0.53	0.478	0.557	0.425
大工业电价	0.385	0.349	电炉铁合金 0.291	0.31
			电石 0.286	
			合成氨 0.291	

从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四个地区综合用电价格来看，北京的工业用电价格是最高的。其中，普通工业用电价格上海最高，为 0.557 元/千瓦时，比北京高出 5%，比天津高出 16%，比广东高出 32%。但从大工业用电来说，北京最高，达 0.385 元/千瓦时，比上海高出 34%，比天津高出 10%，比广东高出 24%（见表 14）。

4. 北京制造业的用水成本偏高

水务成本包括上水和下水两部分，上水成本直接体现在工业用水价格上，而下水成本则体现在污水处理费用上。从全国大中城市来看，下水的成本差异不大，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上水上。

从全国大中城市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工业污水收取的集中处理费用一般是都在每立方米 0 .6 元左右，地区差异性不大，所以，我们对制造业的下水成本不做更多的分析。我们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上水成本上。

首先我们粗略地了解一下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的水价情况。

表15　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水价比较

单位：元/立方米

城市＼用途	工业用水	商业用水	生活用水	城市＼用途	工业用水	商业用水	生活用水
北　京	3.20	3.20	2.30	郑　州	1.80	2.50	1.60
上　海	1.10	1.10	0.88	武　汉	0.88	1.44	0.62
天　津	2.40	2.60	1.80	长　沙	0.99	1.48	1.62
重　庆	1.93	2.68	1.67	南　宁	1.02	1.53	1.00
石家庄	1.65	1.65	1.13	成　都	1.60	2.15	1.20
呼和浩特	1.30	2.50	1.10	昆　明	1.25	1.55	0.85
沈　阳	1.60	2.40	1.40	兰　州	0.85	0.95	0.55
长　春	4.17	4.17	2.00	乌鲁木齐	0.95	1.45	0.85
哈尔滨	2.20	3.85	1.30	广　州	1.47	1.80	1.00
南　京	1.80	2.20	1.45	贵　州	1.25	2.00	1.20
合　肥	1.21	1.80	1.10	西　宁	1.25	1.41	1.045
福　州	1.23	1.48	1.23	海　口	2.30	2.30	1.10
南　昌	0.95	1.50	0.86	银　川	1.10	1.20	0.85
济　南	2.10	2.10	1.75	拉　萨	1.40	1.40	1.00
西　安	0.86	2.50	1.50				

从表15中我们可以看出：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水价普遍较高，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水资源短缺所致，如北京的工业用水为3.2元/立方米、天津为2.4元/立方米、济南为2.1元/立方米。另外，工业发达地区的工业用水价格也略微偏高，这主要是由需求拉动造成的，比如说南京、长春、福州和海口，这些城市的工业用水价格分别达到了每立方米1.8元、4.17元、1.23元和2.3元。

接下来，我们要对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四个城市的水价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出这四个城市在水务成本上的差异。

表16　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水价比较

单位：元/立方米

地区＼用途	工业用水	商贸用水	生活用水	地区＼用途	工业用水	商贸用水	生活用水
北　京	3.2	3.2	2.3	上　海	1.1	1.1	0.88
天　津	2.4	2.6	1.8	广　州	1.47	1.8	1.00

从表16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北京的工业用水成本最高，达到每立方米3.2元，差不多是上海的3倍，是广州2倍多，比天津高出33%。

在这四个城市当中，如果单以工业用水成本一项指标来衡量，上海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其次是广州，第三是天津，北京是最没有竞争力的。

二　北京制造业成本偏高的成因分析

从制造业的土地、劳动、用电和用水四个方面的对比数据上看，北京制造业的直接成本偏高。下面，我们将对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和机理做进一步的探讨。

1. 北京制造业用地成本偏高的成因

造成北京制造业用地成本偏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土地供不应求，“炒卖”抬升了土地价格。特别是在住宅用地价格暴涨的刺激下，产业用地价格也跟着节节攀升；二是政府提高了土地的基准地价标准；三是土地的交易方式发生了变化。土地拍卖的交易方式逐步取代了协议转让的交易方式；四是缺乏优惠的产业用地政策。

①北京土地供不应求，“炒卖”抬升了土地价格。自2000年股市降温、而房地产升温以来，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大中城市的房地产就成为主流资金的“主战场”。北京“申奥”的成功更是激发了北京房地产开发的热情，各路“诸侯”纷纷抢滩北京，这就造成了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在巨大需求的刺激下，土地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抢手货”，价格因此也一路飙升。

北京的土地来源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城镇危旧房改造。掌握在各区县手中，主要是用来招商引资；二是各委办局系统自己占用的土地。各单位自己有权招商进行第二次开发；三是小区开发。掌握在大的开发商手里，如望京、方庄、南磨房小区；四是新征土地。基本由各经济开发区掌握；五是近郊一些乡镇拥有的土地；六是中央在京单位拥有的土地；七是城市建设产生的大量绿化隔离带。各区也可自行规划开发。

从土地的来源看，北京的土地供应并不存在统一集中的供应机

制。按照经济学上的竞争规律，这应该更加有利于平抑土地的价格，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多头供应土地的局面并没有起到竞争的作用，反而成为“炒卖土地”的“温床”。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想从中牟取自身的利益，在自身不具备开发能力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多次转手”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二是北京人素有“八旗作风”。即使有了土地，他们也不愿意自己开发，而是采取更为省事和简便的“炒卖地皮”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北京土地价格越炒越高。

②土地基准地价大幅提高，迫使土地协议转让价格上升。2002年12月，北京市国土房地局推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改革后首次更新的基准地价。在这个新的基准地价标准中，土地共分为十个等级，其中商业、综合、居住用途的一级最高土地价格分别达到了每平方米9750元、8250元和7000元；而最低的十级则分别只有140元和90元。中关村、奥林匹克公园、亦庄、西红门等区域土地级别较前有大幅跃升。土地基准地价的提高实际上是提高了土地协议转让价格的底线，从而使得那些低于基准地价的交易成为非法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抬高了土地的交易价格。

③土地交易实行拍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土地价格的上扬。在土地奇缺的情况下，土地拍卖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扬。

④缺乏统一的产业用地优惠政策是造成制造业用地成本上升的最重要原因。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城市，一般都有统一的用地优惠政策。比如说在深圳，1991年深圳市政府就颁布实施了《深圳经济特区协议用地地价标准及减免的规定》，对高科技工业项目用地减收土地出让金10%～50%；对用地单位一次交付地价款有困难的，可向市国土局提出申请，经批准，可分期交付地价款，分期期限1～3年不等。再拿珠海来说，市政府规定：对一般工业用地，每平方米的地价在236～700元/平方米，即每亩地价在15.74万～46.69万元之间，比商业和住宅用地价格低50%左右；对高新科技工业项目地价更加优惠，每平方米地价平均水平在80～150元/平方米，即每亩5.3万～10万元之间，这只相当于商业和住宅用地价格的1/6。

北京尽管也有一些关于高科技企业用地方面的优惠政策，但都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政策优惠条文，这是北京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一

个最大障碍。在各个区县和各大科技园里，优惠政策五花八门，相互掣肘、无序竞争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还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总之，北京制造业用地价格的上扬除了受土地“卖方市场”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以外，恐怕与前几年政府对制造业的不重视也有一定的关系。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制造业被认为是夕阳工业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那时，制造业不仅没有优惠的用地政策，而且还要为其他行业“让地”、“腾地方”，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现在，好在我们及时地认识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我们的政府也在想方设法地为制造业开辟新的场所、拟订新的优惠政策，这不能不说是北京制造业又一次腾飞的机遇。

2. 北京制造业劳动成本偏高的成因

根据美国翰威特咨询公司的调查，2002 年北京、上海、广州跨国公司制造业员工平均年薪分别达到了 2 万元、2.5 万元和 3 万元。

虽然说北京的制造业员工工资没有广州和上海高，但是，北京是中国服务业非常发达的城市，金融、法律、信息、设计、咨询等服务业人才需求的数量大、层次高，聘用这些人员的成本比广州和上海等其他国内城市要高出很多。所以说，北京的综合劳动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造成北京制造业劳动成本偏高的原因是北京较高的消费水平所致，这些高消费主要表现在住房、交通和通信等方面。根据美联社近期的一个统计，按照国外生活水平来衡量，北京的生活费用已经高过汉城，次于东京、大阪，大概排到了第四位。

3. 北京制造业用电成本偏高的成因

从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四个地区综合用电价格来看，北京的工业用电价格是最高的。其中，普通工业用电价格上海最高，为 0.55 元/千瓦时，比北京高出 5%，比天津高出 16%，比广东高出 32%。但从大工业用电来说，北京最高，达 0.385 元/千瓦时，比上海高出 34%，比天津高出 10%，比广东高出 24%。

另外，北京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工业用电并非排在首位。在用电高峰期，工业用电是没有优先权的，所以，这也是北京发展制造业的重要“瓶颈”之一。

造成北京制造业用电成本偏高的原因有二：一是电力成本太高所致。我们都知道，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为了保证北京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在北京周围地区一般不发展以燃煤为主的大型火力发电厂，北京的用电主要是从内蒙古等省区输入。虽然说这些坑口电站的发电成本很低，但运营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北京的电价自然也就低不了。二是北京的电价结构不合理。在广东和上海，商业用电价格与工业用电价格拉开了差距，工业用电价格比商业用电价格低许多。比如说，上海的商业用电价格是0.742元，而工业用电价格平均只有0.4元左右，差距达到0.34元之多；广东的商业用电价格是0.803元，而工业用电价格平均只有0.36元左右，差距更是达到0.45元之多。再看看北京，北京的商业用电价格是0.68元，工业用电平均价格达0.45元，商业用电与工业用电价格的差距只有0.23元。从电价结构上就可以看出，广东和上海对工业用电的支持力度比北京要高许多，北京不合理的电价结构一方面说明政府在用电上没有给予制造业应有的优惠待遇，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以稳定为中心的北京，提高商业用电价格而适当降低工业用电价格是有巨大阻力的。

4. 北京制造业用水成本偏高的成因

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这种短缺直接反映在用水价格上。从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四个城市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北京的工业用水成本最高，达到每立方米3.2元，差不多是上海的3倍，是广州2倍多，比天津高出33%。

造成北京制造业用水成本偏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北京水资源的短缺。北京亟待开发新的水资源：南水北调是一个途径，但成本不会太低；营造北京周边绿化带，涵养水源也许是一个更为经济的方式。

三 降低北京制造业成本的对策

1. 降低制造业用地成本的对策

①完善政府土地储备制度。完善政府的土地储备是调控土地市场、平抑土地价格、优化土地配置最有效的途径。粮食市场中有句

俗语叫“口袋有粮，心里不慌”，说的是有了粮食储备，就不怕粮价上涨。对城市土地来说也是这样，政府有了土地储备，就不怕土地价格的暴涨；政府手中有了土地，就可以进行合理地调控，以保障那些需要发展的产业用地需求。

土地储备的源头工作是土地的收储。土地的收储不等于土地的收容。我们在储备土地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科学的土地评估工作，做到科学决策、合理储备。土地储备的后续工作是土地用途的优化配置。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经营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在经营土地的时候，不能光顾眼前利益，把土地仅仅作为财政增收的途径，谁的出价高就卖给谁，而要考虑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土地的优化配置，带动产业的发展，这才是最有效的土地经营策略。

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的土地储备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这些城市对建设用地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储备、统一供应“三个一”，即：一个渠道进水，政府统一征用、收购和回收土地；一个池子蓄水，政府统一储备土地，并对其进行整理，根据规划要求，进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使土地得到更好地再开发、再利用；一个龙头放水，政府统一供地，调控土地市场的供需，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有计划地把土地投入市场，使土地市场秩序根本好转。

北京也应该借鉴上海、杭州和广州的土地储备经验，形成自己的“三个一”：统一管理、统一储备和统一供应。当然，要实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北京的土地来源是相当分散的，这些分散土地的使用单位既有中央单位，也有地方单位，还有军属单位，要把这些单位的土地统一集中起来，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项工作又不能不做，因而，北京的土地储备工作首先应该从北京市属单位做起。

②制定产业用地优惠政策。北京海淀区对产业用地价格实行统一限价政策，将产业用地价格控制在每亩30万元以内，这比原来的平均价格降低了60%。深圳对高科技工业项目用地也采取了减收土地出让金10%～50%的措施，对用地单位一次交付地价款有困难的，还可分期交付地价款，分期期限1～3年不等。珠海市对高新科技工业项目地价也采取低价政策，每亩地价控制在5.3万～10万元之间，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土地平均价格的1/6。天津开发区对高新

技术产业的用地价格更是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最低地价降至每平方米 10 元，这个价格只相当每亩 6666 元，完全是一个象征性的地价。所有这些做法看起来是损失了一些财政收入，但从长远的目光来看，这种牺牲眼前利益、培养税收基数的做法，将来肯定会为各地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这比那些只顾眼前利益、“杀鸡取卵”的做法要高明许多。

北京市政府应该从以上这些做法中吸取更多的经验，从而制定出更加符合北京制造业发展的用地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控制制造业的用地价格，支持北京制造业的发展。在这方面应着重降低附着在土地上的各项费用，比如说，应该大力降低制造业土地基准价格中的市政及四源费、土地拆迁费和征地费。第二，降低制造业用地的初期投入，减轻制造业的初期成本压力。在这方面应该向深圳好好学习，应尽快实行土地按揭和分期付款的方式，这样就可以适当降低制造业的初期投入，减轻初期投入的成本压力。第三，改变土地的出让方式，给制造业以更多的选择权。在这方面应该给制造业以更多的选择权，比如说，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既可以采取租赁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作价入股的方式，还可以采取直接划拨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这样企业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选择符合自己实际需要的用地方式。

2. 降低制造业劳动成本的对策

劳动力成本主要由当地的消费水平来决定的，要降低当地劳动力成本的总水平一般来说困难极大，甚至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对降低某一类工种的劳动成本来说，还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对蓝领技工成本的降低就可以采取很多的办法。

蓝领技工是发展制造业的关键要素，这些工种主要包括：车工、铣工、刨插工、磨工、锻造工、焊工、金属热处理工、涂装工、锅炉操作工、机械设备维修工、装配钳工、汽车修理工、维修电工，等等。要降低这些工种的总体成本，可以采取的方式有：第一，大量引进异地老工业基地的蓝领技工。因为这些地区的蓝领技工业务和道德水平都很高，而对工资收入的要求又不是太高，所以，引进他们进入北京的制造行业对控制蓝领技工的成本增长是有好处的。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会对本地的劳动就业造成一定的压力，但这样做是必要的，北京只有制造业得到了发展，才能带动更多的就业。

如果在短期内通过引进异地蓝领技工能够吸引更多的制造业进驻北京，那么，这种牺牲短期利益而谋求长远发展的做法就是值得的。第二，大力培养当地的蓝领技工阶层。从技校抓起，形成大量的技工阶层，这样一来，技工的总体成本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

3. 降低制造业用电成本的对策

降低北京用电成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第一，要降低电力的采购成本和交易成本。山西、内蒙古等地都有大的坑口电站，在电力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可供北京选择的余地会更大一些，这样一来，北京电力的采购成本在将来有望大幅降低。在降低电价采购成本的过程中，对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是不容忽视的，电力采购要完全以市场为准，杜绝采购过程中的“人情电”现象发生。第二，要通过电价的结构改革来降低制造业的用电成本。上海和广东的做法就是拉开价格差距，适当提高民用和商业电价，大力降低特种工业电价，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降低了制造业的用电成本。北京也应该向这些地区学习，适当提高一些民用和商业电价，将提高所得的部分电价补贴到制造业中去，这样就可以大力降低北京制造业的电价水平。

4. 降低制造业用水成本的对策

北京是一个缺水城市，开源节流是水务的根本，但对水价来说，开拓更多的水源才是降低水价的根本，在开源上，北京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做文章：第一，依靠国家财力，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对北京来说至关重要，只要工程的投入在将来不进入水价，北京的水价就有可能降低。第二，依靠北京防沙治沙工程的建设，涵养北京水源。通过绿化工程，减少沙化，北京的水资源是可以得到进一步改善的。只要北京的水源增多了，水价也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第三，加强城市污水的治理力度，让更多的中水进入制造业。目前，北京的中水已经以每立方米 1 元的价格进入到一些行业中。但是，就目前而言，无论是从中水的提供量，还是从中水的利用率来说，水平都是不高的。将来，制造业的发展可以大量使用价格便宜的中水来进行，这就要求水务系统进行大量的管线铺设，做好中水的供应工作。

北京、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比较研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邓丽姝

北京、上海是我国经济、科技等综合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它们具有相似的区域经济地位、要素禀赋等经济发展基础。在国际经济、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它们都将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高、符合环保等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现代制造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力求成为各自所在的区域及我国的现代制造业中心。现代制造业逐步成为推动两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对北京、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现状、优劣势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认清形势，找出自身的长处和不足，并采取有效对策进一步促进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

一　北京、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概况

1. 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概况

北京的现代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工程与新医药产业、汽车产业及新材料产业等。在北京的现代制造业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占很大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中电子信息产业一枝独秀，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等产业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规模过小。在电子信息产品中，移动通讯产品又“一品独大”。北京现代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反映了其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发展潜力较大。

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以园区为主要载体，并初步形成了产业

集群。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电子信息产业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星网工业园的移动通信产业群等。北京的现代制造业集群呈现出价值链区域分工的雏形。市中心区、CBD、中关村科技园区日益成为制造业企业总部的集聚地，汇集了联想、方正等知名高新技术企业的总部；中关村科技园区特别是海淀园成为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基地和技术创新中心，集中了中科院、北大、清华等我国最具实力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并吸引了微软等一批国内外著名企业在这里设立研发中心；郊区县工业区逐步成为生产配套基地。在北京的现代制造业集群中，规模经济效应、协同创新效应、品牌效应等集群效应初步显现。

结合自身实际，北京确定了重点发展汽车、微电子、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新医药等四大产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四大基地、十大产品的目标，力求打造多个支柱产业和有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集群。

2. 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概况

与北京相比，上海的制造业基础较为雄厚。从规模看，2000年上海制造业（规模以上）完成工业增加值1611亿元，为北京同类指标的2.4倍。除职工人数以外，其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高出北京1倍以上。从效益看，2000年上海人均劳动生产率为9.61万元，远高于北京4.27万元的水平。较强的制造业实力成为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目前，上海已形成了电子信息、钢铁、石化、汽车、装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等六大支柱产业。与北京类似，上海的现代制造业也基本上以集群的形式发展。如汽车业，汇集了通用、大众等生产厂商，生产汽车齿轮、汽车饰件、汽车电子的协作配套厂商及生产摩托车的相关厂商，形成了垂直和水平分工协作的格局。上海致力于成为整车制造业和关键零部件制造业中心、研发设计中心、营销中心，通过培育具备更强大竞争优势的汽车产业集群来提升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再如生物医药业，以瑞士罗氏制药等企业为主体的上海张江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企业群体、以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等为主体的新药创新体系等日趋形成。上海正全力打造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园区也是上海现代制造业集群的主要载体。“郊区体现实力和

水平"，生产加工环节逐步向郊区特别是"1+3+9"工业园区集中。[①] 这些园区各项主要指标均占全市工业三成以上，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和发展的动力源。与北京相似，上海的园区也存在产业集聚程度不高、功能相近等问题。

外资对上海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00年，上海信息产品制造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工业总产值、利润等多项经济指标均占全市同类指标的80%以上。国际上一些知名企业的参与，带来了资金源、技术源和市场源，带动了上海现代制造业的升级。

二 两市对比，上海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1. 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区域支撑

①有力的区域支撑是上海现代制造业崛起的强大依托。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前缘，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密集带，区内各城市之间联系紧密，经济协作水平较高，是我国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对外贸易基地，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核心区。就发展现代制造业而言，长三角各地既有分工，又有协作，企业群密集，在上海周边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上海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巨大依托。

长三角各地存在层次分明、衔接紧密的发展梯次。上海处于工业化的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发展阶段，江浙等地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这就使上海的现代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与周边地区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达到优势互补。实践中，上海与区域的合作比较密切。从合作主体看，既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又有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还有江浙企业聘用上海专家、教授、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合作；从合作方式看，有以资产为纽带的相互参股、控股以及兼并的合作，有不改变产权关系的租赁、承包经营、委托经营合作，有上海向江浙提供信息、技术和管理的合作，有上

① "1+3+9"工业园区：即浦东新区、三个国家级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和九个市级工业园区。

海出品牌及相应的技术、管理，江浙出资金和劳动力的生产加工型合作，有以上海为销售窗口，江浙为生产基地的“前店后厂”式合作，等等。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上海周边地区积极实施“主动接轨上海、无缝对接上海”的发展战略，逐步成为上海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加工基地、协作配套基地。

同时，区域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优势资源也不断向上海集中。如江苏同创集团、春兰集团等或将企业的决策机构、营销中心、研发中心迁至上海，或兼并、收购上海的国有、集体企业，实现资产重组优化，共享上海的发展机遇。

在上海与其周边地区进行技术、经济的合作与分工过程中，区域内初步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产业带。上海因其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区域现代制造业的研发和技术创新中心、营销中心以及管理控制中心，占据产业链的高端地位。上海的郊区县和商务成本较低、工业基础较好的周边地区成为生产配套基地。优势互补、分工协作使上海与其周边地区形成合力、共同发展。

②区域支撑的缺位制约了北京现代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与上海相比，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区域支撑明显不足。虽然北京正逐步成为区域现代制造业的研发、营销中心和总部所在地，但生产制造、协作配套环节的薄弱成为北京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上海通过区域合作解决这一问题，而北京在郊区县、京津冀地区、环渤海地区等各个区域层次上都存在不足：虽然北京正努力在郊区县建设现代制造业的生产配套基地，但水、电等生产要素缺乏，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等不利因素制约了北京郊区县这一功能的发挥；对北京周边的河北等地来说，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限制了其对首都现代制造业的支持作用。与北京毗邻的天津，虽然工业基础较好，现代制造业也具有一定实力，具备与北京联动发展的客观条件，但主观上缺乏与北京分工协作的意识和主动性；而传统上，北京与环渤海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较弱。

由于缺乏有力的区域支撑，缺乏有效的生产配套，没有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使得北京许多研发成果在外地实现产业化，一些产业关联性较强的项目选择在上海投资，北京一些企业的经济效率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研发与生产不能有效互动，如此等等，都抑制了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

2. 现代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支撑

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相辅相成，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会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现代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北京、上海都是我国现代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比较而言，上海的金融、物流等服务业比北京略具优势，从而更有力地支撑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

上海已初步成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建成了以外滩——小陆家嘴地区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CBD，成为中外金融机构密集的区域。上海是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最多的城市，世界前50位大银行已有80%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并有16家外资保险公司、80多家外商投资性公司落户上海。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汇集了证券、期货等8家国家级要素市场、13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200多家投资性公司。这些机构为上海及周边地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灵活的政策也使上海具有较为宽松的金融环境。

北京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总部的所在地，是我国金融业的管理调控中心。同时，这里还聚集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等多家国内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在我国，北京的金融地位也是举足轻重。但由于作为首都的特殊性，中央的政策导向使得北京不能营造像上海那样宽松的金融环境，如在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等方面落后于上海。与上海相比，北京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功能稍显逊色。

现代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海略具优势的金融环境使得它在对现代制造业的资金支持等方面略具优势，从而增强了对产业投资特别是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此外，上海的现代物流业也比较发达，正规划建设外高桥、浦东空港、深水港和西北四大物流园区，并争取成为全球物流供应链中的重要枢纽性节点。这也是推动上海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3. 发展现代制造业的产业基础

上海是经济大市和老工业基地，相对完备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相对成熟的技术工人，浓厚的制造业产业文化和商业文化，都

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产业基础。同时，商务成本也是大城市发展现代制造业重要的基础条件。为降低商务成本，增强引资竞争力，上海启动了“173项目”，将位于市郊的嘉定、青浦、松江三区建成面积173平方公里的“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园区”，降低地价等硬性商务成本。同时提出将这里建成政府服务“高地”。如在青浦试点园区实行项目审批的“绿色通道”，一口保送、分段审批、限时办结、减少收费，使项目审批比一般情况提速三成。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制造业的发展几经波折，没有形成现代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完备、深厚的基础产业和产业文化，缺乏蓝领工人，商务成本也居高不下，这都影响到北京现代制造业的活力。

三　两市对比，北京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1. 现代制造业的研究开发支持能力

现代制造业的重要特征是科技含量高，并由此产生较高的附加值。因此，研究开发环节是现代制造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研究开发水平是决定一个区域现代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与上海相比，北京的研发实力较为雄厚，研发能力较强，从而使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从源头上具备了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潜力。

①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是北京现代制造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北京是我国智力、科技资源最密集的地区。拥有国家级科研机构400多所，高等院校60多所。2000年，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26.1万人，这些人员大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20.6万人，占78.9%。拥有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600多人，占全国两院院士总数的50%以上。这些战略资源使北京有实力进行主动型的自主开发，实现源头创新。目前，北京承担国家三大计划（863计划、基础研究计划、攻关计划）项目数和获得经费数高居全国首位。

北京研究开发的投入水平较高。2000年，北京研发经费支出155.7亿元，占全国的17.4%，占GDP的比重为6.3%，达到世界发达地区水平。相对于投入，北京研发的产出水平也较高。2000

年，北京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074件，占全国的17.4%。技术市场成交额为140.3亿元，占全国的21.6%。均领先于其他省市。此外，发表论文数和出版专著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等反映科技产出水平的指标也居全国之首。

北京产学研之间的联系存在广泛的空间。高校、科研机构在战略层次的研究中有许多独到的贡献，对企业的市场开发产生了战略性的指导意义。中关村则是一个较成熟的科技创新载体。

北京也形成了比较浓厚的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这主要得益于中关村独特的科技创新文化，这种意识倾向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逐渐在社会上弥漫，在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强化，逐渐发展成为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大环境。

北京强大的科研实力以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动力源泉。在这里，不断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项目。如0.25微米32位CPU芯片"方舟一号"和"方舟二号"，百万门级专用图像芯片"星光一号"，博奥生物芯片等。其中，由位于中关村的北京中芯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方舟一号"CPU芯片，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实用化32位嵌入式CPU芯片，它结束了我国信息产业没有自产芯片的时代。"方舟一号"CPU芯片成功应用于网络计算机，实现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CPU的产品化。对于保障我国信息安全、提高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②与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要求相比，上海的研究开发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上海的科技创新偏向于以引进技术为主的二次创新。上海将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成为我国最先引进、消化和向全国传播发达国家创新成果的基地。目前上海高新技术产值中，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高达60%，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上海自主研究开发能力的不足。

与北京相比，上海研发投入的水平较低。2000年，研发经费支出为73.8亿元，仅为北京的1/2，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6%，也落后于北京。从研发的产出水平来看，2000年，上海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304件，仅为北京的1/3。技术市场成交额、发表论文数和出版专著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等指标也与北京有一定差距。上海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大多通过行

政机制来实现，缺乏自主合作、市场化推进的协作机制。同时，浓厚的商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新、创业的科技文化。

虽然北京的研发能力优于上海，但研发环节不是孤立的，它与现代制造业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联系密切。因此，只有保持各环节的协调发展，北京才能保证研发环节优势的发挥，上海也才能弥补在这方面的相对不足。

2. 首都优势

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发展现代制造业至少具有信息、市场、品牌等方面的优势。

信息方面。北京聚集了与现代制造业有关的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行业信息研究机构，一些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使得现代制造业企业、科研部门等能够及时、方便地获得相关的技术、政策、市场等方面的信息。

市场方面。北京作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大型企业集团总部等重要机构的所在地，对现代制造业的产品有庞大并且高标准的市场需求。同时，与重要政府部门的沟通是许多现代制造业企业如通讯类企业拓展业务的关键环节，在北京则比较容易获得相关的公共关系资源。这就使得北京的现代制造业因区位而具有得天独厚的市场需求优势和市场开拓优势，成为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

四 进一步提高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对策

1. 加强区域协调，形成区域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合力

发展现代制造业是一个城市和地区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京津冀、环渤海地区的各省市都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都具有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潜力和愿望。实现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是区域内各省市促进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各地政府应首先从思想上认识到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认清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只有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才能充分挖掘自身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生产力潜能，从而取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从思想上统一认识，各地各级政府才会从行动上积极付诸实施，放弃单个

地区、部门的短期利益，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协作，追求自身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是区域中高素质人才、资金、信息等战略资源的聚集地，应成为京津冀甚至环渤海地区现代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中心、营销中心、管理控制中心。同时由于土地、水等常规资源的缺乏，决定了在北京不可能有完备、大规模的生产加工基地、协作配套基地。北京应在巩固具有生产配套功能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基础上，通过企业的资本运作等方式加强与区域其他地区的协调和联系，弥补自身缺陷。

天津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可以成为区域内仅次于北京的“亚中心”。北京与天津应加强政界、企业界、学界的联系与沟通，达成经济协作、协调实现“双赢”的共识。天津因其较低的运营成本等因素，可以部分承担北京现代制造业生产配套基地的功能，与北京实现分工协作。如摩托罗拉，将其总部迁至北京，而生产基地仍在天津。同时，天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汽车业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使其可以与北京在这些产业上既竞争又合作，实现协同创新等集群效应。

河北一些经济实力不是很强的地区，希望通过建设工业园区的方式接受京、津等较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可以从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两方面看待这类地区。从不利的方面来说，这类地区经济、技术基础薄弱，科技人才不足，资金缺乏，政府的经济管理水平较低。从有利的方面来说，由于是从空白开始，这类地区可以进行较科学的定位和规划，从而避免了一些弯路。北京应加强与这些地区的联系与沟通，并鼓励企业的微观运作与当地政府的宏观运作相结合，培育这些地区成为北京的生产配套基地。

2. 充分利用研发资源，促进北京现代制造业研发优势的确立

较强的研发能力是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的优势所在，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是北京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首先，应继续通过优惠的财税政策、资金支持等形式鼓励企业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或二次创新，不断推出高科技含量的新产品，保持活力和持续的竞争力。其次，应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结合。通过产学研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知识、人才的共享等有效途径，使企业不断得到理论的指导，进行高起点的技术创新；使高校、科研院所能够与市场融

合，提高研发成果的实用价值和经济性，提高其产业化水平。再次，政府应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研发机构进行基础研究，保持科技研究的前瞻性，实现源头创新。从而为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充足、强大的技术储备和技术支撑，保证北京现代制造业能够占据产业链的高端地位，不断增强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王远桂："上海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上海综合经济》2003 年 7 月。

石忆邵等："上海实施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联动发展的战略意义与对策"，《同济大学学报》2000 年 3 月。

钱启东："上海新的发展战略定位及新一轮发展九大亮点"，《上海综合经济》2003 年 8 月。

蒋铁柱、杨亚琴："构建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科技创新模式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 年 3 月。

北京广州两地健身娱乐市场比较研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牟　炜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空余时间的增多，体育产业在全球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体育产业的产值也在以30％的速度增长。在体育产业中，健身娱乐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美国的运动健身场所约有4.8万个，商业性俱乐部1.33万个，其中体育健身俱乐部有1.2万个，占90.22％。我国目前已经把体育健身娱乐业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拉动内需的新兴产业。

作为我国的两大都市，北京和广州的体育健身娱乐业拥有很好的发展条件。第一，两地的经济发展都已跨入了富裕型阶段。2002年北京市人均GDP达到3355美元；而广州市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是一个城市向基本现代化起飞的平台。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跨入富裕型阶段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便利和舒适程度的要求将大为提高。第二，两地市民的消费结构出现明显改善。2002年北京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3.8％，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广州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已降至38.1％。教育、文化、体育娱乐服务费用支出低于食品支出，居第二位。物质性消费基本满足，新的消费领域主要表现在非物质性消费领域。人民生活开始进入富裕阶段，文化、体育、娱乐等服务消费增长将加快，占居民消费比例将逐步提高。第三，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根据国外其他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经验，2008年奥运会必将对北京市的体育健身娱乐市场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通过比较北京与广州两城市的体育健身娱

乐市场，我们可以分析总结两个市场的特点和问题，以期进一步推动两地，特别是北京市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　京穗两地健身娱乐市场现状比较

1. 两地体育人口增多并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特点

体育人口是指坚持每周三次、每次三十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体育运动的人群数量。体育人口的增加会带动体育消费的增长，是体育产业得以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比如目前北京市非体育人口的年均体育消费为1423元，而体育人口的消费已达到了1871元。因此，我国体育人口的增多意味着我国体育产业的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据统计，目前北京市体育人口已达50.3%。从年龄分布上看，北京市18～29岁的体育人口比例最大，为60.7%，表明青年人是参加体育活动的主体。排在第二位的是60岁以上的人群，体育人口达到56.1%。这部分人群大都已退休在家，有充裕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体育人口比例最低的是40～49岁年龄段的人群，仅为25.6%。这部分人群由于背负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压，所以很少有时间参与体育活动。

在体育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上，广州市也呈现出与北京市类似的特点。据统计，广州市的体育人口已达41.5%。王小康等人的调查表明，广州市的群众体育活动点以老年人为主，而经营性体育健身娱乐场所则以青年人占绝大多数。中年体育人口少，已是不争的事实。

2. 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广州市的家庭体育消费占优

在北京，群体参与是人们首选的运动方式，有44%的人群选择群体参与方式。这体现出体育不仅可以增强人民体质，还有利于人们的情感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改善人际关系。此外，有41%的人群选择以个体方式参加体育锻炼，以家庭方式参加体育锻炼有15%。

国外数据显示，家庭体育消费已经成为了体育消费市场的一支主力军。据《国外体育动态》1997年转载日本SSF财团的调查资

料，国际家庭体育消费水平呈迅速增长趋势，消费内容也趋于多样化和长期化。家庭体育的消费总支出日本达404亿美元、德国149亿美元、英国103亿美元。瑞士家庭体育消费总支出虽排名靠后，但由于该国人口不多，其家庭年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却高达1265美元。

相比而言，我国家庭体育消费只是刚刚起步。但与北京相比，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家庭体育消费观念要更强一些。据深、港、穗家庭体育消费调查显示，家庭参与体育消费的观念已见雏形。广州85%以上的居民愿意与家人共同参与体育活动，其中86%的居民家庭里有健身器材或用具。

3. 锻炼时间：北京市民更愿意选择晚间

在体育运动时间上，北京市民首选节假日。北京市的运动场所在周六、周日几乎全部爆满，很多场地都需要提前预约。以东单体育中心为例，节假日的顾客要比平常多上三四倍。除节假日之外，晚间是北京市民进行体育锻炼的主要时间，有26%的人群选择在晚间进行锻炼。晨练者占9%，以年龄偏大者为主，主要进行爬山、跑步、步行等类型的体育锻炼。

根据顾伟农等的调查，广州市民有58.97%在下午4～6点进行体育锻炼，30.77%的市民在早上5～7点锻炼。通过调查访问，早上锻炼的群体中45岁以上的占70.36%。而下午4～6点，工人下班、学生放学，大家有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因此，18～30岁的市民大都集中在这个时间进行活动。

京穗两地相比，早晚的空闲时间都是进行体育锻炼的黄金时间。另一方面，北京市民的早晚体育锻炼比例为1:2.89；广州市民的早晚体育锻炼比例为1:1.92。也就是说，相对于广州市民来讲，北京市民表现出更强烈的晚间体育锻炼现象。这一差别与两地居民的年龄构成、生活习惯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北京冬季的早晨天亮时间晚、气温低就会使进行晨练的当地居民减少。

4. 体育运动项目的选择与年龄关系密切

在北京，人们选择最多的是球类运动，占到32%。其中包括篮球、足球、羽毛球、网球等，其次19%的人群选择步行，接下来的运动项目是游泳16%，健身15%，骑自行车10%，登山、轮滑等

占到8%。年龄与运动项目的选择有密切关系，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选择的运动方式不同。调查显示，18～29岁与30～39岁年龄段人群的选择是完全相同的，他们喜爱活动量大的运动，以球类、游泳为主，而高龄人群则首选步行和一些简单的健身运动。

在广州，从总体上看，人们喜欢的体育活动依次为：散步或跑步、小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大球、健美操、跳舞、骑自行车等。与北京的情况类似，不同年龄者所喜欢的健身项目也是不同的：老年人喜欢散步，因为散步活动强度较小，且活动不受场地限制，最适合老年人进行；中年人最喜欢跑步和散步，其次分别为游泳、小球、健美操，这些项目都有轻巧，活动量大的特点，又最适合中年人增强心血管系统的生理功能；壮年最喜欢小球，这与广州气候较暖和、雨季较集中、容易开展有关系；少儿大都喜欢足球（男）和游泳（女），因为广州有很好的足球传统，而游泳也一直在广州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

5．体育场馆设施：北京市民的满意度较高

目前，北京市的社区体育设施已达到5034个，其中城八区的社区体育设施已达到3998个。在城八区中，海淀区的社区体育设施最多，达到1168个；朝阳区平均每一社区拥有的体育设施面积最大，达到429平方米；西城区的平均每一体育设施面积最大，达到290平方米。

随着对外开放性体育场馆的增多，体育场已成为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首选场所。而全民健身工程的实施与推广使社区健身场所成为人门锻炼身体的第二大场所，其余依次为学校（单位）、会馆（俱乐部）、大型公用建筑和公园。调查结果显示，青年人首选的运动场所是体育馆，其次是学校和单位。中老年人首选的运动场所是社区健身场所，其次是学校和单位或公园。

通过分析年龄与运动项目及运动场所的关系可以发现，人们在选择运动场所时主要还是考虑运动项目的自身要求。运动场所的内部环境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路程远近也是人们考虑较多的因素之一，而体育健身场所的消费价格、服务质量、场所的规范性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调查表明，中青年和收入偏高者最注重场所的内部环境。他们往往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注重环境对体育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年龄偏大和收入较低的人群更偏重场所的远近距

离。由于身体、资金的原因，他们更希望通过简单的途径达到最佳的效果。

调查显示大多数北京市民对目前的体育健身场所比较满意，但仍有25%表示不满意。不满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在健身场所的分布极不均匀，大大小小的健身娱乐俱乐部更应普遍分布在各个社区内。公共设施少，群众性的健身宣传不够。普及大众型的健身场所、扩大健身场所的规模意义重大。第二，小区内的全民健身场所缺乏专业性的教练员指导，健身器械保养维护不够，尤其是在器械磨损后，无人问津，造成了不安全的隐患。社会上应有更多的学校、公共性场所对外开放，扩大人们进行体育活动的范围。第三，经营性的运动场所经营管理不善，价格过高，服务质量差，时间设置不合理，环境不好，教练水平也不高，俱乐部的影响力不够。

再来看一下广州的情况。广州目前拥有各类体育场馆6700多个，人均体育用地面积2.72平方米。公共场馆240多个，人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0.24平方米。通过对该市26个社区的调查研究表明，平均每个社区每天有1100人次使用全民健身工程的配建设施进行体育锻炼，68.4%的社区认为居民对健身设施的反映很好，但公共体育设施仍然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

在对体育场馆是否应该向大众开放的问题上，71.32%的人认为应全部开放，28.68%的人认为应部分开放，没有人认为不应该开放。51.71%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不应当收费。在实际生活中，到体育场馆去锻炼身体的人仅占12.3%，说明集中、大型的体育场馆并没有成为市民锻炼的主要场所，原因有二：一是多数人还不具备在大型体育场馆锻炼身体的消费能力；二是离家较远，不方便锻炼。各个社区大都考虑到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实际情况。对26个社区调查表明：58.64%的设施被无偿使用，35.45%的设施象征性收费，只有5.91%的场地器材是按市场价收费。

另有调查显示，尽管不同的运动场地、器材设施的利用率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广州市的场馆利用率不高，其中尤以乒乓球的场馆利用率为最，平均只有50%左右。不少场地器材经常处于闲置状态，周一至周五的白天表现更为突出。但也有少数项目的场地利用率较高，如羽毛球等项目。据《广州市民参与全民健身运动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一文分析，羽毛球是市民喜欢的前8项体育活

动之首，而且是青壮年市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由于青壮年有较稳定的收入和较强的支付能力，因而羽毛球场的利用率较高。该调查还显示，在影响市民体育锻炼的前5位因素中，“没有场所锻炼”（占32.7%）仅排在“学习或工作太累”（占34.1%）之后。场地器材的利用率不高，势必影响经营场所的经济效益，从而不利于广州市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健康发展。

6. 体育消费：北京已初现国际体育消费趋势

北京市体育局进行的调查表明，北京市民人均年体育消费为1648.27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29%。实际上有统计表明，我国各地体育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的2%～7%，体育消费水平较低，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据有关资料介绍，在经济发达国家，人们日常生活中用于体育消费方面的开支通常为整个社会消遣和娱乐费用的30%～40%。当今美国人认为体育消费应占消费总额的20%左右，据美国新闻界的调查统计表明，1988年美国人的体育消费总额就已经达到470亿美元。

从体育消费的结构看，体育健身消费最大，占体育消费总额的43%；其次是体育用品消费占38%；体育彩票消费占13%；体育竞赛消费最低，只有6%。

从年龄结构看，青年人和中年人是体育消费的主体，30～49岁年龄段的体育消费占体育消费总额的61%；老年人的体育消费最小，仅占8%。除了18～29年龄段人群之外，其他各年龄段人群的体育消费结构基本相同，偏好依次为：健身、用品、彩票和竞赛。在18～29岁年龄段人群的消费偏好中，体育用品消费占到了第一位。与体育人口的年龄结构结合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青年人既愿意参加体育活动，也有能力并愿意增加体育消费；中年人有能力并愿意增加体育消费，却不愿或无法参加体育活动；老年人则是非常积极地参加体育活动，但却没有能力或不愿增加体育消费。可见，从体育消费的角度讲，提高中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是提高体育消费整体水平的关键。

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在各个方面的消费都超出了女性。此外，两性的消费结构也存在差异。男性的消费偏好依次为：用品、健身、彩票和竞赛；而女性的消费偏好依次为：健身、用品、彩票和竞赛。

从收入结构上看，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消费偏好。

如收入5000元以上的群体的消费偏好依次为：健身、用品、彩票和竞赛，而收入1000元以下的群体的消费偏好则依次为：用品、健身、彩票和竞赛。从健身和用品两者的整体情况来看，健身消费占51%，用品消费占49%。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用品为代表的实物主导型消费结构逐渐转变为以健身为代表的劳务主导型消费结构是国际体育消费的发展趋势。如美国1988年体育产业产值已达631亿美元，体育劳务收入占当年体育产业产值55.98%；体育实物消费占当年体育产业总值30.1%。德国1990年体育健身服务消费达62%，而体育用品消费只有38%。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体育消费结构，经济发达地区体育劳务消费约占40%，体育实物消费约占60%；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体育劳务消费仅占20%左右，体育实物消费高达80%。从北京的体育消费结构看，体育劳务消费略超过体育实物消费，已经与国际体育消费市场逐步接轨。

在广州市，有研究人员对体育经营场所的主要消费对象进行过调查。调查显示，从经济收入水平来看，高收入者占13.3%，中等收入者占50%，低收入者占36.7%。这说明广州市经营性体育健身娱乐场所的主要消费群体是中等收入者。

从消费者的性别来看，男性比重较大，约占74%，女性约占26%。这一性别结构与北京大致相同。从消费者的年龄构成来看，群众体育活动点与体育经营场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老年人多，青年人少；后者青年人多，老年人少；两者的共同特征是中年人少。另有调查表明，健身娱乐场所的消费者以20～40岁年龄段为主，占90%。这与体育人口“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刚好形成互补态势。到经营性场所消费，对经济有一定的要求，中青年市民一般都有较强的支付能力，也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价值观念。20岁以下的青少年基本上集中在各类学校，但在寒暑假也有不少学生到经营场所进行消费。老年人由于余暇时间多，有的进行个人锻炼，有的在体育活动点进行锻炼，花钱较少，既可达到健身的目的，又可以充实生活，互相交流，消除孤独寂寞感。这一情况也与北京类似。

对消费者调查的结果还显示，人们每个月到健身娱乐场所1～2次的为23%，3～4次的为40%，5～8次的为23%，9次以上的有13%。月体育消费10～50元占23%，51～100元占30%，101～200元占33%，201～500元占13%。可见，一旦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确立后，在经济情况允许时，就会把一部分钱持续投入到体育消费

中。采用平均数组中值加权法计算，人均月体育消费为124.4元，如以此为基数，以广州市区360多万人口、50%的体育人口来计算，市区月体育消费总额可达2亿多元，年体育消费可达24亿多元。因而，广州的体育市场也和北京一样有着诱人的前景和巨大潜力，其关键在于提高大众的体育消费意识和体育消费水平。

广州市体育消费的另一个特点是体育消费实物化。在体育消费的结构中体育实物消费比重高于体育劳务消费，消费比例不协调。王小康等对广东几城市的调查中显示：广州市地区人们用于体育劳务的消费为42%，用于体育实物的消费为58%。这一指标与北京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二 现存问题及对策

1. 增加体育人口总量，改善体育人口结构

目前，京穗两地体育人口都已达到50%左右，增长趋势明显。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体育人口的总量仍然偏少。如澳大利亚2002年的体育人口已经达到77.8%。另一方面，体育人口的结构非常不合理。实际上，体育人口在年龄上“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在我国的各大城市都很普遍。澳大利亚2002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澳大利亚的体育人口随年龄的增长呈递减趋势，中年体育人口的比例为76.3%，明显要高于我国的水平。由于中年体育人口是体育消费的主力军，所以提高中年体育人口的数量将是提高体育消费水平的关键。

2. 加强宣传，提高大众健身意识

在调查关于体育健身娱乐宣传和引导对消费者的影响时，有一半人认为有较大影响，只有一成的人认为没有影响。因此，政府部门以及各经营场所应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多种媒体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和教育，强化市民的健身意识，在市民中树立起“花钱买健康”的观念，指导市民正确地消费，使市民认识到体育健身娱乐不仅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健康投资。同时社会舆论机构不宜过多地宣传兴建高消费、高档次的健身娱乐场所，避免高消费的倾向，而应把基本着眼点放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方

面，设立一些大众消费得起的中低档项目和场所。

3．做好市场调研工作，满足消费者需求

努力开发体育市场，想办法吸引更多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的个人及家庭参加体育活动及体育消费。开拓适合不同层次体育消费水平的体育活动方式和场所，细分体育消费市场。针对北京市民的体育消费来源，应积极鼓励中年人参加体育健身活动，为其创造健身的环境，改变传统体育消费观念，提倡花钱买健康的思想观念以及花钱享受体育的观念。针对目前北京市体育人口的构成，应适度增加体育消费品的开发层次，加强对适合女性和老年人消费的体育商品开发力度。从长远来看，要不断增加城区居民闲暇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居民居住区周围的体育场所，为其参与体育活动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

4．加强体育健身娱乐产业队伍的建设

体育健身娱乐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尤其是经营者的数量和质量。目前，北京市体育产业的从业人员超过8.56万人，但体育经营人员少，业务素质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因此，我们要把人才问题作为发展北京市体育健身娱乐业的首要工作，抓紧抓好，打破部门界限，多渠道全方位发展和培养懂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体育经济人才。既要立足本职，加强体育健身娱乐场所经营者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经营能力，又要有计划地培养一大批现代体育产业的经营者，还可以大胆从经营市场选择一些急需的经营人才，广纳天下贤士，力争体育健身娱乐业队伍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上有明显的改善。当前还要重点抓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本着对体育消费者负责的精神和提高经营场所服务质量的宗旨，对指导人员进行体育教学、项目技术、运动训练、医学、心理学的培训。同时由于健身指导者与消费者直接接触最多，因此，还需要适当增强体育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内容，掌握体育经济的一般规律，使他们能根据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有偿服务。此外，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也应加强体育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经营场所的业务指导和宏观管理能力，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5. 政府应采取支持政策措施

体育健身娱乐业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主要还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新西兰的研究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有助于预防心脏病、结肠癌和糖尿病这些需要大量医疗费用的疾病。如果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成年人增加 10%，那么每年将至少可以节约 5500 万美元的医疗费用。因此，政府对公益事业提供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在我国体育健身娱乐业仍处在初级阶段的今天，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尤其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悉心呵护，为其顺利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由于体育产业投资周期长，收益见效慢，若没有必要的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将影响经营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对体育健身娱乐业的经营，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制定和出台优惠政策和措施，如减免某些税收，降低地皮价格，场地设施方面予以一定资助等以引导全社会参与体育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鼓励社会各界积极赞助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公益性体育市场项目；另一方面动员社会，鼓励企业和个体投资建设适合市民健身、娱乐、休闲的体育经营设施，兴办体育企业，从事体育经营活动，共同开发和繁荣体育市场。

三 2008 年奥运会对北京健身娱乐市场的积极影响

1. 进一步丰富健身娱乐设施

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大型运动会的举行可以进一步丰富举办地的健身设施，为人们进行健身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第 9 届全国运动会于 2001 年 11 月在广州市举行。为承办这届全运会，广东省共新建体育场馆 19 个，改建维修场馆 45 个，建设投资总计约 40 亿元。在广州市的场馆建设中充分考虑了场馆使用的多功能性与多元化，并注重配套设施的完善。如广州体育馆包括比赛馆、训练馆和大众活动中心三个部分：比赛馆可用于田径、体操等大型体育项目；训练馆可用于乒乓球、羽毛球、击剑、摔跤等项目；大众体育中心和地下游泳馆、篮球馆及排球馆则成为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综合健身活动的场所，为广州市民提供健身娱乐服务。

与全运会相比，奥运会的场馆投资力度更要大得多。在美国，具有国际水平的体育设施已经成为举办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永久性的遗产，这些设施包括新建的设施，也包括原有的设施，总投资近60亿美元。佐治亚州许多大学都已从新建和改建的体育场馆设施中得到好处。组委会投入2400万美元在佐治亚技术学院内修建了新的游泳池。组委会还投入1500万美元改建佐治亚技术学院的亚历山大纪念馆进行拳击项目的比赛。亚特兰大大学在奥运会之后接收了新的价值达5100万美元的田径场地设施。佐治亚州立大学投入200万美元用于改建体育馆承办羽毛球比赛。此外，其他类型的设施也得到了开发、改建和扩建，例如私人出资5700万美元兴建的百年奥运公园、造价1000万美元的国际体育广场等。最后，还有许多政府和私人的建设项目也从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受益。这些项目早就列入规划项目，但由于缺乏经费这些建设项目一直未能启动。奥运会的举办给这些建设项目的启动赢得了千载难逢的筹资良机。

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按照《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在京奥运场馆建设及配套设施项目为32个，分布在“一个中心（即奥林匹克公园）和三个区域”，总投资280亿元。其中新建场馆19个（含6个临时赛场），总投资95.2亿元；改扩建场馆13个，总投资24亿元；新建与奥运会直接相关的项目总投资153亿元；训练场馆改造项目59个，总投资4亿元；残奥会专用设施改造总投资3.8亿元。这些达到国际标准的体育场馆在奥运会之后必然将给北京市民提供优良的健身娱乐环境。

2. 促进北京体育娱乐健身业持续快速增长

据韩国学者介绍，韩国的体育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成功举办了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之后得到了快速发展。韩国竞技体育在亚运会和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极大地促进了大众体育的发展，人们对体育用品和健身服务的需求迅速提高。1977年韩国体育用品业的生产总值只占整个制造业的1.3%，1982年上升到1.5%，这之后又迅速提高到5%。1980年韩国国内体育用品消费市场总额为1530.7亿韩元，1990年达到了6080.2亿韩元，增长297%；1980年韩国体育用品业生产总值为5310.7亿韩元，1990年达到了19490.2亿韩元，增长267%。

另据澳大利亚体育联合会的调查表明，1995～1996年，澳大利

亚全国体育产业产值为79亿澳元，占GDP的0.6%；1998年，澳大利亚全国体育产业产值达到80亿澳元，占GDP的1%，在113个产业行业中列第25位；1999年，美国学者提出，在世界各国中，澳大利亚体育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最大，接近3%。按照这一趋势，国内专家预测2008年北京体育产业产值将达到205.1亿~239.3亿元，占北京GDP的3%~3.5%。

与其他奥运会主办城市一样，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北京市民的健身意识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进而促进北京市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据北京市统计局《奥运会投资与收益分析》课题组的预测，奥运会将使北京体育产业的GDP在2001年至2007年保持年均111.55%的增速，高于“十五”计划速度1.03个百分点。可见，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对北京的体育产业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在总量增长的同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都表明，奥运会的举办还将对体育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体育劳务消费的增长将大大超过体育实物消费的增长，体育娱乐健身市场将逐渐成为体育产业的主流市场。

都市型现代农业在京津沪的发展

文/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陈孟平 齐福全

20 世纪早期，西方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导致人们重新定位城乡关系。具有新兴功能的都市农业应运而生。20 世纪 80 年代，相似的农业发展概念如城郊农业在中国得以研究。而后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深入，都市型现代农业成为了中国大中型城市郊区农业未来的发展目标。

都市型现代农业是都市型农业的现代化，是在城郊型农业基础上的提升和延伸。它不仅保留了以城市为依托、利用优越的区位优势生产鲜活农副产品来满足城市商品市场需求的内涵，而且充分利用了城市的资本、人才和科技等资源优势，将市场服务范围推及全国和世界范围。因此，都市型现代农业既有现代农业的一般性，又有都市农业的特殊性。与一般现代农业比较而言，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科技含量、加工深度、产品市场导向性和创新性更强，在食品类农产品生产上更注重国际化的安全性和标准化；而其都市性特点集中表现为受大都市城市功能定位及资源禀赋等外在条件的约束下，它充分适应了因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所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同时将农业原有功能由生产拓展到生态、社会和生活等多方面。具体表现为：一是发展空间的拓展。都市型农业面临的市场空间由供应单一的中心城市转为国内外市场，而资源及生产空间也由有限的城市郊区拓展为国内外可用的农业资源和生产空间；二是农业功能的拓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保持了传统农业提供籽种、食品和观赏物（如花卉、观赏鱼和动物）的功能，同时包含了满足人们对营养、环境以及文化生活等多方面需求的功能。

近年来，中国大中城市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模式做出了积极探索。其中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因其地域特点而使都市型

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将根据当地政府部门颁布的政策文件以及有关负责人的讲话，对三地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加以概述，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目的是探索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规律，为其他城市今后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提供借鉴。

一 京津沪郊区农业发展现状

从表1中可以看出，当前的京津沪郊区农业，无论是对于GDP的贡献，还是对农民增收的作用，都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京津沪郊区农业需要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或者选择何种发展模式。

表1 京津沪郊区农业发展状况（2002年）

类 别	北 京	天 津	上 海
郊区面积(%)	99	98.5	89.9
农业人口比例(%)	29.4	46.2	19.4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比例(%)	38.7	47.6	32.1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3.05	4.1	1.6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5880	5315	6212
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	11.5	26.0	9.8

二 京津沪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概述

1.都市型现代农业概念的提出

①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概念的提出。北京市朝阳区最先提出发展都市农业。1994年，朝阳区在制定本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规划》时，首次将都市农业列为经济发展六大工程之一。直至2003年，市政府开始提及“都市型现代农业”。2003年北京市郊区工作会议在谈及郊区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时，提出要形成包括“以绿色生态为标志的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带”在内的四大产业带。

②上海市都市型现代农业概念的提出。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市最早提出要发展都市型农业。1995～1996年，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

大将上海市郊区农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确定为由“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农业转变”(张强，2001)。

③天津市都市型现代农业概念的提出。1999年，天津市开始实施《天津市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实施规划》，其中提及“从现在起到2010年，是天津农业由城郊型迈向都市型的重要发展时期”。

2．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功能定位

①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功能定位。北京市前任主管农业的副市长岳福洪曾提出，调整农业的功能结构，实现从生产功能向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种功能结构延伸（岳福洪，2001）。具体来讲，就是要在近郊城乡接合部地区拓宽第一产业功能（市农委2002)；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乡镇企业和郊区第二、三产业，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生态良好的都市型郊区经济（孟学农，2002)；要形成包括以人与自然高度和谐为特征的休闲观光旅游产业带（刘琪，2003)。

②上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功能定位。2002年，上海市提出了当地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目标构想，即将都市型现代农业功能的调整定位在实现经济、生态、社会、创汇功能的协调发展，要实现农业功能效应的创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生产型向生态型转变、从提供产品型向提供服务型转变。都市型现代农业既要对内服务市民、强化生态功能，又要对外面向全国、强化服务功能，努力构建农业流通、会展、信息、科技、检测认证等五大服务平台。实践中，上海市农业同时提供瓜果、蔬菜、稻米等有形产品和为大都市输送新鲜空气、改善生态环境、让市民观光旅游等无形产品。寻求两者的有机结合，成为近年上海郊区发展现代农业的立足点。

③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功能定位。天津市有关政府部门只是曾在《天津市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实施规划》中指出，地处环城地带的近郊，积极发展观光，旅游和休闲农业，提高农业的科技和文化含量。可见，对有关都市型现代农业具体功能的定位还不十分明确。

3．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市场定位

①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市场定位。北京市农业生产面临的主

要目标市场包括：鲜活农产品的生活性消费和加工性消费的本地市场、以密集型的技术和资金为依托的籽种商品的国内市场和安全优质的鲜活农产品、加工食品的国际市场。从长远看，北京农业应以国际鲜活农产品和加工食品消费市场为目标，以供应本市高档消费需求为依托和准备，逐步过渡到以名牌创汇产品的生产基地为龙头、以组织无害化农产品贸易为主的格局，形成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聂玉藻，2002）。

②上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市场定位。上海市有关政府部门认为，上海农业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由原来主要保障本地供应的内向型、单一市场结构，转变为同时面向市内、国内和国外的多元化市场结构。

③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市场定位。在市场导向上，天津市都市型现代农业要把满足天津市场对一般鲜活农、牧、渔业产品的需求转化为充分发挥天津市作为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的功能，着眼北方，涉足全国，进而打入国际市场（天津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农林组，2000）。

4. 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结构定位

①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结构定位。在今后几年内，北京市农业要形成以养殖业为主、粮经饲、种养加游全面发展的产业结构，形成以无害化、外向型、优质、特色产品为主的产品结构，形成近郊以都市型农园和绿色产业为主、远郊平原以基地化生产经营为主、山区以生态型产业为主的区域结构，实现农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延伸（聂玉藻 2002）。

②上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结构定位。上海市提出：上海市农业在农地利用结构方面，应逐步形成以经济林为主的林果、花草基地，以创汇农业为主的园艺蔬菜、瓜果基地和以优质水稻为主的粮油生产基地各占 1/3 的格局；在种植业结构方面，应该减粮、扩经，着重发展精细、鲜活、外地难以取代的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药材等作物，应以杂交水稻、特色瓜果与中高档花卉林木为重点，培育、发展种子种苗产业；在养殖业结构方面，应该实行“稳禽、减蛋、搞特色，增牛、减猪、育品种”的结构调整方针；在林业结构方面，应以营造生态林、景观林、经济林为重点，逐步扩大林地面积；在产品结构方面，应该主攻优质、精细、特色品种，向多元

化、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和特色化生产转变，提升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③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结构定位。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结构定位是：种植业结构方面，在稳定粮食总产的基础上，进行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建立起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的“三元结构”，进一步提高蔬菜生产水平，扩大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面积，增加名特优新品种，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实现种植业基地化、专业化生产经营；养殖业结构方面，稳定生猪、蛋鸡生产，突出发展草食型、节粮型畜禽生产和特种养殖，扩大海、淡水养殖面积，提高设施水平，增加经济效益；产品结构方面，要在首批评出的农业名牌产品的基础上，争取创出更多的农业名牌产品；在区域布局结构方面，近郊环城地区大力发展工厂化、设施化农业和以高新技术为主的现代化农业园区，积极发展以休闲、旅游、观光农业为特征的都市型农业，远郊地带以发展城郊型农业为主，建成一批现代化优质粮和菜篮子基地，走精品农业的路子，滨海地带重点发展与出口加工贸易相关的种养业，积极发展近海、滩涂和海洋捕捞业，建立滨海特色的现代农业。

5. 京津沪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战略

①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在“贯彻实施本市十五计划纲要加快郊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意见”（京政办发［2002］35号）中提出，“十五”时期京郊应以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为此，一是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龙头企业联合合作组织、合作组织带动农户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二是要加强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与国际标准接轨、在国内外市场有较强竞争力、具有生产优势的名牌产品；三是要推进种植业由粮经二元结构向粮经饲三元结构的转变，重点发展优质、专用粮和制种业，大力发展蔬菜、瓜类、花卉、药材等经济作物，加快发展饲料饲草种植；四是加快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把京郊建设成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窗口。另外，还要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加快培育籽种产业，重点发展蔬菜种子种苗、果树苗木、种畜种禽等商品种业；依托农业科技创新工程，着力培育以家畜胚胎、新型肥料、生物农药、畜禽疫苗、生物制剂、农业设施装备为

重点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为基地，加快引进和培育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农业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扩大智能化专家决策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及遥感技术在农业资源管理和生产管理中的示范与应用；促进农业技术服务的产业化，以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民营企业为依托，加快发展农业技术服务业。

②上海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战略。上海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五”规划指出，要按照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创汇农业、观光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努力培育种子种苗基地；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一批源头产品强、初级产品优、加工产品精，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副产品品牌，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建设近郊、滨海、沿江、海岛等各具特色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抓好商品粮基地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加快实现农业设施、技术水平、市场信息系统等服务体系的现代化，扩大农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积极发展跨地区的农业投资和经营，提高上海农业的集聚和扩散能力。

上海农业将突出生态优先，效益为上，品牌战略。调整产业结构，拓展发展空间；调整产品结构，提升农业附加值；调整布局结构，稻蔬花果成片；调整组织结构，企业带动农户。

实践中，2002 年上海从四方面着手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一是着手推进农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二是全面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三是继续加大推进农业科技化、农业标准化和农业信息化的力度；四是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③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天津市农业未来发展思路应立足于三个转变：在资源配置上，把依托城郊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以天津及周边地区农业资源为基础，依托天津作为沿海港口城市区位优势，以大城市及其引进的国际经济要素（资本、技术、人才等）为主导，对农业进行资源重组、产业升级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市场导向上，把满足天津市场对一般鲜活农、牧、渔业产品的需求转化为充分发挥天津市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的功能，着眼北方、涉足全国、进而打入国际；要变农业的封闭式经营为全方位对内外开放，以适应国际上农业资本的本土化为契机，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驱

动，发展现代化市场农业（天津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农林组，2000）。

在《天津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及发展沿海都市型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时指出，要加快调整农业结构，积极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出口创汇农业和节水农业，创造精品，形成特色；扩大优质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优质专用粮的生产；加快发展畜牧、水产、特种养殖和远洋捕捞业，养殖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50%以上；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规模经营，实行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形式，扩大农产品深加工，鼓励、扶持农畜和水产品加工出口；加快科教兴农，积极推广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发展种苗、生物技术、储藏保鲜等农业科技产业，建设一批高标准的农业科技产业化项目和示范园区；搞好以信息和科技服务为重点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环城、沿海、沿河、沿路和山区优势，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业经济区和产业带。

三　京津沪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评价

1．都市型现代农业功能定位评价

通过前文介绍可以发现，上海市和北京市都能从功能层面认识和理解都市型现代农业，其拓展都市农业功能的理念好于天津。但通过进一步了解还可以发现，在拓展都市农业功能的认识上，上海比北京更为深刻。上海市不仅认识到，都市农业既可以满足“胃”，还可以满足“肺”，进而努力使城市森林业成为农业板块中的潜力产业。而且还认为，农业的发展不应单单局限在狭义的农业内部，而是要向上下游延伸，努力构建展销、流通、科技、认证、信息五大服务平台，[①] 积极发展农业服务业。更为可贵的是，上海已意识到服务功能其实是现代农业具有的另外一项经济功能。对于农业资源相对稀缺、发展空间相对不足的都市郊区来讲，农业的该项功能极具开拓价值。

---

① 即利用上海现代化的交通，为全国农产品提供周转出口的流通服务；利用上海发达的会展业为全国提供一个农产品展示、展销的平台；利用上海农业科技、人才优势，为全国提供科技服务的平台；通过农产品检测体系的建设为全国提供农产品检测认证的服务；利用上海信息港的条件，为全国农产品提供信息服务的平台。

2. 都市型现代农业市场定位评价

京津沪三市都把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目标市场由短缺经济时期的保本地市场供应目标扩展为同时面向本地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三个大都市郊区现代农业各自的市场定位基本一致，都是在对影响市场定位的比较优势或劣势加以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例如，北京市农业的优势在于：有较好的农业基础、同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成本低、一些特殊资源条件下的特色产品有较强的非价格竞争力、紧靠大城市消费市场、科技和资金力量在国内有相对较为充裕的优势、一些优势产业体现了东方饮食文化的典型特征；而北京市农业的劣势表现为：生产规模小且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不高、加工增值程度低、市场体系不健全、生态环境脆弱、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聂玉藻，2002）。对本地农业发展比较优劣势判断的正确与否将决定市场定位的正确性。作为特大型城市，京津沪郊区农业资源数量有限，土地资源、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京津沪三市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农产品的产出大市，只能通过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使农业在当地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都市型现代农业在本地市场范围内要靠名优特新产品来瞄准中、高档消费群体，满足个性化需求；在国内市场范围内要利用技术、人才和品牌优势积极拓展种业、加工制成品和服务市场；在国际市场范围内要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和特殊资源条件开拓劳动密集型和特色农产品市场。

3. 都市型现代农业结构定位评价

京津沪都市型现代农业结构定位的选择和确定，遵循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以各自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等原则。产业或产品结构的选择和确定，主要是依据市场导向和比较优势，兼顾环境和生态方面的外部性；区域布局结构的选择和确定，主要是在农业区划和生产传统的基础上追求区域规模经济。按照这些原则选择和确定的农业结构是否正确，主要取决于对市场的认识、把握和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判断是否正确。其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影响区域农业结构形成和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市场。从时间上看，京津沪都市型现代农业结构定位的

选择过程，也是三市对市场和自身比较优势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京津沪基本上都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国内农产品市场发生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的历史转变时开始调整农业结构的，例如北京市从1997年开始了对农业的战略性大调整。经过多年对市场和自身比较优势认识的不断深化，京津沪所选择和确定的都市型现代农业结构至少在未来一段时期里大体上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定位也需加以调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影响农业结构的主要因素——市场是不断变化的，特别是自我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都和我国农业呈互动关系。此外，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科技进步，对确定农业结构定位起重要作用的比较优势（比较成本或比较收益），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京津沪都市型现代农业结构定位宜粗不宜细，应着眼于依据对市场变化趋势的把握来确定都市农业中种、养、加和粮、经、饲等重要比例关系。特别是在确定区域布局结构时，不宜按区县等行政区划来安排，而宜于根据地域的不同按平原、半山区、山区或环城、近郊、远郊来布局。

4. 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战略评价

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战略直接关系到都市型现代农业如何发展和发展的效益。在这方面，京津沪三市都认为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调整农业结构，着力强化农业科技化、标准化和信息化。而各自的独到之处或更为重视的分别是：北京强调加强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和加快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上海积极发展跨地区的农业投资和经营，全面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天津力图把依托城郊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以本地及周边地区农业资源为基础，依托自身的地缘和区位优势，以特大型城市及其引进的国际经济要素为主导，对农业实行资源重组、产业升级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述思路虽然各有千秋，但相比之下上海市和天津市的视野更为开阔。上海和天津两市在不同程度意识到，面临机会相差无几、竞争程度颇高的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地处空间、资源和本地市场都相对不足的大都市郊区，必须跳出本市发展开放式农业（异地或域外），跳出狭义农业发展广义农业。只有跳出去，才能充分发挥大都市具有的技术、人才、品牌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才能弥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比较劣势。在这方面，上海比天津

想的更具体，做得更好。例如，身为出口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上海高榕食品有限公司，除上海本地以外，跨越20多个纬度，由北向南先后在吉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和福建建立或自营或联营的蔬菜生产基地，有效地利用各地气候特点种植蔬菜，借助于上海的海港优势，全年供应国际市场。又如，作为养殖业龙头企业的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鉴于级差地租和环境保护压力日趋加大，力图到劳动力和饲料成本相对较低的安徽蚌埠建立100万头生猪养殖基地，发展异地养殖。再如，上海市正试图延伸农业产业链，充分利用自身在交通、展示、科技、人才和信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农业服务业，努力构建面向全国的展销、流通、科技、认证、信息五大服务平台。

参考资料

张　强：《大城市地区都市型农业发展研究》，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01。

"天津市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实施规划"（摘要），《天津日报》1999年8月29日。

"沪郊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解放日报》2002年4月3日。

"跳出农业看农业 站在全局抓农业"，《解放日报》2002年2月21日。

"上海推进农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解放日报》2002年1月24日。

"上海农业服务业方兴未艾"，《解放日报》2002年11月14日。

聂玉藻："接轨国际规则 参与市场竞争"，《京郊日报》2002年3月4日。

"农业战略思路和对策"，《天津日报》2000年6月28日。

"都市型农业结构调整的实践思考"，《天津日报》2001年3月19日。

"贯彻实施本市十五计划纲要加快郊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意见"，京政办发[2002]35号。

"刘琪、强卫、牛有成同志在北京市郊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京办通报》2003年第10期。

岳福洪："从战略上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北京农村年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京沪穗郊区小城镇*发展比较研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　黄　序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北京作为首都和正在创建中的国际化大都市，也面临着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速小城镇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近年来北京市小城镇建设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与国内相关大城市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本文就此问题做一些比较分析和研究。

一　京沪穗小城镇发展现状

1997～2002 这五年来，是北京市小城镇数量、规模发展最快的时期。小城镇个数从 115 个增加到 132 个，总人口从 1997 年的 198 万人增加到 2002 年 326.4 万人，增加了 128.4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25.6 万人。人口密度从 236 人/平方公里提高到 262 人/平方公里。小城镇从业人员从 1997 年的 87 万人增加到 2002 年的 129.6 万人，增加了 42.6 万人。2002 年，小城镇实现增加值 367.5 亿元，比 1997 年增长 2 倍，年均增长 25%。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小城镇生产生活条件以及投资环境显著改善。

尽管北京的小城镇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上海和广州相比，北京长项不多，弱项不少。

1. 北京小城镇建设的优势

①基础设施条件较好。近年来，北京地区建制镇的基础设施建

* 本文所指小城镇、建制镇仅指乡镇，不含县城和卫星城。

设发展得比较快，特别是在交通设施方面与广州、上海比较处于领先地位，平均每镇本乡镇公路里程为第一，在所有建制镇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量和自来水普及率上仅次于上海而高于广州（见表1）。

表1　2002年建制镇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类别	电话装机(部)		本乡镇公路里程(公里)		自来水普及率(%)
	总量	百人拥有	总量	平均每镇	
广州	902612	21.90	5138	63	95
上海	1876073	37.60	5858	49	100
北京	923309	28.15	10935	83	98
上海重点镇	634962	38.14	—	—	—
北京中心镇	368267	30.06	4859	131	100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乡镇统计资料、2003年上海郊区统计年鉴、2002年广州小城镇统计资料汇编整理计算。

②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北京地区建制镇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千人拥有的教师数量在与上海、广州比较中居第一位，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也仅次于上海而高于广州（见表2）。

表2　2002年建制镇社会发展状况

类别	教师数量		医生数量		病床数量	
	总量(人)	千人拥有(人)	总量(人)	千人拥有(人)	总量(张)	千人拥有(张)
广州	38445	9.3	7977	1.93	10244	2.49
上海	50077	9.5	14252	2.71	17282	3.28
北京	45780	14.0	8368	2.55	8034	2.45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北京乡镇统计资料、2003年上海郊区统计年鉴、2002年广州小城镇统计资料汇编整理计算。

2. 北京小城镇建设存在的问题

北京郊区建制镇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与广州、上海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主要问题是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推进的速度不快，城镇化水平不高，城镇发展与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不相称，在分担城市功能、吸引城市人口和集聚非农产业、吸引农民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发挥得不够，具体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①城镇发育程度低。小城镇必须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集聚效益，但目前北京郊区建制镇的规模较小，2002年平均每镇只有2.48万人，与广州的5.01万人、上海的4.24万人相比，差距较大。即使是北京郊区发展得比较好的中心镇，平均每镇的人口规模也只有3.33万人，比上海重点镇的5.04万人，要少1.71万人。这说明北京郊区建制镇的发育程度较低。

②镇区规模小。小城镇的集聚效益主要靠镇区体现，2002年北京郊区城镇的平均镇区面积为3.72平方公里，低于广州和上海的水平。北京发展得较好的中心镇与上海的重点镇相比，平均每镇也要小0.78平方公里（见表3）。

表3　2002年建制镇镇区基本情况

类　别	平均每个镇区面积(平方公里)	平均每镇人口(人)	镇区人口占镇域人口比重(%)	平均每镇外来人口(人)	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外来为1)
广　州	3.85	16451	32.8	6195	2.66
上　海	5.71	17904	44.2	3586	5.95
北　京	3.72	4815	19.4	916	5.25
上海重点镇	5.63	22448	44.5	—	—
北京中心镇	4.85	9683	29.2	2135	4.53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北京乡镇统计资料、2003年上海郊区统计年鉴、2002年广州小城镇统计资料汇编整理计算。

③人口城镇化水平不高。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建制镇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是镇区人口占镇域人口的比重。2002年北京郊区建制镇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为19.4%，是北京、广州、上海三市中最低的。其中平均每镇外来人口数量、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比广州高1倍以上，这说明北京郊区城镇与上述两市相比，聚集人口的能力较差。再看北京的中心镇，虽然其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要比北京所有乡级建制镇的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但与上海的重点镇相比，仍低15.3个百分点（见表3）。

④产业的集聚程度较低。2002年北京郊区镇区的乡镇企业个数、人数占全镇乡镇企业个数、人数在三市中是最低的，这说明北京郊区城镇的产业集聚程度不高（见表4）。从表4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基本上是与其集聚程度成正比的，北京郊区城镇的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使得其经济效益在三市中也是最低的。

表4　2002年乡镇企业发展情况

类　别	企业数量			从业人员			年净利（万元）	人均创利（元）
	全镇（个）	镇区（个）	镇区占全镇(%)	全镇（万人）	镇区（万人）	镇区占全镇(%)		
广　州	76647	19816	25.9	107.30	35.80	33.4	1008828	9401.0
上　海	35351	27900	78.9	164.34	79.72	48.5	2032736	12369.0
北　京	26568	5117	19.5	76.79	17.24	24.4	572913	7460.8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北京乡镇统计资料、2003年上海郊区统计年鉴、2002年广州小城镇统计资料汇编整理计算。

⑤经济实力较弱，产业层次不高。2002年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镇域人均财政收入北京高于广州，低于上海；在镇区产业结构上，北京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是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反映出北京乡镇的第二、三产业不够发达，能够容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限。再从北京郊区建制镇近5年来从业人员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变化，1997年为39.45%，2002年为39.73%，说明北京郊区建制镇的非农产业发展非常缓慢，只在第二、三产业之间有些调整，对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所起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表5　2002年镇域经济发展及镇区就业情况比较表

类　别	镇域人均财政收入(元)	镇区从业人员所占比重(%)			
		总　量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广　州	833.5	100.0	13.7	53.9	32.4
上　海	3952	100.0	4.50	58.50	37.00
北　京	955	100.0	31.35	37.16	31.48
上海重点镇	2713	100.0	6.65	60.00	33.34
北京中心镇	1049	100.0	26.94	38.85	34.21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北京乡镇统计资料、2003年上海郊区统计年鉴、2002年广州小城镇统计资料汇编整理计算。

二　北京郊区乡镇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

造成北京乡村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进程推进速度不快的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1. 客观原因

①自然条件的制约。北京乡镇发展所需要的自然条件不如广州、浙江和上海。第一，北京地处北方，气候较冷，使北京城镇化的发展基础——农业生产发展与广州、浙江和上海相比受一定的制约；第二，北京市域内约有2/3为山区，在山区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城镇发展都会受到地形、地势的制约；相比之下，上海全部是平原，广州除少量丘陵地带外，基本上是平原；第三，北京是个水资源紧缺的城市，年平均降水量为644毫米，上海、广州则均在1000毫米以上，而水资源既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②区域发展条件的制约。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处于我国区域经济较为发达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但从区域发展水平和城镇体系发育的程度上看，京津冀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与江浙一带的乡镇经济发展联系密切，而江浙一带的乡镇经济发展在全国也处于领先水平，这对于促进上海乡镇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的龙头，已与利用毗邻港澳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珠三角城市带融为一体。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本身的发展水平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北京周边地区乡镇的发展水平不太高，与北京的经济联系也不太密切，这使北京乡镇的区域发展条件不如上海。

③北京特殊的城市性质和功能的影响。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北京独具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使北京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要服从于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需要。而上海是全国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中心，广州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中心，其经济功能非常突出。北京与上海、广州在城市性质和功能上的差别对经济和城镇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2. 主观原因

①开放程度不够，封闭式发展。长期以来，北京乡镇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局限于自身，与中心城区的联系不够密切，与京津冀区域内的其他乡镇的联系也不多。当然这里有区域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努力不够。

②产业发展没有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城市经济之所以能够产生比农业经济更高的效益，是因为专业化、规模化生产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海、广州乡村城镇化水平之所以较高，也是因为他们那里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程度较高。如广州番禺的大石镇，是以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小城镇，镇上共有企业600多家，以机械、家电、建材、钟表等为主导产业，其中广州日立电梯厂等企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创造很高的经济效益，大大推动其城镇化进程。

③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不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对推动乡村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广州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如广州番禺的大石镇，利用侨乡优势，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在镇上的600多家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北京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思想还比较保守，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不够。

④利用首都、文化中心这一优势不够。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还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这是北京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最大优势。虽然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等于这一定会制约郊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展符合首都特点的经济。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北京做的还不够。

⑤缺乏对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的引导、帮助。实现城镇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就业向非农产业转化，而农民以往只有农业型技能，缺乏在城镇中谋生的城市型技能，同时也缺乏就业指导信息，他们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得到帮助，而在这一点上，各级政府做的还很不够。

三 政策建议

1. 提高产业发展的专业化、规模化水平，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要提高北京郊区乡镇的总体规模和经济实力，应对现有产业结构及空间分布进行调整，可对目前已有一定特色和发展基础的乡镇加以引导和扶持，形成特色鲜明的专业化、规模化乡镇。这样不仅能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还能增强乡镇的集聚能力和规模效益。

2. 加强区域联系，在更大的范围考虑郊区城镇化的发展

北京郊区乡镇的发展，要跳出以自我发展为中心的框框，将自身的发展与整个北京、京津冀地区乃至更大的区域联系起来。明确我们在北京乃至区域城镇体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中心城区、卫星城的分工与协作，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利用我们的优势和外部的资源，发展郊区乡镇。

3. 优化发展环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乡镇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

北京市的各级政府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调整现有乡镇发展政策，以优化发展环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非公经济的积极性，参与乡镇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

4. 充分利用首都优势推动郊区城镇化进程

地处首都圈是北京乡镇有别于其他地区乡镇的最大特色，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并利用北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发达的优势，进一步提高郊区乡镇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质量，推动郊区城镇化的发展。

5. 扩大镇区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加速人口和产业向镇区集中

集聚是城镇有别于乡村的最明显的特征，也是创造高效益的必要条件之一。目前北京郊区乡镇作用发挥得不理想，与上海、广州差距较大，很大程度上是北京郊区乡镇规模太小。为此，我们应在运用经济杠杆、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扩大镇区的经济规模与实力，调整乡镇的工业小区，吸引人口和产业向镇区集中，使镇区规模达到 10000 人以上，这样才能使乡镇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6. 增加科技投入，提高技术水平

针对目前北京郊区乡镇企业中科技力量薄弱，导致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应增加科技投入，利用北京中心城区科技力量强的优势，采取人才引进、技术入股、进修培训、与科研单位或大专院校合作办厂等多种方式，提高郊区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

7. 对农民进行城市型技能的培训，提高他们的非农就业的能力

要提高农民非农就业的水平，最根本的是要让他们掌握城市型技能，能够进入城镇谋生。为此政府要把这项培训，放到与绿色证书培训（农业型技能）同等重要的地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如民间力量、私人机构等参与培训，帮助农民提高非农就业的能力。

8. 加快山区镇的发展是提高北京郊区城镇化水平的关键

北京郊区 2/3 是山区，且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因此加快山区镇的发展是提高北京郊区城镇化水平的关键。由于山区发展受到诸多限制，不可能自身创造出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所以造成近年来非农就业比重下降。为此要在提高山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帮助山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山区，到大中城市、卫星城或平原地区的小城镇就业。一方面使这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了出路；另一方面他们在外面所获得的收入，也可以帮助留在家乡的亲人提高生活水平，他们所带回的信息、城市型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还可以帮助家乡推进城镇化进程。因此，只有走出山区才能发展山区。

相关链接

“皮书系列”图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年来推出的大型系列图书。它由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年度报告组成，对每一年度中社会各个领域的存在状况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预测。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为主，兼有各部委、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均为国内一流研究机构的一流专家，他们的看法和观点代表了对中国现实和未来最高水平的理解和认识。

皮书是非常珍贵实用的资讯，对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士都能提供有益的帮助。适宜各级政府部门决策人员，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领导，媒体记者，国外驻华商社和使领事馆工作人员，以及关注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形势的各界人士阅读。



经济蓝皮书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刘国光　王洛林　李京文　主编
每年12月出版　（附SSDB光盘）

本研究为总理基金项目，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领衔，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等数十家科研机构、国家部委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共同撰写，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分析中国每年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态势，其内容涉及宏观决策、财政金融、证券投资、工业调整、就业分配、对外贸易等一系列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社会蓝皮书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主编
每年12月出版　（附SSDB光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编写，联合中央党校、清华大学等十几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国家部委的专家共同撰写，从不同层面对中国每年社会的改革现状和发展态势、特别是对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论述。



世界经济黄皮书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王洛林　余永定　主编
每年12月出版　（附SSDB光盘）

本书主旨为世人普遍关注的来年世界经济形势发展作出的预测和分析。报告分为：“综合报告”部分，概述全球经济一年走势的特点；“国别与地区”报告部分，深入解析各地具体发展态势；“专题研究”报告部分，注重对引发全球经济动荡现象的评述。



国际形势黄皮书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李慎明　王逸舟　主编
每年12月出版

一部对未来一年国际形势进行预测的作品，主要涉及当前国际安全在新时期总的走向、大国战略关系、中国周边安全、第三世界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特征、各国政党、西方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中的妥协机制等内容。

相关链接

农村绿皮书

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编
每年3月出版



对当年所进行的农村重大改革实施过程和绩效进行评价，分析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策略。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刘国光 王洛林 李京文 主编
每年5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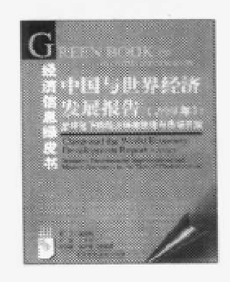


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经济学家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分析与预测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当年度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推断。

经济信息绿皮书

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王长胜 主编
每年12月出版（附SSDB光盘）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年度报告，由中心主任王长胜担任主编。该书今年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环境治理与市场开放”。内容涉及国际环境、定位战略、产业战略、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国汽车、钢铁、房地产市场、电子政务等热点和敏感话题。

财经蓝皮书

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报告

江小涓 主编
每年2月出版



帮助读者对当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未来一年的经济走势有一个全面、翔实、宏观的认识。每年一个主题。它也是一部对策研究著作，可为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旅游绿皮书

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中心 编
每年11月出版 （附SSDB光盘）



中国旅游发展的专题报告集。对中国旅游发展的现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对中国旅游未来趋势提出预测和对策建议，为政府制定旅游政策、企业进行决策和学术界进行研究提供参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组织邀请国内长期从事旅游研究的专家编撰，是了解中国旅游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的重要报告集。